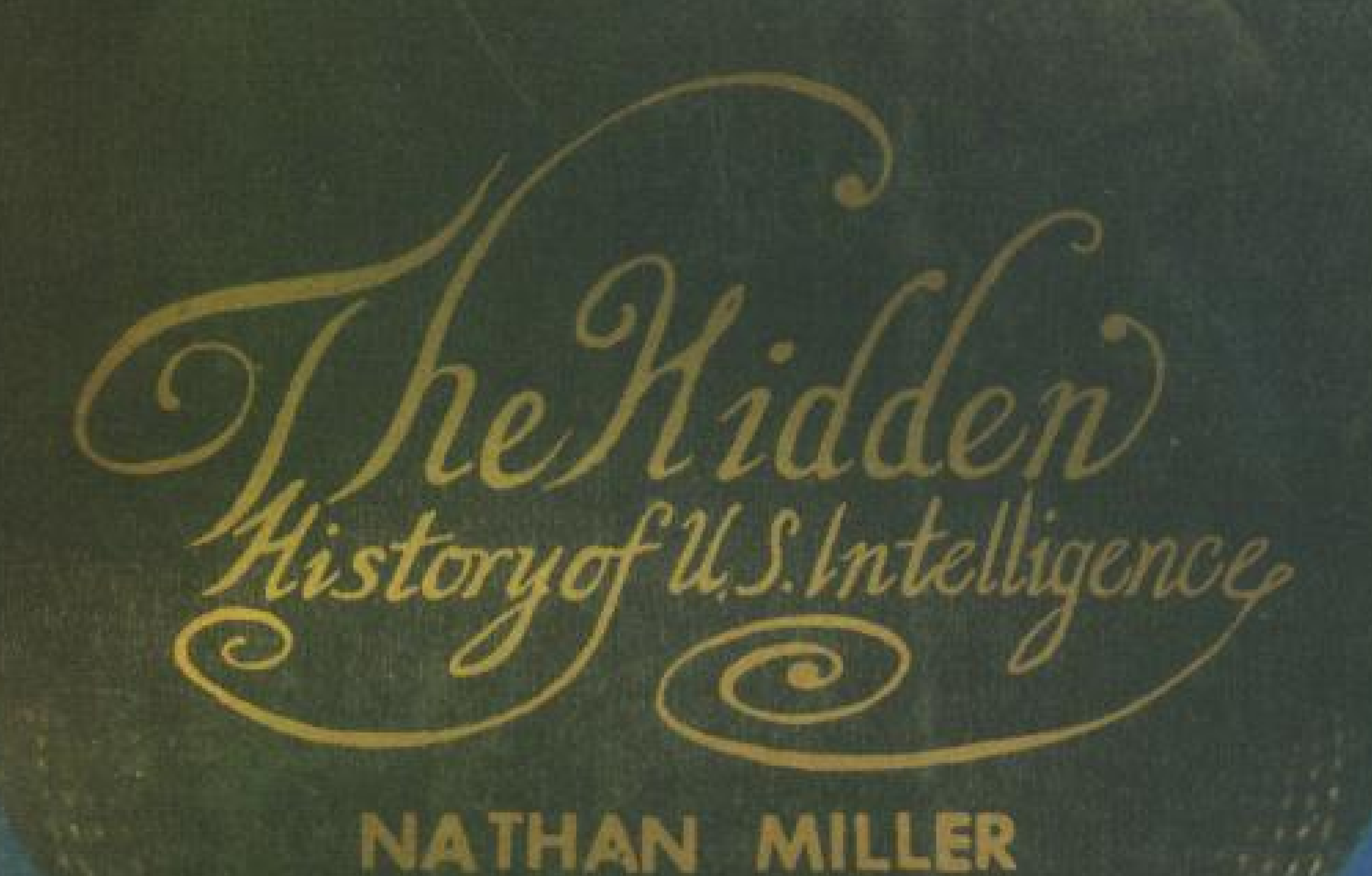


美国谍报秘史

【美】内森·米勒 著
王业桄 任福康 华希玲 译

译林出版社



美国谍报秘史

【美】内森·米勒 著

王业桃 任福康 华希玲 译

译 林 出 版 社

苏新登字第8号

Nathan Miller

Spying for America

——The Hidden History of U.S.Intelligence

根据纽约Paragon House出版公司1989年第一版译出

美国谍报秘史

[美国]内森·米勒著

王业桃 任福康 华希玲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淮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4.50插页 2 字数330,000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00

ISBN 7-80567-135-4

I·51 定价：6.80元

译 者 序

介绍美国谍报工作片断的书籍出版不少，然而像内森·米勒1989年推出的《美国谍报秘史》这样全面系统介绍美国谍报工作来龙去脉的专著却不多见，难怪作者声称他做了“一项开创性工作，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本书的显著特点之一是详实。作者通过采访众多情报界人士和借助大量资料与素材，详细记录了美国谍报工作自建国之初到80年代后期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从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中的业余间谍，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职业间谍，到近代争夺世界之战中的官僚间谍，这一切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完整的而不是零散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历史画卷。

本书的又一个特点是新颖。作者在重点分析典型案例的过程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和内幕，把秘密战争的扑朔迷离和惊心动魄描写得细腻深刻，使交织着阴谋、欺骗、讹诈和暗杀的幕幕活剧生动引人，知识性与趣味性融于一体。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有一定深度。作者不是简单地罗列历史案例，而是在客观叙述美国谍报工作历史变迁的同时，用简练的笔墨，概括总结谍报与反谍报工作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既阐明了谍报工作与军事斗争，国内政治及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又揭露了情报机构内部、情报机构与行政部门和国会之间的明争暗斗。全书没有令人生厌的冗长议论，但处处贯穿了发人深思的综合分析，给读者一定启示。

作者思想观点上存在的某些偏见，请读者阅读时加以鉴别。为了节省篇幅，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删除了一些不必要的注解、照片和细节。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广大读者匡正。

1991年5月

目　　录

第一部：业余间谍

第二部：职业间谍

第三部：官僚间谍

第一部

业 余 间 谍

1. 用间老手乔治·华盛顿

约翰·霍尼曼似乎不像个间谍。

他魁梧结实，身材在英6尺以上。在泽西西部酒馆、饭店他极力标榜自己对英王乔治三世忠心耿耿。在反英的美洲殖民地，他是个为英军服务的牛贩和肉商，有时甚至给他们提供一点情报。1776年12月底，当他在位于特伦顿的雇佣兵基地附近徘徊时，自然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霍尼曼仔细地观察哨兵的警惕程度，部队的部署和大炮的分布，因为他表面上是名亲英肉商，实际上是华盛顿手下一名最精明能干的特工人员。

寒风呼啸着掠过特拉华河浑浊的水面，霍尼曼用斗篷裹紧身子，走在僻静的小路上。田野里的积雪已经冰冻，在冬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欧洲军队在严寒气候下不打仗，前不久，英军司令威廉·豪下令所属部队住进城镇舒适的冬营；而这时华盛顿军队的残部却在数英里以北的宾夕法尼亚河畔凛冽的寒风中安营扎寨。华盛顿军队伤亡惨重，不少人开小差逃跑，残部中许多人没有鞋子、毯子，更没有信心。在《独立宣言》签订5个月后，美国的自由火炬越来越暗淡无光。

英国人已经占领纽约，华盛顿的军队像丧家之犬被赶出

新泽西州。惊慌失措的国会害怕敌人迅即占领费城而逃往巴尔的摩。“这是考验人们意志的时刻，”在令人沮丧的撤退中，托马斯·佩因鼓动说。甚至总司令华盛顿也同样意识到情况危急，他在给兄弟约翰·奥古斯丁·华盛顿的信中写道，如果不采取措施阻止服役期满的士兵回家，“我看我们的事业也差不多寿终正寝了。”

然而华盛顿心中仍燃烧着一线希望。该地区的英军兵力分散，主要盘踞在特伦顿、博登敦和伯灵顿。如果成功地突袭其中的一个据点，那将使他的军威大振，给美国革命带来新的转机。可是他迫切需要获得敌军情报。“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搞到情报，”他对指挥官们说。总司令把具体要求通过秘密渠道转达给霍尼曼后，焦急地盼望着回音。足够的时间过去了，华盛顿下令逮捕那位亲英肉商，并指示务必活捉。

1年前，华盛顿在费城就任大陆军总司令，当时他就同霍尼曼制订了联络办法。霍尼曼是苏格兰-爱尔兰裔人，曾在英军服役，在法国同印第安人打仗、占领魁北克时，主动要求担任间谍。他们商定，他假装是个托利分子①，一旦获得重要情报，就让美军逮住交给总司令亲自审讯。

12月22日，霍尼曼已经摸清敌情：特伦顿的雇佣军立足未稳，防守松懈，突袭容易成功。他来到特拉华河畔，寻找被美军擒获的机会。突然他发现两个美军骑兵下马休息。为了保持亲英肉商的模样，霍尼曼从附近牧场放出一头母牛，扬鞭吆喝着朝他们赶去。他们一看来人正是华盛顿将军要抓的流浪汉，冷不防扑上去。霍尼曼假装拼命挣脱，然后巧妙地在冰上滑倒，才被制服了。

---

①这里指亲英分子。

两位侦察员怀着胜利的喜悦把俘虏押回司令部，因任务完成出色而获得嘉奖。华盛顿命令左右离开办公室单独审俘。霍尼曼汇报了特伦顿的敌情，与华盛顿通过其它渠道获得的情报完全相符。大约半小时后，霍尼曼被关进禁闭室，准备第二天上午接受军法审判，可是不一会儿，军营中突然大火冲天，哨兵们纷纷离开营房去扑救。灭完火回去，哨兵们发现俘虏已经不见踪影，似乎无人知道他是怎样逃走的。

霍尼曼越过部分冰冻的特拉华河，向驻守特伦顿的雇佣军司令约翰·雷尔上校报告。他顾不得满身汗水、筋疲力尽，汇报了自己被捕与逃跑的经过。他说根据自己亲眼观察，美军混乱不堪，根本无法发动攻击。听完汇报，本来不把敌人放在眼里的雷尔，更以为对手不堪一击了，毅然决定按计划隆重庆祝圣诞节。霍尼曼根据华盛顿的指示，编造了这一假情报后，便悄然离开雷尔的驻地，迅速消失在茫茫夜幕中。

圣诞之夜，华盛顿冒着鹅毛大雪重新渡过特拉华河袭击特伦顿。不到1小时，攻击胜利结束。正如霍尼曼所说，雇佣军毫无戒备，许多人烂醉如泥、酣睡不醒，根本谈不上抵抗。英军遭到这次沉重打击后，迅速撤离博登敦、伯灵顿和霍利山。华盛顿乘胜追击，又成功地袭击了普林斯顿。由于一名间谍的杰出贡献，人们重新激起对美国革命的信念，一些服役期满的士兵继续留队，革命得救了。

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个善于用间谍的军事家，他对情报工作高度重视，其重视程度也许是美国历史上任何军事指挥员都无法比拟的。他从一开始就深知战时情报工作的重要。1775年7月2日，他在担任围困波士顿英军的美军总指挥仅几天后便立即着手建立间谍网络。事实上，在战争财务支

出档案中，第一笔数目可观的费用(333.33美元)就是为派遣一名特工员“去波士顿市建立秘密情报组织”而开销的，并且不久又增派了特工人员。为了保护这些间谍的安全，华盛顿十分谨慎，没有列出他们的名字，以防帐簿落入敌人手中。

准确的情报对华盛顿至关重要，因为对英作战资源极为贫乏。由于无法招募一支人数众多、训练有素的军队，他只好采用突然袭击和打了就跑的军事策略，圣诞之夜偷袭毫无戒备的雇佣军就是一例。情报使他能弄清敌我双方的长处和短处，了解了这一点，他就能在利用对手弱点的同时掩盖自己的弱点。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情报决定一切，秘密情报的获取和传递是成功的关键……”

华盛顿把搜集准确的情报当作自己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整个战争期间，他亲任情报部长，并且表现了当之无愧的杰出才能。间谍、双面间谍、反情报、隐蔽活动、假情报宣传、密码，这些情报工作技巧他都了如指掌。他亲自挑选特工人员，给他们作指示，分析并使用他们的情报。情报工作使这位日理万机的总司令更加繁忙，这充分说明，当时的领导人高度重视情报工作，而后来的领导人却有所放松。

华盛顿的早期情报手段是原始的，主要依靠大胆、有时鲁莽的非专业人员搜集情报，随着战争的发展，他的手法日益巧妙。研究华盛顿书信后表明，他几乎每天都同正在活动的情报官与间谍保持联系。谍报网络建成后，他十分强调吸收“隐蔽”间谍，让他们在大陆军被迫撤出的地区继续留在敌后工作。“从生活在敌方人员那里能得到最有用的东西，”经过几年战争后华盛顿深有体会地说。

华盛顿的许多指示似乎出自一位当代情报部长之口。他认为，零星情报与其它情报汇集起来可能很有用处，因此他

告诫部属不要忽略任何情况。"我们在搜集工作中甚至要注意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有些情况看来似乎不起眼，但同重要的情况合在一起，就可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他说。他对特工人员的指示具体明确，要求他们提供的情报务必迅速准确。他规定，特工人员的任务是确切了解英国陆军和海军的活动、工事和基地的分布，甚至包括敌军的士气和健康状况。华盛顿将军要求得到可靠情报，而不要主观推测的材料。"我不希望你们去注意别人提供的模棱两可的情况，"他对助手伊莱亚斯·戴登上校说。"只有弄清敌人团、军的具体数字，我们才能推算出他们的人数，这比主观推测的数字要准确。"

联系中断常常使华盛顿焦急不安。如果同一名间谍的定期联系突然中断，他总是迅速了解情况，敦促部属保证情报渠道畅通无阻。"我已3天没收到情报了，"他给一位将军写信说，"这使我十分不安，因为我军的运动全靠你给我提供的敌军情况。定期给我报送情报十分重要，我要求你每天给我报送情报快件，使我准确了解敌人的位置，把你可能从间谍、逃兵等渠道获取的情报送我。"

华盛顿将军明白，情报在传递中可能会添枝加叶或疏忽遗漏，因此他喜欢书面情报而不喜欢口头情报。有些特工人员得到一种"隐显剂"或称隐显墨水，这是由当时住在伦敦的约翰·杰伊的哥哥詹姆斯·杰伊医生发明的。当战争一触即发时，詹姆斯爵士给弟弟寄去这种墨水和相应的冲洗剂。杰伊的墨水与通常用于密写的柠檬汁和牛奶不同，接近烛光时不能显影。

华盛顿总是认真审阅每个特工员呈报的材料，并且总要与其他人员提供的情报进行验证。有时他向同一地区派遣两名间谍而不让本人知道。"如果他们不知道各自接受的任务，那么通过比较他们的活动情况，就很可能了解到真实的

情报，"他说。尽管经费不足，他总要保证特工人员得到一些奖赏。华盛顿将军对那些为了金钱而从事谍报工作的人保持高度警惕，他诙谐地说："敌人可以付出比我们多的价钱收买他们的忠诚。"

当然，对敌用间并不是华盛顿的发明，间谍手段在18世纪的战争中已普遍使用。当美洲殖民地不满的火种燃烧起来时，双方很快使用了间谍。美国革命得到若干秘密组织的支持，最著名的是为了反对"印花税"于1765年建立起来的"自由之子社"。该组织的地下网络遍布各殖民地，有时用暴力反抗英国的政策。另一方面，亲英的效忠分子也不断向英国军队报告当地人民的秘密活动。

波士顿成为这场秘密战争的中心，因为英国对殖民地的限制政策威胁了该市的商业利益。由于市民抗议茶税，把3船茶叶倾入大海，1774年6月1日，英国政府下令关闭波士顿港，直至茶叶得到赔偿为止。托马斯·盖奇将军被任命为该殖民地的军事总督，英国驻军不断增加，狭窄的街道上回响着欢迎的鼓声，最后英军达到当地居民的三分之一。

在监视占领军的组织中，是著名银匠保罗·里维尔领导的30名勇士。每天晚上他们在绿龙酒馆碰头时，常常有二三人悄悄上街巡逻，注视英军人数以及他们的动向和部署。里维尔和他手下的人还从因港口关闭而失业的数百名海员那里收集情报。这些海员常在码头闲逛，能听到有关英国士兵和水手的消息，很乐意提供情况。情报获取后报告给州议会建立的公共安全委员会负责人约翰·汉考克，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包括著名的爱国者塞缪尔和约翰·亚当斯、约瑟夫·沃伦博士和下文将要进一步谈到的本杰明·丘奇博士。

盖奇也在波士顿市区和周围农村布下间谍。甚至在里维

尔的间谍网内也有人通敌。"一位表面上与托利党有联系、但实质上是辉格党① 的绅士告诉我说，我们的聚会被人发现了，"里维尔的间谍网负责人写道，"这位绅士还提到我们前天夜里讨论的具体内容，和我们讲的完全一样。"密谋者们大吃一惊，发现他们的聚会再也不安全了，迅速放弃了绿龙酒馆这个碰头地点。里维尔深信州议会中出了叛徒。

1775年4月上旬，盖奇接到密报说，美国人在离波士顿21英里的康科德集中了大批军火。"如果现在突然袭击……那会打乱他们的全盘计划，"一位间谍说。担任袭击的分队组成后，为了掩人耳目，盖奇故意放风说那是为了执行特别训练任务。但是4月16日里维尔意识到有重要情况，他指示波士顿港内的运输船把小船全部放到大船的船尾，作好防范准备。在英军司令部的一位马夫偷听到军官们议论盖奇准备突袭反叛者的计划后，转告了一位假装亲英的朋友。第二天，里维尔骑马飞奔康科德报告了英军计划，他也在列克星顿停留，向去费城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的约翰·汉考克和塞缪尔·亚当斯作了汇报。

接到警报后，殖民地的人民赶紧把武器弹药转移到偏僻的谷仓和沼泽地，转移工作十分迅速，盖奇将军的间谍无法赶在英军发兵之前报告这一突然变化。其间，当地民兵奉命磨刀擦枪，作好战斗准备。里维尔在回波士顿之前去查尔斯敦安排发英军已经开始行动的信号② 。注意到基督教堂——

---

①指主张北美殖民地与宗主国英国分离的派别。

②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诗中的记载与这里所说不一致。里维尔当时不在查尔斯河对岸安排发信号一事，而是在波士顿帮助悬挂信号灯。威廉·道斯奉约瑟夫·沃伦博士之命传送英军已经行动的消息，他从波士顿隘口出了城。当夜，沃伦担心道斯被捕，指示里维尔去农村报告敌情。里维尔驾小船渡过查尔斯河，骑马奔向列克星顿，准备向汉考克和亚当斯报告，但还没有到达康科德，他就被英军抓住，但英军扣下他的马后，就把他放了。

老北教堂——的塔尖隔河望去十分清晰，他便告诉一位同伴，如果英军取道波士顿隘口从陆上出发，那就悬挂一盏灯，如果他们渡河，那就悬挂两盏灯。

1775年4月18日夜里10点刚过，700英军从波士顿广场出发，他们悄悄驾着小船，划过查尔斯河乌黑的水面。当时正值涨潮，行至坎布里奇附近时，他们被迫蹚过齐胸的河水上岸。次日拂晓，这支又冷又累、脚穿笨重皮靴的部队向列克星顿和康科德进发，打响了震惊世界的枪声。

1775年11月底，驻罗得岛华盛顿部队的指挥官纳撒内尔·格林准将请求秘密会晤总司令，他领着一位非军人来到坎布里奇的布拉特尔大街。华盛顿将军支走随从，把门关上，格林介绍了同来的伙伴：他叫戈弗雷·温伍德，是个有钱的面包师，他从家乡纽波特带来一封密信。

华盛顿看完信后迷惑不解，又反复看了几遍，仍然看不懂。原来此信充满晦涩难懂的印刷符号，是故意用密码写成的，收信人是盖奇将军手下的一名军官。华盛顿见过的“密信”不多，但他立即警觉起来，这也许是封通敌叛国信。

当问到信的来历时，温伍德略显难堪地说，大约两个月前，他相识的一位水性杨花的女人突然从波士顿去纽波特找他，要他引见停泊在纽波特附近的英国《玫瑰》号驱逐舰舰长詹姆斯·华莱士，或某些著名的亲英效忠分子。面包师听后大吃一惊，问目的何在，那女人称受坎布里奇的一位朋友之托向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送一封信，以便让信再转到波士顿去。当问起这位朋友是谁时，她拒绝回答。温伍德害怕被卷进托利分子设下的阴谋，故意迟迟不办，后来那女人发现他在拖延，便留下一个密封的信袋要他帮助投送。

心神不安的面包师把这个神秘的信袋拿给一位名叫马克斯韦尔的朋友看。信拆开了，温伍德最担心的事终于得到证实，收信人是“波士顿英军凯恩少校”。惊惶失措的温伍德没有把信交给殖民地当局调查，而是保持沉默。几个星期后，那个女人来信责问他为何不把信转到波士顿，并且写明她在坎布里奇的地址。温伍德准确地推测出，密信作者只要不同波士顿联系，肯定不知此信没有送到目的地。最后他把信送给罗得岛当局，当局深信其中必有阴谋，便赶紧介绍他去坎布里奇找格林将军。

听完这番话，华盛顿下令立即逮捕那个女人。当天夜里，根据她写给温伍德的地址，把她抓住交给总司令亲自审讯。身高6英尺的华盛顿身穿浅黄色的制服威风凛凛，脸色严峻，令任何密谋者胆战心惊。信是谁写的？他问道。为何用密语写？信上写的是什么？

那女人声泪俱下，口口声声说自己无罪，不知是怎么回事。华盛顿警告她说，她给敌人递送情报铁证如山，犯了间谍罪，要判死刑。可是，正如华盛顿后来对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所说：“磨了好一阵子，威胁、劝告都不见效。”审讯延续了整整一个通宵，直至第二天，那女人终于屈服了，供出了交信人是本杰明·丘奇博士。

华盛顿仿佛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丘奇不仅是州议会成员，而且是医院管理总局局长，现任大陆军的主要军医，他的办公室与总司令部隔街相望。然而，华盛顿还是传讯了丘奇，并在审问丘奇的同时，找到两位密码破译军官搞清信的内容。

丘奇似乎很老实，立即承认信是他写的，由情妇送到纽波特，准备再转给住在波士顿的兄弟弗莱明·丘奇。为何用密

语写呢？纯粹因为谈的是私事。丘奇还辩解说，把信发往波士顿不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同英军占领区的人员可以定期通信。华盛顿指出，打着白旗互相通邮完全可以理解，但是经过纽波特转一封信，并且是用密语写的，这令人生疑。华盛顿还进一步说，尽管丘奇强烈表白自己赤胆忠心，但并未主动要求把信用明白的语言翻译出来。

事实证明华盛顿的怀疑是正确的。10月3日，信的内容破译出来了，里面谈到丘奇最近的费城之行，那里的议会正在开会，丘奇告诉那位似乎与他保持定期联系的收信人，会议的基调是“团结一致、斗争到底”，信中还透露了殖民地军队的人数、装备和战争准备情况，同时谈到准备动员一支军队进入加拿大的详细计划。显然，作者认识到此信的危险性，恳求收信人“务必小心”，不要让信落入他人手中，“否则我就完了”。

丘奇通敌变节证据确凿，但他继续玩弄花招，企图挣脱行将套上脖子的绞索。他诡称同英军联系是为了支持美国革命，说什么他在信中故意夸大了大陆军的力量，目的是阻止盖奇将军发动进攻，因为当时大陆军弹药告罄，华盛顿甚至禁止鸣放礼炮，担心一旦引起英军炮击，他的炮兵部队无力还击[1]。丘奇鼓动如簧之舌，辩解自己没有叛国通敌，而是一直在为美国革命尽心尽力。华盛顿没有听信他的话，下令将他关押起来等候军法审判。

不久法庭给丘奇定了罪，人们以为这个间谍一定会被判处绞刑。然而令华盛顿懊恼的是，后来发现，国会在起草大

①由于军火短缺，在波士顿城外警戒道路的前沿部队通常发给长矛而不是滑膛枪。本杰明·富兰克林提议部队装备弓箭，理由是，士兵在装子弹、射击一次的时间内能射出4枝箭。

陆军条例时忽视了对间谍的惩治，军事法庭能够决定的最严厉的刑罚是鞭笞39下、开除出军队。虽然后来国会弥补了这一缺陷，通过了处死间谍的法律条文，但是这个法律条文来得太迟了，没有能实施到丘奇身上。①

华盛顿觉得，如果让这个气焰嚣张的无赖逃脱应得的惩罚，那将是不可思议的。他把丘奇交给州议会，由它处理这个叛国通敌的议员。丘奇被开除了议员资格，关进监狱等候进一步处理。丘奇被捕后，人们开始揭发他以往的可疑行为，包括列克星顿战役后不久，他似乎突然得到一大笔钱。当英军提出释放若干美国军官换取丘奇时，逮捕丘奇的人深信他是个极端危险的人物，不能释放。直至1777年年中，美国人才让步，下令把丘奇永远驱逐出美国。然而他未能领到英国人付给的奖赏，因为把他送往西印度的船遇到风暴而沉没，船上的人无一生还。

125年以后，通过查阅盖奇的文件，丘奇叛国通敌的罪行才真相大白。这些文件披露，从1774年——也许更早的时候——开始，丘奇博士就不断给英军提供有关美国政治秘密和抗英准备工作的内部情报。丘奇像历史上许多其他人一样，声称自己的行为是出于无私的动机——“拯救国家”。然而在他给盖奇将军的一份秘密材料中，有一句话作出了明白无误的解释：“每月25日我就花完最后一枚硬币，”这使人们想起，当时通常3个月才发一次工资，他通敌的真正动机也就不言而喻了。

①国会指定了一个由5人组成的间谍惩治委员会，其中有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考虑如何恰当处置那些给敌人提供情报或粮食的人。”该委员会制订了美国第一部《间谍惩治法》，规定对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判处死刑。该法于1776年8月21日通过。

1776年初，在遭到数月的挫折后，华盛顿获得一批把英军赶出波士顿所需要的武器：在尚普林湖畔泰孔德罗加要塞缴获的59门大炮用雪橇运到坎布里奇。兴奋无比的总司令命令要把大炮架在控制着波士顿市和整个港口的制高点多切斯特高地上。从1776年3月2日开始，美国人连续3夜炮击波士顿，以转移英军加强高地防守的注意力。英军被这一顿轰击搞懵了，无心去搞防御工事，最后一切都晚了，看到密集炮群的炮口，英军新任司令威廉·豪将军决定，他唯一的选择是弃城。3月17日，也就是圣帕特里克纪念日这一天，豪的最后一批部队和大约1000名垂头丧气的效忠分子乘船逃往加拿大诺瓦斯科舍的哈里法克斯。

华盛顿没有留在波士顿庆祝胜利，他预见到英军会袭击纽约城，马上率领主力挥师南进。保卫纽约是出于军事和政治双重考虑。相当一部分纽约市民，特别是富人，对托利党怀有同情心，对实行独立还是坚持英国的殖民统治摇摆不定。虽然要防守曼哈顿是不可能的，因为英国有一支庞大的陆军，外加一支随时能够运送增援部队的舰队，但是国会坚决主张防守该岛，以争取人民对美国事业的支持。

华盛顿预见到英军随时都会出现，他在哈得逊河两岸和东河对岸的布鲁克林高地构筑了堡垒，防止敌人包围他在曼哈顿暴露的侧翼。更令他不安的是，威胁他个人和军队的阴谋活动肆无忌惮。已被解职的亲英州长威廉·特赖恩从停泊在近海的一艘英舰上指挥各种阴谋活动。在纽约以北的农村和长岛，敌人正在募集游击队，第五纵队的人员到处活动。1776年5月，英国间谍获得一份有关美国防务和每个炮兵连详细情况的报告。

1个月后，一起极其险恶的阴谋被揭露出来了。一个伪造

假钞、即将受审的罪犯企图通过告发同伙而得到释放，他告诉当局，因使用假钞而被捕的两名军人曾想介绍他加入由特赖恩州长和亲英的纽约市市长戴维·马修斯正在筹建的一个托利军人团体，这两名军人是军士托马斯·希基和二等兵迈克尔·林奇，都是华盛顿将军的警卫。其它来源的情报也证明这一令人吃惊的报告属实，并且华盛顿的警卫中已有一些人被关押起来。

阴谋杀害或绑架总司令的传闻甚嚣尘上。据说华盛顿曾经拒绝吃他平时很喜欢吃的一碟豌豆，管家只好撒给鸡吃，结果鸡全都死了。另有传闻说，以希基为首的一伙人企图绑架华盛顿，把他作为叛徒交给英军处置。也有人说希基想在英国入侵者到达纽约时刺杀华盛顿将军。其它传闻也与日俱增。有的说托利分子正在策划一起大规模暴动，要炸毁弹药库，抢劫武器装备，甚至大陆军的炮兵部队要掉转炮口叛变。

华盛顿下令对希基和"其他人"军法审判，但后来除了希基，谁也没有受到判决，也许"其他人"揭发了希基军士而保全了自己。虽然希基被指控"煽动并参与兵变和叛乱"，但没有请证人出庭证明他企图谋杀或绑架华盛顿，这也许因为华盛顿将军认为最好不使已经紧张不安的纽约人惊惶失措。确有证人证明，马修斯市长曾拿出100英镑给托利军人组织招兵买马，希基也向发展对象们许诺经费充足。希基在辩护中声称，他参与这起阴谋仅仅是为了骗取托利分子的金钱。军事法庭很快就下令将他绞死。

华盛顿利用处死托马斯·希基这件事对部队进行了深刻的教育。6月28日上午11点整，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响起了鼓声，希基被押着穿过查塔姆广场，来到鲍尔里路口的一块空地上，他的肩章已被撕掉，军服上的钮扣也全给摘掉了。希基突然

一笑，走上了绞刑架。绞索套上了他的脖子，双眼用布蒙上后，他被猛然吊起来。挂在绳子上的躯体猛烈地向上颤动，可怖的尸体在阳光下略带弯曲，它告诉人们，叛国通敌必然会得到这样的可耻下场。

2. 不畏艰险的间谍

在位于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附近辽阔的弗吉尼亚农村的中央情报局大门外边，矗立着一座与真人一样大小的内森·黑尔的青铜塑像。这座塑像是根据他的母校耶鲁大学里的纪念碑复制的。塑像上的黑尔是一个为独立战争捐躯的间谍。他双臂被反绑着，勇敢地等待着走向英国刽子手的刑场。虽然这尊铜像显然是为了让今天的间谍缅怀前辈的爱国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然而黑尔很难算作一个成功的间谍典范。

黑尔的任务是查明长岛英军的兵力，然而该计划从构想到实施都背离了谍报工作的基本常识，也许在美国谍报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位年轻军官完全缺乏情报工作经验，没有受过训练，在敌占区没有任何熟人，不会用密码、暗语对可能获取的情报加以处理，除了亲自递送，不掌握向上级传送情报的其它方法。这就是说，他必须书写和携带那些足以证明他是间谍、一旦被捕他会被绞死的情报材料。此外，黑尔性格直率，特别不适合搞秘密工作。一个指挥官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派遣这样一个准备极不充分的人去搜集情报。

英军重返纽约把乔治·华盛顿置于困难的境地。1776年

6月 29 日，也就是处死托马斯·希基的第二天，设在桑迪胡克半岛的瞭望塔发现远处海面船帆点点。几天后，35000 英军，其中有许多人是德国雇佣兵，在斯塔滕岛登陆。这是18世纪英国最大的一支远征军，几乎相当于华盛顿军队的两倍。然而，令华盛顿吃惊的是，英军司令威廉·豪爵士没有立即把大陆军赶出纽约，似乎他更感兴趣的是饮酒、赌博，同白肤金发情妇乔舒亚·洛林做爱。

两个月时间一晃而过，到了 8 月底，豪终于从斯塔滕岛跃上长岛格雷夫森得湾的海滩。他根据一个熟悉道路的间谍所提供的情报，从侧翼包围美军，从曼哈顿东河对岸的布鲁克林高地把美军赶回去，使美军损失惨重。华盛顿不能坐等灭顶之灾。8月 29 日，在夜幕和浓雾的掩护下，他率残部约9000人乘小船渡河撤退。次日清晨，英军醒后发现美军已不见踪影。

尽管华盛顿化险为夷,英军肯定不会罢休。他们完全控制了纽约市周围的水域，从曼哈顿的顶端到韦斯特切斯特——他们能封锁该岛的唯一出口——英军可以在任何地方登陆。华盛顿为了获取情报焦灼不安，不断要求指挥官们拿出情报来。“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他说。“我从来没有为了情报如此发愁。”虽然他也收到一些情报，但这些内容矛盾的情报使他思绪纷乱，他决定派一名间谍深入敌后摸清英军意图。

华盛顿知道不能强迫任何人承担如此危险的任务，所以他叫著名的精锐部队“诺尔顿别动队”的指挥官托马斯·诺尔顿中校挑选一名自告奋勇者。9月 10 日，诺尔顿召开了军官会议，告诉与会者华盛顿急需准确的情报,要求自愿报名。他告诫大家，这个任务非同寻常，危险性极大，如果被捕，该间谍肯定会被绞死。说完话，诺尔顿扫视了一下会议室，只

见军官们一个个无动于衷。法国一印第安人战争中的老兵詹姆斯·斯普拉格中尉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我愿意去同他们打仗，但是要打入他们内部，然后被抓住像狗一样吊死，我可不干。"最后，刚刚加入别动队、年仅21岁的上尉内森·黑尔主动接受了这个任务。

内森·黑尔是近代杰出人物中的典范——"爱国间谍"。在历史上，间谍活动被认为是个肮脏交易，多数人充当间谍是为了冒险或谋取私利。在美国革命时期，那些对间谍工作反感的男人和女人之所以接受这样的任务，是因为他们把国家的需要置于个人的感情之上，他们实际上是历史上首批有头脑的间谍。

黑尔从未干过谍报工作。他出身在康涅狄格州考文垂一个在殖民地事务中颇有影响的家庭。他英俊潇洒，聪明能干，身体健壮，在耶鲁大学深受大家喜爱。他就读耶鲁大学的目的是想当一名拉丁语教师。在他的朋友与同学中有后来在华盛顿将军的情报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本杰明·塔尔梅奇。1773年黑尔毕业后，先后在康涅狄格州的东哈德姆和新伦敦当教师。当听说波士顿周围的战斗打响后，他立即在当地应征入伍，被任命为中尉。在第一次战斗中，他冒着英舰的猛烈炮火，缴获了一艘小型给养船。由于机智勇敢，他得到晋升，并且由诺尔顿上校点名加入了别动队。

黑尔接受间谍任务后，去附近他原先的部队看望了耶鲁大学的同学和朋友威廉·赫尔上尉。赫尔听了他的决定大吃一惊，劝说他改变主意。可是黑尔毫不动摇。几年后，赫尔追忆了那次交谈。黑尔告诉他："祖国和总司令需要我完成如此重要的任务，我责无旁贷。我获取情报的唯一办法是化装

后打入敌营。”

9月 12 日，黑尔在老朋友斯蒂芬·亨普斯特德军士陪同下离开了哈勒姆高地的营地。两人沿着长岛海湾北岸向前走，寻找能把他们送过长岛的船只。在诺沃克，他们找到一条合适的民船“斯凯勒”号。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乌云笼罩着海湾水域，小船借着暮色掩护，悄悄驶进亨廷顿海湾。黑尔决定装扮成一位寻找工作的亲英教师——他身上带着耶鲁大学的毕业证书——上岸前，他换上一件棕色便服，戴上一顶平边圆帽。亨普斯特德想把朋友一直送到敌占区，但黑尔指示他回诺沃克，过几天再派小船到长岛接应，说完，便消失在茫茫夜色里。

“昨夜捕获的一名自己招认的敌特，今天11点在停炮场被处死，”1776年 9 月22日豪将军命令簿上记载的这句简短的话是有关内森·黑尔悲惨结局的唯一官方记录。没有任何信件、私人日记、法庭审判记录保存下来。他在长岛登陆后是怎样被捕的无法查证，在此我们只能重新构想。

如果黑尔执行任务不那么认真，他也许能够中途返回，因为他的任务甚至刚刚开始执行就不复存在了。9月 15 日，英军从基普湾在曼哈顿登陆，惊惶失措的美军纷纷逃命。除了曼哈顿北部，华盛顿将军到处挨打，再也不急需有关长岛敌军的情报了。因此，黑尔如果重新渡过长岛湾回到安全地带，他不会受到批评。然而，他却主动进入纽约市搜集敌军分布和设防的情报。9月 21 日，他在那里被捕，在他身上搜出了罪证。他可能是被认识他的亲英表兄出卖的，也可能是在去哈勒姆高地美军阵地途中被捕的，也就是在东河岸边等候接他的船只时落入敌手。

黑尔被带到比克曼大厦英军司令部由豪将军审讯。他讲出自己的名字、军衔，并且毫不隐晦地说出了自己的使命。豪查明犯人是身穿便衣的美国军官，下令第二天上午将他绞死。黑尔交由宪兵主任威廉·坎宁安看押，在比克曼大厦花房中被关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他被绞死在苹果园停炮场。

当天晚上，英军总工程师约翰·蒙特雷索上尉扛着白旗到美军阵地办事，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上尉谈起那天上午英军处死了一名叫黑尔的间谍。汉密尔顿知道黑尔是威廉·赫尔的好友，就把这个悲痛的消息转告了他。赫尔闻讯如惊雷击顶，经华盛顿批准，去找蒙特雷索上尉。后来赫尔把这位英国军官提供的黑尔临死前的情况写进了回忆录。

那天上午 11 点前，黑尔被带到停炮场。由于天气很热，蒙特雷索出于对即将被处决的这位年轻人的同情，要求坎宁安准许他进附近帐篷等候行刑。"黑尔上尉进了帐篷，他从容不迫，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他叫我取来笔和纸，写下两封信，一封给母亲，一封给当军官的兄弟。不一会儿他就被押上绞架。当时有几个人在场，他那独特的临终遗言深深地印在人们脑子里。他说：'我唯一的遗憾是只能为祖国献出一次生命。'"

从内森·黑尔毫无意义的牺牲，华盛顿看到建立系统的情报机构十分必要。几个月后，第一个名副其实的战时谍报网诞生了。尽管最有效、最迅速的情报都无法弥补大陆军的弱点，但是有好几次，由于间谍及时提供情报，大陆军才化险为夷。间谍约翰·霍尼曼在特伦顿和普林斯顿胜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个例子就清楚地表明，华盛顿的情报工作质量已大有改进。

这不是说华盛顿的间谍是专业人员担任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志愿从事情报工作的普通人，有些是向英军出售粮食和其它物品的农民和小贩，有些是与英国军官来往密切的绅士。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保存下来的甚少，只能从一封信、一个传说、老兵退休金申请书中找到一鳞半爪的记载。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得不到什么报酬或赏金的，能知道自己对美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就心满意足了。

华盛顿的情报人员中有费城辉格党赫赫有名的姓达拉的一家。这家位于第二号大街的宅第被英军豪司令的参谋部征用。由于大多数辉格党成员在战争中严守中立，豪手下的军官在达拉家的人面前无话不谈。然而达拉全家人都投身于美国革命。威廉·达拉把家里人偷听到的情况全都速记在小纸条上，由妻子莉迪亚将这些纸条藏在当时流行的蒙布大钮扣中，然后缝在14岁的儿子约翰的上衣上。这个年轻的特工带着情报悄悄出城，到怀特马什的美军军营去找哥哥查尔斯中尉。查尔斯熟悉速记符号，把父亲笔记的内容翻译出来后送给华盛顿将军。

1777 年 12 月 2 日晚，英国人要在达拉家开参谋人员会议，命令达拉家的人去睡觉以防他们偷听，莉迪亚听了这个命令反觉得更有必要摸清会议内容。她藏在隔壁房间一个壁橱里，把耳朵紧贴在薄壁板上，听到豪准备两天后偷袭华盛顿军队。当听到椅子移动的哗啦啦响声时，她知道会议结束了，便迅速上床装睡，一位叫房东关门的军官喊破嗓子才把她叫醒。

不到48小时敌人就要偷袭了，达拉家的人心急如焚。用什么办法把这个重要情报送给华盛顿将军呢？按通常的办法已经不行了，到处布有英军的警戒，威廉·达拉也很难离开

费城。莉迪亚勇敢地决定亲自去送情报。次日清早，她手拿布袋，走到哨兵跟前，说她去弗兰克福面粉厂买面粉。穿过英军的环形防线后，她向附近的日升酒馆走去，那里设有美军的潜听站。

莉迪亚·达拉的情报送到华盛顿那里，进一步验证了早先收到的关于英军正计划调动部队的报告。这是情报工作的常用方法，把零星情报收集起来，经过整理筛选，集中归纳出敌人的真正意图。由于得到预报，当豪发动“突然”攻击时，大陆军早已严阵以待。英军的阴谋破产了，正如一位军官所说，他们“像一群傻瓜”夹着尾巴回到费城。美军在当时是不堪一击的，一旦这次突袭得手，那将意味着独立战争的结束。

达拉一家的例子证明，华盛顿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收集情报的做法是极为有用的。然而必须认识到，既要获取准确情报，就应当在扑朔迷离的间谍与反间谍战中深入考虑一些复杂问题。首先，需要建立保持高度警惕的反情报系统，采取积极措施保护自己的秘密，肃清通敌的间谍和叛徒。第二，兵不厌诈，要创造性地使用欺骗手法给敌人提供假情报，化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虽然“假情报”也许是个现代术语，但这种做法却早就有了——华盛顿就巧妙地使用这个方法迷惑过英国人。

极为成功的例子之一是发生在1777年冬季的事。大陆军在新泽西州的莫里斯顿扎下冬营，人数已减少到约 4000 人，比离安博伊仅数英里的英军支队还要少。为了防止托利分子发现自己的弱点后给豪将军通风报信，华盛顿把自己的人马三三两两分住在附近一些农舍里，造成兵多将广、实力雄厚的假象。不久，驻地来了一名商人，大骂英军欺侮了他。其

实美国人早就接到密报，知道此人是个间谍，是派来探听华盛顿的确切兵力的。一些军官想立即将他逮捕，但足智多谋的总司令觉得这是个愚弄敌人的天赐良机。

各分队接到通知，要求他们准备一个比实际人数大得多的数字报到一名参谋那里。这位参谋早就有意同“商人”交上朋友，并且同住一个宿舍。当两人吃着晚饭时，参谋突然接到华盛顿的命令离去，将各分队的实力报告仍留在桌上。当他回去时，“商人”已不知去向。那个间谍回到纽约，将窃得的情报交给英军司令豪，这个情报已把大陆军的兵力扩大到3倍。帮助导演这出戏的伊莱亚斯·布丁诺特上校说，这个情报使英军司令坚信“我军太强大了，不敢对我发动攻击，使我军安全度过了冬天。”事实上，豪对这一情报的准确性深信不疑，以至一位逃脱的英军俘虏向他报告了真实数字他都不愿相信。

1778年春，战争出现了新的转折。威廉·豪爵士屡遭挫折后，只好抛下体态丰满的情妇，回英国去解释他为何平息暴乱彻底失败了。他的继任者、驻美英军统帅亨利·克林顿将军迅速放弃了费城而加强在纽约的兵力。这一举动标志着重大的战略变化，这时英军集中精力同已经参战、支持美国人的法国在海上作战，同时把重点放在亲英势力大的卡罗来纳地区。

由于双方军队集结在纽约，市区及其周围地区成为秘密活动的中心。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波恩和越南战争中的曼谷一样，纽约成为永不休止的秘密战争舞台，间谍和反情报特工人员在咖啡厅、在酒店、在英军司令部、在进出该市的渡口、在两军之间不受法律控制的“中立地带”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贿赂、颠覆、叛变是这场战争的武器——

对失败者的惩罚是突然处死。

华盛顿把司令部迁到韦斯特切斯特的怀特普莱恩斯后更加需要来自纽约和长岛的全面、定期的情报，但是原先的情报线路已经销声匿迹，由巡逻的骑兵、难民和逃兵传递和中转的情报不准确，时间也不确定。化装成黑市商人的间谍被派进纽约，但所获情报的质量令人失望。

使人高兴的是，这时华盛顿启用了年轻有为的少校本杰明·塔尔梅奇负责谍报工作。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活到1835年——沉默寡言的塔尔梅奇很少提及自己担任过华盛顿的情报部长。在一次难得的公开讲话中，他简明扼要地说："那年(1778年)我同纽约一些人建立了私人联系。"事实上，他在美国革命时期极为成功地建立了间谍网络，即著名的"库尔珀间谍网"，在英国人的鼻子底下活动，在战争后期，从纽约和长岛给华盛顿提供了大量可靠详实的情报。

塔尔梅奇的最大特点是对其活动地区和那里的人了如指掌。这位24岁的军官出身于长岛一个名门望族，父亲在北岸锡托基特的长老会当过牧师。塔尔梅奇小时候在遍布该地区的僻静水湾和暗港内钓鱼、航船，这些地方后来成为他手下的特工人员的匿身之处。在耶鲁大学时，他同内森·黑尔是好朋友。他像黑尔一样，毕业后当过教师，战争爆发后又投笔从戎。

塔尔梅奇是个勇敢的军人，1774年4月他在第二骑兵分队晋升为少校，这支精锐部队的军官和士兵都骑着灰斑骏马，头盔上缀着马尾形羽毛。华盛顿对这位年轻军官在费城战役中的勇敢表现和提供的准确情报十分赏识，选派他负责情报工作。黑尔充当间谍是出于爱国的动机，而塔尔梅奇则是出于对英国人的仇恨。英国人不仅绞死了他的挚友，而且

将他那被俘后的兄弟威廉虐待致死。此外，英军把他父亲的教堂当作马厩，由于父亲直言不讳地表示支持美国革命，他们强迫他离乡背井去康涅狄格州。

塔尔梅奇设想的间谍网中有各阶层和各行业的人。比如1778年8月，他离开费尔菲尔德的总部、乘小船冒险去长岛时陪同前往的伙伴、锡托基特的一位老邻居凯莱布·布鲁斯特就是他间谍网中一名间谍。布鲁斯特是个捕鲸手，长得慓悍，天不怕地不怕。他经常骚扰长岛海湾内的英国水手，搜集敌人活动的情报。塔尔梅奇吸收的第一个谍员叫亚伯拉罕·伍德哈尔，也是昔日的邻居，出身于锡托基特一个殷实人家，全家曾吃过英国人不少苦头。他比塔尔梅奇年长4岁，刚辞掉在民兵中的职务以便帮助年迈的父母经营农场。伍德哈尔看上去不适合干谍报工作：他胆小多疑，遇到意外的情况甚至陌生人瞪他一眼，他都会胆战心惊。

回到总部后，塔尔梅奇把建立谍报网的计划呈交总司令审批。根据这个计划，伍德哈尔将经常进出于纽约市搜集情报，然后由布鲁斯特驾着武装捕鲸船渡过长岛海湾，将情报送给塔尔梅奇，再由值班骑兵分队把情报送达华盛顿，塔尔梅奇建议总司令面晤伍德哈尔后再批准他的计划，但华盛顿出于安全考虑，拒绝了这个建议。“在让他接受任务前，你必须了解他是否诚实——做了这步工作，我将非常乐意雇佣他。但是你把他带到司令部来是不妥的，因为万一让敌人了解了情况，那也许将毁掉整个计划。”

为了保护伍德哈尔，他们商定今后在一切联络工作中他将叫做“塞缪尔·库尔珀”，同时塔尔梅奇化名“约翰·博尔顿”。只有华盛顿和塔尔梅奇知道“库尔珀”的真实身份并收取他的情报，华盛顿将军的其他助手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他

在纽约有一个能提供重要情报的"秘密联络员"。

1779年初，华盛顿十分重视"库尔珀"提供的情报，提出让该间谍常驻纽约。华盛顿给塔尔梅奇写信说："由于一切重大部署和所有重要情报必须由敌军司令部作出或发出，'库尔珀'最好居住在纽约，与托利分子混在一起，并假装自己也是个托利分子以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避免引起怀疑。""库尔珀"的主要任务是注视英国舰队的活动、陆军兵力分布、增援部队的变动和守备部队的士气。华盛顿还随信寄了50畿尼英国金币作为经费，并附言"诚望尽量节约使用，搞到金币甚为困难。"

几星期后，亚伯拉罕·伍德哈尔在妹妹和妹夫阿莫斯·昂德希尔开的一家小客店安顿下来。该客店地处昆街，离设在百老汇的克林顿将军的司令部只有几个街区。住在该客店的多数客人是英国军官，他们对住在顶楼小房间的亲英流浪汉不予理会。伍德哈尔最好的自我保护方法是很少露面，隐名埋姓。在他整个间谍生涯中，他一直处于唯恐败露的畏惧之中。一次他给塔尔梅奇写信说："整整1年来我一直忧心忡忡，这种忧虑只有亲身体验的人才能真正领略是什么滋味。前不久我差一点丧命……"

每天上午他走进纽约狭窄、喧闹的街道，去市场，逛咖啡馆，希望偷听到毫无警惕的英国军官的交谈，观察军营和要塞。获得足够情况后，他便回到房间，给"约翰·博尔顿"写信，在这些信的行间空白处，隐藏着用詹姆斯·杰伊发明的，由塔尔梅奇提供的隐显墨水写的秘密情报。

一天夜里，伍德哈尔正在房间里书写秘密情报，突然房门被推开了。他惊跳起来，把一瓶珍贵的隐显墨水碰翻在地，伍德哈尔吓得魂飞魄散，以为这下要被捕了，半天才弄

清来访者是谁：原来住在那里的两位女客故意冷不防同他开个玩笑。“这种极度的惊恐，这种狂乱的心绪，时刻煎熬着C先生，打那以来他的健康状况一直欠佳，”一次塔尔梅奇因同他联系失误，在向华盛顿的报告中解释说。

不久，惶惶不可终日的伍德哈尔深信自己已经成为“怀疑对象”，请求批准离开纽约，他找到接替自己的密友——罗伯特·陶森。陶森是一名辉格党成员，来自奥伊斯特贝的干货商人。他有充当间谍的优越条件，商人可以任意到曼哈顿和长岛做生意，不会引起怀疑。他的第二职业是为臭名昭著的托利分子詹姆斯·里文顿主办的《皇家报》搜集社会新闻，这就更有助于他的谍报活动。华盛顿批准接收这名人称“小塞缪尔·库尔珀”的新间谍。无疑伍德哈尔如释重负，回到锡托基特，充当他的继任者和塔尔梅奇少校之间的联系人。

陶森不像伍德哈尔那样喜欢隐蔽，他不顾自己是辉格党成员，按活泼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行事。他经常逛酒店，出没于约翰街的皇家剧院，把落脚点设在《皇家报》报社附近的由里文顿经营的咖啡馆内，那是英国军官和效忠分子喜欢光顾的地方。亨利·克林顿爵士的间谍头子、驻美英军人事副主任约翰·安德烈少校有时也来同他对饮几杯。陶森是里文顿咖啡馆的隐名合伙人，尽管这位亲英出版商未必真正了解他的政治倾向。

反过来，陶森蒙在鼓里的是，詹姆斯·里文顿也是为华盛顿服务的一名特工员。《皇家报》是个极好的掩护，该报表现出强烈的亲英倾向，编辑常常取笑美国革命及其领导人。里文顿改变自己的立场是在法国同美国结盟之后，可能因为经济上受到挫折，也可能自己从磨难中本能地认识到战争对英国越来越不利，他开始暗中给华盛顿提供情报。他把情报

写在薄纸上，然后夹在书的封面里送给华盛顿将军。1781年，他成功地窃得一本皇家海军的旗语通信手册，当法国舰队到达约克敦附近水域时，该手册转交给了法国舰队司令格拉斯。

有时“库尔珀”们的隐显墨水用完了，塔尔梅奇便准备了一套完整的代码供特工人员使用。常用词选自一本发行量很大的词典，编上相应的数码，例如73意为兵营，178为敌人，286为墨水，585为难民，592为舰船。华盛顿的代号是711，塔尔梅奇是721，老库尔珀是72，小库尔珀是723，里文顿是726，纽约是727，锡托基特是729，一位不明身份的女间谍代号是355。代码中未包括的词和短语用另一套密语代替。在这套密语中，一个字母用另一个字母代替，如A、B、C、D则分别由E、F、G、H来代替。

陶森的情报是由塔尔梅奇在锡托基特开酒店的另一个朋友奥斯汀·罗送出纽约市的。罗名义上是陶森干货店的送货员，可以任意来往于长岛和纽约之间。英国人甚至允许他在这条55英里的线路上设立马厩，饲养新买的马匹——这些马是用华盛顿将军提供的资金购买的。当有消息要送给总司令时，陶森使用隐显墨水写在一张白纸上，然后根据预先安排的页数，把它夹在一叠相同的纸中，混在包裹里由罗送出去。

罗到达锡托基特后，就到他从伍德哈尔手里租来的牧场去，在那里他藏有一个小木箱，他把陶森的情报放进木箱，让伍德哈尔经过时取走。伍德哈尔拿到情报后，便漫步到附近的斯特朗路口与安娜·斯特朗聊天。不一会，她把洗好的衣物挂出来，如果其中有一件黑色小上衣和几块手帕，在近海捕鲸船上的凯莱布·布鲁斯特便来取走情报。手帕数目多少表示他们将在哪个水湾接头。布鲁斯特带着情报渡过长岛湾，送给塔尔梅奇少校，他再用化学方法把情报内容显示出

来，看看是否有送给自己的情报，最后把信交给待命的骑兵飞速送给总司令。

华盛顿总是希望与“库尔珀”建立更快的联络渠道，但无法如愿。1779年6月，由上述迂回方法递送情报造成的延误几乎使这一间谍网暴露。原来，陶森给华盛顿送了一份情报说，英军正准备奇袭康涅狄格州的美军阵地，但情报到达太迟了，结果英军缴获了塔尔梅奇的大部分私人行李以及华盛顿指示他送给“库尔珀”的密件。其中一份上写着“S—C—”和他的继任者“C—”，由此英军知道他们驻地有一个间谍网。侥幸的是，他们未能查到底。①

虽然“库尔珀”间谍网提供的许多情报是日常情报，但是源源不断的准确情报是华盛顿制订作战计划的重要依据。这个网络作出的极其重要的贡献是，1780年7月挫败了英军阴谋攻击在纽波特刚刚登陆的法军的计划，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胜利，因为如果英军击败了法国派往美国的第一支远征军，那对战争将产生严重后果。

陶森从英军司令部的内线人物那里获悉，克林顿将军企图乘法军立足未稳来一个突袭。英军10艘战舰已经驶往纽波特，战舰上载有8000人。如何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华盛顿？激战前夕，英军封锁了城外的所有道路和渡口。通常把情报秘密处理后混进包裹让奥斯汀·罗传送的办法太慢了，而单独包装会引起怀疑。陶森急中生智，他假装给长岛一位著名的托利分子写了一封商务信，而信的背面则用隐显墨水写了秘密情报。

---

①华盛顿用这个事件敦促塔尔梅奇加强安全措施。“你丢失了文件……说明在前哨阵地保存重要文件是多么危险。”他写道，“务请注意今后不要发生类似事情。”

夜幕降临时，陶森的信越过长岛湾送到华盛顿司令部。总司令外出视察未归，但他的助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上尉知道隐显墨水的秘密，他把情报冲洗出来后，迅速向法军司令罗尚博伯爵发出警告。华盛顿回来后分析了形势，可惜他没有足够兵力攻打兵力削弱的纽约英军守备部队，也不能在英军抵达纽波特前给予阻击。如果克林顿确信美军进攻纽约迫在眉睫会怎样呢？华盛顿没有力量打这一仗，便使用了手中的另一件武器——假情报。

"秘密"文件很快落入英军手中，大意是美军正计划从哈得逊高地攻打纽约。克林顿惊恐万状，仓皇调转人马回纽约保卫基地。不久，他写信报告国内的官员，解释他为何未能攻击纽波特的法军。"在此期间，"他写道，"华盛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领12000人的部队越过诺斯河向金斯布里奇挺进……"通常沉默寡言的华盛顿将军热情地感激塔尔梅奇，表彰他在纽约间谍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对C一的工作给予重大奖赏（我对他们的忠诚与才能十分满意）。"

然而，并非每个间谍的工作都如此一帆风顺。"库尔珀"间谍网内有一个女人，人们只知她的代号为355，被捕后据信死于狱中。伍德哈尔吸收她为间谍，他告诉塔尔梅奇她"乐意参与这项工作"。在与陶森一起工作时，355既是他的情妇，又是他手下的间谍，但是现在无法查清她的身份。她可能出身于高贵的亲英家庭，能够到英军司令部去，并能搞到安德烈少校的秘密——安德烈喜欢漂亮女人的陪伴。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她1780年10月，也就是在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向英军投降变节后不久被捕，有可能是被这个叛徒出卖后被捕的。她当时怀着陶森的孩子，据信她被关在著名的监狱船"泽西"号上，该船停泊在布鲁克林附近。实际

上，关进“泽西”号等于判了死刑，关在这艘破旧的囚船上相当一部分犯人很快就被处决。极度伤心的陶森再也没有见到她，他以为自己随时可能被捕。然而“库尔珀”间谍网的保密工作滴水不漏，主要成员中谁也没有遭到诱捕。355号被捕后不久在分娩时死去，孩子幸存下来，取名小罗伯特·陶森。

当安德烈少校就任亨利·克林顿的间谍头子时，他拟订了一个在高官厚禄面前可能投降变节的美国军事领导人的名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名字不在其中。英国人认为他是大陆军中最能征善战的将军之一。他两次负伤，被认为是个金钱收买不了的爱国者。华盛顿将军写道：“可以肯定，阿诺德敏捷、勇猛、聪明，在我军首屈一指。”阿诺德长着鹰钩鼻，身材矮小，皮肤黝黑，英勇顽强，美中不足的是他狂妄自大，野心勃勃。

阿诺德为何叛国通敌呢？他因帐目问题与国会发生纠纷，他为国会有意抹杀他的功勋而气恼。另外，由于在费城管理部队给养时违反规定，他面临着军法审判。阿诺德后来声称，通过同政治家交往，他认识到独立是个错误，并说他不相信美国与法国的结盟——但那是在他投靠英国人以后说的话了。实际上，说穿了是他需要钱。阿诺德挥金如土，生活奢侈，尤其是他娶了一个年轻美貌、欲壑难填的妻子后更感经济拮据。

佩吉·希彭·阿诺德出身于费城一个名门望族，她对英国人的占领喜不自胜，主要因为她结识了风度翩翩的约翰·安德烈。她同安德烈是否情人关系至今仍是个谜，但是在他回纽约后，她同他书信不断。阿诺德37岁就丧妻，见到比他小一

半年纪的如花似玉、活泼可爱的佩吉，他立即被迷住了。经过旋风般的热恋后他们结了婚。尽管她知道他有意改变立场，但是若说实际受了她的影响，阿诺德才当了叛徒，那不可能，比较可能的是她仅仅促使他拿定了主意。

1779年5月，阿诺德首次向英国人送去秋波，主动提出只要报酬适当，愿意“立即加入英国军队，或根据某种商定的计划同亨利·克林顿合作。”克林顿同意后，安德烈同阿诺德建立了通信联系，双方小心翼翼试探对方的诚意。他们使用的是数字密码，用数字代替布莱克斯通的《评论》中的字，三位数中的第一位数表示页，第二位数表示行，第三位数表示字。安德烈使用化名“约翰·安德森”，而阿诺德则自称为“穆尔先生”或“蒙克”——这个名字与乔治·蒙克将军有联系，他曾在奥利弗·克伦威尔死后帮助流亡的国王查尔斯二世复辟，蒙克因改变政治立场而获得公爵爵位，可见阿诺德也想步其后尘，希望得到类似的奖赏。同安德烈来往的书信表明，佩吉·阿诺德几乎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个阴谋。安德烈建议，她给纽约一位女友写些闲聊的信，信的空行中用隐显墨水写上她丈夫要传的话，那位女友会把这些信转交给他。

阿诺德从华盛顿将军手里获得扼守纽约市北哈得逊河的西点哨所的指挥权，现在他答应把该哨所出卖给英国人，换取20000英镑和将军职务。在纽约，英军司令部的蜡烛一直燃烧到深夜，克林顿和安德烈躲在反锁的房间里对这一阴谋作最后的斟酌。“小库尔珀”觉察到其中必有蹊跷，但无法摸到这一绝密情况。西点哨所投降英军的最后细节将由阿诺德和安德烈在该哨所附近当面商定。克林顿违心地批准雄心勃勃的年轻助手安德烈去指定地点赴约，但叮嘱他不要进入美军阵地，也不要脱掉军人制服，以免万一被俘当间谍处置。

两次接头失败后，1780年9月21日夜里，安德烈从“秃鹫”号小帆船登上小筏划水上了岸，两人在哈弗斯特罗碰头。他和阿诺德在一片冷杉树林中一直商谈到凌晨4点。阿诺德把西点的计划、大炮的具体数量和现有值勤人数交给了安德烈。由于天快破晓，划桨手拒绝把安德烈带回到船上，所以阿诺德陪同他到附近一家农舍休息。遭到哨兵盘问后，安德烈才猛然想起，他忘了克林顿的告诫，已经闯入美军阵地。

天刚刚亮，阿诺德和安德烈听到哈得逊河上传来两声大炮的轰鸣，不禁大吃一惊。他们跳到窗口，脊梁骨上立即沁出冷汗，原来未经阿诺德批准，美军炮兵就向“秃鹫”号开了火，小帆船掉头朝下游驶去。安德烈无可奈何，只好准备从陆上回纽约。

这位少校脱下军服、换上便服，把阿诺德给他的材料塞进长统袜内。他带着阿诺德批准“约翰·安德森先生”通过美军阵地的手令，骑马向南进入两军之间的“中立地带”。这里有许多抢劫财物而互不干扰的强盗。9月23日上午，安德烈只要再走几英里就平安无事了，他一定想着即将到手的奖赏，突然，在塔里敦附近，长着一脸横肉的3个人举起枪挡住了他。

安德烈看到其中一人穿着雇佣兵军服，以为他们是效忠分子，便说明自己是英国军官，没料这下铸成大错，这伙美国人命令他下马，安德烈挥舞起阿诺德将军签发的通行证，但无济于事，他们已经对他产生怀疑，搜身后，把他的手表和小笔钱拿走了。安德烈说了句“你们这是抢劫!”他们相信他还有钱藏在靴子里，强迫他把靴子脱掉。没料钱未找到，却发现了一小包文件。他们中唯一识字的人看不懂文件里写的是什么，为了得到一点奖赏，他们决定把俘虏带到附近的北城堡哨所。

那天晚上，完成了搜集情报任务正要回去的本杰明·塔尔梅奇，从北城堡哨所指挥官约翰·詹姆森中校那里听说，那天早些时候抓住了一个带着可疑文件、自称是约翰·安德森的人，通过检查，这些文件是有关西点设防的详细材料。詹姆森说，他认为“安德森”携带的由阿诺德将军签发的通行证是伪造的，他已将犯人送到阿诺德司令部去了，在此以前派了一名信使送去一信，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同时，他还把可以构成罪证的文件给华盛顿将军送去，华盛顿在哈特福德与法国人开完会，正在去西点的途中。

约翰·安德森?这个名字敲响了塔尔梅奇头脑中的警钟。仅仅两周前，阿诺德指示他，如果一个名叫约翰·安德森的人从纽约来，将他护送到司令部。而现在逮住一个身上带有西点计划的人正是这个名字。此人不是从曼哈顿来，而是朝相反的方向去。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闯进了塔尔梅奇的脑海：安德森是个英国间谍，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是个叛徒!

给阿诺德送信的信使已经远去，无法召回，但塔尔梅奇当机立断，劝说詹姆森下令把“安德森”带回北城堡。安德烈被反绑着双臂，正满心欢悦地朝阿诺德的司令部——也是朝自由走去，突然，一个骑兵飞马传令把他带回北城堡，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安德烈一下惊呆了。

华盛顿的两名参谋军官已经先于总司令到达西点，正当阿诺德与他们一起吃早饭时，詹姆森的信使到了。阿诺德拆开信，看到一个名叫约翰·安德森的可疑分子被抓获，身上带着他签发的通行证，从犯人身上搜出的文件已送交华盛顿将军，他脸上的肌肉不禁颤抖起来——一位军官注意到他的窘迫——但是他很快故作镇定，悄声说了句“对不起”，便下令备马，并通知船员们随时待命。

佩吉正在床上吃早饭，突然丈夫闯进来，他喃喃地说，一切都完了，他得马上逃命。她惊叫一声，没等阿诺德继续说下去，一名助手敲门报告华盛顿顷刻就到。阿诺德立即朝门口冲去，几乎撞倒来人。他飞身上马，两腿使劲一夹，便冲出草坪，越过陡坡，向哈得逊河奔去。他登上等候的小船，划向已经回来等候安德烈的"秃鹫"号。一会儿，这个叛徒就逃之夭夭，向纽约的庇护所驶去——从此也就臭名远扬了。

安德烈被关在北城堡塔尔梅奇的拘留所内，虽然他拒绝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塔尔梅奇从他的步姿相信他是个军人。"我将我的怀疑告诉了詹姆森中校，叫他注意犯人的步法，尤其是他在房间里用脚跟后转的时候，"塔尔梅奇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安德烈听说从他身上搜出的文件已交给华盛顿时，知道保持沉默再也没有用了。他给华盛顿写了一封短信，承认到美军阵地是为了搜集情报，但是声称无意地"上了你们阵营内部一个伪装的敌人的蒙蔽"。

华盛顿下令把安德烈带到塔潘司令部，准备以间谍罪审判。途中，安德烈和塔尔梅奇交谈了数小时，这个囚徒自然对自己的命运很担心。"我极力回避这个问题，不愿给他真实的答案，"塔尔梅奇在回忆录中说。"当被缠得没有办法时，我告诉他，我在耶鲁大学曾有个最好的朋友，名叫内森·黑尔，我俩一起参军。英军进驻纽约后，华盛顿将军急需有关敌人兵力、部署与活动的情报，黑尔上尉主动接受任务后到纽约去，在经过敌人前哨基地时被捕了。

"我特别问到：你还记得此事的结果吗？

"'记得，'安德烈说，'他充当间谍，被绞死了，不过肯定你不会认为我同他一样。'

"我回答说，完全一样，因此你的命运也将一样。"

塔尔梅奇的预言不幸言中了。军事法庭发现安德烈有罪，判处绞刑。本来打算把他同被华盛顿称作"腐化堕落分子"的阿诺德交换，但是克林顿拒绝放走阿诺德。1780年10月2日，倒霉的安德烈被押上绞架。阿诺德虽然未能把西点交出去，但他仍然得到部分奖金和将军军衔。他以在大陆军服务时同样的热情组织了一支亲英部队，在他的家乡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疯狂地破坏，并且毁灭性地袭击弗吉尼亚。华盛顿一直想将他绳之以法，几次想绑架他，华盛顿指示部属，一旦逮住这个恶棍，立即处决。

约克敦战役前夕，华盛顿极其巧妙地使用了情报与假情报手段，使独立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781年5月，驻美法军司令罗尚博伯爵在康涅狄格州的韦瑟斯菲尔德面晤华盛顿，共商即将到来的夏季联合战略。报告说由格拉斯爵士率领的法国舰队将从西印度群岛北上，华盛顿提出对纽约发动全面进攻，罗尚博伯爵不赞成华盛顿的这一主张，提出南进对付康沃利斯勋爵，因为他领导的英军正对弗吉尼亚和南北卡罗来纳进行空前的浩劫。

最后华盛顿的主张占了上风。一份有关韦瑟斯菲尔德会议的详细文件抄本很快落到亨利·克林顿爵士手中，英军迅速作好了美军攻打纽约的准备，并数次粉碎美军侦察他们阵地的企图。正当法国盟军准备实行包围时，整个战役突然发生变化。康沃利斯率领其士气低落的军队撤到切萨皮克湾的约克城，等待皇家海军的救援。其间有消息说，法国舰队抵达美国海岸指日可待。华盛顿和罗尚博立即看到这是用美法联军和法国舰队夹击康沃利斯的大好时机。1781年8月20日，他们开始向南移动部队。

为了防止克林顿知道美法军队的这一新动向，防止他增援康沃利斯或攻击运动中的美法军队，华盛顿使用了迷惑敌人的许多办法。他对部队提出了严守机密的要求，只有资深的将军才知道部队的真实意图。克林顿缴获了不少假情报，一头扎进为他布好的陷阱。他似乎没料到美法联军有改变计划的可能性，哈得逊河岸泽西方向的间谍所提供的情报使他更加确信纽约是美法军队的目标。情报说，敌人正在建炉灶为一支大军烘烤面包，并且正在整修道路，作长期围城的准备。同时，美军间谍也接到指示，"详细调查"纽约敌军的实力和部署，而这些指示也被英军轻易缴获。在桑迪胡克，船艇正在集结——显然是为了在斯塔滕岛登陆。这一切都是要攻打纽约的迹象。然而一天天过去了，攻打计划却没有实施。一些英军军官报告克林顿，法军和美军声东击西，正绕过纽约去切萨皮克，克林顿将军听了嗤之以鼻，但等到他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时，已经为时太晚了。

9月5日，罗尚博伯爵同参谋人员视察特拉华要塞后，把船驶近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码头。他们看到一个身穿陆军军服、个子高大的军官，一只手挥动着帽子，另一只手挥动着手帕，兴奋得又蹦又跳。他们吃惊地发现，这个兴高采烈的人好像是乔治·华盛顿。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总司令是个冷静严肃的人。然而那人确是华盛顿！他不仅在蹦跳，在挥动帽子，而且在欢呼，这些法国人听到"格拉斯！"的名字。华盛顿大声宣布，5天前法舰队已经抵达切萨皮克湾。

康沃利斯成了瓮中之鳖、网中之鱼。

3. “处于间谍包围之中”

本杰明·富兰克林脸上总是洋溢着友好的神采。作为科学家、政治家和圣人，他似乎以令人费解的仁慈看待世界。但是在这副外表的后面，他却是个精通谋略的大师，巧妙运筹，深谋远虑。他代表宾夕法尼亚和其它几个殖民地，在伦敦担任准外交使节近20年。当大陆会议发动了一场争取外国支持美国独立的秘密运动时，他自然成为新生的美国最富有经验的外交官。富兰克林是秘密战争中的关键人物——这场战争不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进行的，而是在欧洲各国首都富丽堂皇的宫殿和光线暗淡的楼梯角落进行的。

参与外国的秘密阴谋虽然有时被认为是“非美国式的”，但实际上自美国诞生起就存在了。1775年由富兰克林、纽约的约翰·杰伊、弗吉尼亚的本杰明·哈里森、马里兰的托马斯·约翰逊和宾夕法尼亚的约翰·迪肯森组成的秘密通讯委员会不仅负责美国的对外关系，而且还设立了第一个国外情报处，该委员会与国会早先建立的负责采购武器和物资的另一个秘密委员会合作，负责招聘特工人员、指导隐蔽工作、管理军火贸易、制订密码暗语、建立包括邮船在内的通信网络，并为宣传活动提供资金，给提供了服务的外国官员支付“奖金”。

这些秘密委员会和大陆会议制订了一系列情报工作的规定。它们拟定了第一个誓词，要求全体成员保守机密。它们完善立法工作，制订了保护情报方法和来源的措施。例如，1776年5月10日，秘密通讯委员会在将其活动事项提交国会

审议时，获准略去特工人员的姓名。获取记载着情报和对外关系问题的刊物须经严格审批。有一次，为了坚决执行情报资料的保密规定，不得不通过一个错误决议：在一个委员会担任秘书的革命宣传家托马斯·佩因，由于泄密，成为首批被解雇的政府官员之一。

然而，秘密活动几乎不是新手所能担负的任务。尽管秘密委员会和它们的继任机构热衷于秘密工作，但它们往往不能将自己的活动保密。如同我们今天的情况一样，当时最严重的泄密者是国会议员自己。例如，1776年10月1日，一个信使从阿瑟·李博士那里带来一份报告。李博士是美国常驻伦敦的代表，其兄弟是弗吉尼亚在国会的代表理查德·亨利·李。刚加入该委员会的富兰克林和罗伯特·莫里斯是费城在国会的两名代表。“我们赞成甚至对国会也要保密，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在论及上述报告时写道。“我们切身体会到，国会的人太多了，无法保密。”

当理查德·李回到费城时，向他简要传达了其兄弟提供的报告内容。虽然他保证严格保密，但事后还是把情报透露给一位朋友。这起泄密事件引起在纽约北部地区从事反情报工作的约翰·杰伊的重视，他重申了以往规定。“向整个国会转达的情报只能是那些值得引起普遍注意的内容，不能去满足某些人的好奇，”他气愤地告诫莫里斯。

大陆会议还从上述事件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有必要对情报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1775年夏秋之交，百慕大的美国革命支持者报告富兰克林和莫里斯，在圣乔治皇家军火库中储藏着一批数量可观的军火，并且那里防备松懈。于是，他们组织了一次“砸烂仓库、运走军火”的行动，并且成功地将1吨多军火从海上运往费城。然而不巧的是，大陆会议中谁

也没有把此事报告华盛顿将军。华盛顿从其它渠道了解到这批军火的信息，便赶到罗得岛，指示守岛海军派船缴获。10月份当罗得岛人行动时，英国军舰正在该岛附近海域巡逻，他们几乎束手就擒。

秘密通讯委员会成立不久，就受到神秘的陌生人朱丽安·德·邦沃卢瓦尔的试探。来访者强调，委员会的成员——包括70高龄的富兰克林——必须精心化装后顶着暮色各自选择不同线路到费城郊区一个偏僻的小屋碰头。邦沃卢瓦尔声称是弗莱米希的商人，到美国来是探讨向美国人出售武器的可能性。然而，富兰克林凭借灵敏的嗅觉，立即意识到这是一起国际秘密交易。

原来邦沃卢瓦尔是法国外交大臣弗热纳伯爵派遣的一名间谍。由于英国使法国蒙受了耻辱，弗热纳对英国恨之入骨，强烈希望为法国报仇。该间谍受命探测美国形势，同时代表法国向美国反叛领导人表示非正式的同情。见面后的客套结束以后，讨价还价开始了。美国人希望说服法国参加反英战争，但是这位法国人担心英国最终同美洲殖民地握手言欢。直至美国人指出，美英决裂势在必然，他才同意采取行动。

富兰克林有效地利用了法国想对英国报复的强烈愿望。尽管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心理战还远远没有开始，但他已经掌握了心理战的原则，巧妙地操纵着动摇不定的欧洲大国。富兰克林告诉邦沃卢瓦尔，美国独立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并十分肯定地说，他带来的情报给美国革命极大鼓舞。富兰克林的话深深打动了邦沃卢瓦尔的心。虽然当时围困波士顿的华盛顿军队人力不足，弹药匮乏，但他神采飞扬地向弗热纳报告说："美军着装好，待遇好，指挥好……比别人想象的要强

大……望您采取相应措施。”

富兰克林对欧洲人的慷慨没抱任何幻想，他在给塞缪尔·库珀的信中，冷静地分析说：“欧洲有自己的打算……它认为英国的发展会给它带来一定危险，欧洲内部的分裂会使它高兴。”经济利益也有影响，因为欧洲人希望，通过压低英国的威信，他们可以把同美洲殖民地的贸易从伦敦和布里斯托尔转向南特、阿姆斯特丹和毕尔巴鄂。甚至在革命爆发前，通过比斯开湾和西印度的军火买卖已经如火如荼。一位驻巴黎的英国外交官估计，到1775年7月止，法国贸易部门给美洲殖民地提供了至少价值6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

根据邦沃卢瓦尔的谨慎暗示，委员会于1776年3月3日决定派一间谍去巴黎。他是一位康涅狄格商人，曾经担任过国会代表，名叫赛拉斯·迪恩。他同时还被任命为秘密委员会的间谍，负责采购武器和物资。委员会本来可以作出更好的选择；迪恩不懂法语，甚至他自己也承认“国会成员和其他人已错误地把我当作阴谋家。”看不起迪恩的约翰·亚当斯事后说，派遣迪恩到国外的真正理由是给国会“跛鸭”找一份工作而已。

富兰克林书面指示迪恩假装是为印第安人采购物品的商人，他的真正任务是获取军事和金融援助，同时试探同法国结盟的可能性。迪恩的第一件工作是为25000人的部队采购武器和服装。摆在法国面前的诱饵是可以同“独立的”美国自由贸易——《独立宣言》4个月后才签署。富兰克林还指示迪恩同他俩都熟悉、住在伦敦的美国人爱德华·班克罗夫特博士联系，请他提供政治和商业方面的情报。这样，新生的美国把第一条小船投入国际关系和国外秘密活动的大海。

塞拉斯·迪恩1776年7月到达巴黎后，立即陷入秘密活动的汪洋大海。由于缺乏外交经验，过份讲究身份和贵族式的虚荣，迪恩在世界上最辉煌、最奢侈、最腐败的都市不知所措。由于害怕遍布巴黎的英国间谍，他采用了“琼斯”这个名字，用隐显墨水写信，并发誓在讲英语的人面前他只讲法语。“他准是法国讲话最少的人，”一位旁观者挖苦说，“我看他不会用法语连续讲6个词。”

迪恩的船一到法国就被一名英国间谍盯住了。这个间谍名叫雅各布斯·范赞特，是个纽约人，化名“乔治·勒普顿”。他发现迪恩说话随便，没有丝毫保密观念。他向上司报告说，迪恩在一个时髦地段租了住房，“他在那里趾高气扬，架子很大，高兴得像拿到新玩具的娃娃，但是我完全同意你们的看法，他的傲慢劲儿会减弱下去。”一次迪恩刚离开房间，“勒普顿”便把他书桌盗窃一空。令迪恩庆幸的是，这个间谍很快被解雇了，因为他染上性病，如他自己所说，“受了一个妙龄女郎的骗。”

其间，迪恩秘密会晤了弗热纳伯爵。这位法国外交大臣谨慎地强调，公开援助美洲殖民地会破坏法英关系。接着，他富有表情地耸耸肩，说，作为一个平民，迪恩本人可以在法国做生意。然而迪恩蒙在鼓里的是，弗热纳伯爵已经决定秘密通过罗德里克—霍塔利斯贸易公司，把运往美国的武器和物资集中起来。该公司是由流行喜剧《塞维尼的理发师》的作者皮埃尔·奥古斯丁·卡伦·德·博马舍建立的。法国和西班牙政府暗中同博马舍合伙，并提供资金。

作为剧作家、间谍、敲榨者和杀人嫌疑犯，博马舍的冒险经历简直可以像他写的剧本一样搬上舞台。有一次，化装成女人的法国间谍谢瓦利埃·戴翁携带着入侵英国的秘密计

划逃往英国。法国政府担心这位“小姐”会把文件出卖给英国，委派博马舍把文件追回。这是一个棘手的任务。剧作家向那位“女人”求爱，终于成功地将文件送回巴黎。

还有一次，博马舍使用化名去伦敦，会见了美国常驻间谍阿瑟·李，共同讨论了美国革命的前景。博马舍很快认识到，英国的殖民帝国正摇摇欲坠。看到捞取好处的机会到了，他连连上书年轻的国王路易十六，指出在支持美国反叛问题上法国不能再犹豫不决了。凡尔赛有反对支持美国人的强烈偏见，特别是财政总审计官巴隆·蒂尔戈，他警告说，弗热纳伯爵和博马舍的主张将引起财政危机。

然而，国王站在博马舍一边。1776年4月22日，在赛拉斯·迪恩抵达巴黎约3个月前，他命令为军队采购新装备，同时批准把大批过剩武器转卖给霍塔利斯公司。为了防止英国间谍把这一安排同政府联系起来，弗热纳让15岁的儿子写信告知博马舍这一决策，以免他自己的笔迹或秘书的笔迹引起英国间谍的怀疑。“在英国人面前可要谨慎行事，”这位外交大臣说。

博马舍把公司办事处设在曾经是荷兰大使馆的一座大楼里，他兴致勃勃地采购了大量物资，并租用了一支船队运往美国。当迪恩代表美国官方去用烟叶、皮毛、大米和其它商品支付运往美国的武器物资时，博马舍喜不自胜。他立即给迪恩写信，用感人的语言说他“早就希望支援勇敢的美国人摆脱英国的束缚。”结果证明，密谋者们同这位脚踏实地的康涅狄格商人的合作对美国革命起了非常宝贵的作用。在萨拉托加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法国决定承认新生的美国，而美国之所以能在萨拉托加取得胜利，是因为霍塔利斯公司提供了大批武器弹药。

这个秘密交易并没有到此结束。一方面弗热纳发表声明掩饰法国的所作所为以安抚恼怒的英国人，另一方面仍秘密批准美国私掠船进法国港口装运货物、损害英国贸易。英国大使斯托蒙特勋爵对这些非中立活动一清二楚，再三要求驱逐美国间谍，遣返美国人的船只。最后迫于强大压力，法国当局只得下令扣押这些私掠船。事后，法国赔偿了美国人一部分船只的损失，另一部分美国船只获准离开。

博马舍与迪恩联系而不同阿瑟·李接触使李大为恼火，他逢人便说，法国本来把这些物资作为礼物奉送美国，可迪恩和博马舍却想索取货款、中饱私囊。在18世纪，利益冲突的事俯首可拾，当时的贸易法规并不禁止使用政府物资达到私人目的，前提是政府利益不受损害。根据这个原则，博马舍和迪恩对运往美国的物资的确收取了回扣，李的指责完全是出于妒忌和疑心。然而，对于李的指控,国会有人呼应,包括他那颇有影响的兄弟和以塞缪尔·亚当斯为首的新英格兰代表。

《独立宣言》签署 3 个月后，国会派遣使团去巴黎，任务是要法国正式承认新生的美国，并同法国结盟。本杰明·富兰克林、赛拉斯·迪恩和托马斯·杰斐逊被任命为专员，但是杰斐逊拒绝了这一任命，只好叫阿瑟·李离开伦敦到巴黎接替他的位置。富兰克林患有痛风，并且年事已高，他担心不能胜任工作。“我老了，不中用了，营业员称残余的布块为零头布，我现在就是一块零头布，你们想叫我干些什么我就干些什么，”他说。尽管他有些顾虑，但他还是成为使团的主要成员，并且后来的 3 年是他光辉的一生中最值得注意的岁月。

1776年12月，富兰克林抵达巴黎，深深地喜欢上这个城市。他虽擅长于搞公共关系，但他衣着随便，总是戴着一顶旧皮帽，而不戴当时流行的精制假发。在法国人眼里，他既是卢梭笔下蒙昧人的象征，又是美国革命的化身。例如，伏尔泰把美军称作“富兰克林的军队”。任何社交活动，没有他的光临就黯然失色。他出现在哪里，人们就在哪里将他团团围住，好奇心强的人甚至花钱买个有利位置望着他经过。富兰克林的肖像比比皆是——在戒指上，在鼻烟盒上，在纪念章上，甚至在夜壶上。然而英国人却没有那样兴奋。“我看他是尊非常危险的大炮，”英国大使斯托蒙特勋爵写道。“很遗憾，要是英国舰艇尝到他的厉害就好了。”

富兰克林一到巴黎，就利用他的名望为促进美国事业而奔忙。他不断挥动流畅的笔，写下大量文章和小册子抨击英国，其中一篇煞有介事地说，英国人正从印第安人手中购买美国人的头皮，甚至包括妇女和儿童的头皮。他还策划从法国港口驶出的私掠船袭击英国商船，目的是激起英国对法宣战。

富兰克林把使团驻地设在郊区帕西，那里有一幢由同美国人做生意的承包商提供的漂亮别墅。他会见各式各样的人，有政治冒险家、高级军官、外交官、间谍、银行家、科学家、哲学家，也有他的女朋友。他经常会见的女友包括埃尔韦繁斯女士，他72岁时向她求婚；还有布里龙女士，她在洗澡时同他下棋。赛拉斯·迪恩喜欢同这位可敬的博士在一起，几乎每天到帕西去，但是李对这位老人使他暗淡无光而不满，离他远远的，并常常抱怨美国人经不起金钱的诱惑。

专员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阴谋活动的世界里。他们自己也在所有法国沿海港口布间谍，这些间谍的任务是向他们报告法国政治态度和政策的变化，帮助私掠船和商人尽快起航，

在需要时招聘法国水手到船上工作，为货主找船和为船找货主。英国特工局在美国使团周围布置了一个间谍和两面间谍网（富兰克林在英国人的密码中代号为“72”和“moses”）。在英国间谍监视这些美国人的同时，弗热纳和博马舍的间谍也紧密监视着在法国的可疑的英国人——法国警方监视着每一个人。

富兰克林最危险的对手是英国特工局的业务主任威廉·伊登。伊登以副国务大臣的身份作掩护，是自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以来英国最能干的间谍头子；沃尔辛厄姆在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创建了英国特工机关，他的间谍网从直布罗陀一直延伸到易北河，其情报来源与活动能力比我们今天的秘密情报组织都要略胜一筹。1775年英国的情报经费为115 900英镑，到1778年，达到200000英镑。这笔钱不包括几乎没有定额的应急费用，也不包括对其它机构如皇家海军和邮局的拨款；邮局不仅截获邮件，而且雇用了极为聪明的邮件伪造者。

伊登从居住在英国的美国效忠分子中招聘了许多间谍，这些人容易伪装成美国革命的同情者。其中最重要的是保罗·温特沃思，他是以巴黎的美国间谍为目标的英国间谍网负责人。他出身在新罕布什尔州一个有钱有势的家庭，曾经在南美洲北海岸的苏里南经营种植园。1770年，他在自己的家乡为英国人充当间谍，并成为股票市场上不顾一切的投机家。他刁钻奸滑、八面玲珑。他至少有十几个化名，谁要是谴责他搞间谍活动，他会火冒三丈，自称是个老实巴交的效忠分子。实际上，他贪得无厌地追求金钱，希望自己的情报活动能获得爵士身份的奖赏，在议会中捞个一官半职，并得到政府的俸禄。

温特沃思领到一笔可观的经费后，同漂亮的情妇在巴黎

安顿下来。虽然他的任务是领导一个间谍网，但实际上他无孔不入。一次，他去南特拜访美国间谍威廉·李，乘其不备窃取了李的名片和印鉴以便伪造证件时使用。温特沃思最重要的行动是把塞拉斯·迪恩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私人秘书爱德华·班克罗夫特博士拉进英国特工组织，后来班克罗夫特成为谍报史上最非凡的双面间谍，获得巨大成功，他的叛国行为1个世纪后才被发现。

迪恩抵达巴黎不久便把班克罗夫特博士召去，不仅为了获得情报，而且为了叙旧。几年前，迪恩在康涅狄格州任教，班克罗夫特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韦斯特菲尔德，是迪恩的得意门生。后来班克罗夫特学医，在西印度群岛实习后去苏里南，温特沃思聘请他当种植园医生，把他奉为上宾，班克罗夫特除了给奴隶治病，把大量时间花在研究热带植物上，试制草药和其它药剂，包括致命的马钱子毒药。

1767年，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医生去伦敦，凭三寸不烂之舌，在圣巴索洛缪医院找到了工作。他挤时间写了有关苏里南动植物的论文和一部长篇小说，这些成就引起生活在伦敦的最著名的美国人富兰克林的注意。富兰克林认为班克罗夫特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资助他加入皇家科学促进协会，把他介绍到政界和土地投机买卖市场。班克罗夫特撰写小册子支持美国的抗英斗争，同时在万达利亚公司投资；该公司是富兰克林制订的一项投机计划，目的是从俄亥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中分割出一块新殖民地。但是美国革命的爆发使投机家的希望化为泡影，班克罗夫特不断需要资金从事股票市场交易并维持家庭生活，只好另找出路。

一次气氛热烈的晚宴上——无疑是健谈的迪恩作东——班克罗夫特被主人当作知心人。迪恩详细透露了大陆会议给

他的指示，并向班克罗夫特谈了他在巴黎的任务。不久，这两位朋友达成协议，班克罗夫特同意充当迪恩在伦敦的密探，定期提供政治和军事情报并领取报酬。由于这位医生的信件在邮局受到邮检，他一回到伦敦，温特沃思便拉他参加英国特工局。

在后来的数月中，班克罗夫特来往于伦敦和巴黎之间，向伊登提供有关迪恩活动的情况。美国国会还未收到迪恩到达法国的消息，伊登就掌握了迪恩会见弗热纳的详细情况。为了减少迪恩的怀疑，他从伦敦带回英国特工局给他的似乎重要但实际无用的“鸡毛蒜皮”情报。

不久，班克罗夫特和迪恩使用内部情报，在伦敦保险市场大肆投机中饱私囊。任何人可以对正在发生的某件事“保险”,实际上是打赌：一次战役哪一方会获胜，哪位政治家会下台,年底前某个贵族是否会死去等等。像班克罗夫特和迪恩这样的知内情者使用官方情报能够发财。他俩可能赚了1万多英镑，但像大多数赌徒一样,迪恩也输钱,最后净得无几。

后来伊登和温特沃思认为，班克罗夫特常驻巴黎会发挥更大作用。为此，英国特工局蓄意策划，说他有参与一宗反叛阴谋嫌疑便将他“逮捕”,当他被释放后,他“逃”到巴黎。实际他已同英国特工局签了合同，合同规定预付500英镑，年薪500英镑，外加享受每年200英镑的终身保险金。在巴黎，他当了迪恩的私人秘书。

富兰克林一到巴黎便叫班克罗夫特担任美国代表团的秘书长。他能够参加代表团的秘密会议，能看到代表团的秘密文件。富兰克林不注意保密，甚至朋友们经常提醒他“处在间谍包围之中”时，他仍把秘密文件到处乱放，并满不在乎地说:“我长期遵守防止此类事带来不便的一条规则，简单地

说，就是不要去干那些公布于众会使我丢脸的事，专门去干间谍能看到和欢迎的事……因此，如果我的仆从是个间谍，也许他真是，那么，只要我在其它方面喜欢他，我也不将他撵走。”

班克罗夫特使用“爱德华先生”的化名给英国特工局提供了如下情报：法美为了结盟而谈判的详细情况，在欧洲和加勒比地区美国间谍的姓名，富兰克林与大陆会议联系材料的复制本。他提供的有关船运的详细情报使皇家海军得以拦截装有武器和物资的运输船，并使斯托蒙特勋爵抓到抗议法国违反中立原则的把柄。如果美国人参加了一次沙龙聚会或一次招待会，温特沃斯马上对交谈内容了解得一清二楚。

班克罗夫特把情报用隐显墨水写在“理查森先生”收的情书空行里，装入密封的瓶子，塞进杜伊勒利宫北端公园一个黄杨树洞里。每星期二晚上 9 点半，斯托蒙特勋爵派信使到藏匿处去取。信使抓住拴在瓶上的绳子，把瓶子拎出来，然后又放进装有给班克罗夫特信件的瓶子。班克罗夫特还以探亲或出差为名定期去伦敦。这本该引起警觉，但富兰克林和迪恩却认为他从伦敦带回的信息很有价值。的确，国会对他的情报非常满意，决定除了代表团给他的报酬外，另给他发一份薪金。

富兰克林和迪恩都没有怀疑班克罗夫特将他们的绝密材料送给英国人，但对谁都怀疑的阿瑟·李却声称有证据证明这位医生在伦敦期间去过英国枢密院，并当着班克罗夫特的面说他有通敌嫌疑，为此两人几乎决斗。班克罗夫特算是交上好运，虽然他唯恐事情败露，另外搞到一个护照，随时准备逃跑，但李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常常剑拔弩张，矛盾很深，他的指控谁都不予理会。

为了把李支走，代表团派他到普鲁士去说服弗雷德里克承认美国独立。这位外交大臣似乎可能成为盟友，因为他仇恨英国人，蔑视给英国人提供雇用军的德国王公贵族。但此事的结局却成为值得博马舍大书特书的滑稽剧：弗雷德里克拒绝接见李，决定等待观望，看哪一边会“时来运转”。李气得七窍生烟，紧紧盯住弗雷德里克不放，结果这位被缠得头疼的外交大臣一见到李就气得中风。

李还遇到其它麻烦。驻柏林的英国公使休·埃利奥特夜深人静时到他办公室行窃，偷走一包机密文件，叫几位秘书誊抄完后又一份不少地送回去，这些文件包括李的私人日记和美国驻巴黎代表团的所有会议记录。弗雷德里克对这起违反外交礼仪的事件大发雷霆，但也无可奈何，因为这些文件已送往伦敦。由于这次泄密，美国代表团只好放弃在阿姆斯特丹建造一艘护航舰的计划，他们从法国运输物资也加倍困难了。

班克罗夫特不是英国特工局安插在帕西的唯一双面间谍。马里兰州的一位船长约瑟夫·海因森也参与了一起秘密活动，成为这次战争中的奇闻，很有一点浪漫闹剧的味道。

由于班克罗夫特通风报信，皇家海军十分顺利地截获开往美国的货船与邮船。因此，代表团决定采购一艘快艇运送重要情报。1777年初，另一位马里兰人塞缪尔·尼科尔森船长接受了购船任务。当时正在伦敦海滨的海因森，由美国海军军官、异母兄弟兰伯特·威克斯上校推荐，被选中担任该快艇的船长。

虽然上级希望尼科尔森从法国一海港顺利购买到满意的快艇，但上级给他的指示也有一定灵活性，在必要时他可以渡过英吉利海峡去多佛碰碰运气。然而代表团不知道，他在

伦敦有个叫伊丽莎白·卡特的情妇。尼科尔森会见情妇与买船一样心切，他在法国敷衍了事地物色了一下合适的快艇后，便迫不及待地去伦敦。渡海没有遇到周折，尽管海峡两岸港口有法国和英国间谍的严密监视，熟悉情况的人来去很容易，走私船在英国的多佛与迪尔和法国的敦科尔克与加来之间畅行无阻。

尼科尔森到达波特兰大街卡特夫人的寓所后，便给乔·海因森寄去快信："请速乘车来这里，由于我的工作性质，事情不便在信上写明。"海因森匆忙去见尼科尔森，当听说富兰克林点名选他把代表团的信件送给国会时，海因森受宠若惊。虽然他发誓一定保守机密，但命运的戏剧性变化使他忘乎所以，他仍把这件事告诉了好朋友女房东伊丽莎白·江普夫人。江普夫人在斯特普尼开的小客店是美国海员舒适的休息之地，不仅有一流的饭菜与服务，而且提供陪酒女郎。海因森最喜欢的陪酒女郎就是伊莎贝拉·克莱格霍恩，他也情不自禁地向她炫耀自己已成为一个重要人物。然而，热情好客的江普太太根本不是美国革命的朋友。她和伊莎贝拉听了海因森讲的情况后大吃一惊，一五一十向约翰·瓦迪尔牧师作了汇报。

瓦迪尔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他曾在纽约市的教堂当过副教长，在金斯学院任自然法教授。当美国革命爆发时，他在伦敦加入了英国特工组织。特工组织每年付给他200英镑酬劳，并答应叛乱平息后让他在金斯学院神学院谋职。瓦迪尔的主要任务是在伦敦探听有关美洲殖民地的消息。江普夫人虽然与他不是同一阶级的人，但他培植利用她，因为她对来往的美国船只了如指掌。

女房东如释重负地向他谈完情况后，瓦迪尔立即去斯特普尼，请海因森到马车上交谈。"经过耐心规劝，我发现他动

了心，可以用来干有利可图的事，”瓦迪尔含蓄地告诉威廉·伊登。也许瓦迪尔威胁他犯了叛国罪，会上绞刑架，海因森的政治立场更加动摇了。

这次会晤后，英国制订了对策，决定允许海因森和尼科尔森在英国购买快艇后带到法国港口勒阿弗尔；一旦海因森把美国代表团文件搞到手，他便把船驶向接应的英舰。作为交换条件，英国答应将给海因森一小笔补助金，足以使他能在英国安度晚年。

1777年2月中旬，海因森同尼科尔森一起，由卡特先生陪同，去多佛物色合适的快艇。购船任务尚未完成，尼科尔森突然被召回巴黎，留下海因森——和英国特工局——为快艇提供设备。最终选择的这条船是一艘报废的海关船，尼科尔森说它“既不能打仗也不能逃跑”。该船重新命名为“海豚”号，海因森把船从英吉利海峡开到对面的勒阿弗尔，同行的有爱德华·史密斯上校，伊登详细交待他监视海因森的行动。不久，史密斯报告，1777年3月10日海因森将带着给国会的文件和一批干货驾船去美国。于是，7条英舰开到能够截获“海豚”号的水域。

但是预定启航的日期过去了，“海豚”号仍在港内。英舰在海上不断巡逻，唐宁街伊登司令部的人更是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底出什么差错了？到了月底，史密斯报告原计划取消了。原来从巴尔的摩开来的一条帆船带来华盛顿在特伦顿和普林斯顿胜利的消息，富兰克林和迪恩决定文件暂缓送回，待进一步了解法国对美国胜利的反应，收集到更多情报后再说。另外，已经准备好的邮袋交由巴尔的摩来的帆船带回美国，海因森和“海豚”号留下接受其它任务。这起精心准备的阴谋破产了，美国反叛者们得到了英国情报机关交到他们手里

的一条快艇。

英国特工局名义局长乔治三世国王一直密切注视着这起阴谋的发展，他给伊登送去一份挖苦性备忘录说："我一直怀疑海因森是否可靠，现在我相当肯定，他和北美每个其他间谍一样，都受到迪恩和富兰克林的鼓励，只会提供欺骗性情报。"

然而，富兰克林最成功的妙计是使用欺骗手法，借英国特工局之手，把法国卷入反英战争。虽然法国货物源源不断偷运到美国，但弗热纳拒绝说服法国同美国结盟。承认美国无异于对英宣战。弗热纳深谋远虑、小心谨慎，没有西班牙的支持不愿走这步棋。同时，他等待着美国佬在军事上的胜利，直至调解成为泡影、独立势在必然。1777年10月17日，美国在萨拉托加取得了举世震惊的胜利，终于打消了他最后一点疑虑，此时他建议美国代表团重新提出公开结盟的要求。

一连串的重大事件开始于萨拉托加，结束于约克敦。代表团向国内报告，法国人热烈欢呼萨拉托加的胜利，"把这一胜利看作他们自己的胜利"。英国人威风扫地使博马舍欢欣若狂，他带着喜讯急忙去找国王路易——也许赶紧去商量对策——结果车翻人伤。战争的势头变化莫测，弗热纳担心萨拉托加的灾难可能促使英国讲和，12月初，他告诉国王，承认美国的时机成熟了。

班克罗夫特多次警告英国政府，法国同殖民地结盟迫在眉睫，但是国王乔治拒不相信这是真的，他对伊登的间谍所提供的情报一概持否定态度。他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认为凡是私生活糜烂的间谍所提供的情报不值得相信。因此，在他看来，温特沃思、班克罗夫特和伊登雇用的许多其他间谍都

不可靠。

虽然伊登和温特沃思敦促乔治尽早讨好美国人，但他无动于衷。"爱德华兹（指班克罗夫特）是个证券经济人，也是个两面间谍，对他的情报不能相信，"他说。"我们要是认为法国对我有战争意图，那正好上了他的当。"然而首相诺思勋爵最后说服国王批准温特沃思去试探迪恩和富兰克林，在美国向法国提出结盟之前，有无不谋求独立而实现和平的可能性。

交战国之间这种接触并非罕见。富兰克林好几次会见英国政府和反对党辉格党的非官方代表，有时在塞纳河畔雾气腾腾的浴室安排会见以便避开间谍的窥视。温特沃思与富兰克林战前在伦敦相识。英国特工局的档案记载，富兰克林曾去这位间谍头子在巴黎的寓所登门拜访，而温特沃思也曾去帕西作客。

1717年12月12日，温特沃思到达巴黎。当发现班克罗夫特已去英国领取最近几次投机活动的报酬时，他只好自己与美国代表们联系。迪恩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上面写着："同迪恩相识的一位绅士希望进一步增进了解。"另一封信上签着温特沃思名字的缩写字母。迪恩立即认出写信人是谁，同意"秘密"约见几次。温特沃思提出了美洲殖民地停战实现和平的计划——只要殖民地放弃独立，英国便废除那些导致反叛的法规。他绘声绘色地向迪恩说，那些为这种和解牵线搭桥的人高官任做、骏马任骑。

其间，富兰克林以其惯有的深谋远虑，谨慎地报告弗热纳说，从英国来了一位商人，美国人将同他打交道，但没有详谈这位神秘使者的任务。然而，法国人已经知道温特沃思到达巴黎，因为他一直受到警方和博马舍手下密探的跟踪。正如富兰克林所预测的，已经猜出温特沃思此行目的的弗热

纳担心，如果不立即同意结盟，厌战的美国人可能与英国人言和。

根据国王路易的坚决主张，谈判推迟进行，首先说服西班牙参加反英战争，由于西班牙不愿支持西半球的革命，担心战火会烧到自己的殖民地，因此马德里迟迟不表态。法国唯恐拖下去会促使美国人投入英国人的怀抱，12月17日单方面采取行动，弗热纳向美国代表团迅速表态承认美国，并提出签订友好通商条约以换取美国不单独与英国讲和的承诺。

温特沃思不断听到传闻，说法国正准备承认美国。由于班克罗夫特不在，他无法弄清消息是否确凿，但他相信无风不起浪。“注意不要让美国和西印度群岛从我们指缝中滑掉了，”他警告伊登。他惶恐不安地在巴黎度过两星期，担心遭到法国人逮捕甚至暗杀。当发现有人试图撬开他的保险箱后，他把所有信件付之一炬。最后，班克罗夫特腰包赚得鼓鼓地从伦敦回来了，安排他1778年2月6日会见富兰克林。毫无疑问，足智多谋的富兰克林之所以同意面晤温特沃思是他想对法国施加影响，不让它抛开西班牙单独采取行动后再反悔。

“72号极为友好地接见了我，”温特沃思使用富兰克林的代号向伊登报告。然而，历时两小时的会谈一定使这位英国间谍大失所望。富兰克林强调，美国代表团不同意不赢得独立就和谈，他没有权利决定停战。温特沃思还发现，这位通常思维敏捷、言辞尖锐的老人突然变得吞吞吐吐、优柔寡断。当温特沃思暗示，可以给富兰克林和迪恩提供方便去英国同政府代表谈判时，富兰克林没有贸然表态。

如果说这次会见使温特沃思很不满意，对富兰克林则是巨大的成功。担心美国同英国和解的幽灵在法国宫廷引起震荡。第二天，内阁一致同意，不等西班牙行动，法国同美国

结盟。

法国一名官员向美国代表团通知这一重要决策时提出："采取什么必要措施可以使美国代表团满意而不去理会英国人关于建立新关系的任何建议?"富兰克林毫不含糊地说："立即签订一份协定将消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疑虑，让我们能依靠法国的友谊，坚决拒绝英国提出的任何和平建议。"这个回答有力地证明了富兰克林高超的谈判艺术。

1778年2月6日，法国同美国秘密正式签订了保证美国独立的协定，第一个签名的美国人是富兰克林，接着是迪恩和阿瑟·李。签字仪式结束后，文件由富兰克林保存，他交给站在旁边默默观看的班克罗夫特。42小时后，沮丧的乔治国王与诺思勋爵在白厅阅读了协定的复制本。英国的让步太小太迟了。殖民地起义已经发展成为从加勒比地区到印度洋的一场全球性战争。

富兰克林仍然留在巴黎，直至1785年。这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为实现美法联盟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最卓越的成就是促成了1783年巴黎协定谈判，使英国承认了美国，从而结束了美国革命。"但愿我们再也看不到战争，"他说，"我认为从来没有好的战争或坏的和平。"

那时赛拉斯·迪恩和阿瑟·李已经回国，在另一个舞台上继续进行激烈的争斗。迪恩是1778年被从巴黎召回的，因为李指控他用政府的钱肥了自己。两年后，他为国会对他的处理而愤愤不平，带着一肚子气回到欧洲。他同意给美国一批老朋友们写信，建议与英国和解。这些信通过班克罗夫特转递给温特沃思后送给纽约。詹姆斯·里文顿诡称是英国军舰缴获的材料，在《皇家日报》上发表。作者的报酬是价值

3000英镑的美国货物。对迪恩来说不幸的是，几乎在他的信发表的同时，美军在约克敦取得了胜利，这样人们就把他看作卖国贼。

穷途潦倒的迪恩在欧洲一直生活到1789年才决定回国，然而正当他行将启程时，他突然奇怪地死去。他的唯一朋友班克罗夫特说他是自杀身亡，但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历史教授朱利安·博伊德1959年提出颇有争议的看法，说迪恩是由班克罗夫特毒死的，因为他害怕迪恩揭发他的叛国活动。

在整个战争与和谈期间，班克罗夫特一直站在富兰克林一边，为代表团、为唐宁街的主子和为他自己服务。1779年当法国打算入侵骚乱频繁的爱尔兰时，富兰克林派他去观察那里的形势。这位双面间谍一回到法国，便报告说“果子没有成熟”，建议远征推迟。无疑这是英国特工局的旨意。

人们不断指控班克罗夫特已投靠英国，可富兰克林充耳不闻，继续信任班克罗夫特，加上他完全无视最起码的保密规定，使得人们对这位美国政治家的忠诚提出怀疑。当然，班克罗夫特几次渡过英吉利海峡去英国，更不用说交给他的秘密文件总是奇怪地落入斯托蒙特勋爵的手中，应该引起富兰克林的警觉。但是他没有除掉这个间谍，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是这位老人受蒙蔽了吗？是他老眼昏花了吗？还是富兰克林本人真是他们中最大的卖国贼？

让我们一一分析这些可能性。富兰克林虽已年过古稀，但他极其高明地处理了同法国结盟和同英国和好的谈判，充分表明他的敏锐和智慧不减当年。他以惊人的沉着，出奇制胜，挫败了老奸巨猾的法、英外交官，甚至利用英国特工局的监视为自己服务。显然他在秘密战线的失误不能归因于年迈。他也不可能受了蒙蔽。富兰克林在国际间谍战中经验极其丰富，

不可能上班克罗夫特的当。人们不能相信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麻木不仁。

那么，他会是秘密为英国服务的变节者吗？

在整个革命期间，富兰克林变节已成为街谈巷议——他在伦敦生活了近20年，有人提出，与其说他是美国人，不如说他是英国人——1781年，他几乎被从巴黎召回。

阿瑟·李、约翰·亚当斯和另一位美国驻欧代表拉尔夫·伊泽德都对他有怀疑。李患有妄想症，他的看法无须考虑。但是要推翻亚当斯和伊泽德的看法可不是那么容易。虽然他们实际上都没有直接指控富兰克林犯了叛国罪，但亚当斯认为，富兰克林这位"老魔术师"与赛拉斯·迪恩互相勾结，使用公款搞投机买卖，迪恩最后沦为卖国贼，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伊泽德则声称："唯有召回富兰克林博士才能拯救美国。"

两位现代作家理查德·迪肯和塞西尔·柯里坚决认为富兰克林与英国特工局有联系。他们强调，富兰克林与迪恩和班克罗夫特关系密切，而后来发现这两人都是英国间谍，并说富兰克林不重视保密，公款开支是一笔糊涂帐。柯里在1972年发表的《代号72，本·富兰克林：爱国者还是间谍?》一文中指出，富兰克林很可能是英国间谍。迪肯在《英国特工史》中更露骨地说："富兰克林使用许多代号掩盖自己，唯恐露出马脚，英国特工局称他为'72号间谍'。"

英国的确把他叫做"72号"，这个号码在英国特工局文件中出现过多次，主要出现在温特沃思所写的1778年2月6日他会见富兰克林的情况报告中。"72号极为友好地会见了我，"温特沃思写道。这里他指的肯定是富兰克林，因为每当这个号码出现在温特沃思的信上，伊登或他的秘书总是在代号上方认真地写上"富兰克林博士"("51号"上方写的是"迪恩先

生”）。

然而，深入探究温特沃思的注解信，柯里认为这些号码是间谍代号的看法就站不住脚了，因为那张纸上有许多号码，按照柯里的推理，那将意味着在帕西的每个人都是英国间谍。再进一步研究，“107”的意思为“独立”，“64”为英国，“45”为国会，显然，柯里误解了英国代码而犯了重大错误。事实是，这种代码不是间谍名单，仅仅是用数字代替词语的代码。

然而，如果富兰克林不是年迈，不是上当受骗，不是英国间谍，那他为何放心大胆地让班克罗夫特从事间谍活动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富兰克林的确知道班克罗夫特是间谍，希望他接触秘密文件，用现代的话来说，整个事情是故意泄漏。老谋深算的富兰克林认为，美国的独立依赖于法国公开参战，希望英国知道法国对战斗中的美国人的支持。英国对法国支持美国的行动越是恼火，那么英法交战的可能性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不把班克罗夫特的假面具揭掉会更有利于美国。

事实上，如果没有班克罗夫特，富兰克林也许不得不创造出一个来。

4. 更加完善的联邦

1799年2月底，一条小船驶出库珀河，沿途遇到停泊在查尔斯顿的一排船，接着砰地一声，沉重地撞在一条丹麦双桅船帮上。一伙全副武装的人手挽着手，登着踏板绳梯，爬上双桅船的甲板，他们决心使美国不致遭到颠覆和爆发奴隶

叛乱的危险。双桅船上3位混血儿，包括一名法国国民议会前成员马修·萨蒙被捕了，夹在他们行李中的几个木桶被撬开，藏在桶底夹层中的是用法文写的神秘文件。

“那些歹徒们凶相毕露，”目击者说：当时有人想把他们扔进大海喂鱼，经头脑冷静的人阻止才没这样做。原来这3个人是约翰·亚当斯总统内阁的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直接下令逮捕的。美国驻汉堡领事早就报告萨蒙已乘船去查尔斯顿，携带着领导法国政府的督政府的文件——藏在木桶的夹底内。由于当时美国正在同昔日的盟国法国进行未经宣布的海战，想象常常先于事实，皮克林断定这个报告清楚地表明法国阴谋推翻美国政府。因为萨蒙是个混血儿，人们也以为他受督政府的派遣，到南部诸州煽动类似曾在圣多明各出现的奴隶叛乱。

皮克林和逮捕3位混血儿的这些卡罗来纳人被当作共和国的救星。纽波特的《信使报》宣称，要不是他们幸运地发现法国背信弃义的最新例证，“许多美国人喉管也许被割断，全国将尸堆成山、血流成河，查尔斯顿也将成为一片废墟。”在其它城市，人们为美国逢凶化吉、免遭涂炭庄严地感谢上帝。

然而“木桶阴谋”不久便真相大白。调查表明，在查尔斯顿被捕的人根本不是督政府派遣的间谍，而恰恰是敌视法国现政权的人；他们没有计划在美国煽动奴隶叛乱，而是打算去圣多明各告诉那里的黑人，督政府正阴谋把他们再次沦为奴隶。

像间谍活动本身一样，对真正的或想象的国内外间谍活动的恐惧成为早期美国社会的一种通病，“木桶阴谋”是独立之初风行全国的周期性间谍恐惧症的典型事例。像在革命烈火中诞生的大多数国家一样，新生的美国总是对威胁其安全

的敌特活动提心吊胆，这些阴谋活动有的是凭空想象，有的是确有其事。英国和西班牙在边界地区的继续存在使美国人疑虑重重。英国无视宣告独立战争结束的巴黎协定，在俄亥俄河北岸占领着边境要塞；西班牙拥有路易斯安那和东、西佛罗里达① 。此外，法国革命以后，美法关系日趋恶化。

一些美国人感到身陷包围、缺乏安全感是不无理由的。从新罕布什尔州到乔治亚州，在这片呈弧形状的辽阔边疆，殖民者们纷纷要求与联邦政府脱离关系，要求同能够保护他们利益的国家达成协议。对这些国家的意图美国政府几乎一无所知，独立战争期间掌握的有关情况早已淡忘。美国陆军已经建立了一个初级的总参谋部，本来可以负责情报工作，但是该机构总是人手不足，情报工作仅仅限于侦察和绘图。

更为混乱的是，直至1789年乔治·华盛顿就任总统前国家没有按照文字松散的联邦法规认真管理。前殖民者们根本没有成为团结一致的美国人，因为他们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可能导致实行同他们刚刚摆脱的政府大同小异的新的专制制度。结果，软弱的国会几乎类似13个主权国家组成的极不稳定的大使委员会，财政困难，陆军仅有一个雏形，根本没有海军。

英国在美国继续保持着一个由加拿大总督多切斯特控制的庞大的情报网络。这些间谍搜集情报，同有权势的美国人建立联系，培植亲英势力，从对新生的共和国忠诚程度不一的美国人那里得到巨大支持，那些在革命期间也许批评过母国的美国人这时却对英国友好了。一位向英国提供消息的人

①佛罗里达被彭萨科拉附近的珀迪多河分为东、西佛罗里达。西佛罗里达包括现在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南部以及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部分，东佛罗里达近似于现在的佛罗里达州。

写道："从新罕布什尔州到乔治亚州，凡是有教养的人，无不蔑视现政府，无不认为现政府无能，无不希望用君主制取而代之。"

由于联邦法规中有关政治与经济的条款不健全，1787年5月在费城召开了立宪会议。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夏天，55名代表努力在利益冲突各方之间寻求妥协——船主反对工厂主，种植园主反对商人，小州反对大州。代表们渴望建立一个稳定可靠的政府——"一个更加完善的联邦"——消除阶级、经济和政治差别，赞成在竞争各方分权。

后来制订的联邦宪法没有直接谈到情报工作，随后制订的人权法案中规定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同时，保护公民不受国内间谍的监视。但是宪法的确含蓄地批准从事情报工作。第二款第二条规定总统为陆军和海军总司令，第三款要求总统"注意法律得到忠实执行"。自那以来，历届总统依靠这一概括性的含糊条款，作为从共和国早期临时情报组织到现代情报机构从事情报工作的法律依据。

1790年7月1日国会批准给华盛顿总统的第一次拨款，向他提供了显然用于秘密外交的"应急费用"。法律明确授权总统在说明经费开销时不透露经费使用目的或用于谁身上。1790年的特工费为4万美元，3年后增至100万美元。这些钱的大部分用于赎回北非伊斯兰各国海盗扣留的美国人质，用于收买外国官员，实际上是花钱买和平。

华盛顿还避开国会和国务院，派遣间谍到国外搜集情报、开展谈判，这一做法被后来的总统所采用。在许多情况下，总统派出人员的工资是从"应急费"中支出的。华盛顿总统甚至没有等待经费批下来，就派遣古文纳·莫里斯去伦敦调查英国继续占领美国边疆要塞问题。事实上，莫里斯是根

据宪法派往国外的第一个间谍。戴维·汉弗莱斯被派往里斯本为在葡萄牙首都建立外交机构作出安排，上级指示他"要避免让人怀疑是去办公事的"。

然而，甚至在这样的早期阶段，国会为在处理外交事务中被撇在一边而不快。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威廉·麦克莱获悉汉弗莱斯的使命后评论说："总统派好后才向我们征求意见。"他对莫里斯甚至更加挖苦："他担任了一项奇怪的工作，半是皮条客，半是外交官，也许更确切地说，是英国宫廷政治情况的窃听者。"

法国革命使法国与前殖民者的脆弱联盟破裂，并促使在美国爆发了有害的间谍热。起初多数美国人对法国革命表示同情，把它看作他们自己反抗专制国王的继续。拉斐特甚至送给华盛顿总统一把巴士底狱的钥匙，以象征这两次革命的联系。在与法国"热恋"期间，法国流行的"公民"称呼也在美国暂时取代了"先生"之类的尊称。但是当革命变成恐怖统治时，美国舆论根据阶级和政治态度分化了。

部分地因为对法国革命的意见分歧，在华盛顿的首届政府内形成了两个政党：由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和由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现代民主党的前身共和党。这两位强硬的杰出人物几乎从一开始就发生冲突，用杰斐逊的话说，他们"像两只公鸡每天在内阁争斗"。为了保证新生国家未来的稳定，汉密尔顿认为，美国应该以商业和工业阶级为基础，把英国作为它的模式，实质上，他觉得国家的主人应该统治国家；而杰斐逊怀疑以商业利益为基础的政府，设想建立一个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基础的美国。1793年初当法英交战时，他同情法国。在当时和后来，

美国选择什么道路的争论都支配着它的领导人如何看待外国“朋友”与“敌人”。

政治斗争十分激烈，联邦主义者被称作“英国人的马屁精”，而共和党人被叫作想在城市广场设立断头台的“可鄙的暴民政治”倡导者。华盛顿虽然同情汉密尔顿的观点，但他努力在争论双方中走一条中间道路。实际上，总统把4名内阁成员——除了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外，还有司法部长埃德蒙·伦道夫、陆军部长亨利·诺克斯——看作早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听取各种意见作为他决策的基础。

法国新任驻美公使埃德蒙·查尔斯·吉尼特的活动使华盛顿的设想更难实施。甚至在到达首都费城递交国书之前，“公民”吉尼特就要求美国履行1778年签订的法美协定，允许法国把美国领土用作对英作战的基地。吉尼特指挥14艘私掠船劫掠英国商船，还组织了武装远征军，以便征服加拿大以及由英国盟友西班牙控制的路易斯安那和东、西佛罗里达。

杰斐逊及其追随者们热情欢迎吉尼特，支持并参与他的计划。吉尼特派遣间谍，组织美国边民袭击敌方区域，著名的植物学家安德烈·米肖就是其中的一个。杰斐逊完全知道米肖到西方来不是搜集标本，而是另有使命，但没有对他加以任何限制。杰斐逊为这一做法辩解说，他希望通过这种合作，让美国得到东、西佛罗里达，此外，法国夺取路易斯安那后会允许美国人在密西西比河自由航行，而西班牙人却拒绝给予这种权利。

吉尼特的私掠船纷纷开出美国港口，截获了80多条英国船。英国强烈抗议这种公然违犯中立的做法，但是冒犯者们被亲法的陪审团释放了。吉尼特成功后忘乎所以，变得越来

越肆无忌惮，杰斐逊开始担心他的活动可能对共和党带来事与愿违的恶果，最终导致英美再战。由于法国政权的更迭，“公民”吉尼特最后被迫中止活动，尽管他威胁要呼吁美国人民推翻总统。这些错误做法扩大了美法之间的裂痕，并加剧了国内的分歧。

其间，亲英派对暂时缓和美英关系鼓起信心。1794年，约翰·杰伊离开首席法官岗位，被派往伦敦与英国拟订一项解决两国矛盾的条约。杰伊不是强硬人物，但手中有一张王牌，即美国可能联合一批中立国，抵制英国恣意妨碍海上贸易。然而这仅仅是一种恐吓，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决定避免所谓的“武装中立”。杰伊的工作遭到暗中捣乱：汉密尔顿把政府的真正意图透露给英国驻费城公使乔治·哈蒙德，使得英国谈判者在杰伊打出王牌之前就压倒了他。至少可以这样说，那时人们对国家的忠诚是错综复杂的，有时是混乱不清的。

事实上，汉密尔顿同哈蒙德的关系——此前同英国间谍乔治·贝克威思少校的关系——使人们不得不怀疑他本人是否是英国间谍。如果说杰斐逊几乎积极帮助了吉尼特的阴谋活动，那么，如果英美也是盟国，汉密尔顿同贝克威思和哈蒙德的关系与前者也差不多。由于两位英国间谍同这位财政部长关系密切，他们几乎能得到一切国家机密。杰斐逊怀疑汉密尔顿破坏他的外交政策，但没有抓到这位内阁成员叛国的证据。

杰伊从消息灵通的英国人那里获悉，英国的真正让步是许诺放弃他们早在1783年就应撤出的边疆要塞和开放西印度群岛与美国通商。后来签订的条约非常不得人心，人们痛斥杰伊是卖国贼，绞死他的模拟像。1796年3月，众议院要求行政部门提供与谈判有关的一切文件。华盛顿正在构想未来

模式，拒绝了这一要求，并提醒国会，外交谈判依靠秘密方法进行，“即使谈判结束了，彻底泄露所有措施、要求或最后可能提出和考虑的让步都是严重失策。”

然而，杰伊的条约减小了美英再战的可能性，但是法国督政府声称，该条约有损于法国的利益，他们加紧骚扰美国商船。在9个月时间里，法国扣押了316艘美国船，有些是在美国水域内扣押的。这时美法冲突一触即发。为了防止战争，1797年就任总统的约翰·亚当斯当年下半年派了特别代表团去巴黎。没料代表团吃了闭门羹，接连几个月法国当局避而不见，正当他们任务失败后准备回国时，新任外长塔莱朗派了3名代表登门拜访，为外长索要25万美元的贿赂和为法国政府索要一大笔贷款作为谈判先决条件，美国代表团断然拒绝。

当亚当斯总统用“X”、“Y”、“Z”代替3名法国代表的名字把此事公布于众时，反法情绪席卷全国。“不！不！一分钱也不给！”据说代表团成员、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主义者查尔斯·平克尼把这件事告诉了法国代表。有人用报纸编辑的口吻把总统的原话改得更加通俗：“宁用百万加强国防，不用一分作为贡金！”在联邦主义者的号召下，全国准备用战斗保卫独立。已经退休的乔治·华盛顿被重新启用，请他统帅已扩充的美国陆军，国会授权新建的海军扣押公海上的法国船只。

间谍恐慌再次风靡全国，有关颠覆和外国阴谋破坏的谣言四起。联邦主义者唯恐天下不乱，蓄意制造阴谋活动的证据。《波丘派恩报》的极端联邦主义编辑威廉·科贝特警告说，在1798年5月9日亚当斯规定为禁食日的这天，“铤而走险的恶棍”将火烧费城，屠杀平民。结果那天风平浪静。但科贝特继续怒吼，他恐吓说：“听着，当你们的血流进阴沟时，勿

谓言之不预也。”此时担任副总统的杰斐逊被指控与法国督政府有联系，并说他使用密码通信。

也许这种发狂的气氛是美国对内使用间谍手段的发端，从那以后不断出现国内政治和宪法争端，以及外交事务与真真假假的安全威胁互相纠缠的问题。联邦主义者喜欢偷偷摸摸监视对手，同时更公开地使用限制性法规对付所谓的威胁，而实质是想中止对手的活动。1798 年 6、7 月间，他们在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处置外侨和煽动叛乱惩治法——据说这些法是为了打击颠覆分子，但是结果却打击了美国公民最基本的自由权。这些法律限制外侨，特别是法国人和爱尔兰移民的权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倾向于反英的共和党，同时抑制国内的激进分子，尤其是亲共和党的记者。

在杰斐逊派称作的“联邦主义恐怖时期”，总共约有 25 人被捕，多数是报纸编辑，受到重判或重罚后他们才噤若寒蝉。来自佛蒙特州的共和党议员马修·莱昂因煽动叛乱罪被处以1000元罚款、4 个月监禁。副总统杰斐逊声称他一直受到联邦主义间谍的跟踪，一次他因参加茶会迟到而向女主人道歉，说他“被人以极不寻常的方式尾随和监视”，只好绕道去她家，“巧妙地避开了间谍的好奇心”。

当查尔斯顿的“木桶阴谋”揭露出来后，联邦主义者如获至宝，把它作为需要制订外侨法与煽动叛乱惩治法的有力证据。“美国人民团结在政府周围，”亲政府的一家报纸呼吁，“警惕法国移民！”但是当“木桶阴谋”真相大白后，人们再也不相信联邦主义者杜撰的形形色色的“阴谋”了。在汹涌的大海中，亚当斯总统谨慎地驾驶着美国这条航船。虽然亚当斯根本不赞成民主政治——他把杰斐逊相信平民的天生美德看作是感情的扭曲——但他也同样反对任何形式的独裁。

法国派人前来试探和平的可能性，亚当斯抓住契机派代表团去巴黎谈判结束敌对状态。联邦主义者惊恐万状。不同法国交战，就无法诽谤共和党，也不能获得新奥尔良和东、西佛罗里达。但是总统勇敢地把国家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他完全明白，实现和平也许使他不能再次当选，但他仍坚持谈判。腐败无能的法国督政府为战争寻找借口，但它被拿破仑·波拿巴取代，新任执政官没有理由继续进行只会使美国倒向英国怀抱的战争。正如亚当斯所预料的，7个月的谈判使联邦主义者大失所望、威信扫地。1800年，共和党人托马斯·杰斐逊击败亚当斯当选总统，联邦主义者被从权力机构中永远清除出去。

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美国西部是阴谋活动和间谍威胁的热点。那里的政治气候非常有利于隐蔽活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间谍互相竞争，阴谋把美国控制下的大片土地分割出来。也许美国政府获取可靠情报的唯一来源是肩负着与印第安人拟订条约的执行这一艰巨任务的印第安事务官，他们同时在这些边远地区充当政府的耳目。威廉·亨利·哈里森上尉在给陆军部的报告中写道："我认为，凡是我们的朋友，都有义务警惕敌特的活动，并在可能情况下，发现和揭露那些受外国人指使、策划损害国家利益进行阴谋活动的叛徒、卖国贼，使他们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是当务之急。"

1801年3月4日，杰斐逊穿过华盛顿市泥泞的街道，到尚未竣工的国会大厦举行就职典礼。几个月后，新的阴谋活动蔓延全国。新任总统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决心结束侧翼地区欧洲殖民地对国家安全的不断威胁。为了控制该地区，他计划派一个秘密考察队去路易斯安那探查那里的土地和居民。

该考察队由两名正规军军官梅里韦瑟·刘易斯上尉和威廉·克拉克中尉率领。在为考察队申请拨款时，杰斐逊告诉国会，此举"旨在扩大美国国内的商务活动"，这句含义隐晦的话掩盖了进入属于同美国和平相处的别国领土从事军事情报活动的实质。刘易斯和克拉克的任务是调查在密西西比河与太平洋之间的辽阔地区居住的是些什么人，勘查地形，为建立防御工事选择地点。他们将隐瞒身份，如果遭到西班牙当局或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区的英国人逮捕，就说是在寻找传说中的西北走廊。

然而，考察队尚未完全建好，杰斐逊便吃惊地获悉，西班牙已秘密地将路易斯安那所有权还给了法国。如果拿破仑在新世界重建法兰西帝国，那将给美国继续扩张领土设置了障碍。更为糟糕的是，据说在转让准备期间，西班牙人关闭了新奥尔良港，该港对从密西西比河出口的西方贸易至关重要。杰斐逊立即采取行动对付这一紧急情况，派遣詹姆斯·门罗去巴黎，与美国驻巴黎公使罗伯特·利文斯顿一道，加快为了购买新奥尔良和东、西佛罗里达已经开始的谈判进程。总统授权门罗出价1000万美元，如果法国人拒绝，那就用这笔钱的四分之三单独购买新奥尔良；如果他们仍然不答应，总统授权美国代表们去伦敦，商谈同英国结盟。

1804年4月11日，也就是在门罗到达巴黎前不久，在法国政权更迭中的不倒翁塔莱朗出其不意地问利文斯顿："你想出多大价钱购买整个路易斯安那?"本来有点失聪的利文斯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回答说美国仅仅对新奥尔良和东、西佛罗里达感兴趣。然而，不到3星期，门罗到了巴黎，他们同意支付1500万美元现款购买大约1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宗土地买卖。国会批准购买路易斯安那后，刘

易斯和克拉克被立即派出考察——这时不再是去搞秘密情报活动，而是去完成合法的探索任务。

另一项有关西部土地的秘密计划与詹姆斯·威尔金森将军有关，虽然了解他的美国人寥寥无几，但他是个罪孽深重的人物。这位说谎者和阴谋家在担任美国陆军将级司令官的同时为外国充当间谍。

威尔金森在独立战争时期就干起了这种吃里爬外的勾当。他通过奉承拍马而不是自己努力，20岁时就晋升为上校。他曾加入企图罢免华盛顿总司令职务的阴谋集团。由于帐目"严重不清"，他被免除被服处长的职务，无疑因为他妻子出身于比德尔家族，而这个家族在费城颇有势力，他才算没有被撵出军队。

威尔金森嗜酒如命，负债累累，迁到肯塔基后，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并从事土地投机买卖。不久，他深深卷入"西班牙阴谋"。西班牙人害怕对其领土垂涎欲滴的美国边民，威尔金森觉得这是可以捞取好处的良机。他驾着平底船顺密西西比河到达新奥尔良，向统治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总督埃斯特班·米罗献媚说，阿勒格尼以西的地区有意摆脱美国的控制，可以建立西班牙保护下的一个缓冲国。

该计划被批准了，1787年威尔金森秘密宣誓效忠西班牙，从此以后西班牙文件中称他为"第13号间谍"。他获得一本"最难破译的密码本"，他1年的酬劳是2000美元加补贴，用银元支付。

尽管发了横财，但他生活奢侈，常常入不敷出。也许为了进一步得到西班牙主子的器重，他参加了重新组建的美国陆军，通过灵活巧妙的公共关系，作为印第安军人，他赢得

了很高声誉，尽管华盛顿总统对他并不赏识。当听到威尔金森与西班牙人有联系的传闻时，用间老手华盛顿马上警觉起来，下令立即查明情况，但是其他人谁也不重视这件事，唯有卖国贼本人惶惶不可终日。“为了上帝和友谊，在我们的一切联系中务请保密，”他给纳奇兹的西班牙当局写信说。“千万不要书面或口头提到我的名字，华盛顿的警惕性极高。”

威尔金森安然渡过风险，成为美军的一名主要将领。他又讨好杰斐逊，爬上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的宝座，一直为西班牙人效劳。西班牙人对美国不放心，购地协定中有关路易斯安那边界的措词写得模棱两可。当利文斯顿问及这块土地的准确边界时，塔莱朗曾莫名其妙地回答：“你为自己做了一笔极好的生意，我想你会受益最大。”该地区的南部边界是美国人所说的里奥格兰德呢，还是西班牙人所说的萨宾河？西佛罗里达包括在其中吗？

“第13号间谍”获得12000美元的酬劳后，给西班牙提供了有关杰斐逊未来计划的一份备忘录。为了防止美国从新购土地中得到好处，威尔金森希望西班牙不要放弃西佛罗里达，同时建议，如果考察队进入西班牙领土，那就逮捕刘易斯和克拉克。他还要求西班牙人在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边界构筑工事，尽管作为美军将级司令官，他可能会奉命率部攻打这些工事。

威尔金森怀揣西班牙人给的大笔钞票去了东部，他骑着饰有豹皮马鞍和金质马刺的骏马，穿着亲自设计的少将军服，比华盛顿更添几分威风。在那里，他拜访了老相识副总统阿伦·伯尔，革命期间，他俩曾在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参谋部共过事。伯尔由于任期将满，并且因在决斗中杀死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纽约和新泽西被指控犯了杀人罪，他正在

寻找征服新领域。这两人很快一拍即合，全神贯注地研究起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墨西哥的地图。

伯尔是革命阵营中的害群之马，尽管他仪表堂堂，智慧过人，但他几乎像阿诺德一样，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他的祖父是清教徒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父亲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是个勇敢的军人、能干的律师和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伯尔有进入美国奠基人行列的各种条件。然而，他不能抵制周围形形色色的诱惑，甚至在臭名远扬后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公众看来，他的罪行是：1800年企图窃据杰斐逊的总统职位；因政治上失意后杀害了汉密尔顿；阴谋把阿巴拉契山脉以西的大片土地从国家中分裂出去由自己统治。

伯尔与威尔金森和新泽西州的前参议员乔纳森·戴顿勾结在一起，究竟制订了什么样的西部计划，他们是否像后来被指控的那样通敌叛国，至今仍是个谜，因为对他的问题众说纷纭。其中一种最严重的说法是：他企图把西南地区从联邦中分裂出去，征服墨西哥后建立一个帝国。这一计划送给了驻华盛顿英国公使安德鲁·梅里，旨在得到50万美元的资助和皇家海军对分裂美国秘密活动的支持。伯尔对其他人谈的计划没有这样宏伟，仅是为了把墨西哥从西班牙人手中“解放”出来而远征。

梅里是个谨小慎微的职业外交官，然而他却大胆接受了伯尔的计划；他是从与伯尔关系密切的英国间谍查尔斯·威廉森那里得到该计划的。革命期间威廉森曾在驻美英军中服役，后去埃及和土耳其为英国特工局工作，1791年回到美国成为美国公民。虽然经梅里极力怂恿，威廉森亲自去伦敦请求英国支持伯尔的计划，但英国正忙于同拿破仑交战，拒绝

分出兵力。

威尔金森积极参与阴谋活动。伯尔在西部旅行时，他给这位副总统提供交通工具、引见当地知名人士。1806年夏，威尔金森收到几封密信，通知他说伯尔及其追随者们已准备就绪。但是这位狡猾的将军又犹豫起来，因为他曾派考察队去西班牙领地，忠于祖国的西部人已将此事报告了杰斐逊。为了保全自己，威尔金森像曾经背叛任何与他有联系的人一样背叛了伯尔。他给总统寄去一封耸人听闻的信，谴责“一个埋藏很深、涉及面广、用心险恶的阴谋集团”。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他擅自下令在新奥尔良逮捕了一批可疑分子。他还抓紧时机为自己捞取好处，厚颜无耻地向西班牙人索要20万美元奖赏，理由是他阻止了对他们领地的入侵。

已经怀疑伯尔1800年曾企图窃据他总统职位的杰斐逊认为伯尔几乎能干出任何变节的丑事。“我看他决不是个诚实、坦率的人，”他后来声明，“而是一个居心叵测的核心人物，谁都说不准他会对谁暗算。”斐杰逊觉得清算老帐的机会到了，下令以叛国罪逮捕伯尔。

在里士满由最高法院院长约翰·马歇尔主持的审判伯尔的工作虎头蛇尾。差一点被押上被告席的威尔金森是政府的主要证人，他声称由伯尔写的一封密信是原告出示的最有力的证据。杰斐逊千方百计要判伯尔有罪，但坚定的联邦主义者马歇尔坚决主张严格遵守宪法中关于叛国的定义——“发动反对美国的战争或依附美国的敌人”——最后陪审团裁决“罪证不足”，把伯尔释放了。

伯尔不愿受到即将到来的其它指控，也不愿受到债主的骚扰而逃往欧洲，直至1836年去世前几年才离开。他毫无悔

悟之心，愉快地生活着。70多岁时生下两个聪明的孩子，80岁时因通奸而离婚。詹姆斯·威尔金森怎样了呢？由于他对同谋者反戈一击，作为报答，杰斐逊允许这个老恶棍继续留在军队。在1812年的战争中，他因指挥无能被革职。墨西哥脱离西班牙独立后不久，他去南方想从这场剧变中捞取油水，于1821年在那里死去。

路易斯安那购地激发了美国获取东、西佛罗里达的欲望。东佛罗里达直插墨西哥湾深处，对新奥尔良与大西洋海岸地区间的贸易、交通构成永恒的威胁，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西佛罗里达控制着新奥尔良周围地区，还控制着流经今天的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的河流。同时，东、西佛罗里达也使美国感到头疼，因为敌对的印第安人把该地区作为袭扰边疆的基地，逃跑的奴隶也在那里藏匿。

杰斐逊总统和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坚持认为西佛罗里达应包括在路易斯安那，可西班牙人拒不承认。美国人没有泄气，试图通过贿赂，由拿破仑对西班牙施加压力，把这块土地割让给美国。国会在一次秘密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措词委婉的提案，决定拨款200万美元"支付美国与外国交往中可能需要的特别开支"。虽然该计划未能成功，但杰斐逊和麦迪逊的眼睛仍牢牢盯住渴求得到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把东、西佛罗里达和古巴搞到手，"杰斐逊语气坚定地说。不久，麦迪逊继任了总统。

今天，麦迪逊被人们尊敬地称作"宪法之父"，但他也开创了总统否决权和美国积极干涉西半球其它国家内部事务的先例。人们通常认为墨守陈规、胆小怕事、不会感情冲动的麦迪逊，一改小心谨慎的性格，大胆使用计谋将东、西佛罗

里达并入美国。1810年，他看到梦寐以求的机会终于来到了，曾经联合拿破仑的西班牙改变了立场，国王费迪南德六世沦为法国囚徒，西班牙半岛被一场残酷的游击战争搞得四分五裂。正当西班牙放松对新世界殖民地的控制时，法国、英国和美国对没落的西班牙帝国虎视眈眈，一点一滴地争夺。

麦迪逊乘西班牙之危，认为夺取西佛罗里达的时机成熟了。他把一心扩张的新奥尔良州州长威廉·克莱本召到华盛顿共商面临的选择，一致认为，如果美国公开入侵西佛罗里达，那将导致国内国际的严重混乱。于是，他们制订了一个更加微妙的方案，决定怂恿居住在西佛罗里达"爱国的"美国人宣告独立，并要求华盛顿支持——当然这种支持会立即提供。等到西班牙人弄清是怎么回事时，西佛罗里达也已归入美国版图了。

负责这项任务的克莱本甚至在离开华盛顿之前就开始物色支持者。1810年6月4日，他写信给曾经表示愿意领导这场"爱国运动"、居住在西佛罗里达巴吞鲁日附近的知名人物威廉·怀科夫，详述了颠覆西班牙这块领地的计划内容，指出"由当地居民先提出请求再占有这块土地将更令人满意。"为了制造"民众运动"的假象，他建议相同政治派别的人召开会议，邀请美国干涉。

然而"爱国者们"已经抢夺了枪枝。在克莱本写信前1个月，他们已召开了这样的会议，抗议西班牙政权的苛捐杂税与严重腐败。为了监视这次会议，西班牙总督曾批准召开这个会议。代表们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一个立法机关，经过几个星期讨论，他们谴责总督拖延改革、企图等待哈瓦那援军来镇压人民的反抗。1810年9月23日，约80名"爱国者"攻打巴吞鲁日的要塞。他们高呼"万岁，华盛顿!"，蜂拥冲进没有

防守的大门，没损失一人便占领了要塞。他们扯下西班牙国旗，换上“西佛罗里达共和国”蓝底银星旗。

接着，会议实施麦迪逊计划中的下一个步骤，向新奥尔良州州长克莱本送去独立宣言，该宣言10月3日转呈国务院，并附信请求把西佛罗里达“作为美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立即给予特别保护”。“爱国者们”没有久等，暴动后一个多月，于1810年10月27日，心满意足的麦迪逊发表声明，将西佛罗里达并入美国版图，并把美国的边界延伸到珀迪多河。

声明墨迹未干，法国公使便会见国务卿罗伯特·史密斯，说法国人对美国人挤进他们有意得到的地方很生气。“君子不说假话……我发誓我们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史密斯若无其事地回答。为了说明这种吞并不是人为的，并且进一步掩盖国务卿赤裸裸的谎言，总统篡改了他收到要求美国保护的那封信的日期，比实际时间推迟了两个星期。直到50年后一位历史学家细查国务院的文件时才发现麦迪逊这一狡猾的花招。

西班牙强烈抗议这种明火执仗的强盗行径，但是由于忙于同拿破仑交战，无心考虑从美国手中夺回西佛罗里达。英国也很气愤，驻华盛顿的英国公使谴责这一占领“违背了社会公正、信任和国家名誉等准则。”然而大多数国家则接受了国际生活中的这一事实。当驻俄国的美国公使约翰·昆西·亚当斯面带难色地解释美国如何突然获得邻近的土地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耸耸肩，表示理解地答道：“现在每个国家都在一点一点扩大。”

5. 这里只有我们爱国者

19世纪头50年，当美国在北美扩大疆土时，隐蔽活动——含义在许多方面是模糊不清的——成为美国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同现在一样，当时的秘密活动用来实现以公开方式无法达到的政策目标，并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有时也以难堪和失败而告终。

麦迪逊为在西佛罗里达没有流血便获得成功而洋洋得意，又把注意力转向东佛罗里达。隐蔽活动曾在巴吞鲁日奏效，他决定使用类似的策略夺取毗邻的土地。1811年1月3日，总统给国会写了一封密信，要求批准将东佛罗里达并入美国，以防西班牙或其它国家抢占该地区。12天以后，国会授权麦迪逊使用隐蔽活动，通过了一项秘密决议，"使总统在一定情况下能占领珀迪多河以东、乔治亚州和密西西比领地以南的土地，以及实现其它目的。"

同时，国会也授权总统，在外国企图占领东佛罗里达时"可以任意调用陆军和海军"，并提供了在当时数目可观的10万美元经费。决议批准后，麦迪逊立即任命前乔治亚州州长、72岁的将军乔治·马修斯负责该计划。马修斯将军接到的指示模棱两可，也许是故意的。指示说，如果西班牙总督或"当地政权同意"，马修斯可以占领东佛罗里达，并可提出成立临时政府；如果他们不同意，马修斯则"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如果需要军队支持，他有权向附近陆、海军司令官提出请求华盛顿将命令他们合作。

像今天中央情报局对付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一样，马修斯在东佛罗里达的行动本来可以隐蔽进行，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保密。他以为总统的意图是不择手段控制该地区，于是十分卖力地干起来。他告诉西班牙总督，英国对这块殖民地虎视眈眈，暗示如果总督接受美国的保护，当被监禁的国王费迪南德七世复位后，美国将把该领地归还西班牙。这些明确的暗示遭到拒绝后，马修斯立即采取了颠覆该殖民地的直接行动。

马修斯回到乔治亚，募集了一支由偷牛贼、偷伐木材者、奴隶走私者组成的200来人的军队。他许下诺言，远征军参加者都能得到大片土地。1812年3月16日，这些自称“起义者”的人渡过美利坚合众国与东佛罗里达交界的圣玛丽河，与约翰·麦金托什上校领导的一支“爱国军”联合攻打阿米利亚岛上的费南迪纳城。马修斯还请家产万贯的种植园主麦金托什充当请求美国保护的当地政权的领导人。

当美国的一支小型舰队兵临城下时，“起义者们”要求费南迪纳守军投降。西班牙要塞司令给舰队司令写了一信，问他是否有意支持攻击者，收到肯定答复后，要塞司令没发一枪一弹便向“爱国者们”投降，随后成立的东佛罗里达共和国便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并升起旗帜——白底上一位蓝衣士兵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在冲锋，上面写着：“人民的声音是最高的法律。”

麦金托什作为“东佛罗里达合法当局”的领导人，根据事先安排，迅速把该城和周围的土地交给了率领两连美军紧跟在入侵者之后而来的马修斯。这位热情奔放的老兵代表美国总统接受了新的土地，并向麦迪逊报告了这一胜利喜讯。马修斯一边等待华盛顿的嘉奖，一边下令向东佛罗里达的西

班牙堡垒圣奥古斯丁挺进。

然而，马修斯蒙在鼓里的是，麦迪逊政权内部发生争论，对东佛罗里达行动的态度已有重大变化。他出乎意外的成功在华盛顿没有引起欢呼，而是引起惊恐。1812年4月4日，正当由美国海军和陆军支持的“爱国军”开到圣奥古斯丁，兵临城下时，已经就任国务卿的詹姆斯·门罗拒绝对占领费南迪纳和阿米利亚岛承担责任，他写信给马修斯，冷冰冰地说他执行命令过了头。

“你为占领阿米利亚和东佛罗里达其它地方所采取的措施没有经过规范你行动的美国法律的批准，”门罗声明说。“总统的目的不是从西班牙手中强行夺取该地，而仅仅是占领该地以防落入外国手中。”虽然门罗对他的热情和正直冠冕堂皇地赞美了几句，并含糊其词地表示要给予奖赏．但马修斯很快被免去总统代表的身份。

1个月后，马修斯收到门罗的信，他怒不可遏，认为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是把他抛出去当替罪羊，扬言要去华盛顿向新闻界提供这次行动的全部背景，包括他同麦迪逊的私下谈话，揭露总统和国务卿背信弃义的行为。他口出狂言，要一枪崩了门罗，或至少在首都用鞭子抽着他游街示众。最后，接替马修斯负责该行动的乔治亚州州长戴维·米奇尔安慰他说，风波平息后，会让他出任东佛罗里达的州长。

米奇尔接到命令把阿米利亚岛归还给西班牙，但这项命令仅仅为了掩人耳目，其实暗中附加了条件，即西班牙必须保证被阻塞在圣奥古斯丁附近沙地和盐碱滩上“爱国军”的安全，否则美军不能撤走。米奇尔认为这个指示是尽可能长期在被占领地区呆下去的托词，于是他继续控制费南迪纳。7月份美国对英宣战后，这些指示便自行作废，因为西班牙是

英国的盟友，这时对东佛罗里达实行公开军事征服也就名正言顺了。

但是起义者们错误地把塞米诺尔的印第安人和害怕在美国沦为奴隶而逃跑的黑人当作敌人，迫使他们拿起武器保卫家园和自由。1813年年中，他们把“爱国者”及其支持者联邦军赶出了东佛罗里达。马修斯纠集的乌合之众渡过圣玛丽河14个月后，美国政府以隐蔽手法作的第一次冒险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通过公开和隐蔽活动没有办成的事，最后通过外交手段获得成功。1819年，美国放弃了对得克萨斯的含糊要求，用500万美元从西班牙手中买下美国人要求得到的土地，这样美国获得了对东、西佛罗里达的所有权。

那么门罗拒绝对马修斯在东佛罗里达行动负责的原因何在呢？原来美国默认这场“革命”的风声已经走漏出去，西班牙和英国公使不断提出令人难堪的问题，该计划在国会也遭到谴责。“我认为这不仅是战争，而且是进攻性战争，是非正义战争，”来自罗得岛的参议员威廉·亨特宣称。“为了国家的名誉，我不得不说……这是一场邪恶的战争，是强盗行为。”更重要的是，麦迪逊和门罗本来策划给联邦主义戴上卖国贼的帽子，结果这一错综复杂的秘密计划给漏了馅，因此，当时如果暴露他们秘密获取东佛罗里达的计划，将对他们十分不利。

1812年3月9日，正当马修斯紧锣密鼓准备入侵东佛罗里达时，总统给国会送去一封引人注目的信，谴责3年前英国人雇用美国陆军军官约翰·亨利与主要的联邦主义分子密谋分裂美国、最终把新英格兰再度纳入大英帝国。随信附了加拿大总督约翰·克雷格公爵给亨利的标有“绝密”字样的指

示，以及亨利给克雷格提供的几份报告。为了加强戏剧性效果，有些段落经删节后用星号代替，给人的印象是这些文件已经“消毒”。

麦迪逊的信引起轩然大波。参议院要求调查，共和党议员要求公布亨利同党的姓名，咬定其中必有主要的联邦主义者。亲政府的报刊大肆鼓吹类似10年前“木桶阴谋”的间谍恐慌。联邦主义者被突如其来的喧嚣搞得有口难辩，只好说那些文件纯属伪造。

亨利的这些文件，麦迪逊和门罗是从一位秃顶蓄须的法国人那里得到的。这位法国人自称叫爱德华·克里伦，是马尔他爵士，曾在拿破仑参谋部工作。事实上他名叫索比兰，是一位冒险家和诈骗犯，因挪用公款被开除出军队，是六七个国家警方通缉的罪犯。1811年圣诞前夕，他同在欧洲相识的亨利到达波士顿。和蔼可亲的“克里伦”讨好当地官员，包括总统的私人朋友埃尔布里奇·格里州长。从格里那里获得一封会见麦迪逊的介绍信后，这位法国人抛下亨利，在波士顿酒店饭馆转了一圈便去了华盛顿，受到麦迪逊的亲切接见。

不久，这个伪装的贵族向总统透露，他的一位朋友掌握一批能够证明联邦主义者勾结英国人阴谋推翻美国的文件。麦迪逊很快上了钩，要门罗同他共商搞到文件的详细计划。麦迪逊和门罗对这个骗子的花言巧语信以为真，认为一旦搞到这些文件，不仅能彻底打垮联邦主义者，而且能保证麦迪逊再度当选。

“克里伦”把他们的胃口吊上来后，狡猾地给文件定下令人咋舌的价钱：25000英镑，约合125000美元。门罗一听泄了气，因为特工费只有50000美元。然而门罗没有用这笔钱查

明这位法国人的底细，而是把全部经费送给了他。"克里伦"像一名垂钓能手嬉弄着上钩的鱼儿，说什么亨利来到华盛顿听说如此微不足道的数额后大发雷霆，表示宁可把文件烧了也不接受这个条件；只是经他耐心恳求，答应把自己在法国的不动产加进去，才算做通他的伙伴的工作。"克里伦"告诉门罗，作为一名爱国的法国人，他不希望因为少几个钱就让叛徒逍遥法外。最后，门罗同意让亨利免费搭乘美国海军军舰去法国作为补偿，同时答应在他安全离开美国后再公开文件内容。

1812年3月7日，约翰·亨利携带价值50000美元的黄金——除去借给那位"伯爵"的6000美元——乘船去了法国。两天后，门罗将亨利提供的文件交给国会，同时附有亨利写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出于纯粹的爱国主义和无私精神，把文件无偿地献给政府。为了掩盖这桩卑鄙肮脏的交易，门罗坚持要他写这封信。麦迪逊和门罗花这笔钱——几乎相当于建造一艘装备完善的小型护航舰的费用——买来的文件中没有任何陆军或海军秘密，没有阴谋活动的证据。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没有表明任何人有罪。经过删减的文件中没有涉及亨利同谋者的名字，也许"克里伦"删改的意图是给文件加上一种更邪恶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麦迪逊和门罗不将全部文件交给国会，而是透露少数几份，让联邦主义者猜测他们还掌握哪些材料，那他们就更聪明了。

文件披露出来后，联邦主义者如芒在背，如坐针毡。但是他们很快镇定下来，经过仔细分析，他们清楚地看到，这些文件并不能证明同亨利交谈的人事先知道他是英国间谍或者同他有见不得人的勾当。来自波士顿的联邦主义议员乔赛亚·昆西领导的小组对此事作了认真调查后，很快便获得了

嘲笑政府的把柄。通过查核财务帐目，昆西发现总统说没有花钱买文件完全是谎话，他甚至查明了文件的确切价格。昆西还迫使门罗承认他并没有掌握亨利同谋者的名单。

更糟糕的事还在后头。门罗给美国驻巴黎的公使乔尔·巴洛写信，请他从亨利那里搞到与他密谋的联邦主义者名单。结果这封信同巴洛的来信交叉了。巴洛告诉国务卿，亨利一到公使馆就大骂“克里伦”是骗子，气愤地说他在法国的不动产纯属子虚乌有。门罗听了这个消息一定大惊失色，因为他已托巴洛转交给已经离开美国的“克里伦”一张5000美元的支票，显然是作为“克里伦”自愿牺牲祖传家产崇高精神的补偿。这时，麦迪逊和门罗意识到事情的可怕后果，公众将很快发现他们不仅使用公款为党派斗争服务，而且在讨价还价的交易中上当受骗。处于这种狼狈境地，他们企图掩盖乔治·马修斯在东佛罗里达的隐蔽活动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他们任意宰割西班牙，那怎么能指责英国阴谋分裂美国呢？

尽管“亨利阴谋”没有彻底曝光，但此事激起美国人对英国的仇恨，加剧了战争叫嚣，1812年6月 18 日终于正式宣战。门罗指出，战争爆发的原因是英国强迫美国公民参加皇家海军、英国干涉中立国之间的贸易和英国同印第安人策划阴谋活动，其实战争真正的原因是西部主战派施加压力的结果。他们认为战争是从英国手中夺取加拿大的好机会。

在1812年战争中，虽然美国海军屈指可数的几艘挂帆舰与英国海军舰艇在一对一的交战中打得相当出色，但是美军在陆上遭到惨败，并且标志着美国情报工作的低谷。在革命期间为乔治·华盛顿工作的老情报人员本来仍然可以使用，但是没有请他们发挥聪明才智。事实上，在这次战争中，任

何一级机构都没有组织情报工作或使用间谍。美国战争情报准备工作相当糟糕，甚至连加拿大边界地区的地图都没有，尽管征服加拿大是这次冲突的主要目标。陆军部也几乎不了解驻加拿大的英军兵力情况，只知道英军和他们的同盟者印第安人的大致分布，但根本不掌握他们的真实意图。

总的说来美国陆军对情报工作漠不关心，唯一的例外是建立了一个由16名军官组成的测绘分队，除了测量、制图以外，这些军官的其它任务是给派出获取敌人情报的侦察员带路，绘制侦察人员行动路线图并附上值得注意的文字说明。

入侵加拿大由内森·黑尔的好朋友威廉·赫尔准将指挥。革命时期的赫尔曾经血气方刚、智勇双全，但这时他已头脑迟钝、缺乏活力。英军从约翰·雅各布·阿斯特那里比他先一步了解到美国已经宣战的消息，这位皮毛贸易大王与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有生意来往；而陆军部则需通过正常邮路，才能把战争已经开始的消息通知赫尔。由于不知道已经进入战争状态，赫尔派一艘纵帆船把他的行李和文件从伊利湖送往底特律，结果该船被英国人俘获，他的文件也落入敌手。

这仅是赫尔不幸的开端。由于没有情报就发动入侵——拿破仑曾经说过，忽视情报工作的将军是“不会打仗”的将军——他在加美边界地区不知所措，无法发现敌人，更不用说牵制敌人。而英军司令艾萨克·布罗克将军对赫尔的弱点了如指掌，巧妙地以机动制胜，骚扰对手。当赫尔掉头保护其漫长的交通线，逃向底特律时，布罗克又抓住他的恐惧心理巧施计谋，把新征集的加拿大民兵化装成英国正规军派到被困的美军附近迷惑敌人。布罗克还有意让美国佬缴获一些信件，其中有一封指示驻麦基诺的一位英军军官不要再派印

第安人去底特律，因为“目前已有5000人”。

赫尔一口吞下了诱饵。由于只有1000余人的作战部队，他以为自己面临的敌人很强大，除了人数众多的英国正规军，还有至少5000印第安人。实际上，双方实力大体相当，美国人拥有坚固的工事，占有一定优势。赫尔彻底上当受骗，下令在底特律悬挂白旗，结束了入侵加拿大的企图。这位倒霉的将军是情报工作失败的牺牲品，也是英国假情报的受害者。

不久，美国在军事上连遭挫折，港口受到日益严密的封锁，英国入侵者兵临华盛顿，政府陷入瘫痪。在新英格兰，“麦迪逊先生的战争”十分不得人心，人们怨声载道，声言要揭竿而起。给海上英国船只和驻加拿大英军提供物品的走私贸易如火如荼，楠塔基特宣布“中立”，脱离联邦的幽灵再次在美国徘徊。

安德鲁·杰克逊是这次战争中唯一成功的美军指挥员——也许是唯一认识情报工作在军事行动中重要性的指挥员。这位自学成才的将军十分重视及时获取有关敌军兵力、供给和作战计划的准确情报，善于使用间谍和侦察员。一位现代传记作家指出：“他的情报手法相当先进并极为有用。”他的最详实的军事论文中有一篇是对通过“秘密渠道”——可能是在英军占领的彭萨科拉的一名间谍——获取的有关英国陆海军情报的评论。

杰克逊还利用歹徒获取情报，这也许是后来黑手党和中央情报局密切联系的先导。由于杰克逊许诺赦免琼·拉菲特为首的海盗集团，在新奥尔良战役中，这班海盗在杰克逊的领导下，监视从牛轭湖向新奥尔良进军的入侵英军，为美国佬的辉煌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1814年圣诞前夕，在比利时的根特签订了一项和平协定，两周后发动了这次著名的战役，

使连续数年遭受失败和屈辱的美国人扬眉吐气，然而可惜的是，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改进国家的情报工作。

从签订根特和平协定到墨西哥战争爆发历时30年，在此期间，美国没有足够的财力维持一支可观的外交队伍，常常只好使用间谍。最不寻常的间谍无疑要算乔治·贝休恩·英格利希，他几乎能同著名间谍詹姆斯·邦德相提并论。英格利希扎着穆斯林头巾，穿着轻盈的长袍，代表美国在遥远的君士坦丁堡从事秘密活动。

19世纪20年代，奥斯曼帝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额每年为100多万美元。詹姆斯·门罗总统内阁中的国务卿、美国第一个职业外交官约翰·昆西·亚当斯希望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一个外交使团以便保护这种贸易，土耳其人表示愿意谈判，但是亚当斯希望获得他们同其它西方国家签订的条约复制本以确保美国也能获得相同特权，这个任务交给了英格利希。

英格利希是个人才难得的冒险家，他不仅会讲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而且对奥斯曼帝国的风俗习惯了如指掌。他1787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当他20岁毕业于哈佛大学时，人们说他是个“聪明洒脱、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对法学厌倦后，他转入哈佛神学院学习，并且获得当教士的证书。但是学习希伯来语后，他开始怀疑《新约全书》中的《启示录》。他在181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提出了自己的怀疑，结果在新英格兰激起公愤，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该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剽窃来的。就这样，他很快结束了教士生涯。

为了寻求新的开端，他去西部在一家报纸担任编辑。他对语言很有天赋，学会了几种印第安语方言。不久，他决心见见世面，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当上一名中尉。当他在地

中海服役时，他的舰艇驶进当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亚历山大。他立即被东方深深迷住了，辞去在美军中的职务，皈依伊斯兰教，改名穆罕默德·埃芬迪后加入埃及军队。

英格利希与埃及巴夏穆罕默德·阿里的第三个儿子伊斯梅尔结为好友，1820年陪他沿着上尼罗河出征苏丹。英格利希的任务是负责远征军的炮兵——10门轻型野战炮，2门榴弹炮，1门迫击炮——全由骆驼运输。英格利希是进入苏丹的第一个白种人，后来他把这次远征写进一本书，至今仍是很好的读物。由于白天酷热，部队夜间击鼓行军，开路先锋高擎火把，发射土火箭，大部队紧紧跟上。虽然苏丹部落英勇抵抗，但无法抵御英格利希的大炮。

尽管如此，英格利希仍然忠于自己的祖国，1823年他回美国时，毅然接受了亚当斯交给的秘密任务。回到君士坦丁堡后，他租了一座小房子，重新使用土耳其名字，穿上土耳其服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多数欧洲人认为他只是个浪漫的西方人，穿当地服装是为了更好地游览。但是，他认为，“穿上这种服装，我几乎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可以有机会与土耳其官方来往，如果穿欧洲人的服装，那肯定不行。”通过某种秘密途径，英格利希“神不知鬼不觉地”获得一份奥斯曼帝国同法国签订条约的复制本。他还同土耳其卡普丹巴夏交上朋友，说服他促进美国的权益。

英格利希输通关系后，亚当斯派代表去君士坦丁堡拟订美土条约。为了防止英法破坏谈判——英法都不希望美国同奥斯曼帝国发展贸易关系——亚当斯坚持要严格保密，他对代表们说：“该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只有保密才能成功，务请慎之又慎。”负责传送信件的信使使用化名，偷偷搭乘开往地中

海的船。英格利希建议给土耳其官员送些礼品，亚当斯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从特工费中拨出 20000 美元给海军部供谈判人员使用。

虽然英格利希的任务表明，年轻的美国已经有了全球利益，但是当时的美国同现在一样，也特别注意其附近地区的动向。美国担心欧洲列强卷土重来，在新世界重建殖民地，因此对拉丁美洲严密监视。如果允许专制者们重新涉足西半球，最终难道不危及美国自身的安全吗？1823年，门罗总统派遣间谍亚历山大·麦克雷去欧洲搜集有关欧洲国家对南美意向的情报。现代情报官员将会发现，麦克雷接受的指示也是他们熟知的：“你将不担任任何公职，只是携带美国平民护照……你要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避免抛头露面，避免人们怀疑你受雇于某个政府机构。”另一名间谍被派往古巴去观察该岛的形势，他自称是寻医找药的旅游者。

特工人员不仅被派往欧洲和拉丁美洲，而且被派往东亚。1832年，安德鲁·杰克逊派遣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名船长埃德蒙·罗伯茨去安排同暹罗、马斯喀特、缅甸、印度支那和日本的商务谈判。他的秘密使命是阻止某些国家“对总统正在考虑目标的可能干扰”。罗伯茨的掩护身份是他所乘坐的“孔雀”号单桅帆船上的“船长秘书”；只有船长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国务院对他所去的国家了解甚少，甚至不知道某些国家统治者的名字，因此罗伯茨携带了许多空白护照和介绍信，以便入境方便。鉴于曾在佛罗里达等地发生的越轨行动，上司向他强调，美国同与东方交往的其它国家相比有许多优点，他无意中表露出讽刺意味，说：“我们从不像英国、法国与荷兰那样征服别国，或要求别国允许我们在那里建立影响。”

在印度支那，罗伯茨认识到，他必须在某些方面炫耀自己以便赢得别人好感。凭着惊人的记忆力，他滔滔不绝地讲出家乡新罕布什尔州城镇、河流与湖泊的名称。尽管他有一连串吓人的头衔，但罗伯茨在印度支那遭到冷遇，因为他不愿磕头——见到统治者时把前额触碰到地上——西方人认为这样做有失身份。在以后的4年中，他成功地同暹罗和马斯喀特的苏丹拟订了条约，正当准备启程去日本时，他在澳门去世。

当总统们向全球派遣间谍时，与国会经常发生争吵，国会提出"公众需要知道"特工费的秘密用途。1831年参议员约翰·福赛思——后来在杰克逊和范布伦总统手下任国务卿——首次公开彻底阐明了这笔费用的用处。"特工费应该而且能够用于公共利益，这是划拨这笔经费的全部目的，"他宣布。"这就是用于间谍活动，这样说一点不过分……"

1842年，为解决长期争论的美加边界问题，签订了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结果特工费问题再度爆发。4年后，国会谴责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使用17000美元特工费在宗教报纸上开展宣传活动以争取人们支持这个不得人心的条约，要求彻底公布韦伯斯特任职期间特工费的开支情况。尽管詹姆斯·波尔克总统是民主党党员，韦伯斯特是辉格党党员，但波尔克坚决拒绝国会调查。他模仿乔治·华盛顿的口吻说：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紧急情况随时可能发生，为了公共安全和利益，完全有必要制订一些经费计划；而这些计划的真正目的如果公开，就会导致失败……任何国家都不会公布这些经费的用处。在战

时或危险来临时，国家有必要聘用人员获取情报或执行其它重要任务，但是，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名字或机构有万分之一的可能被泄露出去，那就无法说服他们去执行任务。因此，划拨经费用于对国家极为有益的目的很有必要……但是，如果公布原始计划和财务开支单据，我们的意图就会暴露，以上目的就可能被其它国家的阴谋活动彻底粉碎……”

波尔克总统有充分理由对特工费使用情况保密，也有充分理由把“执行其它重要任务”和“获取情报”列入特工费开支范畴，因为他正忙于旨在把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纳入美国版图的秘密活动。长期以来，许多美国人把古巴和墨西哥同美国接壤的地区看作美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获得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新奥尔良一家报纸大肆叫嚣，“我们还要获得旧墨西哥和古巴！巴拿马地峡挡不住我们！圣劳伦斯河也挡不住我们！时机已经成熟！”

自1836年孤星共和国[①]从墨西哥独立出来后，美国一直对得克萨斯虎视眈眈，但是没有立即吞并这块土地，因为几任总统都担心卷起反对奴隶制的浪潮。为了阻止美国的扩张，英国间谍主动支持得克萨斯人民维护独立，同时在古巴积极活动。吞并问题一直搁置到1844年4月，不得人心的总统约翰·泰勒及时抓住这个问题，想在即将开始的大选中捞取资本。虽然泰勒在选举中败北，但国会仍然批准吞并得克萨斯，从未承认得克萨斯独立的墨西哥一怒之下同美国断绝了外交

①指1835—1845年的得克萨斯州，泰勒总统下台前加入美国联邦 故该州别称孤星州。

关系。

其间，波尔克吃惊地获悉，英国在加利福尼亚加紧活动，而美国对加利福尼亚早就垂涎欲滴。形势变得非常严峻。加利福尼亚作为墨西哥一个省，同远方混乱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脆弱，数百名美国人已经进入加利福尼亚。人们认为，类似在得克萨斯发生的分裂运动不可避免。1845年年底，驻蒙特雷的美国领事托马斯·拉金报告华盛顿，英国开办的哈得逊湾公司准备向墨西哥政府提供武器和资金，组织一支远征军重新控制加利福尼亚。同时，在墨西哥城的一位间谍报告，一旦美国同墨西哥交战，墨西哥人可能把加利福尼亚割让给英国。波尔克立即指示拉金充当密使，坚决反对“把加利福尼亚割让给英国或其它国家”。

拉金接到的指示措词相当微妙。一方面，要他告知加利福尼亚人，美国将不秘密支持反对墨西哥的叛乱；另一方面，要他向加利福尼亚人保证，“如果加利福尼亚宣布独立，我们将视其为友邦，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如果有人提出吞并问题，他将说美国没有这样的计划，但是，如果“独立的加利福尼亚人民要求加入美国，”那将受到欢迎。

凡是涉及类似为在别国煽动叛乱而铺平道路的敏感问题，指令往往是模糊不清的。然而，对拉金这样刚直诚实的人来说，总统的意图极为清晰明了。

美国同墨西哥冲突的原因，像历史上其它战争的原因一样，美国人民得到的是错误的解释。波尔克希望通过发动战争获得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边界地区，但是如果墨西哥不首先进攻，国会就不一定同意他宣战。吞并得克萨斯后，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总统命令扎卡里·泰勒将军带领一支部队去

里奥格兰德河，公开任务是保护新成立的得克萨斯州，实际上是为了刺激墨西哥人，因为他们声称，得克萨斯的西南边界是里奥格兰德河以北和以东的努埃西斯河。墨西哥政府愤怒谴责美军的占领破坏了它的领土完整。1846年4月25日，墨西哥军队渡过里奥格兰德河，突然袭击了美军一支骑兵分队，杀死杀伤16人，这下波尔克终于找到他所需要的借口。

总统宣称，墨西哥人"入侵了我们的领土，在美国土地上屠杀美国人"，他向国会递交了一份战争文告，经过长时间的激烈辩论后获得通过。"命运天定论"的支持者们欣喜若狂，但是这场战争并未受到普遍支持。废奴主义者们谴责这场战争是企图制造新的畜奴州的"邪恶、该死的"阴谋。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议员亚伯拉罕·林肯对波尔克提出的战争在美国领土上发生的断言提出质疑。

从情报的角度看，美国再次对战争的准备很不充分。自从1812年以来，美军情报工作略有改进。测地工兵继续测量美国腹地，美国第一次注意努力与外国军事发展齐头并进。

尽管1889年前美国没有向国外派驻常设武官，但是派了几名军官去欧洲担任观察员。西尔韦纳斯·塞耶上校在欧洲参观了几所军事院校，后来，在他担任西点军校负责人时，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实行了重大改革。其他军官获得了改进炮兵和骑兵战术的情报。尽管如此，陆军部仍然没有建立搜集、分析、协调情报的机构，并且美军多数指挥员对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征服墨西哥是当时美军实施的一项最庞大的计划，但是他们对战争却毫无准备。泰勒将军是个有勇无谋的武夫，认为战争就是行军、冲锋、射击而不是参谋工作，因此在他占

领墨西哥同美国之间有争议的领土期间，根本不去搜集情报。当他的部队渡过里奥格兰德河进入墨西哥时，他对当地地形和民情一无所知。“我们两眼一抹黑，”伊桑·阿伦·希契科克上校说。“也许泰勒将军将掌握的情报藏在肚子里，不过我深知其人，不相信他掌握什么情报。”

当需要西南地区的地图时，陆军部只好找来一份极不准确的商业地图；测地工兵曾经绘制过一份比较精确的地图，但归档后已查无着落。总统对北部墨西哥毫不了解，却希望泰勒的部队从当地农村获得给养。军需主任托马斯·杰瑟普将军一针见血地说：“就我所知，华盛顿没有任何情报能使我或陆军部决定在墨西哥是否可以使用四轮马车。”

泰勒将军以为不会遇到强烈抵抗，不慌不忙地向通往墨西哥东北地区的重镇蒙特雷前进，根本不去侦察敌人的兵力和防御工事。有人曾建议从墨西哥走私人员或野蛮的边民中物色不满分子充当间谍或密探，可是他以这些人不可靠为由一口拒绝。令这位耳目不灵的将军十分吃惊的是，蒙特雷的防御工事十分坚固，虽然攻击成功，但因他的愚蠢错误使部队伤亡惨重。

在蒙特雷以沉重的代价获得胜利之后，一场秘密外交奇怪地开始了。波尔克只希望尽早结束战争，在获得加利福尼亚和里奥格兰德边界地区后，他想立即同墨西哥和解。1846年11月，纽约亲扩张主义的《太阳报》出版商摩西·比奇要去墨西哥办事，他告诉总统，他在墨西哥军界和宗教界有许多熟人，希望让他担任密使去拟订一项和平条约，对美国的征服给予认可。波尔克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虽然比奇的正式任务仅是搜集情报，但波尔克希望他能带回一个条约。“如果他这样做了，并且条约很好，我将……呈交参议院批准。万

一他以官方名义，冷不防签订了条约，那可是个大笑话，”总统在日记中写道。

比奇不是英国公民，可是他持英国护照去墨西哥。他接到的指示是“绝不直接或间接地暗示你是本政府的代理，除非为了实现和平，万不得已时才能这样做。”陪他前往的是一位漂亮活泼的女人简·麦克马纳斯·斯托姆斯。她常为他的报纸撰写社论，会讲西班牙语，对戏剧性的事情有鉴别力，曾经支持在得克萨斯建立殖民地。实际上，这个任务可能就是斯托姆斯想出来的。

他们一到墨西哥湾的维拉克鲁斯就被捕了，墨西哥官员搜查他们的行李，对他们审讯了好几天。起初比奇担心自己暴露了，后来发现墨西哥人只是对所有外国人都怀疑。获释后比奇与伙伴前往墨西哥城，到达后他们很快投入首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并向几位墨西哥要人试探和平问题。但是他们错误地参与反对墨西哥独裁者安东尼奥·洛佩斯·德·桑塔·安娜将军的圣职人员暴动。桑塔·安娜本来正在北方同泰勒作战，出其不意地回到墨西哥城，政变破产了，迅速实现和平的希望也化为泡影，比奇和斯托姆斯见势不妙，逃离了墨西哥。事后比奇声称和谈已经取得进展，波尔克至少表面上信以为真，从特工费中支付给他 2609.95 美元。

战争在继续进行，波尔克对泰勒在军事上的进展日益不满，虽然这位老兵赢得过几次胜利，但波尔克认为这些不足挂齿的小胜没有摧垮墨西哥的主力。总统和他的顾问们也担心泰勒可能在1848年被辉格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同时遏制泰勒的政治野心，1847年3月，一支由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率领的部队在维拉克鲁斯登陆，奉命向

敌人腹地挺进直捣墨西哥城。不到1个月，斯科特所率部队距墨西哥首都只剩3百英里。

斯科特对桑塔·安娜部队的位置、计划和兵力一无所知，当他率部穿越陌生险恶的地形，通过敌对居民生活的地区时，认识到必须尽快获得准确情报。由于没有可靠地图，他派工兵担任特别侦察任务。与泰勒将军不同的是，斯科特认为叫墨西哥游击队担任侦察员和密探很有用处，因此他指示监察主任伊桑·阿伦·希契科克上校建立一个秘密机构。希契科克是革命战争中的英雄伊桑·阿伦的孙子，毕业于西点军校，曾与佛罗里达的森密诺尔人打过仗，并且曾在西北地区担任过巡逻任务，他对使用当地人充当侦察员的作用有切身体会。

当部队到达维拉克鲁斯与墨西哥城之间的普韦布洛时，希契科克下令逮捕公开住在城内的土匪头子曼纽尔·多明格斯。获释后，多明格斯同意替美国人担任间谍。为了试探这个土匪是否忠实可靠，希契科克派他送一封信到斯科特将军的司令部去。"如果他忠实地执行这项任务，我将交给他其它工作，"这位上校在日记中写道。两周以后，多明格斯回来了，并带回了答复。希契科克这下放了心，指示他从手下土匪中挑选5人侦察敌人的阵地，同时担任向导、信使和密探。

希契科克对多明格斯十分赏识，认为他"猛如雄狮、忠实可靠。"多明格斯自称原是个普通织布工，因为遭到一名墨西哥军官的抢劫和毒打才当上土匪，向政府报仇雪恨。

不久，希契科克从当地监狱中释放了多明格斯的十几名同胞。被释放的人欢呼、拥抱，发誓永不再做伤天害理的事，永远忠于美国。多明格斯每天的报酬是3美元，其他人2美元。最后这班人——美国情报机构雇用的首批外国人——增加到近100人，并且正式命名为墨西哥侦察连，人称"40大盗"。

“他们骑着马，哼着下流小调，不时地鸣枪，完全不像军人，”一位美国军官报告说。“他们还同几个浪荡女人鬼混。每人持一根长矛，帽子上系着宽宽的红带子……第一次见到他们，我就同其他军人一样心想：‘让这班流浪汉见鬼去吧！’”

虽然不正规，但侦察连的人起劲地为斯科特效劳。他们窥探敌方阵地，为美军提供敌人活动的情报，保护行军队伍和供给线的安全。多明格斯抓住为桑塔·安娜卖命的游击队头领，亲自“说服”他们掉转枪口，同时，他几次拒绝墨西哥领导人贿赂他背叛美国人的企图。他们曾逮住一名墨西哥将军及其随从，他们还化装成赶集的人混进墨西哥城，把城内设防绘制成图。为了使美国军官能辨认出这些间谍，希契科克给他们发了有他签名的纸条，上面写着“请信任持条者”。土匪间谍们把纸条藏在衣缝里或长长的头发里。

令人遗憾的是，战争一结束，美国政府就不再像以往那样信任这班从事情报工作的外国人了。在占领墨西哥城以后，墨西哥侦察连就被遣散了，每人发得20美元后自谋生路。多明格斯对希契科克说，如果他留在墨西哥，“将会像狗一样被杀死”。最后，他同家中9口人被带到新奥尔良。上校气愤地说：“他在那里抚养家庭，死活无人问津。”希契科克说服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杰弗逊·戴维在参议院提出救济多明格斯的议案，但是未能通过。

在建立战时间谍网的过程中，希契科克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一点成绩实属不易，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总的说美国情报工作还缺乏经验。然而，万事开头难，在有限的条件下，美军情报工作比独立以后任何时候都有起色。情报没有直接带来战役的胜利，但是一些军官积累了侦察经验，战术情报工作有了起色，这些进步在内战中对南北双方都起了

重要作用。

6. 内战中的业余间谍

亚伯拉罕·林肯伫立在白宫巨大的窗口旁，脸色严峻地远眺波托马克河对岸弗吉尼亚州重叠的山峦。那边的事态怎样？南部同盟军集结起来有何意图？3个月前，南部主张脱离联邦主义者们轰炸并占领了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要塞。这时是1861年7月，眼看缺乏训练的两军又要交锋。叛军一共有多少人？多少门大炮？这些问题萦绕在总统脑际，但他无法找到答案，因为联邦没有建立战时情报系统。烦恼和疑虑煎熬着总统的心，灿烂的夏日阳光似乎在嘲弄着他。

叛逆地区从北马里兰一直向弗吉尼亚延伸，处在这个地区的华盛顿受到内外的威胁，到处都潜伏着谋反的危机。反叛一方的信使和间谍活动猖獗，全副武装的小分队随时可能渡过波托马克河袭击秩序混乱的首都。有传闻说间谍已经渗透到联邦政府上层。林肯夫人发现，白宫客人中有一人“喜欢在内阁办公室门口偷听”。然而，由于这位第一夫人是肯塔基人，有1个兄弟和3个其他亲戚在同盟军服役，她自己也被怀疑通敌。总统给他的内弟媳签发去南方的通行证时，这个女人带了大量南方急需的药品奎宁。林肯对近在咫尺的敌人的资源和意图，这些最基本的情报一无所知。

为了解决情报问题，林肯找到为南部诸州提供铁路和轮船指南的出版商威廉·阿尔文·劳埃德。劳埃德是总统的老相识，到白宫办理去南方出差的通行证，林肯认为他是去南

方搜集情报的理想人物：他是南方负有盛名的交通专家，在视察轮船和铁路时，可以畅行无阻地了解情况而不会招致怀疑，他有从事谍报工作最理想的掩护身份。

总统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告诉劳埃德他急需情报。后来劳埃德的家属在领取报酬时说："那时政府在反叛诸州没有可靠而又负责的间谍，林肯极需一个对反叛诸州的地形了如指掌、忠实可靠、聪明能干的人。"当劳埃德抱怨这样做危险时，林肯冷冷地说，如果他不接受任务就不给他签发通行证。劳埃德去南方做生意心切，无可奈何地同意担任总统的私人间谍，在他 1861 年 7 月 13 日离开华盛顿之前，林肯交给他一份合同，除了报销各项开支，每月报酬为 2000 美元。

由于林肯和劳埃德都不熟悉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他们都未考虑建立秘密联络渠道。劳埃德像内森·黑尔一样，不知道密码和暗语，随身携带大量可能成为罪证的情报，只有找到信使才能把材料送给总统。他甚至把有林肯签名的合同带在身上，后来为了免遭麻烦，才聪明地销毁了。劳埃德在南方呆了 4 年，南部同盟的支持者们怀疑他搞间谍活动，几次将他逮捕，然而与倒霉的黑尔不同的是，他没有被押上绞架。

虽然劳埃德违心地充当业余间谍，并且缺乏训练，但结果证明他善于随机应变。一次在里士满，他说服负责防务的将军带他去参观该城周围的防御工事，甚至获准同一些炮兵连连长交谈。他还把从一位粗心大意的参谋那里获得的有关罗伯特·李将军部队实力的情报提供给林肯。一次被捕后，他把坐牢当作获取情报的机会，在里士满军事监狱雷堡，他成功地开辟了一条与白宫联络的秘密渠道。对于交换的战俘，谁也不会去搜身，因为他们被俘后毕竟一直受关押，所以当释放一批北方俘虏时，劳埃德把他想送给总统的密信悄悄塞

给其中一个人。

林肯对劳埃德的活动始终保密。今天，劳埃德送回的情报一份也找不到了，总统可能看完后立即销毁了，他对自己派出间谍这件事守口如瓶，甚至他的传记作者们都未能了解到他是个用间能手。尽管林肯对情报工作缺乏经验，但是他充分认识战时稳定可靠的情报来源的重要性，以及保护这种来源必须严格保密的必要性。

也许内战期间的谍报工作在浪漫的神话和离奇的故事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不少人认为，搜集情报是见不得人的勾当，许多为南北双方作出重要贡献的间谍均无史料可查，虽然偶然保留一些记录，但有些间谍战后仍不愿透露姓名。在南方，有关情报活动的大部分文件在南部同盟垮台时销毁了。虽无历史记载，但有关联邦和南部同盟间谍的神秘传说却非常丰富，许多是关于漂亮女人把绝密文件藏在鼓起的胸前飞马冲过防线的故事。不幸的是，正如埃德温·菲谢尔在题为《内战情报神话》一文中所说，这些传说中的多数与事实相去甚远，多半是历史杜撰学派想象出来的。

例如贝尔·博伊德常常被描写成“脱离联邦主义的绝代佳人”，她给斯通沃尔·杰克逊提供的情报帮助他在弗吉尼亚的弗兰特罗亚尔打败了北部联邦军，成为他 1862 年谷地战役大捷的高潮，事实上她只可能最后提供了少量有价值的东西，因为这位将军认真搜集北方佬阵地的情报已达两个星期。“在我们离开纽马基特之前，杰克逊已经掌握了这些事实，整个部队的运动就是以这些事实为基础的，”他领导下的理查德·泰勒将军说。另外，贝尔也常常被描绘成任意摆布北方军官的美女，但是照片表明，她的鼻子过长，牙齿向外突出。虽

然贝尔·博伊德当过几次南方信使，但实际上人们对她的贡献已作了添枝加叶的夸大。

极其明显的事实是，在4年战争中，南北双方都没有建立搜集、分析情报或进行反情报活动的全国性情报系统。双方军队中的情报参谋工作仅处于初级阶段，华盛顿和里士满的统帅部和领导人还无法清楚地知道对方的情况。

在北方，由于西蒙·卡梅伦领导无能，陆军部陷于瘫痪。卡梅伦是宾夕法尼亚共和党领袖，他因1860年曾支持林肯而被任命为陆军部长。为了弥补情报工作的缺陷，海军部和国务院都想派遣自己的间谍，各拉一套人马对着干。两家都招聘了间谍，制订了计划，落实了任务，根本不想在“平行”机构之间互相通气。

内战头18个月，华盛顿有两个互相竞争的情报机构，都称作“特工局”。一个由美国第一位私人侦探阿伦·平克顿负责，向波托马克河军团司令乔治·麦克莱伦将军汇报工作；另一个由拉斐特·贝克负责，先后向年老体衰的陆军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国务卿威廉·西沃特、陆军部长卡梅伦的继任者埃德温·斯坦顿汇报工作。至少有两次，一个机构的成员被另一个机构扣押。南方的情况大体相仿，南部同盟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亲自领导情报和反间谍工作。

许多将军在局部地区建立了间谍网，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但是他们的成就同革命时期乔治·华盛顿相比就相形见绌了。内战中最重要的情报不是间谍获得的，而是偶然发现的。1862年9月13日，两名印第安纳州士兵发现了李将军的一份“特别命令”，号码为191号，这份包着3包雪茄烟的文件中记录了即将在西马里兰发动军事行动的详细内容，然而这份命令转送给麦克莱伦将军后，他未能抓住时机迅速采取

行动。

由于双方情报人员缺乏经验、能力差，增加了谍报工作的危险性。密码和暗语常常很不完善，不仅起不了作用，还可能连累携带这种密件的人。间谍有时冒着生命危险搜集到重要情报，可是到头来这些情报被弃之不用。保密工作极其马虎。里士满宪兵主任约翰·温德尔将军负责首都反情报工作，同时兼管维持该市秩序的繁重任务。令人吃惊的是，他把保卫里士满的各团番号和兵力用粉笔写在别人能看到的办公室黑板上。

也许内战期间的谍报工作很不协调，但谍报活动十分广泛。南部同盟支持者们首先着手建立了情报网。进攻萨姆特要塞后，明火执仗的南方狂热分子离开了华盛顿，但不太露面的支持者们继续隐藏下来，其中之一是托马斯·乔丹上尉，他在北方首都又呆了 1 个月，建立了一个渗透到联邦政府上层的间谍网。乔丹毕业于西点军校，曾同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同住一个宿舍。他在斯科特将军手下当参谋，有机会了解到联邦军的作战计划。到他离开华盛顿的时候，他已经建立了一个包括专业人员、政府职员、店员、银行家、政治家在内的间谍网。他尤其喜欢使用女间谍，他的谍报网内有一位著名的女人，被南方崇拜她的人称作“反叛者罗斯”。

罗斯·奥尼尔·格林豪是马里兰的一名贵族，脱离联邦主义者中的死硬派，同许多名门望族有来往，因此成为理想的间谍。她嫁给弗吉尼亚的律师、语言学家、国务院官员罗伯特·格林豪博士。她的朋友遍布华盛顿。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约翰·卡尔霍恩是她的良师益友，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她精心伺候他，听到他关于联邦内部即将分裂的预言。“我是

个南方妇女，血管中生来就有革命的血，”格林豪说。“我对州和联邦问题的认识是从本世纪这位最聪明的人那里获得的。”

在内战爆发前很久，格林豪就对政治感兴趣，并表现出从事秘密活动的才能。1854年丈夫去世后，她便开始谨慎地表现自己。尽管她已失去年轻时的风韵，但男人仍然为她倾倒。在詹姆斯·布坎南担任总统期间，她的影响达到了顶峰。邻居们从窗帘背后常常看见单身男子布坎南从圣约翰教堂穿过繁华的16号大街到寡妇格林豪家去，而且很晚才离开。内战前夕，老朋友们成为内阁官员，例如来自纽约的参议员西沃特被任命为国务卿，格林豪家常常高朋满座、贵宾盈门，有配戴彩色绶带的高级军官，也有衣冠楚楚的政客。一旦发现能够套取情报的目标，格林豪便立即向对方送去微笑，他们也滔滔不绝地同她谈论机密。

对反叛者罗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似乎要属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亨利·威尔逊。他身居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要职，是南方间谍最用得上的朋友。保存在国家档案馆里的文件表明，他同罗斯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你知道我爱你，我愿牺牲一切，”一份署名“H”、用参议院公文纸写的信中肉麻地说。“我的确爱你。今天上午我很不舒服，实际上不仅是身体上的病，也是精神上的病。你知道，只有同你在一起，哪怕1个小时，才能更好地减轻我的痛苦。今天夜里，无论如何我要见你……今晚我要和你在一起，那时我要对你讲一千遍：我爱你。”

乔丹声称，正是了解到格林豪同这位议员的“密切关系”后，他才把她拉入间谍网的。据一位联邦军官透露，乔丹也承认“他同这位寡妇建立了相同的关系”，并且“诱使她千方百计从威尔逊那里获取情报”。

1861年5月底，当乔丹发现间谍网能够独立活动时，他便转到军队担任上校，在南方军司令皮埃尔·博勒加德将军的参谋部任副长官，领导情报工作。调离之前，他交给格林豪一份自己编制的简易密码，指示她通过信使把情报送给托马斯·雷福德——他给自己起的化名。博勒加德后来说，这一安排使他能够“从联邦首都非官方人士那里定期获得最准确的情报，这些情报都是由政界要员和陆军部工作人员无意提供的。”

南方信使渡过波托马克河相当容易。内战使该河两岸的通邮中断，但义务信使迅速接通了邮路。医生是特别有用的信使，因为他们到任何地方去都不会引起怀疑。另外每个医生都携带药品，很少有人去搜查他们。这是内战期间为南方服务的“医生通信线”的发端。

在华盛顿以南约10英里处的村庄萨拉茨维尔里，由约翰·萨拉特经营的小旅馆是一个“安全屋”，南方的间谍、侦察员和偷越封锁线的人进出华盛顿的途中都在这里落脚。根据南方一位重要间谍托马斯·康拉德回忆，萨拉特对“北方人充满偏见和仇恨，明确表示支持南方，为南方的每一个胜利而骄傲。”1862年萨拉特死后，他的儿子小约翰·萨拉特接管了中转站，成为南部同盟的信使，这也许使他结识了另一位仇恨北方人的约翰·威尔克斯·布恩。

在华盛顿，罗斯·格林豪毫无顾忌地到处活动。军人遍布大街小巷，挤满酒馆妓院，行动很难保密。一次，格林豪在一位联邦军官陪同下参观了城市周围的防御工事。不久，乔丹就获得有关这些阵地优点与缺点、大炮数量、口径和射程等详细情报。

但是“反叛者罗斯”对南部同盟的最大贡献是提供了帮

助内战中第一次重要战役布尔河之战取得胜利的情报。在攻击萨姆特要塞之后，林肯要求征集 75000 名服役期为 3 个月的志愿兵平息暴乱。总统、新闻媒介和公众都极力主张进军里士满。欧文·麦克道尔将军知道，他的部队只不过是一群武装起来的乌合之众，希望训练一下再发动攻击。“这不是军队，”他悄悄告诉一位朋友，“建立一支真正的军队需要很长时间。”

征集志愿兵的工作结束后，麦克道尔被迫发动进攻。同样缺乏训练的叛军集结在马纳萨斯的铁路交汇处，距华盛顿西南约 30 英里。麦克道尔计划部署约 35000 人对付博勒加德将军的 20000 人。60英里以外，同盟军约瑟夫·约翰斯顿将军在谢南多厄山谷部署了 12000 人。北方军能否取得进攻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南方军是否能及时会师迎战。

博勒加德收到罗斯·格林豪的第一份情报说，麦克道尔将于 1861 年 7 月 10 日开始进军。该情报的传递带有一点传奇色彩。前一天，罗斯的一位漂亮年轻的朋友贝蒂·杜瓦尔离开华盛顿，身穿印花布衣服，扮成农村姑娘模样，坐在一辆农用马车上穿过钱恩桥。在一位弗吉尼亚朋友家中，她换上漂亮的骑服，借了一匹马，第二天上午直奔费尔法克斯法院南方军的前沿哨所。贝蒂被带到博纳姆面前，她从乌黑发亮的头发上取下一个梳子，头发松散下来，她从脑后取出一个银元大小、用丝线缝制的小包，里面装着格林豪的一封信，内容简单明了：麦克道尔将于 7 月中进军。

格林豪的情报与报纸报道和一名联邦军俘虏等其它渠道提供的情况完全相符。就这样，博勒加德把部队部署在蜿蜒曲折的布尔河畔。但他还需要更多情报。7月 16 日凌晨，一位名叫乔治·唐兰的土地办公室雇员来到格林豪家，自称是

“弗吉尼亚雷福德先生”派来的，并出示了用密语写的“来人可靠”的便条。罗斯交给他一封信，内容是那天麦克道尔将取道费尔法克斯法院和森特维尔，进军马纳萨斯。

唐兰把情报藏在皮靴后跟里，乘马车进入马里兰州南部，渡过波托马克河。傍晚时分，博勒加德收到情报后，给里士满发了紧急电报，催促谢南多厄山谷的约翰斯顿部队同他会合。7月17日夜里，格林豪送出第三份重要情报：北方军企图切断从温切斯特至马纳萨斯的铁路线，阻止约翰斯顿增援博勒加德。在攻击受到挫折后，7月21日，约翰斯顿的部队及时到达布尔河战场，本来可能获胜的联邦军节节溃退，最后龟缩到华盛顿。

布尔河战役后的一个月，格林豪一直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虽然她也许夸大了自己在这场胜利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她的贡献不容抹杀。乔丹给她写信说：“我们的总统和将军要我向你致谢，南部同盟多亏了你。”布尔河战役之后，罗斯继续给乔丹提供情报，包括她所称的“内阁会议的原本文件”。不久，格林豪受到怀疑而被监视起来。

监视格林豪是由阿伦·平克顿下令实施的。克莱伦将军把他召到华盛顿建立了谍报机构。这位出生在格拉斯哥、表情冷峻的侦探同盛气凌人的格林豪有天壤之别。平克顿出身贫寒，8岁时就跟木桶师傅当学徒，年轻时来到美国，在芝加哥附近福克斯河畔一个农庄安家落户。他辛勤劳动，省吃俭用，自己开了一家制桶工场。一天他到河中小岛去砍伐制桶木材，偶然发现假币制造者的藏身之地，便带人捣毁了那个黑窝。不久他便开始了侦探生涯，他成功地追捕假币制造者和偷马贼的消息传到芝加哥。1849年他成为这座新兴的城市

第一个警察侦探。近一年后，他因在同犯罪分子作斗争中受到政治干扰而辞掉公职，另立炉灶，开办了私人侦探局。此后他像一颗上升的新星，他选择了一只凝视的眼睛作为标记商人和铁路管理人热切希望请这只眼睛上门服务。

1861年初，费城-威尔明顿-巴尔的摩铁路公司总裁塞缪尔·费尔顿获悉，反叛支持者们因巴尔的摩人民愤怒谴责脱离主义者而阴谋炸毁该市附近的桥梁和隧道，切断这条连接华盛顿和北方的大动脉。平克顿坚决拥护联邦，他打入在巴尔的摩公开活动的反叛组织“秘密社团”，结果发现了一个更为险恶的阴谋：有人企图在林肯途经该市去华盛顿就任总统时对他行刺。

林肯本来不信这是真的，但后来从斯科特将军那里获得了相似的警告，于是他改变了计划。在预计到达巴尔的摩的前一天夜里，林肯从费城乘专列准备闯过危险区。由于沿路电话线被人割断，平克顿一路派了密探，一旦出现情况，立即发出信号。最后火车平安到达巴尔的摩。总统一行准备清晨转乘正常火车去华盛顿，这趟车在该市另一边的卡姆登车站发车，他们把头蒙得紧紧地到达车站，但发车时间推迟了整整两小时。林肯同紧张不安的平克顿和他的伙伴们谈笑风生，直到火车最后平安到达首都车站，平克顿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反对派的报纸嘲笑林肯不敢公开去华盛顿——有人把他画成化装成老太婆或戴着苏格兰方格花呢女帽偷偷地走进城去——林肯不知到底是平克顿救了他的命，还是他轻信了对方而虚惊一场。同样，历史学家也无法辨别巴尔的摩阴谋的真伪。但是两个月后，一连串的事情证实了平克顿的情报。马萨诸塞州一个民兵支队选择了林肯总统本来要走的路线，

结果经过巴尔的摩时遭到一伙脱离主义暴徒的袭击，在混战中有几名士兵和公民丧生。几座桥梁被烧毁，电话线被割断，该市与外界的联系中断了好几天。显然巴尔的摩发生暴力事件的条件已经成熟——并且4年后，林肯在一起类似平克顿所讲的奇怪的阴谋中遭到杀害。

内战爆发后的头几个月，平克顿在麦克莱伦将军的领导下在俄亥俄河以南的地区领导一个间谍网。麦克莱伦在为联邦拯救了西弗吉尼亚以后，被召到华盛顿担任波托马克河军团司令，把平克顿也带到身边。开始时，平克顿在宪兵主任安德鲁·波特上校领导下工作，后来他直接向陆军部副部长托马斯·斯科特汇报工作。平克顿使用化名“E.J.阿伦少校”，立即在首都打击南方间谍、特别是罗斯·格林豪。“她比林肯和内阁更了解我的计划，”麦克莱伦似乎这样叫过苦。

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有时颇有戏剧性。1861年8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平克顿在检查格林豪住处时发现窗帘拉上了，只有一线光透出来，他顿生疑窦，冒着倾盆大雨同他的人一起监视，被浇得像落汤鸡，终于看到有人来了。平克顿决心弄清屋内究竟在搞什么名堂，便带着两个人，蹑手蹑脚来到住宅旁。他脱掉靴子，站在同伴肩上向客厅窥望。他吃惊地看到，他认识的一位年轻军官——宪兵队的一名上尉——正同女主人俯身看一张华盛顿设防地图。平克顿未及听清里面的交谈，突然几个行人路过，他赶紧从人梯上跳下来，大家藏进了阴暗处。等他重新爬高观看时，屋里人已不在。1小时后，那两个人手挽着手出现在前门口，互相道了晚安，并且“似乎听到接吻的声音”。

平克顿没顾得上穿皮靴便走上大街追赶，那位军官意识到有人跟踪，迅速闪进宾夕法尼亚大道和第15号大街交叉

处的一幢大楼。霎时间，4名士兵出现在平克顿面前，明晃晃的刺刀对准他的胸膛。反抗是徒劳的。这位光着脚的侦探被强行推进宪兵队。令他懊恼的是，他竟遭到被自己追踪的那名军官的审问。平克顿拒绝谈任何东西，只是说他名叫“E.J.阿伦”，就这样，他被关押起来。夜间，他买通一位看守替他给陆军部副部长斯科特送了一封信，斯科特下令立即把“阿伦”带到他家由他审讯。平克顿顾不得浑身泥水，光着脚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斯科特立即传讯那名上尉，面对侦探的揭发，他只好承认将地图交给了格林豪。

1星期后，格林豪被拘留了。那天上午，她散完步沿着16号大街向回走，来到家门口，两个人迎上前去，悄声宣布她被捕了，其中一人板着脸，自称是“E.J.阿伦少校”。

平克顿和其他侦探进屋彻底搜查床、抽屉和衣柜，悄悄地翻找文件，希望她的同案犯来找她一并抓住。正在这时，这位寡妇8岁的女儿小罗斯突然跑出屋，爬上树向行人高喊：“妈妈被捕了！妈妈被捕了！”这个小叛逆被拽进屋后，声嘶力竭地哭喊。

格林豪的罪行是毋庸置疑的，但那时对女犯通常宽大，她没有被绞死，而是被关在自己家中。平克顿把其他女犯也同她关在一起。后来被人们称作“格林豪要塞”的这幢宅院成为首都一景，旅游者们总要前往光顾，亲眼看看这位著名女谍的尊容。格林豪为自己同南方的秘密联系公开后名噪一时而洋洋自得，但平克顿的意图是引诱她的同伙上钩一网打尽。最后，这位寡妇和她的小女儿被关进充满寄生虫的老国会大厦监狱。1862年，她在高墙之内度过一个沉闷的冬天，表面上她不断抱怨，其实她对自己为南方的事业而沦为囚徒感到欣慰。

平克顿和他的密探们没能彻底清除华盛顿的南方间谍，但是，在他负责反情报活动期间，南方间谍报回里士满的情报质量和数量都大大下降。1862年年中，虽有两名间谍成功地打入华盛顿，但他们获取的有关联邦军的情报鸡零狗碎，并在每个重大问题上都有错误。现存的李将军的信件也表明，在此期间他对联邦军的情况全然不知。

无疑平克顿领导的间谍中首屈一指的要数曾在纽约市担任过警察的蒂莫西·韦伯斯特。平克顿认为："对他来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1853年，平克顿在参观水晶宫展览时偶然同韦伯斯特相识，觉得此人不错，便请他参加了谍报组织。韦伯斯特不仅身强力壮，而且能随机应变，多谋善断，他的这种天才对完成战时任务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为联邦服务的两面间谍。一方面，他给南方提供似乎引人注目但实际用处不大的情报，另一方面，他给联邦提供价值连城的重要情报。

韦伯斯特的第一个任务是在巴尔的摩执行的，在揭露刺杀林肯的阴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化装成一个狂热的反叛分子，打入一伙夜间从事恐怖活动的秘密集团，摸清了他们计划烧毁铁路桥梁、割断电线、不让"专制统治者"安全通过巴尔的摩的罪恶阴谋。后来他回到巴尔的摩，扮成一个游手好闲的富翁，在当地酒馆挥金如土。南部同盟的第五纵队拉他加入了"自由骑士团"，这是一个为了破坏北方战争而建立的组织。

一次，该组织中有个家伙声称见过韦伯斯特，说他是北方侦探。在这生死关头，他沉着冷静，化险为夷。他严正地否认对方的指责，怒斥这个"说谎的小人"。当此人向他扑去

时，韦伯斯特将他打翻在地，但那个反叛分子气势汹汹亮出刀子，韦伯斯特拔出手枪，啪地一声将子弹上了膛，对准那人的脑壳说，他若敢再胡说就将他崩了。

此事提高了韦伯斯特的威信，使他成为该组织的核心人物。不久，正当他在一次秘密会议上慷慨激昂地讲演时，联邦军破门而入，逮捕了在场的大多数人，而韦伯斯特成功地"逃跑"了——是他事先向联邦军报的信——从此以后他在反叛分子中间名声大振。

1861年初秋，韦伯斯特通知巴尔的摩的脱离主义者，他想去里士满以摆脱联邦侦探的跟踪。他们给他发了去见南部同盟官员的介绍信，同时委托他捎信给南方亲友。去里士满前，他在华盛顿停留，由平克顿作了"邮检"。到达里士满后，韦伯斯特发现市内戒备不严，十分顺利地将捎去的信一一送走。他结识了陆军部长本杰明，几乎每天登门拜访。当他回北方时，本杰明给他签发了通行证，并托他给巴尔的摩的南部同盟支持者们捎信。除了这一大包来自南方的信件，韦伯斯特还交给平克顿一份长达 37 页的详细军事情报。

接着韦伯斯特又回到巴尔的摩。由于他是个声名赫赫的反叛分子，不知他真实身份的其他联邦密探将他逮捕。平克顿再次巧妙地安排他逃跑：在他被押往监狱的途中，他从马车上跳下来立即消失了。

韦伯斯特通常单身一人去里士满，但有一次由曾当过奴隶的约翰·斯科贝尔陪同前往。许多奴隶知道这场战争将决定他们的命运，千方百计帮助北方尽快取得胜利，有的参加了联邦军，有的给联邦提供情报。斯科贝尔就是为北方服务的一名密探。

当韦伯斯特和斯科贝尔在马里兰州南部的伦纳德敦等候

渡过波托马克河时，他们暂时分手了。韦伯斯特由旅馆经理介绍认识了一个名叫格利的医生。医生悄悄告诉韦伯斯特他身上带着送往里士满的信件，需要请大名鼎鼎的南方信使帮忙。韦伯斯特欣然同意，但说他得先办一件急事。当韦伯斯特办完事回来后，两人在酒吧开怀畅饮。一会儿，格利医生起身去包装信件，不久医生忽然踉踉跄跄走进酒吧间，说在黑暗中有人向他扑去，把行李抢走了，那些信件也不见了。韦伯斯特对不幸的医生安慰了几句。其实，那些信件已由斯科贝尔送往华盛顿了。

1862年，麦克莱伦将军打算对里士满发动等候已久的进攻，计划攻击约克河与詹姆斯河之间的地区。他忧心如焚，急切盼望着韦伯斯特的情报。韦伯斯特由另一位间谍哈蒂·劳顿夫人陪同去里士满已经好久，但是杳无音讯。平克顿十分不安，又派了两名间谍普赖斯·刘易斯和约翰·斯卡利去找他。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这两人是从事反情报工作的，那些暴露后逃往南方的反叛同情者都认识他们。使用相同人员既搜集情报又进行反情报活动是平克顿战时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尽管他辩解说这样可以节省人力。

刘易斯和斯卡利一到里士满，就去了韦伯斯特通常下榻的斯波茨伍德饭店，吃惊地发现他因患急性风湿病而卧床不起，由劳顿夫人照料着。韦伯斯特病倒后，劳顿无法同华盛顿的平克顿联系，只好忠实地同病人在一起。正当新来的两人考虑如何逃跑时，他们受到怀疑而被关押起来。在华盛顿曾被他们审讯过的南部同盟支持者们认出他们是联邦间谍，结果他们被判处绞刑，暂时被分开关进牢房。

刘易斯和斯卡利是英国公民，最后他们孤注一掷，请求驻里士满的英国领事馆帮忙。南部同盟期待着维多利亚女王

政府的承认，不敢触怒英国人，同意缓期执行，查明案情。斯卡利在威逼面前招了供，韦伯斯特被从病榻上带走。尽管他坚决否认是间谍，但斯卡利还是把绞索从自己脖子上取下套到同事的脖子上。

在平克顿的催促下，林肯总统和联邦的其他官员呼吁赦免韦伯斯特，但南部同盟坚决不让步。1862年4月29日，身患重病的韦伯斯特勇敢地走向刑场。他是自从内森·黑尔以来作为间谍被绞死的第一个美国人。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1862年春夏之交，当麦克莱伦将军计划向里士满推进时，平克顿在麦克莱伦的司令部工作。为了完成查明同盟军兵力的任务，他建立了一个专门机构，通过“战犯、逃跑的奴隶、忠于联邦的南方人、逃兵、偷越封锁线者以及可靠的侦察兵的实地观察”搜集情报。

虽然平克顿战前为反情报活动打下了良好基础，但他没有作好分析军事情报的准备。他对同盟军的实力估计是极不准确的，有时他的估计超出实际力量的一倍，这样使本来举棋不定的麦克莱伦更加畏缩不前。虽然麦克莱伦具有战略眼光，并有组织和训练部队的杰出才能，但他是个厌战的军人，林肯对他优柔寡断十分不满。

这次战役之初，平克顿报告麦克莱伦，说约瑟·约翰斯顿将军在约克敦集结约10万至12万大军，其实，南部同盟几乎动员不了5万人，约翰斯顿正在请求戴维斯总统把海军部队全部调给他指挥。6个星期后，平克顿坚持认为反叛者在里士满的兵力达20万之众，实际数目不足一半。麦克莱伦对此信以为真，认为自己寡不敌众。其实在数量上联邦军占有优势，只要指挥果断，肯定能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捣里士满。

结果本来稳操胜券的联邦军不战而退。为此，麦克莱伦被撤销职务，平克顿也离开了华盛顿，在内战后期负责查处开小差的士兵以及战时腐败和欺骗案件。

然而，平克顿不该仅仅因这次失败而受到非难。事实上，他对南方兵力夸大的估计也许与失败无关。即使他给麦克莱伦提供了准确情报，这位胆小如鼠的将军也许会找出其它借口不战而退。不过平克顿的灾难说明了一个重要教训：如果麦克莱伦司令部认真分析平克顿提供的数据，人们也许可能对他的敌军兵力估计提出质疑。总之，情报分析必须同情报搜集分开。

美国情报部门没有很好吸取这一教训，整整一个世纪后，中央情报局犯了同样的错误，没有把从猪湾入侵古巴的计划阶段同作战阶段分开。

随着阿伦·平克顿从情报舞台上消失，拉斐特·贝克渐渐崭露头角。在美国情报史上，谁也比不上他更声名狼藉。人们常常谴责他粗暴地践踏法律的尊严，在全国制造恐怖。国会的一份报告把他称作"卑鄙之徒"，应该"遗臭万年"。他之所以受到如此严厉的指责，主要因为战后他代表激进分子企图弹劾林肯的继任者安德鲁·约翰逊。也许贝克受到的指责大部分是不实之词。

贝克是志愿从事谍报工作的。1861年7月，他主动要求为斯科特将军服务，很快得到批准。斯科特指示他查明华盛顿和里士满之间敌军兵力和分布情况，并给他10枚每枚面值为20美元的金币作为活动经费。斯科特还特意提醒他，原先派了5人完成这项任务，结果其中2人被杀害，另外3人也许被俘。

为了越过联邦军防线时不暴露身份，贝克买了一架破照

相机和一个三脚架，伪装成一名流动摄影师。可是他马上被当作南方间谍扭送到司令部。斯科特将军暗自发笑，叫他再试试。这次贝克混进一支穿越长桥进入弗吉尼亚州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但马上被一名军官扭住衣领拉出来。第3次，他扔掉照相机，去马里兰南部，付给一位黑人农民1枚金币，乘小船渡过波托马克河。

上岸不久，贝克被南方军巡逻兵逮住，送往位于马纳萨斯的博勒加德将军司令部。他自称名叫“山姆·芒森”，那是他在加利福尼亚认识的一位田纳西青年。但博勒加德怀疑他是间谍，把他关押起来。“山姆·芒森”被逐级押解到里士满，由戴维斯总统审讯。戴维斯逼“芒森”提供华盛顿附近有关北方军部署的情报，“芒森”讲出了一些不会对联邦造成危害的情况。可是审讯意想不到地转向极为不利的问题。“那么你名叫芒森，来自诺克斯维尔罗？”总统问道。“你在那里认识些什么人？”贝克出了一身冷汗，很快报出真芒森曾提到的几个人名，最后总统唤来一位秘书，交给他一张便条。

贝克想，显然他们已经发现有人认识山姆·芒森。侥幸的是，他注意到，每当来访者被引进戴维斯的办公室前，有人总要交给总统一张来访者的名片。当戴维斯传唤的秘书回来把一张名片放到总统桌上时，贝克迅速溜了一眼上面的名字。来访者进屋时，贝克冷不防热情地同他打招呼。

“噢，你好哇，布罗克！”贝克一边大声说，一边迅速站起来，亲切地同他握手。那人茫然地望着他。接着贝克问道：“你还记得芒森法官那个去加利福尼亚的儿子吗？”

“哦，山姆·芒森！”布罗克叫起来，热情地拍拍贝克的后背。

两天后，戴维斯在“芒森”发誓不离开里士满后释放了

他。贝克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始刺探情况。他乘人不备，混进庆祝布尔河之战胜利的人群，准确地找出部队和据点的位置。搜集到足够情报后，他搞到一张去弗雷德里克斯堡的临时通行证。他继续北去，好几次死里逃生，回到华盛顿后，他向斯科特将军作了汇报。

斯科特对贝克的工作十分满意，把他介绍给国务卿苏厄德。苏厄德自认为在林肯内阁中他是第一部长——或“总理”——愿意负责国务院搜集情报的传统工作。他领导的“叛国惩治局”向加拿大、欧洲和南方派了一小批间谍，但是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北方清查通敌分子与颠覆活动。内战开始后的几个月，一共抓了1000多名政治犯。由于总统命令暂时停止执行人身保护法，犯人未经审判就被投进监狱。

苏厄德领导的反颠覆运动得到众议院政府雇员审查委员会主席约翰·波特的支持。这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极端仇视南方，采用了在近一个世纪后被另一名威斯康星律师、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仿效的方法，对政府部门的不忠分子进行了残酷的大清洗。他收到大量匿名信，声称查出了数百名脱离主义者。波特的做法得到林肯总统的支持，林肯为政府雇员制订了极为严格的效忠誓词，林肯认为，政府有权实行自我保护，即使这样做破坏了国家的基本法，但也不能让人借用宪法推翻政府。

这时苏厄德指示贝克查清南部同盟在马里兰州南部的通信网络和偷越封锁的活动。贝克带领300名印第安纳骑兵对乔治王子县、查尔斯县和圣玛丽县突然采取行动，据说逮捕了几名间谍和信使。但在他走后，民众对他恨得咬牙切齿。

不久，贝克正式调到陆军部，被任命为宪兵主任，名誉军衔为上校。在与地方警察打交道时，他的头衔几乎无用，他

便把自己的机构称作国家侦探警察局。贝克每年的经费不到65000元，他的编制限额为30名侦探左右，但是向他提供情报的人很多，有的是自愿的，有的是领取报酬的。他建立了有南方间谍嫌疑的人的档案，并装进他们的照片以便辨认。不久，他的触角伸到纽约，在那里设立了办事处，并且同其它城市的警察局建立了联系。他还监视南部同盟分子在加拿大的活动，在邮局派驻人员实施邮检。

虽然贝克搜集积极情报，但他的主要工作是调查犯罪和反情报，此类工作往往带有神秘色彩。据说当好人和坏人混淆不清时，贝克便下令在夜间搜捕，一阵敲门后把人强行抓走。在老国会大厦监狱的审讯带有洗脑子的味道。贝克对人犯进行第一轮审讯，如果被抓者拒绝坦白，便交给监狱长威廉·伍德诱供，再不行便由贝克进行第三轮审讯。对那些特别难办的犯人，审讯常常持续几天几夜，据说贝克有时请自己的人作伪证，威胁嫌疑犯坦白。证明犯人有罪的材料由本人签字后装进他们的档案，有时犯人签字仅仅是为了免受皮肉之苦。

贝克的做法受到人们的抨击，但是他经常辩解说："战争是保卫正义事业的最后的可怕的手段，可以蔑视一切普通法律和社会习惯。"此话把内战时期谍报工作的浪漫色彩剥得精光。

7. 其它方式的战争

1861年6月4日上午，詹姆斯·布洛克推开沉重的大门，

迅速进入利物浦弗雷泽-特伦霍姆公司的银行。职员们从帐簿上抬起头，发现他是一个长着浓密胡须的彪形大汉。来人求见常驻合伙人查尔斯·普里奥洛。几分钟后，他被领入银行家的私人办公室。他没有携带文件或介绍信，因为南部同盟驻欧洲的这位主要间谍肩负着极为重要的秘密使命。

布洛克抵达利物浦引起的国际秘密战对南部同盟来说像弗吉尼亚战场的战斗一样极端重要，南方无力生产战争需要的武器、弹药和军舰，企图在国外采购，而北方则千方百计阻挠反叛者们获得外国的支持。在以后的4年中，宣传人员、间谍、双面间谍、外交官和破坏分子发动了一场秘密战争，布洛克是这场战争的中心人物，对南方发挥了其他人无与伦比的作用。

在1个多月前，曾经当过美国海军军官的布洛克是纽约-新奥尔良航线上的商船船长。这位乔治亚人在萨姆特要塞陷落后主动要求替南部同盟服务。海军部长斯蒂芬·马洛里把他召到当时南部同盟首府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他们见面时间很短，但作了言简意赅的交谈。布洛克本来希望被安排到新奥尔良以南的密西西比河防区工作，但他刚自我介绍完毕，马洛里就说："见到你我很高兴，我希望你去欧洲。什么时候能出发呀？"

"您向我布置完任务后我就可以出发了，"思想准备不足的布洛克回答。

马洛里要他去英国购买或建造6艘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配备船员和武器后到海上骚扰北部联邦的海上贸易。这是南北战争中最重要最艰巨的秘密任务。两个星期前，林肯总统宣布封锁南方从波托马克河到里奥格兰德河之间漫长的海岸线。如果南方不能用棉花换取武器，那将意味着被卡住

了脖子。马洛里决心防止这种不测之事的发生，他相信，武装快船的劫掠活动将牵制北方部分船只，迫使北方放松封锁。

布洛克了解到，南部同盟在英国的金融代理人弗雷泽和特伦霍姆设在利物浦的分理处将把100万美元的贷款存在他的帐户上，此外还要派间谍到英国或法国建造或购买价值200万美元的两艘大型装甲舰以便打破北方封锁。当夜布洛克乘火车离开蒙哥马利，准备经由底特律去蒙特利尔，然后再转乘轮船去利物浦。当他进入北部联邦地域时，布洛克销毁了身上所有证件，以防被捕时留下任何罪证。

布洛克非常适合担任这一敏感任务，他有商人那种准确的判断力，行动谨慎，完全能够安全避开英国中立法的暗礁。他出生在阿特兰大以北约19英里的罗斯韦尔一个有钱有势的家庭，16岁时当了一名海军候补生，但晋升缓慢，14年以后只是个中尉。1853年他退役后从事商业邮运工作，后来在纽约市定居，离异母妹妹马莎家很近；马莎嫁给一个名叫老西奥多·罗斯福的商人和慈善家，这对夫妇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儿子，也叫西奥多，叫布洛克吉米舅舅，后来成为美国第26届总统。

布洛克发现利物浦人十分同情南部同盟，据说那里悬挂的反叛旗帜比里士满还多，该市是棉花贸易中心，金融与商业系统的人同美国南方的关系极为密切。内战之前，默西河内挤满了等待卸棉花的船，另有一些船装上货物运往南方。人们对北部联邦的封锁十分气愤，偷越封锁已成为有利可图的生意。“这里的人希望建立南部同盟，”美国领事托马斯·达德利说，“他们对南方的同情和对北方的仇恨是公开的，明显的。”

布洛克争分夺秒，实地察看了准备购买的船只。由于当

过海军军官，他经验丰富，清楚地知道需要购买什么样的商船。首先速度要快，以便无法击败对手时能溜走，其次必须比较大，能够装载远航所需要的足够燃料和给养，因为它们主要靠自给。它们也必须有最好的帆和蒸汽，帆用于航行，蒸汽用于作战。同时，虽然它们是木制的，便于修理，但必须坚固，能够安装重炮。

要采购这样的船，必须克服法律障碍。"外国采购法"禁止在英国装配武装船。当布洛克聘请的律师指出，这个法律对在英国建造船只，在别处装配武器没有限制时，布洛克抓住这个漏洞立即行动。

布洛克察看的船只都不完全符合要求，因此他决定先建造两条快船的船体。第一条，也就是后来的"佛罗里达"号，由利物浦威廉·米勒父子造船厂建造。它驾驶灵便，速度快，有三根尖尖的桅杆和两个烟囱，甚至停泊时仍使人觉得在行驶。路经默西河的行人都能看到耸立在船台上的船身，布洛克给它起了一个带有意大利风格的隐名"奥里托"，并告诉造船工人它是给在巴勒莫做生意的一家公司制造的，工人们不多打听，布洛克也不向他们讲任何情况。万一日后有人提出这违反了英国的中立法，他们可以如实地说他们不知道是给美国南方建造的劫掠快船。

在"奥里托"动工兴建后，布洛克渡过默西河去伯肯黑德，同颇负盛名的莱尔德造船厂又签订了合同，制造一艘稍大一点的巡洋机动船，外形仿造漂亮的游艇。造船厂根据通常做法，在船台旁树了一块牌子，标明它的号码为"290"。虽然后来纽约报纸气愤地声称该号码表明 290 个英国投资者组成的联合体为该船筹措了资金，但实际上该号码仅表示它是该厂建造的第二百九十条船。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它取名"恩

里卡”号，但在历史上，它叫“亚拉巴马”号。

甚至在布洛克到达伦敦之前，南部同盟陆军部负责武器采购的凯莱布·休斯上尉已经开始抢购武器以防北方代理人垄断采购。据估计，北方代理人共有1000万美元的武器采购资金。休斯到达英国的第一天，便赶到伦敦武器公司购买12000支新式步枪，没料已有一个采购员先到一步。等到那人走后，休斯提出订购该公司一年的产品，并保留续订的权利。公司官员说他们刚同北部联邦代理人签了合同，卖出全部产品。休斯通过行贿，了解到北部联邦订货量不大，很快就可交完货。接着，休斯订了一份合同，包下该公司的全部产品，有效地防止了联邦代理人再进这家公司的门。

不久，休斯又去维也纳，向奥地利帝国兵工厂订购了10万支步枪、60门大炮和一批弹药。当美国公使提出抗议时，奥地利冷冷地回答，该兵工厂曾主动提出向联邦政府提供服务，但没有收到答复。美国公使立即提出买下全部货物，但遭到断然拒绝。“当我看到60门膛线炮、枪支和弹药取出待运时，心里真是乐滋滋的，”休斯后来兴奋地回顾说。这些大炮送上汉堡的一条船，运往百慕大，再转上一条偷越封锁的船，悄悄运到南方。

这些工作起初还算顺利，但后来南部同盟在欧洲的代理人遇到若干困难，如经常缺乏资金，得不到国内明确指示，并处于阴谋活动的包围之中。令布洛克十分吃惊的是，甚至在他开始工作之前，伦敦《时报》就有文章全面介绍了他的任务，详细谈到他的资金、他联系的银行和商务机构，这些报道似乎是从上级给他的指示中抄下来的。后来，他写信给海军部长马洛里，说凡是同他有联系的人，都被怀疑在为南部同盟服务，受到北方雇用的侦探的监视。

从写这封信的时间可以清楚地看出布洛克在安全方面遇到麻烦。虽然从6月初起他就在英国，但是到8月中旬他才同里士满建立了安全联系渠道。“有3个人曾先后同意捎带口信，但没有一人愿意传送文字信件，”他说。尽管联系建立起来了，他仍害怕信件传递中发生意外，只好在信中省掉同他做生意的承包商的名字。

的确，北方反情报系统在布洛克和其他南方代理人周围布满间谍和密探。1861年10月，利物浦报界报道，一名著名的商人一直受到一位侦探的监视，由于这个“可憎的幽灵……在门口徘徊”，他无法离开自己的办公室，他运往美国的货物被非法开箱检查，去纽约或波士顿的朋友们被搜身，有的遭到监禁。两个月后，伦敦的《编年史》透露，“一个时期来，一个无孔不入的庞大间谍系统在伦敦活动，凡是带有战争性质的步骤都立即向美国政府报告。”该报还说，该系统已活动了约4个月，英国所有海港都有间谍了解离港船只所载的货物和航行的目的地。

这些隐蔽活动是由美国驻比利时公使亨利·桑福德一手控制的。桑福德看上去不像一个间谍头子，他衣冠楚楚，拄着金头拐杖，十分引人注目，不像精明的间谍那样很少抛头露面。他腰缠万贯，挥金如土，有豪华的住宅、漂亮的马车，表面上他是个无所事事的阔佬，实际上他是美国为数不多的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在海德堡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精通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曾在若干国家担任外交使节。

甚至在攻克萨姆特要塞之前，国务卿威廉·苏厄德就写信给桑福德：“美国驻欧外交代表最重要的责任是通过各种适当方式，阻止即将成立的南部同盟所派出的间谍在各地的阴谋活动。”桑福德积极地承担了这一重任，建立了广泛的间谍

网，开展宣传活动，采购各种物资。他以外交领事人员为主体，把间谍网扩展到整个欧洲的纺织厂、造船厂、港口、金融公司和其它厂矿企业，甚至渗入邮政电报局和政府其它部门。

桑福德的第一次隐蔽活动是反对唯利是图的欧洲新闻界对南部同盟的同情和支持。起初，他期望北部联邦用自己的胜利作自我宣传，但是布尔河战役的惨败意味着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影响舆论。凡是愿意发表亲北方文章的编辑、作家都得到他特工费的“资助”。例如，当时著名的法国记者马利斯平经常撰文支持北部联邦，每月都能得到他付给的报酬。他请求国务卿苏厄德批准买下发行量很大的一家报纸，未能成功，继尔提出在巴黎建立中央新闻局，收集整个欧洲大陆的新闻稿。当苏厄德再次拒绝时，他在北方商人中发起了募捐活动，可是也夭折了。

桑福德通过对比利时工业中心列日主要制造公司的工作人员行贿获取南方代理人采购物资的情报。“我发现了南方采购物资的秘密，”他告诉一位朋友。为了不让南方购走物资，他报的价格比南方代理人报的价格要略高一点。他获得枪炮和布匹的优先购买权，还把欧洲市场出售的硝石全部买下，包租了一条船运往美国。一次他从南方代理人鼻子底下抢走了6万支步枪的采购合同。“但愿这些枪支能有效地消灭原先的买主，”他高兴地说。

桑福德对建立间谍网的热情更大。“我决心在可能条件下，搞到这些‘专员’的文件，摸清他们的活动，”1861年7月4日他告诉苏厄德。“采取什么办法，是否通过美女、仆人还是房东，那谁都管不着；不过我一定给你搞到他们在这里活动的全部情况。”为了加强美国外交官的情报工作，他怂恿苏厄德增拨特工费，批准在欧洲聘用各种私人侦探和密探。

1861年7月初，桑福德雇用了以私人侦探伊格内修斯·波拉基为首的一批特务监视在英国的南方间谍，波拉基查出17名正在活动的南方阴谋分子。提供南方反叛分子所收信件邮戳上城市名称的邮差每月能得到1英镑报酬，当发现几封信来自同一港口时，就派侦探去调查可能正在装货准备运往南方的船只。电报局也有人监视，有时把信使拉到酒馆灌醉后盗走他们身上的电报。波拉基的间谍还追踪到南方所采购的物资储藏待运的仓库，了解英国哪些公司在与南方做买卖。

不久，詹姆斯·布洛克成为桑福德间谍网的首要目标。“他是南方驻此间最危险的人物，活动十分猖獗，”他在一封密信中报告苏厄德。对布洛克的监视尤为严密，每月费用达150英镑。“我认为此人十分危险，我主张在他来欧洲大陆时以某种借口将他逮捕。他没有外交证件，得不到外交保护，也许可以把他送回国审查，”桑福德进一步建议。说穿了，他主张伺机绑架布洛克。“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发现并禁止反叛者在这里的冒险活动，我们不久将在海上遭到更严重的损失，”他说。

桑福德的丰富想象力孕育了挫败布洛克间谍网的各种计划。他建议买通劳埃德保险机构中一位职员，以便获取有关驶往南方港口船只的情报。如果波拉基的间谍和领事们所获得的证据不足以成为扣押这些船只的理由，那就聘请律师寻找法律依据推迟这些船只离港的日期。桑福德告诉苏厄德，只要经费充足，他可以在船离港前派人破坏。当谈到最近把一批武器运往南方的偷越封锁的英国船“托马斯·沃森”号时，他说，“只要花5000美元就可以把它搞沉，现在海峡中的事故频繁，谁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一次桑福德提议，派北方间谍担任向南方运送战争物资

的商船的商务负责人，间谍们可以买通船员，共同在海上控制这些船。一条满载货物、企图偷越封锁线的船在起航前他曾想买下，但因联邦政府未能支付5万英镑，该计划流产了。另一名打入南方间谍网的联邦间谍桑德斯告诉苏厄德，南方人在欧洲港口储存了价值约200万美元的战争物资待运，他建议给他拨款买下一条准备由南方运货的船，然后把船驶向等候的北方军舰。该计划同桑福德的其它建议一样未能付诸实施。

1861年10月，波拉基的间谍发现布洛克购买了快速汽船"芬戈尔"号，准备用作南方第一条偷越封锁的船。他们在伦敦-利物浦-格林诺克这条军火运输线上追查军火偷运时发现"芬戈尔"号装载着14000支步枪、400箱弹药、一批药品和其它装备，是送往南方的最大一批军火。

尽管"芬戈尔"号将悬挂英国国旗，雇用的是英国船长和船员，但是波拉基听说布洛克打算指挥这条船。1861年10月9日当该船离开格林诺克时，布洛克突然不见了，原来他了解到该船受到北方间谍监视，乘人不备，偷偷溜走，然后在霍利黑德登上"芬戈尔"号，把武器平安运到南方。

也许北方间谍在欧洲最不寻常的工作是聘请意大利的救星加里博尔迪到美国陆军担任将军。美国驻比利时安特卫普市领事詹姆斯·奎格尔即将被人取代，企图搞些冒险活动保住自己的饭碗。他听说当时在卡普雷拉岛过着半流放生活的加里博尔迪答应，只要美国政府需要，愿意去美国服务，他便向华盛顿提出了建议。当时正值布尔河之战惨败不久，林肯总统和苏厄德国务卿迫不及待抓住这个机会要使用这位著名的意大利领袖，希望他的出现能给士气低落的北方军打一

针强心剂。

该建议在当时不像今天这样显得牵强附会。许多美国人把加里博尔迪看作“意大利的华盛顿”,联邦军新组建的部队都自豪地穿上红色衬衣——他的军团的象征——并自称是“加里博尔迪警卫队”。至于加里博尔迪本人，他曾在美国生活 3 年，是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并自认为是外来的美国公民 。由于新任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未采纳他提出的使意大利摆脱教皇控制的计划，他只好引退，隐居到卡普雷拉岛上。

1861年 7 月27日，苏厄德撇开奎格尔，指示亨利·桑福德同“著名的自由战士”联系，提出让他担任联邦军的最高军衔少将。虽然没有提到林肯总统的名字，但他肯定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遗憾的是,桑福德去意大利同加里博尔迪磋商时把自己的使命告诉了奎格尔，这位领事赶紧通知加里博尔迪他将得到“只有总统才有权授与的最高军衔”,这使加里博尔迪将军误认为他将成为联邦军的最高指挥官。

目标在罗马而不在里士满的加里博尔迪巧妙地利用美国提出的条件迫使国王伊曼纽尔支持他向罗马进军。这位英雄威胁说，如果国王不答应，他将接受美国的条件。令他十分吃惊的是,伊曼纽尔竟批准他离开意大利。桑福德获得这个消息后，深信加里博尔迪只有接受美国的条件才能保全面子，决定亲自进行微妙的谈判，用化名在热那亚租了一条小船，驶向加里博尔迪所在的石岛。

1861年9月18日，桑福德见到可能成为联邦救星的加里博尔迪。这位将军已有4个月闭门不出，风湿病正在好转。奎格尔的话曾使他造成误解，他指出，美国没有委派桑福德同他见面，并说只有任命他为联邦军总司令，同时给他解放奴

隶的权利——这些条件只有总统才能批准——他才愿意去美国。桑福德回答说，他授权给予的最高军衔是少将，表示愿意安排加里博尔迪和他的随从访问美国，让他亲自了解形势后再作最后决定。然而，这位傲慢的将军坚持自己的要求，不让有回旋余地。

这反而成为好事。如果加里博尔迪同意去美国，他会在美国军官中引起强烈妒忌，并且以往的事情表明，他缺乏现代战争中所必须的服从上级、同友邻合作的品质。然而，此事却帮了加里博尔迪的忙。当意大利人民听说他们的解放者由于国王不愿接受他的计划而打算离开祖国时，掀起支持加里博尔迪的强大声势，这正是他同美国人谈判的主要目的。

加里博尔迪事件流产几个月后，欧洲的秘密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詹姆斯·布洛克乘坐“芬戈尔”号成功地偷越了封锁后于1862年3月又回到英国，这时他已担任南部同盟海军中校。在他离开英国期间，“奥里托”基本竣工，它引起北方官员、特别是美国驻利物浦领事托马斯·达德利的注意。

达德利是来自新泽西州的辉格党成员，并且是个废奴主义者，他曾在南方营救过一名被绑架的黑人妇女和她的3个孩子。一位作家评价说，他有“狸狗的凶猛和叭喇狗的韧性”。达德利雇用了一名私人侦探马修·马奎尔，在默西河畔的酒馆和船厂探听这条神秘的船。马奎尔发现了不少情况，足以使达德利相信该船肯定是反叛者购买的劫掠商业快船。1862年2月底，在布洛克回到伦敦之前，有人告密说看到“奥里托”号上装有两个炮架。达德利将此情况报告了美国驻伦敦公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亚当斯立即拜会了英国外交大臣约翰·拉塞尔勋爵，提出该船违反了中立法，必须

扣留。

拉塞尔勋爵作了调查，他了解到的情况同布洛克事先跟“奥里托”建造者们讲的情况完全相同。3月 4 日，海关检查官米迪·瑟彻检查该船时没有发现大炮，虽然船体留有装炮的洞孔，但他无法干预此事。“该船没有大炮，甚至信号枪都没有，并且只有信号旗和英国旗，没有南部同盟的旗，”他报告说。最后，拉塞尔决定，没有合法理由阻止该船起航，亚当斯和达德利大失所望。

虽然布洛克这件事干得很漂亮，但他对“奥里托”的安全仍然十分忧虑，为其下水加紧作最后准备。达德利还在四处探听消息，谁也难料他会提出什么问题。1862年 3 月22日，“奥里托”打着英国旗、使用英国船长和船员驶离港口。布洛克预先放出风，说它将出海试航，故意载了一些客人，包括几名妇女。但在结关之前，这些人统统用小船送上岸，唯一留下的乘客是秘密指挥该船的南方海军上校约翰·洛。根据布洛克指示，洛将把“奥里托”开到巴哈马斯的拿骚，把船转交给约翰·纽兰·马费特中校。只有高级船员才知道它的目的地，一般船员以为他们将去意大利的巴勒莫。几天前，布洛克已租用“巴哈马”号轮，从英国另一侧海岸的哈特尔普早于“奥里托”起航，船上装着 4 门 7 英寸口径滑膛炮和弹药，后来全装配到“奥里托”号上，使之成为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佛罗里达”号。

接着布洛克把注意力转向伯肯黑德莱尔德造船厂正在建造的第 290 号船上。由于施工过细，加之他自己去了美国，工程进展缓慢。他也担心有人企图扣押该船。达德利对英国人放走“奥里托”十分恼火，决心阻止“290”号逃跑。侦探、

造船工人和船坞旁的闲杂人员都动员起来监视该船。在后来数月中，随着工程的进展，布洛克和达德利都试图智胜对方。谁都知道该船是南部同盟用于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但是达德利很难找到使英国信服的证据。尽管他向海关官员塞缪尔·普赖斯·爱德华兹再三保证确有其事，但答复总是“证据不足”。

该船命名为“恩里卡”号，定于1862年5月15日下水。不久，它被拖进干船坞安装发动机、桅杆和其它设备。1个月后，“恩里卡”号由一名英国船长指挥下水试航。达德利的密探报告，说船上几个美国人对船的性能特别满意。为了防止违犯英国法律，布洛克决定，“恩里卡”号装备武器的工作在亚速尔群岛中的特塞拉岛进行，那是1年前“芬戈尔”号航行时他去过的地方；他已在伦敦买了一条小船装运“恩里卡”号所需要的大炮和弹药。

为了在“恩里卡”号离开英国水域后亲自指挥该船，布洛克为航行积极准备。“我把全部身心都放在这条船上，但愿上帝保佑我为祖国充分使用好这条船，”他说。他加满煤箱，储足给养，并从南部同盟驻英军官中任命了一批工作人员，包括他的异父兄弟、16岁的海军候补生欧文。但是，不久布洛克收到也许令他终身遗憾的消息，海军部长马洛里决定把该船交给拉斐尔·塞姆斯上校，因为他指挥南方第一条武装快船“萨姆特”号成功地破坏了北方的海运。马洛里告诉布洛克:“你目前在英国的工作极为重要，我相信你一定能正确对待不让你出航之事。”“恩里卡”号交给塞姆斯后，他将着手完成购买两艘巡洋舰和几艘装甲舰的新任务。

其间，正当布洛克洋洋自得时，北部联邦间谍加紧了活动。不久前，偷越封锁的船上的一名南方雇员鲁滨逊到达德

利雇用的密探马圭尔经营的客店投宿，无疑被多灌了几杯，鲁滨逊酒后失言，说他听到船上军官们谈论，在一个叫布洛克的人指导下，南方正在伯肯黑德建造一条巡航机动船。莱尔德造船厂的一名工头也提供消息说，该船比“奥里托”大，能够安装11门大炮。达德利再次向利物浦海关负责人爱德华兹检举，信誓旦旦地说：“一切情况表明，该船是条军舰，它有弹药仓，甲板上的炮床是装回旋炮用的。”可是爱德华兹再次对他的指控不予理睬。

达德利恼羞成怒，把控告书带到伦敦，由亚当斯公使转交给外交大臣拉塞尔勋爵，紧急要求依法扣押“恩里卡”号。外交大臣把此事推给管辖海关总署的财政部，但利物浦的海关负责人恰巧是爱德华兹，他说，没有证据表明该船装备了武器弹药或配备了南部同盟海军人员。亚当斯不肯轻易让步，随即同英国一位著名律师罗伯特·科利尔作了研究。科利尔审查证据后告诉亚当斯：“要说此事严重违犯了外国采购法很困难”，如果拉塞尔勋爵批准“恩里卡”号出航，布洛克他们会向北方提出赔偿名誉损害费。1862年7月26日，焦灼不安的拉塞尔把有关文件送给女王的司法官约翰·哈丁爵士，要求立即裁决，没料哈丁病倒了，此事被搁置下来。

星期六布洛克收到一份匿名电报，警告他说如果“恩里卡”号在利物浦停留48小时以上将有危险。布洛克立即下令“恩里卡”号赶紧竣工，并放风说7月29日星期二该船要进一步试航。

为了减小怀疑，“恩里卡”号载了大批客人，挂满旗帜，由一条拖船拖着从默西河缓缓驶进大海。经过一段舒适的航行后，布洛克宣布让船在港外呆一夜，在同客人们乘拖船回利物浦之前，他告诉船长布彻上校，他将于第二天在威尔士以

北约50英里处同其他船员重上“恩里卡”号。

在伦敦，另外两名司法官从患病的哈丁那里取回文件，审核后认为扣押“恩里卡”号的理由充足，但是对这一裁决英国政府部门互相推诿，这个皮球从外交部踢到财政部，又踢到海关，谁也不采取任何行动。同时，达德利气急败坏地寻找爱德华兹扣留该船、查明情况，但是爱德华兹神秘地不知去向，数年后才知道他当时在大做棉花投机生意，这真是天助南方。

7月 30 日这天黎明刚过，布洛克来到浮码头准备上船。三四十名水手已经集中待命，几乎同样数目的妓女闹哄哄乱作一团。当布洛克命令水手们登上拖船时，妓女们提出，男人们预领的第一个月工资交给她们后她们才离开，否则大家别想上船。被纠缠得六神无主的布洛克突然接到电报，北方炮舰“塔斯科洛拉”号已驶离南安普敦，显然是驶向爱尔兰南海岸拦截尚未武装的“恩里卡”号的。

布洛克没有多费唇舌，命令大家挤上拖船。下午 4 点左右，拖船靠向停在威尔士海岸莫伊尔弗雷湾的“恩里卡”号。毛毛细雨把大家淋湿了。由于拖船上没有食物，布洛克等大家上了“恩里卡”号都拿到食物和饮料后告诉水手，这船不回利物浦了，去哈瓦那和近一点的港口行吗？大多数人都赞成，水手们预领了 1 个月工资付给妓女，直到半夜妓女们乘拖船离去时，布洛克才舒了一口气。

一场风暴正抽打着爱尔兰海面，此时起锚开航并不合适，但布洛克不敢等待风暴停息。为了避免同“塔斯科洛拉”号遭遇，他命令布彻船长沿爱尔兰北部汹涌的海面航行，去特塞拉岛同拉斐尔·萨姆斯会合。7月 31 日夜幕降临时，布洛克在贾恩茨考斯韦角附近招呼到一条渔船，站在颠簸的渔船甲

板上，他目送“恩里卡”号消失在雨雾中后上岸。回到利物浦，他听说“恩里卡”号刚启航时伦敦就下令将它扣留。秘密策划和制造假象是该船能侥幸逃脱的重要原因，但是归根结底，这次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布洛克的大智大勇。

当布洛克秘密使船下水启航时，南部同盟派28岁的记者亨利·霍茨在英国公众中开展了一场宣传战。霍茨是个出类拔萃的宣传家，有高超的宣传手段。他本来是瑞士人，年轻时到达美国，但仍保持着欧洲人的风度。他当过美国驻布鲁塞尔公使的秘书，内战爆发时，为南方一家主要报纸撰写社论。他曾从人类学角度写过一部维护奴隶制的专著。

霍茨到英国1个月后，在主要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维护南部同盟的文章和评论，并为南方政党领袖起草在国会的发言稿。他极力为1862年2月亨利和多纳尔森两个要塞的陷落辩解，发表文章说这些要塞仅仅是南部同盟的“外部防线”，内部“堡垒”仍固若金汤。

由于多数欧洲人从“虚假的”北方报刊了解美国，1862年5月1日，霍茨创办了《索引》周报，刊载宣传南方观点的文章。他敏锐地认识到最重要的是赢得可靠的名声，因此《索引》刊载大量带有南方偏见的准确消息。英国若干著名记者为该报撰稿，扩大了它的影响；这些记者还带着亲南方的观点，在他们自己的报刊上发表文章。霍茨报告南部同盟国务卿朱安·本杰明，除了出版《索引》，他还雇了7名撰稿人给伦敦各报提供新闻。他十分慷慨地抛洒礼品，如“从哈瓦那进口的雪茄烟……美国威士忌酒”。《索引》报发行量最大时只有2250份，然而它在英国各界，包括编辑、议员和政府高级官员中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霍茨在英国大肆宣传说美国已经分裂成北方和南方，北方的工业化和高额关税政策对南方造成威胁，并以成功偷越封锁的具体数字说明北方的封锁不起作用。但是霍茨的宣传无法逾越的障碍是英国对奴隶制的敏感，特别是1863年1月1日“解放黑奴宣言”生效以后。霍茨一贯正视现实，他向里士满报告，英国人对南方的厌恶已经根深蒂固，不能指望得到它的支持。

在“亚拉巴马”号穿越大西洋，俘获并烧死北方商人的同时，布洛克进一步制订了给北部联邦以粉碎性打击的秘密计划，在莱尔德造船厂建造两艘装甲舰以便打破北方的封锁。这些装甲舰比南方海军的低舷铁甲舰更大，更坚固，更经得起风浪。每舰安装两门9英寸口径的大炮，一艘将于1863年4月竣工，另一艘5月竣工。除大炮外，舰上还要安装坚固的鸟嘴形船头，能够撞坏木船侧面，这就是莱尔德造船厂生产的著名的撞角军舰。

布洛克的法律顾问保证，虽然这两条船显然是军舰，但是不会违犯中立法。然而英国对“亚拉巴马”号逃脱十分恼火，加之北方间谍加紧阻止这些更令人生畏的军舰下水，布洛克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艰巨。一些观察家担心这些“海怪”会粉碎封锁、轰炸北方港口城市，因此达德利带领间谍们到处活动，在造船厂布满密探，并向工头行贿以获取情报。

当亚当斯公使敦促唐宁街赔偿由“亚拉巴马”号和“佛罗里达”号击沉或烧毁的船只时，布洛克觉察到英国态度起了变化，开始感到忐忑不安。1862年年底，他已怀疑能否看到南部同盟的旗帜在撞角军舰上飘扬。“我担心英国政府会阻止军舰下水，”他给海军部长马洛里写信说。“联邦公使在施加

压力，诱使当局阻止……但我仍充满信心地工作。”

布洛克还遇到新的麻烦，南部同盟驻英人员中出了叛徒。原来在“亚拉巴马”号安装设备准备出航期间，他选择克拉伦斯·扬作为助理出纳员为该船雇请英国船员。1年后，扬因酗酒被塞姆斯船长解雇回到英国，他耿耿于怀，伺机报复，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告诉了亚当斯，亚当斯立即向拉塞尔勋爵指出，这一新的证据说明反叛者无视英国的中立。当撞角军舰即将竣工时，亚当斯和布洛克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一个千方百计让军舰下水，一个不遗余力劝说麻木不仁的英国政府扣押军舰。1863年整个夏天，双方相持不下。

为了防止军舰被扣押，布洛克想出一个掩盖真相的计谋，把军舰所有权转移给法国商人布拉维，这个商人声称军舰是给埃及巴夏建造的。只要军舰一下海，立即由南部同盟海军接过去——布拉维和他的助手们可从中赚一大笔钱。为了掩人耳目，这两艘撞角军舰分别命名为“图松”号和“穆萨西尔”号。然而亚当斯识破了这一阴谋，向英国外交部接连不断提出抗议。拉塞尔勋爵不想激怒北方，把抗议书转交给司法官。可是司法官告诉亚当斯，不能依法扣押撞角军舰，因为所掌握的证据在法庭上站不住脚。

正当亚当斯一筹莫展时，形势突然出现了可喜变化。南部同盟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一败涂地，英国统治阶层对南方最终获胜的信心发生动摇。此外，英国驻开罗领事馆根据伦敦指示调查后报告，埃及人不是撞角军舰的真正买主。接着，拉塞尔命令英国驻法大使调查军舰是否法国政府建造的，收到否定的答复后，他要求查明布拉维的活动。

1863年8月底，事情到了紧急关头。第一艘军舰准备试航，这使人们想起“亚拉巴马”号也是以试航为借口而逃脱

的。提高警觉的达德利不断向爱德华兹提出抗议，但是这位海关官员像往常一样充耳不闻。面对这一危机，在北方胜利的鼓舞下，亚当斯对英国撒手不管的做法采取了强硬立场。9月5日他在给拉塞尔的照会中声明："我希望不必在此表示我对女王陛下政府得出的结论是多么遗憾，由我向阁下指明这意味着战争将是多余的……"

事实上，亚当斯的照会的确是多余的。两天前，拉塞尔认识到形势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勉强下令，如果撞角军舰企图下海，立即予以扣留。有人把该决定的重要性同夺取维克斯堡相提并论。在后来几周里，正当英国人讨论如何处理这些军舰时，布洛克企图把它们偷偷开出利物浦，但是未能成功。1863年10月9日，撞角军舰被英国人扣留，最后加入了皇家海军。

南部同盟驻欧机构还购置到包括商业武装快船"谢南多厄"号在内的其它船只，并在战争后期继续给南方采购战争物资，但是该机构的努力已经达到顶峰。布洛克和他的同事们表现了坚韧不拔和主动勇敢精神，虽然组织混乱，经费不足，命令不切实际，加之北部联邦间谍的干扰，但他们仍然为帮助南方维持4年的艰苦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8. "执行特别任务"

威廉·诺里斯少校的办公室位于里士满政府办公区边缘的银行街一幢偏僻的大楼里。他是南方军的通信主任，但他的办公室经常有明显不是军人的人光顾。实际上这里是南

部同盟陆军部特工局的隐蔽基地。隐蔽是个恰当的字眼：诺里斯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出色，以至内战后很久该机构仍然蒙着神秘色彩，100 多 年后，有些专家声称该机构纯属子虚乌有。

到1862年，北部联邦和南部同盟已经打了一场较长的战争。战争有自身的规则，其中一条是必须搜集与分析情报。人们越来越依赖于信号、密码和"特种勤务"——类似内战期间的间谍活动。为了适应形势需要，那年下半年，南方领导人建立了特工局，几个月后北部联邦也建立了有效的情报机构：波托马克军区军事情报局。

40岁的诺里斯是经过一条曲线走上秘密工作岗位的。他原先是巴尔的摩的律师和商人，该市被联邦军占领后，他离开家乡，参加了约翰·马格鲁德将军的部队，当了一名文职助手。由于10年前诺里斯在美国海军太平洋中队担任过军法官，主要监督通信系统，这时他主动提出为马格鲁德建立一个相同的系统，该系统包括旗帜和升在杆子上的彩球。将军对此很感兴趣，任命诺里斯为通信主任。

19世纪中叶，各国军队都在加快情报传递的速度。北方和南方军队中直观军事通信的创始人是艾伯特·迈尔，他是个军医，曾当过民用报务员。50年代末在新墨西哥时，迈尔注意到居住在科曼奇的印第安人通过变换所持长矛的角度传递信息，出于好奇，他研究了这些信号，发明了白天用旗帜、晚上用火把转递的一种信号，该系统比欧洲军队当时使用的旗语塔更灵活机动。1859年，罗伯特·李领导的一个委员会批准了迈尔的计划，第二年建立了通信兵，已经晋升为少校的迈尔担任负责人。

迈尔的一名助手爱德华·亚历山大中尉参加了南 方 军，

当了上尉通信主任，在博勒加德将军领导下，在第一次布尔河战役中获得很大成功。由亚历山大建立的通信系统“在该战役中发挥的作用，也许超过任何方式的情报活动，”研究内战情报的权威人士埃德温·菲谢尔说。南方军的通信兵于1862年4月建立，使用旗帜、火炬和电报信号，但是当亚历山大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当通信主任搞机关工作，一是去炮兵部队搞野战勤务，他选择了后者。最后，诺里斯还是被调到里士满，任命为少校通信主任。

通信是情报工作的辅助手段。在双方军队中，有两种通信站，一种以通信联络为主要任务，另一种是通过高倍望远镜观察敌军运动的观察站。有了通信站，双方军队就设法截获对方的通信，并使用暗语和无用信息迷惑对手。然而战场使用的简易暗码很容易破译。“我们总是掌握联邦军的暗码，”南部同盟一位通信主任说，“我想他们也掌握我们的暗码。”根据菲谢尔的观点，这种信号截获通常包括旗帜和火炬通信而不包括有线电报通信，他指出，尽管双方常常怀疑他们的有线电报被窃听，但是有据可查的例子极少。

诺里斯敦促陆军部建立了由他领导的秘密组织特工局，负责侦察、监视、截取敌方通信、用假通信迷惑敌人，并且管理南方军的暗码系统。该局监视敌军动向和波托马克河上的海军活动，帮助官方传递信件，搜购报纸、书籍、技术出版物和南方军械工程军官所需要的其它材料。同今天的正确做法一样，当时情报工作主要在于耐心搜集任何人可能获取的资料而不在于秘密间谍活动。例如未经审查的北方报纸是了解北方军活动的情报的主要来源。南方一位情报军官说：“从这些报纸中，我们不仅了解到部队的调动情况，而且知道各师各旅所担负的任务，把这些情报综合起来，我们常常相

当准确地掌握敌军的兵力。"

该局最重要的工作是在波托马克河上建立了秘密通信线。新的"秘密线"以老的"医生线"为基础，从里士满延伸到华盛顿、巴尔的摩、纽约，一直到加拿大，一系列安全屋、中间站在南马里兰建立起来，条条隐蔽小路通向波普斯克里克、艾伦斯弗雷什、波特托巴科等波托马克河的支流。船只隐藏在河岸边的浅水滩，在没有月色的夜晚，人们偷偷渡河，通常等待落潮时在马里兰登陆，下次涨潮脚印便全淹没了。一位北方军官无可奈何地说，在该地区，甚至妇女和儿童都"千方百计探听我们无法保密的事实后提供给敌人"。

后来同约翰·威尔克斯·布思一起密谋刺杀林肯的小约翰·萨拉特是南马里兰的一位重要间谍。内战结束后诺里斯回忆说，萨拉特"经常传送我们在华盛顿的朋友们所提供的重要军事情报，并帮助我们的信使来往于里士满和北方城市之间。"布思也许在特工局工作过，是"秘密线"上留下的最后一人，因为当他击伤林肯总统，使他受了重伤后，企图逃跑时，许多帮助他的人曾在这条线上工作过。

然而，特工局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央情报局，它没有反情报功能，并且没有迹象表明，南方军事领导人认为它的情报比其它来源的情报更重要。但是该局保密工作甚好，今天已无法弄清其活动真相，只知它在北方主要城市和加拿大布有间谍。内战结束后，诺里斯回到巴尔的摩安度晚年，1896年死去。他从未写过自己的经历，他的大多数文件在他去世前几年一次火灾中化为灰烬。

托马斯·康德拉是"秘密线"上一位智勇双全的间谍。他出生于弗吉尼亚，内战爆发时任卫理公会的业余牧师，兼任

乔治敦一所私立学校校长。他直言不讳地主张脱离联邦。攻打萨姆特要塞后在华盛顿掀起的清除间谍运动中他锒铛入狱，获释后继续在华盛顿逗留了两个月，阴谋暗杀仍然忠于联邦政府的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

康拉德回到家乡后被授予上尉军衔，在南方骑兵统帅斯图尔特将军领导下的第三弗吉尼亚骑兵分队任军中牧师。不过他几乎没有履行过牧师职责便化装成联邦牧师潜入北方军阵地侦察。他化装的本领很高明，只要改变一下胡须式样就行了。他一边给北方兵宣讲宗教教义，一边搜集军营内部的情况和联邦军的行动计划。

不久，南部同盟陆军部长朱达·本杰明请他去华盛顿与英国和法国专员联系，并且带领他们去里士满。这两位专员是来给南方提供300万美元贷款的，他们化装成普通旅行者，之所以取道华盛顿去南方，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比偷越封锁安全。康拉德携带了陆军部的证明信，内容是他自己写的："持证者舌部有一个切口，左手食指有一个伤疤，本部信任他。"

康拉德渡过波托马克河，在萨拉特酒店搞到一匹马，化装成马里兰农民骑马进了华盛顿。在威拉德旅馆找到那两位外国间谍后，他出示了证明，并伸出舌头和带伤的手指。接着，他带着他们的重要文件和他们的皮靴，找到一个可靠的皮匠，把文件藏进靴子后跟。他们租了一辆马车，经过麦克莱伦将军的司令部和白宫，窥视了国父亚伯拉罕的官邸，洋洋得意地离开了华盛顿。

不久，康拉德又回到华盛顿。北方陆军部里同情南方的职员们证实，麦克莱伦将军正计划向里士满推进，南部同盟最高司令部希望他摸清联邦军的兵力。康拉德的一位间谍能搞到这些数字，可他担心事情败露，不敢去查阅秘密文件。

他告诉康拉德，陆军部正在汇总各团实力，他能搞到这些统计报告。4 天后，康拉德去陆军部从该间谍办公桌上取走所需要的报告。事后康拉德声称，所窃文件对阻止麦克莱伦进攻里士满起了重要作用。

康拉德频繁出入于华盛顿，在离陆军部和白宫不远的老范纳斯大厦建立了落脚点。他声称在拉斐特·贝克的司令部有他的间谍，即使贝克风闻他在华盛顿，该间谍会立即给他通风报信。康拉德在波托马克河弗吉尼亚一侧的悬崖峭壁上有个人称“老鹰窝”的藏匿之处，那里有间谍昼夜值班，收取从河对岸送来的情报。附近水湾里布有水雷，北方的侦察炮舰无法接近。康拉德吹嘘说：“不需 24 小时，我保证能从华盛顿给里士满送去可靠情报。”

1862年 8 月底，在布尔河第二战役打响短短数小时里，康拉德几乎掌握了联邦的命运。他听说北方几乎动员了全部人马去支持再三求援的约翰·波普将军，留下保卫首都的部队寥寥无几。他从华盛顿溜出来，企图向斯图尔特报告这一重要情况，可惜他无法找到这位骑兵统帅。不久这位将军了解到这件事，不无后悔地说，如果他及时得到情报，他“可以率领全体官兵冲进华盛顿，把司令部设在白宫。”不到 1 年后，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华盛顿再度防守空虚，部队全被调走抗击李将军的入侵军，守卫首都的任务由文职人员担任，康拉德因未能与斯图尔特取得联系而再次错失良机。

在这失去的两次机会之间，康拉德声称他获得一次辉煌的成功。1862年11月底，在波托马克军区司令麦克莱伦被安布罗斯·伯恩赛德将军取代不到 24 小时后，康拉德便向南部同盟作了报告。然而仅仅知道新任司令的名字是不够的，伯恩赛德有何意图？他将从弗雷德里克斯堡渡过拉帕汉诺克河进

军里士满，还是取道库尔佩珀从西部攻打南方首都？康拉德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安插在北方陆军部的间谍，很快就得到答案：伯恩赛德将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发动进攻。康拉德把这一情报亲自送往李将军的司令部。结果，伯恩赛德遇到李和斯通沃尔·杰克逊的顽强抵抗，北方军在攻击弗雷德里克斯堡后边的高地时伤亡惨重。

绑架林肯的阴谋计划层出不穷，康拉德也策划了其中一起。为了避开白宫繁忙的工作，总统计划到城外军人之家广场的一个小别墅去，尽管他要经过一片茂密的丛林，那是狙击手和绑架者理想的隐蔽之地，而他的随行警卫人员却很少。康拉德计划在总统去军人之家的途中抓住林肯秘密送往弗吉尼亚。他声称南方陆军部长詹姆斯·塞登批准了该计划，并于1864年9月5日写信命令南方游击队领导人约翰·莫斯比协助。后来由于反对林肯的其它阴谋走漏了风声，总统由一支骑兵分队护送到军人之家，康拉德的计划才取消了。

内战后期，康拉德继续来往于里士满和华盛顿之间，但由于拉斐特·贝克的人知道了他的身份，他的作用明显减小。一次被捕后，他担心自己的画皮被戳穿，便伪装了患有天花的症状，然而这一诡计使他陷入另一个危险，抓他的人担心此病传染，小心翼翼地把他投入天花患者集中营。后来因看守人员不敢接近他，康拉德成功地逃到波托马克河畔的藏身之处。

康拉德善于乔装打扮，在内战期间十分有用，但当战争临近结束时，他由于化装几乎丧命。他在偷越南马里兰时被在该地区搜捕约翰·威尔克斯·布思的联邦军抓获。说也凑巧，他当时选择的头发与胡须式样同那个总统刺客的式样完全一样，他被误认为就是那个著名演员，结果被关进老国会

大厦监狱。要不是他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也许他真会遭罪。

伯恩塞德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惨败后，林肯总统气愤地将他革职，叫约瑟夫·胡克将军接任波托马克军区司令。胡克外号叫“好斗的乔”，虽说不上才华横溢，但工作勤勉，立即着手重建这支士气低落的部队，这位优秀的组织者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是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情报机构。他的参谋长丹尼尔·巴特菲尔德将军后来宣称，在胡克刚接任司令时，司令部没有掌握敌方的任何情报。

1863年初，宪兵司令马森纳·帕特里克准将奉命建立了“特工处”，协同军队周围的侦探、特务、业余间谍和侦察员做好情报工作。帕特里克1835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参加过塞米诺尔和墨西哥战争以后退役回到家乡纽约州北部地区，担任纽约州农学院院长，内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军队的宪兵司令。

帕特里克吃惊地发现部队保密工作十分糟糕。联邦军和同盟军中的士兵常常喜欢饶舌，虽说不上别有用心，但往往坏事。一次帕特里克看到一名宾夕法尼亚籍士兵公然与敌兵对话。“准备行动吗？”南方哨兵隔河大声问。宾夕法尼亚士兵回答：“差不多，我们分到8天的口粮，几天后要行动。”当南方士兵追问行动方向时，北方兵说将朝河的上游走，然后向右拐，并说部队将使用驮骡，意思说那将不会沿铁路线走。这种违反保密的现象不仅局限于普通士兵，一位幼稚的军医竟给报纸提供了伤病员的具体数字，李将军由此能计算出联邦军的人数。帕特里克将军怒不可遏地说，如此重要的情报这样草率地到处散布，部队何以迷惑敌人呢？

为了加强保密工作，帕特里克下令把南方的逃兵和散兵

游勇集中起来不准离开联邦军阵地。他还亲自审讯俘虏的反叛士兵，获得南方军的大量情报。不久，他开始与友邻部队交换情报，并向司令部提供情报。

帕特里克选择曾经担任过纽约志愿军上校的乔治·夏普担任新建的军事情报处处长。夏普被授予宪兵副司令的头衔，在指导广泛的情报活动方面表现出非凡的才能。虽然军事情报处的主要情况至今仍然是个谜，但它是内战时期美国最高级最完备的情报机构，是自乔治·华盛顿以来首屈一指的机构。李将军的传记作家道格拉斯·弗里曼说："北方军第一次知道在拉帕汉诺克河以南发生的情况多于李将军知道该河以北发生的情况。"

夏普领导的情报处是个战术情报机构，到内战结束时、他总共雇用了 200 名间谍和侦察人员。派往南方的人中既有暂任间谍，又有常任间谍。他的军人间谍有时假装成逃兵或落伍者连续数天滞留敌营，探听李将军的兵力部署。这项工作特别危险，被俘意味着死亡，间谍可以就近在树上吊死，即使侥幸脱离险境，在回去途中也很可能被北方哨兵击毙。

夏普特别强调快速传递情报。如果情报转递到司令部化的时间太长，或中途延误，那将使之失去价值，因此夏普发出命令，要求所属官兵将情报迅速送达宪兵司令。为了防止情报落入敌手后造成损失，夏普使用了"斯特赖特上校"的化名。他的情报来源有间谍、侦察员、骑兵、汽球驾驶者、通信观察站、信号截获、报刊以及俘虏、难民和逃兵。他和助手们从大量原始材料中加工提炼准确情报，使胡克成为北部联邦将军中最了解情报的人。同时，帕特里克谨慎地保护该处的独立性，使之不受外来干扰，特别是不受拉斐特·贝克的干扰。内战期间，他一直对贝克怀有宿怨，一次他竟下令，凡是

持贝克司令部签发的证明到他部队的人立即送回华盛顿。

军事情报处在搜集战争情报的同时也从事反情报工作。1863年春，当胡克调兵遣将，拉开钱瑟勒斯维尔战役序幕时，李将军发现很难了解到联邦的内幕，他对戴维斯总统说："我没有办法弄清真实情况。"帕特里克也说："反叛者们对我们的意图毫无所知，甚至他们的前沿哨兵也是两眼一抹黑。"南方的情报搜集工作甚至遇到荒唐可笑的不幸，一位信使携带密码情报到达里士满，竟然想不起来破译的密钥；而夏普的一位间谍却从里士满带回了有关李将军部队实力与部署的准确情报。

然而，经过几次失败的教训，李将军的情报工作渐渐加强。通过骑兵和侦察员的艰苦努力，通过通信兵截获情报，通过积累华盛顿的报纸，不久李将军总结出波托马克军区的实力。而胡克却未能充分使用自己的情报。在南方军猛烈攻击其在钱瑟勒斯维尔暴露的右翼之前，该地区的德国雇佣军就不断向司令部报告叛军动向，但是参谋军官们对此充耳不闻。由于获取重要情报后未能迅速采取措施，结果联邦军再次败北。

李将军准备乘胜进犯北方，军事情报处首先发现这一情况。通常认为联邦骑兵能最迅速地提供南方军进攻的情报，但是这一次实际是夏普的一位间谍在审讯难民时偶然获得的。夏普报告胡克："南方军已接到前进命令，最近他们刚传达李将军的指示，宣布长途行军打一场恶仗……逃兵们都说部队已经知道马上要前进。"这样，叛军接近波托马克河、涉水过河、进入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注视。

后来，审讯在葛底斯堡抓获的叛军俘虏所获的情报，使胡克的继任者乔治·米德将军在战斗中面临撤退还是坚守阵地时起了决定性作用。米德担心李会对他发动新的进攻，但

是夏普准确地报告叛军已经精疲力尽,不可能再次发动进攻。米德坚守住尸横遍野的阵地，疲惫不堪的同盟军一直撤退到弗吉尼亚。

米德赶走了潮水般的敌军，但他缺乏乘胜追击的勇气，只是谨小慎微地与叛军作战。由于某些原因，他对曾经在葛底斯堡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军事情报处失去信任，该处职能下降，只是处理通常由军警过问的琐事。不久，米德和帕特里克终于爆发了正面冲突。当帕特里克怒斥他无能、威胁要辞掉宪兵司令职务、到作战部队任职时，米德声称夏普领导的情报处“不中用，不如骑兵能提供情报”。

1864年3月，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被任命为联邦军总司令，给波托马克军区及其情报处注入新的活力。格兰特从西部战役连连获胜的经验中认识到系统情报的重要性，把夏普及其领导的情报处调入他的司令部。该处恢复元气后，向各地派出侦察员，同里士满和其它地方的间谍重建联系，后来，在斯波齐尔韦尼亚法院战斗中，3000多南方官兵被俘。帕特里克将军为情报工作的成效感到骄傲，他写道:“被俘的军官吃惊地发现我对他们的编制了如指掌，我像指挥自己的部队一样，很快报告他们各团的番号,并把俘虏编成一个旅，由他们自己的军官负责。”

在西部，格兰特将军的情报处长是格伦维尔·道奇，他因创建联邦太平洋铁路公司而一举成名。道奇出生在新英格兰，当过铁路检查员和工程师，创办铁路公司后在俄亥俄州定居。内战爆发时，他在该州民兵组织中担任上校，由于作战勇敢,晋升为将军。驻密苏里联邦军司令约翰·弗雷蒙特将军于1861年底首次交给道奇的任务是叫他追查该地区的反叛

活动。

由于干过铁路工作，道奇对边防侦察的技术十分娴熟。他派骑兵到密苏里和阿肯色各地去，在该地区建立了间谍网。他还根据敌军在道路上占据空间的大小，找到估计其兵力的新方法。不久，他不断获得整个西南地区叛军活动的情报。1862年3月，道奇的侦察员报告了大批同盟军进犯的消息，使阿肯色州皮里奇的联邦军转危为安，这充分证明了他情报工作的成效。

在格兰特担任西部联邦军司令之初，他接管的情报系统松散混乱，常常摸不准同盟军的实力和部署，联邦指挥官对获得的情报不放心。格兰特了解到道奇的工作成绩后，叫他重建情报系统。道奇组织了由南方联邦主义者构成的田纳西第一骑兵团，促使全体成员与他们的亲戚参加秘密间谍网。这些间谍的举止与外表同当地人完全一样，在该地区生活、旅行不会引起怀疑。他还请逃跑的奴隶送信，因为敌人哨兵很少盘问他们，并且事实证明，这些黑人是完全值得信赖的，没有一个黑人出卖过间谍或秘密。

道奇相当重视地形情报。他保存着活动地区的大幅地图，收到新的数据后加在图上。如果有人偶尔提到一条小溪、一座小山，他总要弄清它的确切位置。尽管他的主要任务是搜集积极情报，即有关南部同盟武装力量的情报，但他领导的机构能够、也确实发现过南方间谍。他的机构派出的间谍最多时达到近100名，他们的身份是保密的，即使可靠的参谋人员也只知道他们的代号，所有情报看完后立即销毁。

道奇告诉他的间谍，如果被捕，为了保存自己，可以给反叛者供出一些情况，但不能危害北方的事业。内战结束前，他的间谍中约有一半人被俘或被杀，有的是军事法庭审判后

处决的，但没有一人背叛联邦——尽管少数人为了活命假装背叛。一名被迫加入同盟军的间谍因表现突出，很快晋升为上士。道奇以为他已阵亡，但他抓准一个机会逃回来，未及更换叛军的服装便向道奇报到，请求交给他新的任务。“特工人员比一般军人要勇敢，”道奇将军说。

35岁的密西西比人菲利普·亨森是道奇手下最有才干的间谍之一。他是他家唯一坚定的联邦主义者，但他不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当联邦军推进到该州北部时，他偷偷去为联邦工作。他个子高大，走路蹒跚，说话、举止慢条斯理，没有引起叛军的怀疑。为了摸清斯特林·普赖斯的意图，他骑马进入同盟军阵地，同哨兵交谈，在普赖斯的司令部附近观察，获得需要的情况后，他迅速报告了一位联邦军官。同盟军骑兵指挥官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将军深知亨森的厉害，称亨森是“在南部同盟活动的最危险的联邦间谍”，他为未能绞死亨森而遗憾。

1863年，道奇将军派亨森去维克斯堡。当时联邦军正准备包围密西西比河上的这一重镇。亨森陪同一位儿子在同盟军服役的邻居，以探亲为名，通过了重兵把守的同盟军防线。当遭到南方巡逻兵阻拦时，他们说了声“到维克斯堡去看望儿子”便得到放行。亨森一进城，便找到约翰·彭伯顿将军，控诉北方人虐待占领区内南方人的罪行。彭伯顿深深感到，如果把这些情况向部队宣传，可以激发士兵的斗志。亨森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在维克斯堡的环形防线内通行无阻，在向军人讲话的同时，把耳闻目睹的一切铭刻在心里。道奇将军对亨森的情报十分满意，奖给他一匹骏马。

1864年8月底，全国各地民主党代表云集芝加哥，满怀

信心地准备下届总统的提名。战争旷日持久地拖延着，共和党总统林肯越来越不得人心，格兰特将军在进军里士满的途中被阻塞在科尔德港，联邦军伤亡惨重，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直捣南部同盟心脏地带的行动也在亚特兰大之外陷入僵局。兴奋的代表们相信，北方更换领导人势在必行。

一群衣冠楚楚的青年冷眼注视着熙熙攘攘的会议代表，为首的是一位长着乌黑头发、略带阴柔之气的肯塔基人托马斯·海因斯。海因斯和他的部分同伴在里士满宾馆下榻，客房门口挂着“密苏里代表团”的牌子。但他们不仅仅是会议代表，海因斯是南部同盟久经沙场的骑兵上尉，负责领导一起旨在芝加哥引起暴动、进而使整个北方陷入混乱的秘密活动。

南部同盟在北方制造动乱蓄谋已久。李将军兵败葛底斯堡，继而维克斯堡陷落，促使里士满的领导人孤注一掷，企图采用秘密活动改变灭亡的命运。他们发现俄亥俄上游的老西北地区是采取行动的好地方，因为那里反战的民主党“铜头蛇”正在煽动反对内战。许多北方人对林肯政权独断专行不满，还有些人担心奴隶获得解放后会造成就业危机。据说西北地区爆发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传闻装备精良的秘密团体，如“自由之子社”，正准备把希望尽快结束内战、对政府不满的诸州组成“西北同盟”。

1864年年中，南部同盟分子已在加拿大境内纠集了一伙亡命之徒，大多数人是北方战俘营的逃犯，为首的名叫雅各布·汤普森，曾任布坎南总统手下的内政部长，是位老奸巨猾的政客。汤普森和亚拉巴马州的前参议员小克莱门特·克莱是“南部同盟政府驻加拿大特别专员”，有南方政府提供的活动经费。杰斐逊·戴维斯总统谨慎地写信告诉汤普森：“我特此指示你立即去加拿大……去后执行我给你的书面指示，

积极推动南部同盟各州的利益。”

汤普森偷越封锁后在多伦多设立了大本营，海因斯上尉当他的行动主任，克莱继续留在蒙特利尔。他们制订了恐怖计划，把“铜头蛇”编为“第5纵队”，在反联邦政府的叛乱中打头阵。他们的计划包括越过美加边境偷袭骚扰，在五大湖区扣押运输船只，烧毁北方城市，释放关在中西部集中营的数千南方囚犯。显然，这些都是恐怖阴谋，但是反叛者们为他们的行动辩解说，北方佬所犯下的暴行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6月初，汤普森和海因斯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会见了“自由之子社”领导人克莱蒙特·瓦兰迪加姆，为所谓的“西北秘密行动”制订方案。瓦兰迪加姆曾经是来自俄亥俄州的民主党议员，因为反对内战和征兵而投靠南部同盟。他同意在8月29日民主党代表会议召开的那天聚众起义。“自由之子社”声称总共有20多万人，仅在伊利诺伊州就有85000人。他们计划在以海因斯为首的南方间谍配合下，“铜头蛇”在城内放火，当警察和消防人员灭火时，把关在道格拉斯和罗克爱兰集中营的南方囚犯释放出来。他们还计划抢劫银行，占领市政厅，攻打警察局。只要反叛者控制住联邦的第二大城市，暴乱会很快蔓及整个西北地区。

瓦兰迪加姆戴着假胡须，偷越边境回到他在俄亥俄州的老巢。他气势汹汹地警告说，“一大批人”决定奋起捍卫宪法赋予的权利，反对专制政权。联邦间谍们监视着瓦兰迪加姆的一举一动，但是政府不想现在就逮捕他。瓦兰迪加姆受到一些人热情欢迎，胆子壮了，又去芝加哥，那里大批“自由之子社”成员夹杂在市区人群里，海因斯和他的人也都带着武器准备行动。道格拉斯集中营的犯人已经获悉有人来释放他

们。大批武器——有些装在贴有"主日学校课本"标签的箱子里——和燃烧剂也已经储备好，随时可以使用。

正当海因斯作最后部署时，这个阴谋破产了。原来联邦间谍早已打入海因斯的组织，肯塔基州"自由之子社"的秘书长费利克斯·斯蒂杰就是一名联邦间谍。当局接到预报后向芝加哥增派了军队，并加强了道格拉斯集中营的警卫。"他把我们全毁了，"海因斯无可奈何地把气发到斯蒂杰身上。其实这起阴谋从一开始就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南部同盟分子错误地以为"铜头蛇"很勇敢，十分欣赏他们为自由而战的夸夸其谈，可是"铜头蛇"一旦面临着杀头或坐牢的危险，他们那种跃跃欲试的勇气便烟消云散了。当看到计划濒临流产时，海因斯不遗余力地鼓劲打气说，只要有500人跟他干，他愿意指挥袭击罗克爱兰俘虏营，然而对他的提议没有任何人响应。最后，当他认识到"自由之子社"只是空谈、不想行动时，他轻蔑地说他们只是"一班成不了气候的童子军"，将他们全解散了。

汤普森和海因斯在芝加哥遭到可耻失败后仍不甘心，加紧进行一系列阴谋活动。他们暗中破坏北方报纸的宣传，纽约《每日新闻》的编辑收到25000美元贿赂后，与南部同盟一唱一和大念和平经。他们可能花了50000美元，准备选举和平民主党候选人詹姆斯·鲁滨逊为伊利诺伊州州长，但是未能成功。其间，他们大做美元投机买卖，搅乱黄金市场，并在全国散发了大量伪币，企图制造一场金融恐慌。

为了补充李将军部队的兵源，他们密谋把关在北方俘虏营的同盟军战俘释放出来，主要目标是俄亥俄州桑达斯基附近约翰逊岛的俘虏营，俘虏一旦获释，立即抢夺武器，向克

利夫兰前进，然后直插弗吉尼亚的同盟军阵地。然而在实施该计划前，必须先夺取伊利湖上唯一的军舰“密执安”号武装汽船，汤普森挑选了南部同盟海军中尉查尔斯·科尔负责这件工作。

科尔获得大量经费后，同他在布法罗相识的一位女人在该地区游览了一番，最后，他报告汤普森，他已贿赂了“密执安”号上的军官，计划1864年9月9日晚在该船举办“酒会”。科尔建议，当酒会达到高潮时，派突击队乘小船前去缴获军舰。该计划获得批准后，一支全副武装的分队，由南部同盟海军代理军士长约翰·耶茨·比尔率领，在湖上夺得一条汽艇，向停泊在约翰逊岛的“密执安”号驶去。然而，比尔看到的不是进入高潮的酒会，而是“密执安”号机器起动、枪炮就位准备战斗。显然出问题了，比尔手下的人拒绝执行攻击任务，他被迫放弃了该计划。事后才知道，科尔在酩酊大醉时被人出卖了，他被关进约翰逊岛上的监狱。

在加拿大的南部同盟分子也几次试图烧毁北方城市。第一次行动是在路易斯维尔，一场大火把联邦军的几座仓库化为灰烬。接着又在伊利诺伊州的马顿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大火毁掉圣路易斯河上的几条运输船。为了搅乱人心，他们还袭击边境城镇，今天在这里抢一家银行，明天在那里烧一座城镇，他们希望这些骚扰能迫使北方佬从前线撤出部队保卫后方，从而减轻对南方的压力。

1864年10月19日，21岁的骑兵中尉贝内特·扬率领近20人在佛蒙特边境的圣奥尔本斯抢劫了3家银行。他们卷走约22万美元，骑着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看到人就开枪，向主要建筑投去一瓶瓶燃烧剂。随着阵阵爆炸声，大火熊熊燃烧，在一支紧急动员的武装分队追赶下，袭击者们仓皇逃往加拿

大。大火很快扑灭了，但一名公民被枪杀，另一名负伤。这次袭击过后，从缅因州到密执安州一带边境地区人心惶惶，人们传说这班强盗走后同盟军一支部队将紧接着从加拿大发动进攻。为了安抚受惊的人民，联邦军从前方调回几个连加强后方，此后总算安稳下来。

接着南部同盟又把注意力转向另一起阴谋：1864年11月8日大选日在北方制造破坏。那年秋天，联邦军捷报频传，先后占领了亚特兰大和莫比尔，林肯连任总统已成定局。汤普森和海因斯企图在联邦后方发动一起暴动，使南部同盟恢复元气。这次他们没有让胆小如鼠的"铜头蛇"参加行动，他们准备以芝加哥和纽约为重点发动大规模暴动，同时在辛辛那提和波士顿纵火，以便转移当局的视线。海因斯将担任芝加哥行动的总指挥，在同盟军服役的英国上校乔治·圣莱杰·格伦费尔任副总指挥。

南部同盟分子再次时运不佳。10月底，道格拉斯俘虏营指挥官本杰明·斯威特上校获悉有人企图袭击该营，立即请求增援，因为他只有近800名老弱残兵看守8000多俘虏。眼看到了11月6日，援军还没有到达，他便改换策略，派人去请约翰·尚克斯中尉。据说这位负责该营门诊所的俘虏爱上了经常给囚徒们送水果食物的寡妇。斯威特许诺说，如果尚克斯发现了阴谋分子的活动地点，他就可获得假释由她监护。

尚克斯藏在垃圾车上假装"逃出去"，在芝加哥各旅馆寻找密探，斯威特派了两人跟踪他，结果发现格伦费尔在里士满宾馆下榻。这位英国人没有怀疑尚克斯，拉他一起参与这次阴谋。尚克斯立即把详细情况转告了斯威特，次日清晨，罪魁祸首们一个个束手就擒，只有海因斯一人侥幸逃脱。

纽约的密谋者们从报纸上看到芝加哥大搜捕的消息后大

惊失色，决定推迟执行放火计划。大选之日平安无事，林肯再次入主白宫，本来在国会占优势的联邦主义者席位也大大增加。暴动计划被挫败以后，罗伯特·马丁上校和他的人决定于1864年11月25日晚火烧纽约，"即使达不到其它目的，至少可以制造一次恐慌，要让华盛顿政府知道，谁要是在南方烧房子，北方也不会安宁。"

计划放火的前一天，马丁的副手约翰·黑德利中尉在华盛顿广场西侧一座房子的地下室从一位神秘的老人那里拿到一只装满燃烧瓶的旅行袋。黑德利回秘密活动地点时，把沉重的旅行袋放在有轨电车上，随着车子颠簸，袋中散发出一股强烈的臭鸡蛋味。看到其他乘客捂住鼻子，黑德利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袋里肯定装着什么死家伙，"一位乘客说。幸运的是，黑德利带着臭气熏天的旅行袋安全到达目的地。

每个密谋者分得10瓶燃烧剂，任务是烧毁他们用假名登记住宿的旅馆。晚上7点刚过，黑德利首先在阿斯特旅馆纵火。"我把床单挂在床板上，把椅子、抽屉、洗脚架全堆到床上，"他说，"然后塞上报纸，浇上一瓶松节油，小心迅速地打开一瓶燃烧剂，往床上一扔，顿时烈火熊熊。当我离开房间时，似乎整个床都烧起来。我锁上门，并像平时一样把钥匙留在登记处。"

黑德利在另外3家旅馆也放了火。南部同盟分子总共在19家旅馆纵火，此外还在尼布洛花园和巴纳姆博物馆放火。争相逃命中有数人被踩伤。警报声响彻全市，消防队冲上大街，在一处救完火又赶到另一处。人们猜测叛军要打过来了，愤怒的人群声言要把纵火犯吊死在路灯柱子上。在座无虚席的温特加登剧院，布思3兄弟——埃德温、小朱尼厄斯和约

翰·威尔克斯——正在义演《凯撒大帝》,附近一家旅馆着火后，人们惊惶失措。埃德温·布思顾不上演戏，安慰观众没有危险，总算稳定了秩序，使演出继续进行。

半夜时分，各处大火基本扑灭，没有造成重大损失。这起阴谋彻底破产了。有人分析说，纵火犯在旅馆房间放火时忽视了一点，窗户都紧闭着，没有氧气，火势就不会蔓延。黑德利及其同伙继续留在纽约了解这次行动产生的后果，几天后才去加拿大。令他们失望的是，燃烧剂没有发挥应有的威力。

火烧纽约市是南部同盟秘密活动机构最后使出的解数之一。尽管这伙亡命之徒别出心裁，不惜代价，但他们只是引起联邦一点小小的烦恼而已。间谍们既胆大妄为，又幼稚可笑，无视基本常识，把秘密活动当儿戏，联邦反情报间谍一眼就识破他们的阴谋。雅各布·汤普森声称，为了对付这些阴谋活动，大约6000联邦军从前线调到北部边境加强防卫。即使这个数字是准确的，这么一点军队对整个战争的影响也是无足轻重的。

当在加拿大的南部同盟分子阴谋采取重大步骤扭转局势时，格兰特将军的部队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进逼里士满。格兰特本人、米德将军和许多参谋人员几乎被南部同盟特工局除掉。一个间谍在弗吉尼亚州锡蒂波因特联邦物资供应基地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1864在8月9日，炸毁了那里的设施，炸死58人。

在内战最后一年里，格兰特时刻都能了解到反叛首都发生的一切，因为大批第5纵队队员、间谍、黑市商人、特务打入了最重要的政府机构，甚至南部同盟的白宫。像独立战

争时期的“库尔珀间谍网”一样，这些地下网络由各阶层各种族的人组成，最成功的间谍网无疑是由伊丽莎白·范卢所领导的间谍网。她是北部联邦的罗斯·格林豪，不过她比南方的罗斯更加成功，尽管她好几次九死一生；但她在整个战争中从未被捕过。

埃德温·菲谢尔说：“用任何标准衡量，她的行动都可以说是巨大的胜利。”军事情报处处长乔治·夏普上校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她代表了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留在里士满的权力……从1864年到1865年我们大部分情报都靠范卢小姐搜集和转递。”

从家庭出身看，伊丽莎白·范卢理应是个坚定的脱离联邦主义者。她是里士满的一个名门闺秀，住在豪华的大厦里，大厦对面的教堂是帕特里克·亨利曾经呼吁“不自由，毋宁死”的地方，她常常把弗吉尼亚人民叫做“我们的人民”。然而，使人意想不到的是，她成为毫不妥协的废奴主义者，公开支持联邦。也许这是因为范卢一家原先是北方人，她父亲约翰·范卢年轻时从长岛去里士满，经营五金获得成功，她母亲来自费城。伊丽莎白1818年出生于里士满，后去母亲的家乡读书，因此她的邻居坚持认为她准是在费城获得废奴思想的。

据说伊丽莎白小时长得很漂亮，是个“令人喜爱的白肤金发女郎”，长长的鬈发披到肩上，一双蓝色的眸子炯炯有神。即使那时，她已有了奋斗目标。父亲死后，她解放了家中9名奴隶。每当听说曾在她家当过奴隶的后代和亲戚被其他主人卖掉时，她便买下来再把他们放了。她在日记中写道：“奴隶制使劳动贬值。奴隶制骄横、残酷、暴虐，不仅对奴隶，而且对社区、对国家都是如此。”朋友们以为她会改变自己的观点，但他们想错了，到内战爆发时，她还是个老处女，同守

寡的母亲住在彻奇希尔，与周围的世界几乎隔绝，但她仍然是个热心的废奴主义者。

使全市人惊诧的是，范卢母女定期去她们家附近的利比监狱看望关在那里的北方俘虏，送去食物、衣服、被褥和药品，请求医生把病人转到医院去。

不久，范卢母女的行动引起报界的指责。一家报纸说，“当这个社区的每个真正的女人在为我们的军队制做物品或照料伤病员时，这两个女人却一直把大量东西送给侵犯我们神圣领土、抢劫杀人的恶棍。”

反叛者们如果知道伊丽莎白·范卢从俘虏那里获取军事情报，准会气得七窍生烟。开始她对获得的情报不会筛选，甚至不解其意，她便同进出于里士满的联邦间谍联系，请他们帮忙。有关情报的问题与答案藏在来回传送的食品篮中或药瓶里。有时她叫其他俘虏监视哨兵，自己同刚刚被俘的人交谈，了解有关战斗和敌人实力的第一手情况。当禁止同俘虏交谈时，她便给他们送去书籍，当书籍归还到她手中时，她便获得用针头扎的小孔拼成的信息。

为了避免怀疑，范卢小姐开始装疯卖傻。她披头散发，穿着破衣烂衫，常常喃喃自语，人们看到她直摇头，称她“疯丫头”，但这也许使她免遭逮捕。官方对她采取的最严厉措施是收回批准她去军事监狱的许可证。然而，像罗斯·格林豪一样，她有地位显赫的朋友，里士满宪兵主任约翰·温德尔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个，范卢请求他重新签发了一张许可证。

随着内战的发展，范卢的情报活动范围扩大了，方法也有了改进。她获得一份密码，把密钥保存在手表盒里，文件藏在卧室的壁炉柴架顶上。联邦信使把她家当作安全屋。她还把逃跑的北方俘虏藏在一间密室里。不久，南部同盟的间

谍监视起她的住处。一次她说:"我转身同一个朋友谈话，发现附近有一个密探。后门附近也经常有陌生人窥视。"当听说利比监狱新来了一位军官时，范卢想了一个防止突然搜查的天真主意。战时的里士满住房紧缺，她主动请这位军官夫妇住进自己家中。这位叫吉布斯的上尉愉快地同意了，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也就听之任之了。

范卢安插在最重要位置的间谍是在南部同盟白宫中当佣人的黑人姑娘玛丽·伊丽莎白·鲍泽。她曾经是个奴隶，范卢解放了她，并送她去北方受教育。内战爆发后，范卢叫鲍泽回到里士满，吸收她参加了间谍组织，替她在杰斐逊·戴维斯家找到工作，在那里,她可偷听到总统吃饭时的讲话,窃取他的文件。范卢对她手下间谍们的活动十分注意保密，鲍泽提供了哪些情报，没有任何可供查核的资料保存下来。

范卢领导的间谍网中有农民、餐馆老板、商人，甚至在南部同盟的陆军部和海军部也都有她的人。

从里士满范卢的家到北部联邦总部一共建立了5个中间站。范卢或一位黑人佣人把情报送到里士满她家经营的一个小农场,这是第一站,信使从那里再把情报转送到另一站。情报有时藏在鸡蛋壳里或缝在衣服里。这些情报是伊莱扎·琼斯小姐与住在诺福克敌后的叔叔詹姆斯·阿普·琼斯之间的家信，表面上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信的空行中用隐显墨水写着里士满地区同盟军的数量、部署与活动的情报，以及联邦军俘虏转移、敌特活动的情况。当联邦军进军里士满时,格兰特将军每天吃早饭时收到范卢托人送去的鲜花，花中藏着从里士满内部送去的最新情报。

与范卢的情报网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个谍报网，由里士满-弗雷德克里斯堡-波托马克铁路负责人塞缪尔·鲁思领

导，两个网络的部分成员相同。这条铁路是李将军的重要运输线，但是李将军对该线营运日益不满，增援部队和物资运输不能适应需要，火车头和车皮总是不足，并且修理桥梁耽误的时间很长。1863年初，李将军要求戴维斯解除鲁思的职务，但是总统以此人政治上可靠为由拒绝了。然而李将军的怀疑是正确的：鲁思千方百计破坏南方的战事，是北方军事情报局功勋卓著的间谍之一。

两年后，鲁思因通敌嫌疑被关进雷堡监狱，但是对他的指控查无实据，很快他就获释。内战结束前夕，他继续给夏普上校传送重要情报。仅在1865年3月，鲁思领导的间谍网就向联邦军报告了李将军企图破釜沉舟、阻止格兰特占领里士满的消息，结果这个阴谋被彻底粉碎；报告了南方企图以烟叶换取黑市腌猪肉；报告了里士满-弗雷德里克斯堡-波多马克铁路线上全部车辆的位置，结果这些车辆被北方军缴获或毁坏。

李将军在里士满周围的防线在格兰特的猛烈打击下彻底崩溃，1865年4月2日，南部同盟政府弃离该城。叛军溃退时放火烧毁弹药库、物资库，里士满在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中摇晃，大火从一幢楼蔓及另一幢楼。但是伊丽莎白·范卢临危不惧。她期待的那天终于来到了，她取出珍藏在家的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把这面饰有34颗星的旗帜挂在屋檐下——这是4年来飘扬在里士满的第一面联邦旗帜。一伙暴徒蜂拥过来，威胁要扯下旗帜、放火烧屋。但是范卢毫不畏惧，轻蔑地指着人群中她认识的一个家伙警告说，如果她发生意外，联邦军会替她报仇的。暴徒们碰了一鼻子灰，一个个夹着尾巴溜走了。

格兰特将军没有忘记范卢，甚至在部队占领里士满之前，

他就派人进城保护她。她正在为联邦完成最后一项任务——从南部同盟首都的灰烬中寻找未被烧毁的秘密文件。格兰特到达里士满后不久便正式看望了她。他们静静地坐在门廊前，一边喝茶，一边交谈，似乎战争早已过去。

第二部

职 业 间 谍

9. 早期阶段的职业间谍

1898年2月15日晚万籁俱寂。鱼雷快艇“库钦”号上的船长艾伯特·格利夫斯准备就寝，前舱的船员们躺在吊床上，雪茄形的艇身在黑色的海水拍打下轻轻地摇荡。10点刚过，码头边的讲话声越来越大，打破了热带夜晚的宁静。一位值班军官轻叩格利夫斯的舱门，报告有人求见。

格利夫斯立即上了甲板，一看来访者是他们的特工员，驻基韦斯特的国际海洋电报局经理马丁·赫林斯。“我收到驻哈瓦那间谍发来的重要情报，”他说。

格利夫斯借助一盏油灯闪烁的光亮匆匆看完简短电报的内容：“缅因”号战列舰刚在90英里外的哈瓦那港爆炸。格利夫斯对这个简短消息将信将疑。1个月前，“缅因”号被派往古巴水域保护该岛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因为那里再次爆发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叛乱。自那以来，各种谣言不胫而走，几天前，有传闻说美国领事菲茨林·李遭到杀害，领事馆被洗劫一空。

但是赫林斯坚信不疑，因为这份情报来自一个“从未使我们失望”的人。尽管赫林斯是个文职人员，但不能把他毫不客气地打发走。他不仅同“缅因”号舰长查尔斯·西格斯

比上校是亲密的朋友，而且数月来他一直给海军提供来自哈瓦那的秘密情报，他的主要间谍是古巴报务员多明戈·维拉弗德。

格利夫斯听取了驻基韦斯特海军军官威廉·考尔斯少校的意见后，3人一起来到格林街电报局，值夜班的报务员告诉他们哈瓦那方向没有新情况。他们极想同维拉弗德联系，叫他提供详细情况证实电报内容，但转念一想，这样做也许会引起西班牙人对这位担任报务员的美国间谍的怀疑，只好再等一等。11点钟左右，收报机滴滴嗒嗒地响起来，这是西格斯比上校给华盛顿海军部长的第一份报告："'缅因'号今晚9：40在哈瓦那港爆炸，许多人受伤，更多人被炸死淹死……"

在"缅因"号354名官兵中，共有266人在爆炸中丧命，幸存者中许多人受了重伤。尽管西格斯比赞扬了西班牙人的营救工作，并要求"待进一步调查后再作公开报道"，但是敌视西班牙、鼓吹侵略的报刊立即谴责西班牙人炸毁了该舰。"这意味着战争！"纽约《每日新闻》出版商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宣称。其它报刊则把此事归罪于古巴反叛分子，因为他们希望挑起美西战争以使该岛实现独立。

多年来，美国对古巴垂涎三尺，多次想购买或兼并该岛。上次古巴反对西班牙的暴动发生于1895年，美国极力同情支持古巴人。尽管美国佬在该岛的投资举足轻重，但是美国介入的主要原因不是出于帝国主义的贪婪，而是为了减轻古巴人民的痛苦，帮助他们赢得独立。这次威廉·麦金利总统尽量避免冲突，但是美国人民被煽动得群情激愤，1898年4月19日，国会在一片"记住'缅因'教训！西班牙滚蛋！"的喧嚣声中，匆匆忙忙通过了等于向西班牙宣战的两院决议。

与以往战争不同的是，在这次美西战争中，美国陆军和

海军都使用了处于萌芽状态的职业情报机构，这些机构的建立——首次以系统收集外国军事情报为目标——是19世纪末给陆军和海军带来深刻变化的技术革命和思想革命的组成部分，美国谍报界在战争中使用业余人员担负特别任务的时代开始让位于职业情报时代。

根据通常做法，内战以后，曾经拯救了联邦的陆军和海军大幅度裁减，经过千辛万苦发展起来的情报组织也相应压缩。美国人民厌倦战争，负债累累，渴望把主要精力转向加强边疆建设、开发国家资源。陆军裁减后成为只有 25000 人的武装警察部队，担负着在战败的南方实施政府的重建政策和平定西部印第安人反抗的任务。海军从大约 700 条舰船减少为48条过时木船，难怪海军上将戴维·波特把些这破旧木船比作“吓唬敌人的玩具”。

重建时期陆军肩负着难于完成的艰巨任务。李将军的投降仅仅意味着停战，但南方人重新挑起反对联邦当局的冲突，企图保存体现“白人优越”的政权。尽管陆军和自由民管理局共同负责保护刚解放的黑人权利，但是陆军没有足够力量控制李将军投降后近两年中在南方不断蔓延的暴力事件。三K党之类的非法组织恐吓黑人和同情黑人的白人，陆军无法制止它们的活动。甚至负责搜集有关恐怖分子及其活动计划情况的基本组织都没有。熟悉秘密活动的唯一政府机构是内战以后由财政部建立起来的特工局，但是它的任务只是追捕钱币、文件伪造者，并且没有派特工员去南方协助陆军工作。

与印第安人作战的部队也遇到相同问题。小部队常常在意想不到的恶劣条件下为生存而作战，为了弥补情报的不足，陆军吸收友好的印第安人担任侦察员和搜集情报。一位将军

评价说，由印第安人组成的一支侦察分队比6名骑兵组成的小队更有用，但是许多军官不大想依靠印第安人。即使能够获得有用情报，传递工作常常没有保证，结果无法使攻击成功或防止敌人偷袭。建立了情报机构就能改变这一状况吗？后来在菲律宾、中美洲、越南同游击队作战的经验表明，获取足够的情报对发现敌人、采取相应行动相当重要。

虽然美国陆军建设处于低潮，值得庆幸的是，从1869年到1883年它在美国最卓越的军事家威廉·谢尔曼的指挥下。在此阶段的多数陆军军官只知道如何指挥骑兵，而谢尔曼敏锐地观察到军事革新使普鲁士1870年对法作战取得辉煌胜利。后膛装填的步枪和大炮第一次在战斗中大规模试用，同时普鲁士人成立了为战争制订计划的总参谋部，创建了通过动员预备队能够迅速扩充的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军队，建立了使用全国铁路网迅速部署部队的预定系统。

美国远远落后于这些最新发展，但是谢尔曼为军事复兴打下了基础。西点军校开始纠正其偏重工程学的倾向，把德国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著作译成英语，并在研究生院开设了军事学课程。谢尔曼的改革思想由内战时期的奇才埃默里·厄普顿作了阐述。厄普顿1861年毕业于西点，内战结束时是3次负伤、年仅26岁的陆军少将。他回到军事学院当教官，发展了一套更灵活的步兵战术对付后膛装填武器带来的密集火力，成为著名的富有创见和开拓精神的军官。

1876年，谢尔曼派厄普顿到世界各国研究国际军事新发展，要他特别注意英军在印度的行动，希望他学到在西部边疆战斗中能有用的东西，可是厄普顿却被在德国的见闻迷住了，回国后立即写了一份有影响的报告，并着手编著《美国的军事政策》。由于病魔缠身而面临强制性退休，厄普顿书未

写完，就于1881年自杀了，然而，该书成为美国军事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厄普顿认为，美国在大多数战争中，由于民众干涉、缺乏准备、依靠未经训练的民兵而犯了严重错误，结果造成不必要的巨大损失和牺牲。相反，德国总参谋部很少受到民众约束，和平时期就作好战争准备。包括搜集潜在敌人的情报。为了防止重复以往的错误，厄普顿主张建立一个德国模式的总参谋部，同时建立一支只有基本骨架的庞大正规军，战时由预备役人员补充。

虽然这些意见同反对建立庞大的正规军的偏见相抵触，但是厄普顿的思想对美军建设有深远影响。高级军官开始注意到外国的新发展和美国未来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同意建立总参谋部以纠正过去在制订计划和政策中的缺点。各国参谋部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都建立了一个搜集、储存、检索情报的情报部，美国军事领导人也开始讨论建立类似的机构作为合理制订计划的基础。然而不是陆军而是海军率先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永久性情报机构。

内战以后，经过裁减只剩下老式船只和过时装备的美国海军停滞不前，而其它先进国家的海军正经历着激烈变化。所有海上强国都使用了改进的装甲板、自行推进鱼雷和大口径膛线炮，甚至丹麦和智利海军都比美国海军先进。美国海军军官懊恼地发现他们的船成为外国人的笑料。奥斯卡·怀尔德在一篇讽刺小说中谈到，一个美国姑娘告诉坎特维尔魔鬼，美国没有古迹和文物，但魔鬼反唇相讥说："没有古迹！没有文物！你们不是有海军和生活方式嘛！"

1880年前后，事情开始变化。内战后暂时消失的"天定

命运”论再次在美国抬头。拉丁美洲和远东被认为是倾销美国工农业过剩产品的地区。与他们先辈不同的是，新帝国主义者们没有想把这些地方变成殖民地，而仅仅希望在商业方面开发利用这些地区，并把美国文明带给那里蒙昧落后的人民。要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就必然要建立一支现代化海军。1881年国会批准建造第一艘钢铁军舰，1882年3月23日，海军部长发布了第二百九十二号命令，在航海局建立海军情报部，“搜集、记录在战时与平时可能对海军部有用的情报。”

海军有值得注意的情报工作传统。和平时期在国外水域巡航中，海军军官总是搜集日常情报，包括港口设施、航道和锚地的情况，在19世纪，整整一个世纪，海军进行了科学考察，把外国海岸线绘入航海图，同时测量海深。严格地说，这些不是情报，只是有军事价值的信息。海军还定期派代表团到国外观察别国海军正在取得的进步，并搜集海军现代化和改革的情报。遗憾的是，搜集到的许多资料被浪费掉了。海军部没有核对情报的机构，也没有归纳整理情报、把情报运用于政策制订的中心计划部门，重要的文件经常在类似独立王国的8个局的某个档案室中不翼而飞，查无着落。

34岁的中尉西奥多勒斯·梅森热心情报工作，被挑选担任海军首任情报部部长。此前，他曾去欧洲搜集加强海军情报工作的资料，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法国系统。他说：“精通业务的军官被派到情报局工作，为加强全军建设提供资料，”梅森希望吸收同样素质的人到他新建立的机构工作，然而派去协助他的多数军官却是些平庸之辈。

情报部建立以后，航海局命令每个舰长或船长都要指定一位情报军官向该部报告港口、要塞和外国船只情况。这些军官缺乏经验，有的人甚至抱怨附加的文字工作影响了正常

观察和其它任务。当一位军官说他对情报一窍不通，拒绝兼管情报工作时，他的船长也附和说："我们都是半斤八两。"尽管如此，华盛顿仍然收到游弋在各地的美国海军舰只发回的报告。大部分是例行公事，但也有报告谈到法国企图在巴拿马地峡开凿运河、阿根廷购买了一条新的鱼雷快艇、非洲南端开普敦在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性。

在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大楼中一间极小的办公室里，梅森和他的助手们艰苦地把各种资料制成档案卡片，整理刚刚接管的海军部图书馆资料、报刊文章以及从控制严密的各局挖取的任何材料。1年后，美国向驻伦敦的公使馆派出第一位海军武官。考虑到欧洲各国间的联盟关系，几年后又陆续向巴黎、柏林、罗马、维也纳和圣彼得堡派了海军武官。

不久，沉重的档案盒中与书架上装满了各种资料，内容涉及各国军舰速度和装备、建造新舰的计划和外国海军预算等。凡是与海军建设有关的资料，如各国政治、资源、钢铁生产能力，都可能在这些日益增加的档案中查到。海军情报部提供了船体设计与构造、大炮和发动机的现代技术资料，为海军现代化作出了贡献。一位权威人士作出这样的结论："美国海军第一批钢铁舰艇的建造，无一没有情报部的直接帮助。"

为了不让海军压倒自己，1885年10月陆军也建立了情报部。据说陆军部长威廉·恩迪科特向陆军副官长德拉姆了解他应该掌握的欧洲某个国家——也许是德国或俄国——的有关情况。令恩迪科特吃惊的是，德拉姆不仅没有这些资料，而且也缺乏获取这些资料的手段。这个传说也许不足为信，但是据说此事促使德拉姆在相当于今天的陆军总参谋部的陆军副官长署建立一个情报机构。新成立的陆军情报部的任务是

搜集“能够供陆军部和全陆军使用的我军或外军的军事资料。”

起初，陆军情报部隶属于军队地产部总务局，由威廉·沃尔克默少校负责。显然，因该情报部将关注外国的地形测量而将其置于地产部管辖之下。沃尔克默是个有口皆碑的优秀军官，但是由于手下只有1名办事员，加上权力有限，他几乎什么也干不成。有些野战部队司令对他的情报要求完全置之不理。

不到1年，丹尼尔·泰勒上尉接替了沃尔克默，成为实际上的陆军情报部首任部长。泰勒虽有德拉姆将军作后台，但他俩认识到，在经费有限、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只有集中、高效才能适应陆军部的情报需要。陆军副官长亲自命令那些难于驾驭的指挥官同陆军情报部合作，并也像海军情报部一样建立了资料库。1887年，陆军首次向柏林、巴黎、伦敦、维也纳和圣彼得堡派驻了武官，负责“调查和报告对陆军部任何部门乃至整个陆军可能有价值的一切带有军事或技术性质的事情”。

在公开军事情报机构建立的时候，另一个负责秘密情报搜集的机构“打猎钓鱼休假团”已经存在。陆军部以这个休假团名义派遣军官到敏感地区侦察地形，如果他们被抓住，休假团可以正式否认。加拿大边境地区就是从事这种活动的好地方。德拉姆将军给一些边防哨所指挥官写了一封密信，指示他们“选派精明能干的军官”侦察同美国毗邻的地区，协助绘制一张战争爆发时能使用的军事地图。1881年，陆军情报部新任部长泰勒上尉在圣劳伦斯河沿线作了勘测，1890年安德鲁·罗恩中尉又秘密视察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全线。

美国对加拿大的兴趣主要源自内战期间美英之间的强烈

仇恨。美国人谴责英国毁坏了“亚拉巴马”号船和南部同盟的其它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同时谴责英国允许把加拿大用作秘密活动的基地。美国人成功后得意忘形，胸有成竹地谈论涌过边境接管加拿大，纠正过去约翰·布尔犯下的错误。以实现爱尔兰独立为宗旨的秘密组织“芬尼亚运动”的活动进一步使美英关系恶化。“芬尼亚运动”的成员以美国为基地，计划征服加拿大，也许想把美国和英国卷入一场导致爱尔兰独立的战争。联邦军的一些爱尔兰裔老兵被调去袭击加拿大，一次次行动虽然遭到可耻地失败了，但使加拿大当局惶恐不安。

一时间似乎加拿大已成为美国的囊中之物，分裂思潮席卷整个加拿大，特别是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百余名居民请求美国兼并。1867年国会通过了加拿大纳入美国的议案。两年后，格兰特总统派遣密探詹姆斯·泰勒去红河谷，也就是现在的马尼托巴，调查法裔加拿大人暴动的情况。“你此行的一切活动必须严格保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暴露，”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叮嘱泰勒。“同时对你的身份也必须保密。”然而，美国企图获取新的领土的希望很快化为泡影，马尼托巴的反叛者们不是想脱离加拿大，而只是希望建立一个西魁北克。

政府高层领导人逐渐认识到必须加强情报工作。1858年，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在给国会的文件中批准向国外派遣陆、海军武官。“我们的海军部必须汇集我国所有精明能干、足智多谋的人才，准备利用其它国家的经验，”他说。在陆军和海军分别建立情报机构的问题上至少获得勉强通过，尽管在经费与人力上卡得很紧。然而，情报工作没有被当作专业，两个机构的军官仅仅是临时帮忙。因此，这些初步的努力充

其量只是代表了适应系统搜集情报需要的一种意向。

海军情报部和陆军情报部主要搜集技术情报和准备地图，而陆军和海军武官也传递政治情报。"有些情报的获取必须使用即使在国外被发现也不会引起任何麻烦的方法，"陆军副官长说。比如，驻巴黎陆军武官亨利·博勒普上尉从法国海军部一位官员那里买到了土伦市防御工事计划。不可思议的是，当那个叛徒被抓起来时，博勒普竟吹嘘自己参与了这起阴谋，结果被陆军部召回。1891年陆军情报部已能分析出11个欧洲国家武器库中武器的数量和种类，并着手绘制加拿大、墨西哥和古巴地图，以及首次绘制美国军用地图（该工程于1915年完成）。两个情报机构还把摄影技术用于情报目的，一位军官给海军情报部送去29张有关智利瓦尔帕莱索市沿海防御的照片。

从一开始情报机构之间就展开了激烈的竞争。1890年海军情报部部长小查尔斯·戴维斯中校攻击陆军情报部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机构，它老是缠着我们帮忙提供情报。"当发现一位陆军军官未经批准就借走了一份存档文件时，戴维斯宣称："类似的事使我加倍警惕，特别是同这些人打交道更要小心，我认为他们在需要谨慎的问题上似乎比骡还蠢。"

海军情报部担心通过商业电报传递给海军部的秘密材料容易泄密，于是开始编制海军密码。由于参与该项工作的军官缺乏经验，工程进展缓慢。他们从欧洲请来一个叫"霍克先生"的专家帮忙。即使在那时，新闻界和情报界就互相提防。驻伦敦的海军武官接到指示，对霍克先生的事要守口如瓶，"因为如传出去，此事就会立即见诸报端，被用来作为攻击海军部的炮弹，那将会把整个事情搞糟。"约两年后密码终于编成，委托航海部保存，直至1917年。

初建时期也是美国商业与情报部门共生关系的发端。当了解到欧洲几个国家正在生产无烟火药后——据说比美国仍然使用的黑色炸药威力大得多——陆军部叫美国的炸药主要生产商杜邦家族获取有关情报。1889年初，这个家族中年纪较小的成员艾尔弗雷德·杜邦到达巴黎，带去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给法国官员的一封信，充满信心地希望同对方合作。法国人拒绝把生产过程透露给杜邦，但这位年轻人无意中获悉，为了保密，无烟火药在法国的4个地区生产，还了解到2.5克的无烟火药超过了杜邦公司生产的5克火药的威力。

听说比利时库帕尔公司也正生产无烟火药后，年轻的杜邦悄悄越过边境去了比利时，通过大量行贿，他被作为一名工人偷偷带进工厂。杜邦一言不发，睁大眼睛看个够，窃得了他所需要的秘密。回国前夕，他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向比利时人提出，要么签订合同允许杜邦公司在美国生产无烟火药，要么杜邦公司不付专利权税便生产这种火药，使他们破产。库帕尔公司无法证明这位年轻人搞了间谍活动，只好违心地接受了他那海盗般的条件。他胜利地回国后，获得晋升高级职务的奖赏。

情报对美国军方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还体现在陆军情报部已经成为值得各部门争相控制的单位。通信兵司令格里利准将发动了这起争权闹剧，说什么陆军情报部应该由他领导，而不该由陆军副官长领导，因为通信兵的工作职责中就有“为陆军搜集和传递情报”。为了击败这种企图，陆军部通过扩大任务、扩充人力的办法加强了陆军情报部，除了搜集情报外，陆军情报部授权负责武官工作，在战争爆发时负责动员预备役和民兵，并且制订针对邻国的应急作战计划。

海军情报部在1895年的中日战争中全面搜集情报。在这

次海战中，首次使用了现代化的舰队。海军官员希望估价新式大炮对改进了的装甲板的作用。美国海军军官到现场广泛收集材料，威廉·西姆斯中尉编写了一份由400多页笔记、草图、地图组成的报告，为此竟患了指痉挛，折磨了他后半辈子。

美国情报机构对于美西战争的爆发早有预料。海军情报部和陆军情报部一直注视着饱受战乱的西班牙的动向。陆军情报部部长阿瑟·瓦格纳少校是担任此职的难得人才。他毕业于西点军校，参加过印第安战争。在莱文沃思要塞步骑学校担任教官期间，他富有革新精神，在全陆军颇有影响。他写的美国第一部战术情报专著《安全与情报工作》在1893年出版，多年用作陆军训练的教材。在海军方面，好战的海军部副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对海军情报部的工作很感兴趣，说该部部长应该是在必然爆发的美西战争中"我们相信能够开创战略工作的人"。

1897年春夏之交，驻马德里陆军武官塔斯克·布利斯上尉提供了有关西班牙战争准备、驻古巴的西班牙军队实力的详细情报，同时，古巴起义者通过他们驻纽约的机构，提供了古巴岛的有关情报。地图也正在紧急准备中。在"缅因"号战列舰1898年1月派往哈瓦那之前，原先支持过海军情报部的西格斯比舰长秘密安排基韦斯特的马丁·赫林斯传递情报。

赫林斯很胜任这项工作。他出生于宾夕法尼亚，是位出生入死的联邦军老战士，同一位著名商人的女儿结婚，现任国际海洋电报公司当地分理处经理：该公司是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子公司，在哈瓦那和基韦斯特设有分理处。蒸汽机船"奥利夫特"号每周3次来往于哈瓦那、坦帕与基韦斯特之间。

赫林斯安排该船事务长担任秘密信使，在这几处传递情报。但是赫林斯最重要的工作是吸收了哈瓦那的古巴报务员多明戈·维拉弗德进入间谍网。不仅来往于马德里和哈瓦那之间的官方电报要经过维拉弗德之手，而且他处于能够窃听政府高级官员讲话的地位：哈瓦那电报局正好设在总督府内。

从“缅因”号沉没到正式宣战这段时间里，海军部副部长罗斯福常常超越部长约翰·朗的职权，指示海军武官购买军舰、装备，如果需要，也可购买煤炭，同时注视西班牙的战备情况。为了不违犯英国的中立法，在英国购买的一船速射炮贴上了机器的标签，而在德国购买的鱼雷压缩机则伪装成农用水泵。罗斯福还要求海军情报部提供有关美国和西班牙军舰性能的材料，这种情报首次用于制订战略计划。

虽然许多战略家预想美西战争仅局限于加勒比地区，但罗斯福制订了不仅干涉古巴、而且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菲律宾的计划。1898年2月25日，海军部长朗因连续召开紧急会议后疲惫不堪而请假休息，由罗斯福主持海军部工作。罗斯福立即给在香港的亚洲海军中队司令乔治·杜威准将拍去电报，命令他战争一旦爆发，马上攻击驻菲律宾的西班牙舰队。两个月后战争爆发时，杜威早有准备，把舰队从中国南海驶向马尼拉。

一个临时成立的谍报系统帮助杜威整理他可能获取的情报。他的主要情报来源是美国驻马尼拉领事威廉。他还指定一名军官同从马尼拉到达香港的船员谈话获取情报。另外，住在香港的一名美国商人经常去菲律宾首都，能够提供一些所见所闻。从这些情报中，杜威了解到西班牙的船只破旧不堪，几乎无法对付中国的平底帆船队。

美国国内等待着杜威的消息，可是1个多星期后仍杳无

音讯，似乎该中队已经驶到天涯海角。当战胜西班牙的传闻慢慢传到美国时，美国人不知真假，更是焦急不安。5月7日凌晨，一条邮船带着杜威准将的正式报告抵达香港，密码电报发到了海军部。

约半小时后，海军部副部长罗斯福会见了一班聚集在海军部的记者，他宣布，6天前，也就是1898年5月1日，杜威在马尼拉湾打垮了西班牙舰队，敌船不是被击沉，就是被俘获。整个房间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全国很快沸腾起来。

然而主战场是在古巴。早在1897年12月28日，瓦格纳上校就给陆军部长拉塞尔·阿尔格送去一份备忘录，提出派一名观察员去古巴了解西班牙人和古巴人的作战特点。虽有十几名军官志愿完成这个任务，但他补充说："我倾向于派陆军情报部的值班军官去。"这个建议被束之高阁，直到"缅因"号沉没10天后，才派安德鲁·罗恩中尉去古巴同起义领袖加西亚将军联系，试探能否同他联合行动。

罗恩有条件完成这项任务。他在陆军情报部负责边境工作，自从1890年以后一直在加拿大边境担任秘密侦探任务，有丰富的经验。他曾根据自己阅读和听到的材料精心编著了《古巴岛》一书，似乎谁也没有看出他从未去过古巴。罗恩没有给加西亚捎带任何信件。他要去丛林寻找这位古巴领导人，弄清加西亚有多少兵力，需要什么物资，是否愿意同美国远征军合作。

当他脱下军装、换上便服时，罗恩也许想到了内森·黑尔和约翰·安德烈的命运，因为他知道在侦察西班牙军队的情况时风险很大。在牙买加的金斯敦与古巴的起义者们联系后，他乘一条小渔船，花了36小时渡海到达古巴。当接近海岸

时，小船被西班牙炮艇发现，但未经检查便放行了。在正式宣战的那天，罗恩在奥连特省的沙滩登陆。后来的6天中，他在丛林中披荆斩棘，与酷热、蚊虫作斗争，克服饮用脏水后的不良反应，最后于5月1日在该岛东端的巴亚莫找到加西亚。

这位游击队领导人身材魁梧，威风凛凛，山羊胡子银光闪闪，额角上印着一道深深的伤痕。他年轻时被西班牙人投进监狱，曾经想对准脑门开枪自杀。这时这位令人畏惧的战士凶狠地望着来人。此人有什么证件？是否是西班牙人设下的圈套？但是当罗恩讲出在牙买加他所联系的人的名字后，这位古巴人解除了疑虑。

加西亚对罗恩的到来非常高兴，提出他需要大炮、弹药和现代化的步枪。两人顺利会见6小时后，罗恩踏上了归途。这次由加西亚的3位军官护送。向北部海岸出发的旅程比进来时更加艰难，因为西班牙巡逻兵已处于戒备状态。他们一行只好在丛林中晓宿夜行，5天后到达海边，藏在那里等候的船只太小了，只好留下一名古巴人。船帆是黄麻袋做的，一场风暴随时会把小船掀翻，但罗恩终于带着情报和加西亚愿同美国入侵部队合作的承诺安全抵达拿骚。

陆军情报部的另一名军官亨利·惠特尼中尉执行了另一项同样艰巨的任务，在西班牙人的鼻子底下秘密侦探了波多黎各。不知怎么搞的，他的行动走漏了风声．敌人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一情况。当他乘坐的英国汽船到达蓬塞时，敌人已布下天罗地网，可是彻底搜查该船后，却没有发现美国军官。原来惠特尼临时当上司炉，当时他正在锅炉间，满脸的汗水和煤灰使谁也没能认出他。后来他重新化装成英国商船上的船员上了岸。

以上两项任务是在瓦格纳上校领导下，由陆军情报部组

织实施的，陆军部长阿尔杰和陆军司令迈尔斯将军均未指示陆军情报部搜集古巴或波多黎各的情报，结果这些冒险行动不仅没有受到奖励，而且瓦格纳被撤职。当在白宫一次会议上讨论入侵古巴的计划时，比主管人员更了解情况的瓦格纳提出，美军登陆正值黄热病发病高峰期，建议推迟行动。他的意见得到著名的流行病专家斯滕伯格军医局局长的支持，但最后得由阿尔杰部长拍板。由于杜威在马尼拉湾旗开得胜，阿尔杰急于分享海军获得的荣誉，结果瓦格纳的意见未能采纳。

接着瓦格纳提出建立陆军野战情报处陪同远征军出征古巴，但远征军司令威廉·沙夫特将军宣称他不需要有关敌人的任何情报。就这样，美国陆军最有才华的情报军官只好作为师长的义务助手去古巴参战。在那里他去前线侦察时染上了严重的黄热病。由于阿尔杰不断阻挠，直至 1906 年瓦格纳临死前才晋升为准将。

不久，西班牙的西印度舰队引起海军情报部的关注。该舰队在塞韦拉将军的领导下正在加的斯改装，它到底由多少艘舰只组成？塞韦拉的意图是什么？另外值得担心的是，据传当美国战列舰"俄勒冈"号绕过南美同在加勒比地区的美国舰队会合时将遭到西班牙一支巡洋舰中队的截击。此外还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西班牙的卡马拉将军正率领另一支舰队去马尼拉偷袭杜威。

为了摸清这些问题的虚实，陆军部和海军部打破常规，派遣密探去欧洲侦查情况。化名为"费尔南德斯·坎波"的间谍在马德里最高级的宾馆下榻，假装成痛恨美国人的墨西哥阔佬。他同西班牙军官混熟后常常被待为上宾，打牌时他故

意满不在乎地输钱。不久，他被请到加的斯，不仅参观了军火库和造船厂，还应邀出席了卡马拉将军亲自主持的宴会。这位间谍殷切希望“无敌舰队”尽快出航，给美国佬应有的严惩。将军在回答时透露说，他的舰队还需6个星期才能改装整修完毕。获得这一重要情报后“费尔南德斯·坎波”悄悄溜走了。

另一名间谍恩赛因·威廉·巴克化装成有钱的游客，驾着游艇在欧洲海岸巡航，当他发现卡马拉的舰队后，一直尾随它们通过地中海进入苏伊士运河。其间，驻巴黎的海军武官威廉·西姆斯故意在西班牙密探中散布谣言，说美国一支巡洋舰中队已经出发，即将袭击西班牙海岸。马德里惊慌失措，迅速召回卡马拉，有效地牵制住了他的舰队。

在派出间谍执行秘密任务的同时，国内不断向驻欧海军武官们催要情报。海军情报部部长约翰·巴利特指示他们要不惜代价达到目的。他说：“情报部经费可观，合理的支出，即使50000美元，也能支付。”有了足够经费，武官们毫无拘束地雇用间谍，并在一定范围内放风，他们准备收买情报。

驻伦敦海军武官约翰·科尔韦尔中尉建立了一个广泛的间谍网，他在马德里安插了一名间谍，月薪2500美元，接着又派了间谍“E”和“F”，月薪1500美元。间谍“G”主要提供从伦敦到西班牙的货运情况，经过讨价还价，每月10美元。间谍“K”在西班牙使馆中为美国海军刺探消息，间谍“L”监视苏伊士运河。在安特卫普，另有一名间谍截获电报和搜集货物运到西班牙的情况。科尔韦尔用于他的间谍网的费用总计27000美元。爱德华·布雷克曾经就读于海德堡大学，化装成一名休假的德国医生打入西班牙。他行动谨慎小心，总是注意化装，暗中携带手枪。但是像许多业余间谍一

样，他不知如何安全传递已经获取的有用情报。

西班牙人也对这种非职业谍报活动作了尝试。美西战争爆发之初，华盛顿接到报告，说西班牙驻美前任大使带领部分工作人员去了蒙特利尔，企图建立一个在加美边境活动的间谍网。据说这些西班牙人计划在美国天主教徒中打出圣旗，怂恿他们破坏美国的战争努力。海军情报部和陆军情报部都缺乏反情报能力和经验，因此粉碎西班牙间谍网的任务就交给了特工局。曾经担任过芝加哥治安记者的特工局局长约翰·威尔基立即把这些西班牙人监视起来——这件事很容易，因为加拿大新闻界已经对他们作过报道。为了迷惑美国人，这些西班牙人订了船票回国，但在圣劳伦斯河沿岸几个港口，部分人员悄悄下船又回到蒙特利尔。由曾经在华盛顿担任过海军武官的拉蒙·卡伦扎中尉组成了一个新的间谍网。然而，西班牙人不知道他们的全部活动一直受到监视。

卡伦扎的第一个目标是获取有关美国海防和海军战略的情报，他雇用的第一名间谍是曾在美国海军当过军士的英裔美国人乔治·唐宁。缺乏经验的卡伦扎在多伦多旅馆向新雇用的间谍交待任务时一时疏忽，没有检查隔壁房间有无房客，结果他们的谈话被威尔基手下的间谍窃听，唐宁去华盛顿时一路受到监视。当他向蒙特利尔投寄一封有关美国海军活动的情报信时被当场逮捕，两天后唐宁在牢房上吊自杀。

这个不幸事件没有使卡伦扎惊惶失措，接着他走出第二步棋：诱骗有军事知识的加拿大人和英国人参加美军，然后用重金向他们收买有关美军装备、训练和士气方面的情报。两位无业英国青年接受了条件，但其中一人不久犹豫起来，偷偷把这个阴谋报告了美国驻安大略省金斯顿的领事，特工局立即对报名参军的英国人和加拿大人给予注意。后来，一名

叫弗兰克·梅勒斯的人在向蒙特利尔卡伦扎的同伙拍发一份密码电报后，在坦帕被威尔基的人抓获。

不久，卡伦扎在蒙特利尔租了一幢住宅。两个月后的一天，出租人带了3个未来的住户去看房子，当时卡伦扎正在吃早饭，一位女佣把来访者们领进屋，其中一位是密探。他发现卡伦扎写给表兄——西班牙海军将军——的一封信，便偷偷塞进口袋。美国人认为，此信足以证明卡伦扎在从事间谍活动，便把信交给了加拿大政府，要求命令他离开加拿大。卡伦扎无比愤慨，提出美国人偷偷篡改了信，是栽赃陷害。加拿大不顾他的抗议，以破坏加拿大中立为由将他驱逐出境。

然而，西班牙的西印度舰队到哪里去了呢？

4月29日塞韦拉将军的舰队离开佛得角以后，各种传闻不断涌进白宫麦金利总统的战争指挥部。报纸宣称，西班牙的大帆船很快将炮击波士顿或纽约。请求保护的呼吁像潮水一样涌进海军部。为了平息舆论，海军部把船只分成了3个中队：最强大的中队由海军少将威廉·桑普森率领，派往基韦斯特；由温菲尔德·施莱准将指挥的“飞行中队”驻在汉普顿锚地，准备在那里截击大西洋或加勒比海的一支西班牙舰队；第3中队由武装商船组成，在特拉华角以北巡逻。

桑普森预测到塞韦拉将去波多黎各的圣胡安添加燃料，便把舰队开去截击，可是没有发现西班牙舰队。当桑普森回师基韦斯特时，有消息说西班牙舰队已到达马提尼克岛。桑普森认为，西班牙人加完燃料会驶向古巴南海岸的西恩富戈斯卸下给哈瓦那驻军的武器，便命令施莱率“飞行中队”在那里同他会合。但是塞韦拉比美国海军指挥官智胜一筹。当法国人拒绝让他加燃料时，他就驶向库腊索岛，从荷兰人那

里添加了部分燃料后，他便消失在浩瀚的加勒比海。

关于塞韦拉下落的第一个可靠消息来自由马丁·赫林斯领导的基韦斯特-哈瓦那间谍网。美西战争爆发后，赫林斯的工作转交给了通信兵，他被任命为上尉，在基韦斯特工作。该间谍网是保密的，甚至陆军部长阿尔杰也不知它的存在，因为他反复要求关闭哈瓦那海底电报线路，说驻美国的西班牙间谍也许在使用该线发报。事实上哈瓦那发生的一切不需1小时麦金利总统的战争指挥部就知道了。

5月19日，哈瓦那电报局报务员多明戈·维拉弗德正在收听日常通话，突然从古巴岛东南端的圣地亚哥传来以下电文：

古巴舰队司令：

今天已在此港停泊，为此我舰队全体官兵向您致意，希望携手合作保卫贵国。

塞韦拉

维拉弗德把电报扔给一位信使送走，等剩下他一人时，迅速给基韦斯特发了一份电报。

该电报在华盛顿引起震惊。这不可能是真的。如果塞韦拉的舰队开进圣地亚哥港口狭窄通道，隐蔽到炮群和雷场后边，那么他就不能投入战斗，因为一旦美军实行封锁，他就无法出来。另外，美国一艘巡洋舰此时已到达圣地亚哥附近，但它报告没有发现西班牙舰队的踪迹。总之，人们认为这消息值得怀疑，完全忽视了这场战争中最重要情报，以至美国海军继续在西恩富戈斯附近盲目搜索，直至5月28日晚——维拉弗德给基韦斯特发去塞韦拉到达的消息9天以后——桑普森的中队才驶到圣地亚哥附近封锁了港口出口处。

桑普森把舰队布成半圆形，距圣地亚哥的出口约6英里，每夜派一艘战列舰用探照灯监视。而西班牙舰队装备陈旧，没有探照灯，无法对桑普森的不断炮击给予有效回击。然而，美国人也无法进港摧毁塞韦拉的舰队。桑普森要求陆军从背后夺取要塞，以便他排掉航道中的水雷直取敌舰。

但是桑普森不知西班牙舰队到底有多少舰只。有报道说，敌人的几艘巡洋舰仍在港外航行，如果它们碰上运送沙夫特将军部队去古巴的运输舰，那将造成严重后果。该运输舰已经行驶在坦帕附近海面，海军部暂时没有下令他们继续前进，而是派"萨旺尼"号炮舰的副舰长维克托·布卢中尉去摸清塞韦拉所有的船是否都在圣地亚哥港内。

布卢在离圣地亚哥约15英里的海滩由一位古巴军官和一组游击队员接应，然后艰难地向西班牙阵地接近。熟悉敌人前哨基地位置的向导担心完不成这个艰巨任务，他们说那地方插翅难飞，如果被俘，准会被乱刀砍成肉泥。那位古巴军官抽出大刀，威逼着胆战心惊的向导们带路。太阳刚下山，为了防止碰上西班牙巡逻兵，大家从沼泽地前进，有时陷入齐腰深的泥潭。到了干燥地段后，他们到一位可靠的农民家投宿，农民说，西班牙部队正在采取军事行动。

五更时分布卢同这些古巴人又上路了，有时走大路，有时取小道。似乎到处都有敌人的部队，为了保证安全，他们走得特别慢。最后，那位古巴军官爬上一个小山顶，招呼布卢也爬上去。布卢调节好望远镜，静卧在阳光下的塞韦拉的舰队历历在目。经过清点，所有的船一条不少。布卢立即回去报告了情况。几小时后，运载沙夫特的第三中队的运输舰迅速驶离坦帕湾。

陆上与海上的血战即将打响了，但对情报机构来说，它们

的工作已经完成。陆军情报部和海军情报部都已获得最主要的情报。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的确打得很漂亮。战争结束后，许多部门的工作受到严厉批评，但情报机构的声望却大大提高。然而，这次辉煌胜利最重要的结果没有很快表现出来，那就是对高级军官拉尔夫·范德曼产生的影响。在后来20年中，他成为美国情报界的主要人物。

10. 未获殊荣的先驱

拉尔夫·范德曼身材瘦长，脸上布满皱纹，样子很像亚伯拉罕·林肯。他那饱经风霜的脸显得苍老，但眉宇间却时刻闪烁着火一般的热情。在近25年时间里，他为情报工作奔走、呐喊，同官方的冷漠、偏见与拖沓作斗争，建立了一个情报收集与分析的高效系统。范德曼是公认的现代美国军事情报的创始人——也是国内侦查工作的创始人，这种工作有时侵犯了人民的自由权，违背了宪法中保护人民的有关条款。

“最必要和最基本的情报——没有它战争计划就无法制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按常规产生的，”一次范德曼说，“必须主动去寻找、发现和证明。”

范德曼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有与大多数军人不同的经历。他1865年出生于俄亥俄州，毕业于哈佛大学，学了1年法学后转学医学。他当过一段时间军医，然后从事野战勤务。由于比相同职务的人更有经验、更成熟，美西战争前夕，他投身于情报工作，被派到陆军情报部测绘处。战争爆发后其他从事情报工作的军官陆续调往作战部队，而他却

仍然留在华盛顿负责白宫的绘制战争地图的工作，令他十分懊丧。战争结束后，他被派往美国在远东的基地菲律宾。他为未能参加美西战争而感到前途渺茫，失望时曾想离开部队。

不久，范德曼的运气来了。1901年他晋升为上尉，受到驻菲律宾司令阿瑟·麦克阿瑟将军的注意。与其他军官不同的是，麦克阿瑟有"情报意识"，充分发挥了范德曼的特长。麦克阿瑟把他从一个边远小岛调到马尼拉，指示他建立驻菲律宾美国陆军情报处。该处与他在华盛顿时工作过的单位差不多，尽管它们之间没有联系。

美国陆军对占领菲律宾毫无准备。当一位指挥官索要有关菲律宾群岛的资料时，陆军情报部只好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复制了一篇文章送去。像半个世纪后在越南的情况一样，美军的占领使它陷入反暴的冲突，曾经为谋求独立同西班牙作战的菲律宾游击队反对美国人的接管。

范德曼领导的情报处采取积极办法对付菲律宾人策划的种种阴谋诡计，从情报搜集到反情报活动，所使用的现代化手段令人吃惊。与华盛顿的陆军情报部不同的是，它雇用的间谍除1人是美国人外，其余都是菲律宾人。他们还挫败了反抗者们企图袭击马尼拉、刺杀麦克阿瑟将军及其参谋人员的阴谋。

美国人最担心的是菲律宾人可能获得外国、特别是日本的支援。当时日本已在远东磨拳擦掌、跃跃欲试。大量迹象表明，日本对菲律宾很感兴趣。一次，日本人告诉美国，如果美国人不想单独管理这个群岛，他们乐意助一臂之力。范德曼注意到，1895年菲律宾游击队的领导集团被西班牙人摧垮、所有成员都逃往香港，而其中一个叫"鲁滨逊"的人却选择了日本。据了解，鲁滨逊在日本军事情报机构有熟人，

未经证实的报告说，日本曾支持过反抗者。在海军准将马修·佩里访日后的半个世纪中，美日关系友好，但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美日关系迅速恶化。许多美国人为日本的胜利而欢呼，当日本人打败俄国人接近筋疲力尽时，罗斯福总统出面帮忙解决问题。但是，由于在谈判桌上没有达到所有目的，日本人谴责美国阻挠了他们雄心勃勃的计划。此外，席卷加利福尼亚的反日浪潮也加剧了两国间的紧张关系。

一天，范德曼看到一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军官威风凛凛地坐在麦克阿瑟将军办公室旁的接待室里。经过询问，才知来人是日本陆军武官田中上尉。这真是咄咄怪事，因为陆军武官通常是派往大使馆或公使馆的，而马尼拉只设领事馆。田中请求批准他到各岛旅行。经进一步查问，范德曼注意到，他想去观光的地方都在发生战斗。3天后，田中接到答复，申请未能获准，因为行将离开菲律宾的美军司令无暇安排此事。事后了解到，此人隶属于日本总参谋部，肩负着搜集情报的使命。

事隔不久，范德曼的一位密探发现，另一名日本军官化装成造船公司的代理商到达马尼拉，经调查，他在菲律宾外围地区推销的船型明显不适合当地人的需要。当向他暗示，不希望他久留后，他很快消失了。

几年后，日本反情报系统对范德曼转守为攻。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后，美国和其它几个国家在北京和天津驻军保护它们的侨民。范德曼奉命勘测通往海港的公路和铁路，绘制成图以便外国人被迫撤离时使用。他身穿便服，住在天津郊区一家小客店。一天，他从野外回去，突然日本邮政局长来访，来人交给他一封寄往美国领事馆由他收的信。范德曼疑惑不解，此人为何亲自送这封信？

“我知道上尉已经旅行3周了，我想你一定很想一回来就收到信，”这位日本官员态度和蔼地说，“所以我把信送来了。”

他怎么知道“上尉”住在这个地方呢？

“你有日本厨师，”邮政局长会意地一笑。

在范德曼从事这些冒险活动的同时，美国陆军正经历着美军史上一次大改组。由于美西战争动员时出现了混乱，人们再次要求按照埃默里·厄普顿20年前的主张进行改革。1903年，在罗斯福总统和陆军部长伊莱休·鲁特的领导下，改革派战胜了保守派，说服国会批准建立一个规模有限的总参谋部。这个新机构由参谋长领导，负责制订国防计划和战时动员。鲁特认识到情报工作必须集中领导才能有效，于是把陆军情报部编为新成立的总参谋部的二部，通常用G-2表示。为了结束陆军情报部和海军情报部之间的竞争，同时作出了共享情报和资料的安排。驻菲律宾的陆军情报处并入华盛顿的总参谋部二部，范德曼奉命回国领导测绘处。

这一改组同罗斯福总统认为美国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应该与其财富和实力一致的观点完全吻合。由于渴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罗斯福特别注意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动向。在总统的支持下，陆军情报部开始在拉丁美洲秘密搜集情报，类似10年前在加拿大和古巴进行的秘密侦察活动。

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几名陆军军官被派往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派往危地马拉使团的约瑟夫·史迪威中尉。史迪威是西点军校的语言教师，他去危地马拉的公开目的是进修西班牙语，然而陆军情报部给他的指示表明了他的真正任务：“望不要携带可能暴露你身份或表明你是政府间谍的任何材料。”史迪威将使用化名，把所有情报寄

往一个秘密通信地点。有关人员警告这位中尉，如果他被抓住，陆军部将否认知道他的使命。在他临行前，有人再次向他提出令人心寒的告诫："如果被发现，那将大大有损于你的军人的体面。"

罗斯福为日本日益威胁着菲律宾的安全而深感忧虑，他指示陆军情报部每月仍向他综合报告一次日本在世界各地的活动情况。范德曼奉命负责这项工作。海军情报部不断报告华盛顿，日本正加紧战争准备，其中提到日本在英国购买了一艘2.1万吨级的战列舰。1907年春末，范德曼在白宫出席了有总统的陆、海军顾问参加的会议。罗斯福透露，日本正在准备反对美国的敌对行动，也许在巴拿马运河完工前会生战事。他说，美国的全部战舰必须立即从大西洋调往太平洋。

"总统先生，你真以为日本敢于攻击美国的西海岸吗?"一位官员激动地站起来问道。"嘿，总统先生，太平洋东岸的妇女用扫帚柄就能把日本人赶下海。"

"噢，坐下，坐下，"罗斯福一下被激怒了。

总统转向与会者中职务最高的一位将军，问舰队何时绕过合恩角进入太平洋，对方回答将在3周后出航。实际上，这项行动直至6个月后才开始，并且改为白色大舰队环球航行。罗斯福把这次意义重大的航行视为他的政府最辉煌的成就，但是在范德曼看来，这代表着另一种胜利——在制订战略计划中使用了情报。他知道，陆军情报部的情报在派遣该舰队的决策中发挥了作用。

说也奇怪，当陆军情报部对政府上层产生重大影响的时候，它在部门之间的竞争中却越来越不能保持其独立性。多年来，陆军情报部同位于华盛顿中心区的总参谋部第三部或称G-3的陆军学院建立了密切关系。1907年夏，陆军学院

移至首都郊区华盛顿兵营的一幢新大楼，不久，陆军学院院长向参谋长富兰克林·贝尔将军抱怨，说这样一来就不能随时得到情报部的资料了，建议情报部也迁到同一大楼。可是正当情报部准备搬迁时，有人告诉贝尔将军，两个完全不同的单位同在一幢楼不妥，情报部应该撤销，其人员和工作并入陆军学院。

对陆军情报部不利的是，贝尔将军不仅原则上对陆军情报工作怀有强烈偏见，而且对范德曼本人也很看不惯。几年前在菲律宾任宪兵主任期间，贝尔就同当时的情报处长范德曼为属于“鲁滨逊”的一些文件发生过冲突——“鲁滨逊”被怀疑是混入菲律宾革命政务会的日本间谍——在这次冲突中范德曼获胜，为此贝尔耿耿于怀，决不放过范德曼。他很快接受了陆军学院院长的意见，1908年6月24日，这位参谋长下令撤销陆军情报部，陆军学院重新改为二部。结果，正当从墨西哥边境到欧洲，国际紧张形势日益加剧，需要加强情报工作时，美国陆军却失去为实现各种实际目标收集和分析情报的机构。

1915年某个时候，日本巡洋舰“浅间”号在加利福尼亚的特特尔湾搁浅。日本军舰日益频繁地出现在该水域，这表明日本对墨西哥越来越感兴趣，前不久，日本海军司令访问墨西哥城时就谈到要加强两国关系，因此，如果说经验丰富的日本水手是因航行故障而误入该水域，那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人们怀疑这个事件是否真是事故。后来情报军官悉尼·马什伯声称，从“浅间”号上登陆的几连日本军人在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南部进行了秘密演习。

当时在亚利桑那国民警卫队任上尉的马什伯说，1916年，

他曾根据驻墨西哥边境美军司令弗雷德里克·芬斯顿将军的指示，检查日军在该地区活动的传闻是否属实，此前已有两名军官作过尝试，但均未证实从当地印第安人那里得到的这一消息，也许在沙漠地区有丰富经验的马什伯可以弄个水落石出。他带着这个任务出发了，临别前芬斯顿的叮嘱还在耳边回响："记住，如果他们抓住你，可不要说受我们派遣的。"

印第安人侦察员告诉马什伯，每隔约一个月，就有近50名"中国人"经过该地区。马什伯知道，虽然日本人很能走路，但是如果没有供水保证，他们不可能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墨西哥沙漠。他推测，他们已经向北进入有充足水源的亚利桑那。他沿着自认为他们走过的路前进，在路边石壁上发现了用木炭写的日文字，他想这些字是为后来的人指路用的。

马什伯把这些字认真模仿下来，同时搜集了有同样字的纸片和印刷物，一并寄往华盛顿。然而，他收到的答复是："这些材料没有军事意义。"有关人员完全没有领会这是日本人活动的证据。试想一想，如果有事实证明美军在日本列岛外围探测其边沿地区，日本人会有什么反应？未能领会在该地区发现日语材料的重要性，这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美国在墨西哥情报工作的无能。

1910年墨西哥爆发的革命把年迈的独裁者波菲利奥·狄亚斯撵出了总统府，后来一个叫维托利阿诺·卫塔的铁腕人物用武力夺取了政权。伍德罗·威尔逊总统采取了合乎道德的立场，决心"在墨西哥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正义政府"，拒绝承认"恶劣得难以形容"的卫塔。美国海军派出1个中队前往墨西哥的加勒比海岸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约10亿美元的投资，1914年4月9日，几名赤手空拳的水手在坦皮科被墨西哥人逮捕。虽然他们很快获释，但海军少将哈里·梅奥要求

道歉，并向美国国旗鸣放21响礼炮。卫塔答应随时可以道歉，但不愿鸣放礼炮，除非美国人也向墨西哥国旗同样鸣放礼炮——梅奥拒绝作出这样的保证。

形势迅速恶化。美方获悉，德国已给卫塔送去包括200挺机枪在内的一船军火，这些武器将在维拉克鲁斯卸船。华盛顿立即警惕起来，美国越来越担心德国干涉西半球；德国企图在南加利福尼亚建立海军基地，在委内瑞拉的阴谋活动已延续多年。根据威尔逊的命令，1个旅的海军陆战队4月20日在维拉克鲁斯附近登陆，准备占领海关、扣押军火船。登陆中遇到顽强抵抗，交火中126名墨西哥人和19名美国人丧生。

芬斯顿将军领导的美军占领了维拉克鲁斯及其周围地区，但是谁也说不清他们将在那里干什么。由于陆军情报部撤销了，有关墨西哥的情报大部分是67年前在墨西哥战争中获得的。芬斯顿几乎不了解墨西哥的兵力，也不知到内地后使用什么交通工具。为了弄清这些情况，美国人只好借助昔时使用的笨办法：派遣毫无情报工作经验的大胆军官去实地侦察。

总参谋长伦纳德·伍德将军的心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尉被作为"特别情报员"派往墨西哥，并获准独立活动。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军官四处寻找自己需要的情报，发现从维拉克鲁斯出来的铁路上有许多车厢，但没有火车头，决定深入腹地寻找。他同一位墨西哥工程师，乘坐手推车到了农村，除了找到几个火车头外，他声称在返回美军阵地途中打死了几个墨西哥人。这次行动几乎一无所获，只是提高了麦克阿瑟的声誉。

最后，维拉克鲁斯事件成为徒劳无益的努力。威尔逊接受了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关于调停争端的要求，决定撤军。美

国海军没有权利扣押德国军火船，只好放行，让它去另一港口卸货。不久，维拉克鲁斯登陆事件渐渐为人淡忘，因为欧洲陷入了历史上空前残酷的战争。

1914年夏天，当协约国和同盟国剑拔弩张、摆好战争架势时，威尔逊总统号召美国人民"在思想上、行动上要严守中立"。这种呼吁是徒劳的，多数归化的美国公民支持原籍国家，几乎没有人假装中立。在全球性冲突中，不管怎样，中立只是一种幻想。双方都企图通过海上封锁，迫使对方弹尽粮绝后束手就范。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美国成为协约国各种物资的主要供应国以后，美国几乎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战争。英国和法国从美国购买战争物资，使美国脱离了经济萧条，同时美国的金融机构也为协约国的胜利大量投资。由于人们对德国昔日觊觎西半球的野心记忆犹新，有关德国在墨西哥的阴谋活动不断见诸报端，加上协约国的大肆宣传，这一切都帮助形成反对德国的舆论。

1915年5月7日，英国丘纳德航运公司的邮船"鲁西塔尼亚"号被鱼雷击沉，在丧命的1198人中，128名是美国人。此事使反德情绪更加明朗化。德国人辩解说，"鲁西塔尼亚"号位于战争区域，并且运载着军需品，但这也无法开脱他们的罪责。德国政府同意赔款，同时为了避免进一步激怒美国，命令潜艇不要攻击大型远洋班船。然而，击沉"鲁西塔尼亚"号使包括威尔逊总统在内的许多美国人相信有必要加强国防。在公开场合，美国继续保持中立，但实际上支持协约国。

幸运的是，正当美国有意加强国防时，已经晋升为少校的范德曼从部队调到总参谋部。看到陆军学院的现状后范德曼十分吃惊。情报工作被束之高阁，陆军武官和驻欧部队观

察员送回的报告堆在昏暗的角落无人问津，正在墨西哥南部搜索游击队领导人弗朗西斯哥·维亚的约翰·珀欣将军报回的情报也遭相同厄运，实际上美国陆军的整个情报机构形同虚设。作为陆军学院熟悉情报工作的唯一军官，范德曼在建立新系统、阅读、处理最新情报的同时，重点整理现有资料，从中找出有价值的东西。后来他承认，虽然成果不大，但至少是个开端。

范德曼相信，美国参战势在必然，认为重振陆军情报机构比任何时候都紧迫，华盛顿断断续续派出的零星观察员不能代替连续的积极情报系统。1916年3月，他冒着被革职的危险，向参谋长休·斯科特将军呈送了一份报告，直截了当地阐明军事情报在美国陆军中的重要地位，指出现有情报活动“毫无用处”，提出了具体改革方案。也许范德曼的这个报告堪称美国军事情报史上最重要的文件。

官方对范德曼的报告毫无反应，只是在陆军学院院长约瑟夫·库恩的帮助下和政府内外朋友们的合作下，他秘密建立了一个非正式的情报网络，以便战争爆发时这一基本机构能投入工作。不过，如果威尔逊总统了解到这一情况，范德曼也许会受到军法审判。

1916年7月30日半夜刚过，纽约市及其周围地区在连续巨大的爆炸声中摇晃，许多窗户被震碎，人们以为发生了地震，迅速冲出屋子，冲天大火和滚滚浓烟从布莱克汤姆上空升起；这个小岛有一条狭窄的小道同贝永附近的泽西海岸相连。该岛是向协约国运送军火的重要转运站，这次爆炸引爆了货车车皮和驳船上满载的炮弹和烈性炸药，幸运的是，只有4人丧生，尽管整个港口设施被夷为平地，事后统计损失

约1.5亿美元。

该站的主人不愿在民众中引起惊慌，声称这次爆炸是自然引起的，但是专家们排除了事故的可能性。不久人们议论纷纷，说装运站是被德国间谍炸毁的，他们划小船去该岛把一枚炸弹投进一条驳船，可是当时一个人也没抓住，大战以后德国政府也否认与此事有牵连，至今仍无足够证据说明这是人为破坏。然而，由于当时范德曼已看到地平线上正在形成的风暴，布莱克汤姆事件引起人们对大西洋西岸秘密战争的警惕，这场秘密战争是由宣传人员、外交人员、密探和破坏分子在不同层次上进行的，其特点是采用阴谋和暴力。

德国在美国的秘密活动名义上由约翰·冯·伯恩斯托尔夫领导，但他为激怒美国人的那些手法而大伤脑筋，因为他比柏林任何人都清楚，尽管德国打了胜仗，但美国参战将打破平衡，对同盟国不利。精明的冯·伯恩斯托尔夫在待人接物中使用魅力和坦率，女人喜欢他的殷勤，男人羡慕他打牌和玩高尔夫球的娴熟技巧。多年来他养成一种习惯，假装耐心听别人讲话而自已却沉默寡言，人们觉得他外交工作成功的秘密在于不怕厌烦。

然而，实际上，德国在美国的秘密活动由陆军武官弗兰茨·冯·巴本上尉、海军武官卡尔·博埃德上校和商务参赞海因里希·阿尔贝特博士指挥。他们直接向柏林报告，当他们捅了漏子，再由冯·伯恩斯托尔夫做令人难堪的解释工作。衣冠楚楚的冯·巴本雇用有爱国热情的德裔美国人、不满的爱尔兰人、东印度民族主义分子充当间谍，企图炸毁码头、运河、铁路桥梁和其它目标，但均告失败。博埃德给打算回到祖国的德裔后备役军人提供假证明，并向大英帝国的骚乱地区偷运军火。阿尔贝特则收买人员在美国为德国从事宣传和

情报工作。

1915年4月，德国海军军官弗兰茨·冯·林特伦突然到达纽约，破坏了上述默契的分工。他带去柏林要求阻止美国军火运往欧洲的命令。林特伦年轻时曾在美国生活，有许多熟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冯·巴本和博埃德对他那副“我要取代你们”的架势十分不满，假装对他破坏船运、炸毁仓库和工厂的庞大计划惊叹不已，实际上同他貌合神离。

冯·林特伦使用“吉本斯”的化名开了一家进出口公司，给一个叫全国工人和平委员会的政治组织提供了50万美元巨资，煽动码头工人和军火工人罢工或怠工。实际上，这笔钱大部分被华尔街一个骗子骗去。冯·林特伦还在被扣押的一条德国班船的机房内建立了一个炸弹工厂，一种炸弹是靠轮船螺旋桨的转动而触发的，另一种炸弹外形像煤块。这些炸弹准备由反英的爱尔兰裔码头工人偷偷放进运往协约国的货物中。然而，对冯·林特伦的破坏活动至今仍争论不休，他自己声称炸沉或炸坏了若干条船，但一些观察家怀疑他的活动有什么综合价值。

冯·林特伦的触角也伸到墨西哥。他想，如果美国在南部边境遇到困难，它的注意力就不能集中于欧洲。因此，他阴谋使1910年革命后夺取政权、后来被流放的强硬人物维托利阿诺·卫塔重新上台。到达纽约不久后的一天，他在麦迪逊大街一家旅馆面晤了这位墨西哥将军。正当他俩密谋时，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套间两侧已住上英国特工局雇用的几名美籍捷克人，他们交谈的内容已被窃听。

这伙人中的为首分子是伊曼纽尔·沃斯卡，化名“维克托”。由于从事社会主义活动，这位波希米亚民族主义分子被

奥匈当局驱逐出捷克斯洛伐克。移居美国后，他获得了成功，利用手中财富进一步推动捷克的独立事业。战争爆发时，沃斯卡主动向英国人提出他领导的“波希米亚同盟”愿为推翻奥匈帝国助一臂之力。该组织约有80名精干成员，是协约国在美国反谍报的中坚力量。

战争爆发不久，当时称作秘密情报局的英国情报机构在纽约建立了办事处。该处打着军火部采购委员会的幌子活动，1915年由威廉·怀斯曼爵士领导。32岁的怀斯曼上尉曾在纽约库恩-洛布银行工作过，后在弗兰德参加了特工局。他的助手有曾经在纽约《世界》刊物当过编辑的诺曼·恩韦茨上尉和英国海军武官盖伊·冈特上校，他们的任务包括防止破坏活动，监视为德国人服务的爱尔兰人和印第安人中的捣乱分子。

沃斯卡和他组织中的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打入了同盟国的使团与机构。冯·伯恩斯托尔夫的贴身女仆就是沃斯卡的一名间谍，奥地利使馆的一名主要职员也是他的间谍。他的两个人打入了汉堡—美国船运公司办事处，另有一人在德国大使馆当司机，一人在长岛塞维尔无线电站当报务员，负责德国电报通讯。每天邮递员把写给德国办事处和商务机构的信件送到第86号东大街沃斯卡的总部，经影印复制后送出去。沃斯卡的间谍在工厂、铁路、码头、船运办事处到处活动，使为德国服务的爱尔兰人不敢抬头。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说，沃斯卡是“协约国在美国最有用的间谍”。

沃斯卡把他的间谍搜集的材料传送给怀斯曼和他的同事，由他们再报告威尔逊总统的机要顾问爱德华·豪斯上校。美国人看到这些情报非常震惊——这是第一次获得的德国阴谋活动与破坏美国中立的可靠证据。英国人也向普罗维登斯

的《每月新闻》公布情况。总统接到报告甚感吃惊，指示财政部长威廉·麦卡杜——特工局由财政部管辖——监视德国和奥地利外交人员，在监视过程中，特工人员发现了冯·林特伦的破坏活动。

1915年7月6日，到达纽约4个月后，冯·林特伦收到德国海军一份密码电报，因为他的活动已经暴露而召他回国。实际上，该电报可能是皇家海军密码破译绝密机构“40室”发出的，该室负责破译德国海军的通讯信息，能够轻易伪造给林特伦的命令以便不让他继续活动。就这样，冯·林特伦用化名搞到一份伪造的瑞士护照，乘坐荷兰班船回国，当船停靠南安普顿时，他因伪装被识破而被捕。美国参战后，他被引渡到美国，被判犯有破坏罪，关进亚特兰大联邦监狱。他遇到困难时总要责备冯·巴本是个“又蠢又笨的密谋者”；冯·巴本反过来说他是个“缺乏创见的低能儿”，也许两人的话都有道理。

冯·巴本在美国也呆不下去了。冯·林特伦离开后不久的一天，在百老汇南部监视汉堡—美国航运公司办事处的特工员弗兰克·伯克忽然发现德国商务专员海因里希·阿贝特博士手提鼓鼓囊囊的公文包，登上6路火车离开了闹市区，伯克紧追不舍。夏日的闷热使这位德国人昏昏欲睡，当火车在第15号大街停下，车门打开时，他突然醒来，忘了拿包便匆匆下了车。伯克迅速从座位上拿起包，悄悄下了车，气急败坏的阿贝特发现后拼命追赶。伯克把狂暴的阿贝特甩在后边，爬上一辆有轨电车跑了。

政府向纽约《世界报》透露，阿贝特包中装的东西反映了德国在美国的全部宣传活动，虽无任何触犯法律的内容，但这位“丢包专员”的文件不久帮助美国人获得新的发现。沃

斯卡的间谍向英国人透露，一位名叫詹姆斯·阿奇博尔德的信使于8月的最后一周乘"鹿特丹"号船去欧洲，结果被拘留了，从他行李中查出的大量材料转交给了美国人。

阿奇博尔德的文件中包括一份来自奥地利大使的在美籍匈牙利军火工人中煽动罢工的报告；给宣传人员和破坏分子支付报酬的支票存根；冯·巴本和博埃德关于他们从事破坏活动的情况报告；还有冯·巴本给妻子的一封信，其中谈到他对"愚蠢的美国佬"的蔑视。威尔逊总统勃然大怒，要求奥地利召回这位大使，并迅速驱逐冯·巴本和博埃德。

这件事的主要结果没有公开。阿贝特事发不久，"鲁西塔尼亚"号邮船被击沉，加上人们日益害怕间谍和破坏活动，政府意识到有必要监视德国人在美国境内的活动。

1898年特工局粉碎蒙特利尔间谍网以后产生了外交纠纷，为了防止重蹈覆辙，总统把监视德国间谍活动的任务交给国务院。国务卿兰辛把国内情报管理工作委托给顾问弗兰克·波尔克。波尔克的工作不是领导间谍，而是防止谍报系统的各个单位——特工局、陆军情报部、海军情报部、司法部刚成立的调查局——互相碰撞。他的工作表明了一个重大变化，它标志着文职人员而不是军人对情报工作控制的开端。

波尔克曾就读于格罗顿大学和耶鲁大学，是坚定的亲英分子。他是那些即将控制美国情报机构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中的典型，刚跨进神秘的情报界时，他像得到新玩具的孩子那样高兴。然而，他完全知道，单凭他在纽约搞过一点政治改革的经历是不足以管理情报工作的，因此他找人帮忙。一天，波尔克突然请求英国大使塞西尔·斯普林·赖斯公爵帮助他同英国特工局美国事务处负责人联系，大使听了先是一愣，接

着马上镇定下来，告诉他根本没有这样的人。

不久，波尔克接待了威廉·怀斯特爵士的来访。他们几周前在长岛乡间别墅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因此波尔克以为来人只是礼节性拜访。

“大使告诉我你想会见英国特工局负责人，”温文有礼的怀斯特在舒适的椅子上坐下后说。“好吧，如果说有这么一个人，那就是我。”

“太好了！”波尔克惊叫起来。

这样，在美国正式参战1年多时间前，英国特工局与美国情报机构协调员开始了非正式联系。通过波尔克，英国在对付可疑的颠覆分子中得到美国的支持。例如，沃斯卡的间谍网追捕一批从德国人手中获得资金购买武器的印度民族主义分子，英国人束手无策，怀斯曼把这一情况转告了纽约市警察局局长、波尔克在政治改革中的同盟者阿瑟·伍兹，这些印度人被立即捉拿归案。

英国人能够在侦破战争期间最著名的一起间谍案中同美国人有效地合作。1917年，“40室”截获了德国外交部长阿瑟·齐默尔曼给德国驻墨西哥大使的密码电报，内容令人吃惊：

> 我们打算2月1日开始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尽管如此，我们将尽力使美国保持中立，如果达不到目的，我们将以下列条件为基础同墨西哥结盟：一起参战，一起实现和平，提供大量财政援助，同时我们希望墨西哥重新征服在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失去的领土。

英国人希望这颗炸弹能迫使美国人改变坐山观虎斗的立

场而投入战争，便通过某种渠道把这一电报送给了波尔克。威尔逊总统对德国的这种口是心非的欺骗十分生气，下令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新闻界。全国仇恨的烈火顿时燃烧起来，就这样，臭名昭著的齐默尔曼电报帮助美国1917年4月6日对德宣战铺平了道路。

为了保护英国情报机关同华盛顿之间的秘密联系，该电报的来源没有对外透露，国务卿兰辛以国家安全为由不让新闻界追根寻源。他向新闻界暗示，一位大胆的美国间谍在德国或墨西哥获得这份材料，继续查询该电报的来源也许会给该间谍的生命带来危险。这种搪塞之词后来累见不鲜。

拉尔夫·范德曼抓住国会对德宣战的机会，说服斯科特将军重建陆军情报机构，可是这位参谋长说，如果美国陆军需要情报，可以向英国和法国索取，“我们没有理由不向他们伸手，我们可以说，‘嘿，我们现在在帮你们忙，如果你们把获取的情报全部提供给我们，我们很高兴’。”几个星期后，范德曼再次为建立情报部呼吁，但同样遭到断然拒绝。当他第三次提出建议时，恼怒的斯科特将军说范德曼令人讨厌，禁止他直接向陆军部长牛顿·贝克呼吁，并说这是命令。

根据民间传说，不久范德曼奉命陪同当时一位重要小说家格特鲁德·阿瑟顿参观军营，阿瑟顿应陆军部长贝克的要求正在准备撰写有关军队生活的文章。当他们参观华盛顿附近的军事设施时，这位小说家提到他有一位朋友在英国军事情报部门，人们推测，当时范德曼可能痛苦地回答，美国陆军从1908年以来一直没有军事情报机构，并且参谋长禁止他向陆军部长反映这个问题。阿瑟顿大吃一惊，当天亲自向贝克面陈此事。1917年5月3日，陆军部长下令在陆军学院建立

新的陆军情报部，范德曼晋升为中校，并领导该部工作。

阿瑟顿帮助周旋的故事十分生动，但这个故事很可能是范德曼编造出来的，以掩盖美国陆军情报机构对英国的依赖。像波尔克一样，范德曼要求英国秘密情报局帮忙。美国参战后，英国立即派驻华盛顿使馆的情报军官克劳德·丹西中校帮助他。虽然范德曼在他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丹西，但在1920年他请求授予丹西功勋章的建议中也许披露了实际情况：

> 他不仅在组织计划方面给我们极大帮助，提出宝贵意见，更重要更有价值的是，他努力劝说陆军部长和参谋长加强军事情报工作，并且也许他比任何人都积极使陆军部听到极力要求加强情报工作的总参谋部军官们的呼声。

在后来异常激动的几星期中，丹西给范德曼提供了英国情报机构总部与分部的组织与活动的详细情况。不久，他俩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丹西在范德曼办公室安排了一张办公桌，他向大家作报告，与大家探讨情报工作的各种方法，特别强调情报工作集中统一的必要性。

范德曼建立的机构受到丹西的很大影响，主要分3个处：管理处，担负情报收集的大部分传统功能；情报处，负责“秘密工作”，包括谍报或叫积极情报和反情报或叫消极情报；审查处，与政府其它机构合作，审查电报通信和邮件。

在范德曼的有力领导下，陆军情报部日益发展。创建之初只有2名军官、3名文职人员的骨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已经拥有282名军官、29名军士和近千名文职人员，

大多数人在华盛顿市中心一幢改装过的公寓大楼办公：每次值班只有6人是正规军军官，其余都是经范德曼选定的文职人员。陆军情报部对建立美国驻欧远征军中的情报机构没有发言权，该机构由丹尼斯·诺兰上校领导，隶属于约翰·潘兴将军参谋部，但陆军情报部负责训练情报军官。

与旧军队的许多老兵不同的是，范德曼容易接受新思想。国务院一位年轻的密码员赫伯特·亚德利建议，美国陆军应该有类似欧洲军队的破译机构，范德曼立即接受了这条意见，任命亚德利为中尉，指派他组建8处，即陆军情报部密码处。建立该处的必要性很快显示出来了。据丹西报告，德国人前1年在墨西哥获得一本陆军部的电码，结果发往潘兴将军的每一份电报柏林都能破译。亚德利立即接到编制安全密码的任务，编制了一本敌人无法破译的电码。这些工作标志着战后长期存在的“黑屋”的开始。

1889年亚德利出生在印第安纳州一个中等家庭。中学毕业后，他学习法律，渴望成为一名律师，结果却于1912年在国务院当上一名年薪为900美元的密码员。亚德利爱好密码术，空闲时喜欢在密码室破译国务院的绝密电码。他发现这件事惊人地容易，他告诉上司，只需几个小时，他就能读懂威尔逊总统同他的亲密顾问豪斯上校之间的专用通讯内容。

亚德利领导的密码处来了一批穿上军服显得别扭的人，多数是数学家和语言专家，他们对密码学知之甚少，但具有掌握和运用密码学原理的能力，芝加哥大学乔叟研究权威约翰·曼利上尉更是才华横溢、出类拔萃。在亚德利领导下，密码处迅速扩大业务范围。在截获了德国的一封速记信后，他们立即成立了速记科，能够识别30多种用不同方法速记的材

料。一次从一名间谍嫌疑分子鞋后跟中发现了一张白纸，他们便建立了密写墨水检测科。他们还在墨西哥边境地区建立了流动无线电截击站，监视德国在墨西哥建立秘密电台的企图。驻墨西哥城电报局的一位间谍还窃取了德国的外交电文。

密码处还提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被判处死刑的唯一德国间谍的罪证。该间谍叫洛塔尔·维茨克，是年轻的海军预备役军官。1916年他所乘的船为防止被英国人俘获而凿沉，后来他去了美国，由于他参与了德国人搞的破坏活动，有人怀疑布莱克汤姆港口是他炸毁的，因此他逃往墨西哥。

美国宣战以后，维茨克从俄国驻维拉克鲁斯领事那里获得一本护照，回到美国从事破坏活动。他声称曾投放炸弹炸毁梅尔岛海军造船厂，炸死5人。更庞大的计划包括破坏坦皮科的油田，在南方黑人中煽动暴乱，煽动激进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在亚利桑那铜矿罢工。

维茨克吸收了住在墨西哥的几名外国人参加其阴谋活动，包括美国黑人威廉·格利夫斯、奥地利外科医生保罗·阿尔滕多夫。1918年2月1日，他从亚利桑那的诺加利斯进入美国，刚越过边境，等候的陆军情报部密探就将其逮捕。审讯中，维茨克声称是俄国记者，拒不说出从他身上搜出的一张纸上十个字母一组的那些符号表示什么意思。

于是，这份密码转交给了亚德利和曼利，此案完全取决于他们是否能成功地破译这封信，否则就没有足够证据判处他死刑。经过3昼夜连续作战，他们破译了这份密码。密码开头写着“绝密！”，内容是德国驻墨西哥公使给他的领事们的密信：“持信者是使用俄国人的名字帕布洛·韦伯斯基旅行的帝国国民。他是德国密探，请应其要求给予保护和帮助，同时

应其要求预付1000墨西哥比索的黄金，他的密码电报均按领事馆正式文件发至本馆。”军事法庭很快宣判维茨克犯了间谍罪，判处绞刑。但是判决尚未执行战争就结束了，威尔逊总统将其改为在莱文沃斯终身监禁。

1917年11月，陆军情报部参与处理了一起更令人兴奋的案子。英国情报机关通知华盛顿，一个德国间谍已离开马德里去纽约，将把携带的1万美元交给该市某人。当联邦密探根据获得的两个人的名字查找时，两人都不在，便将他们的住处监视起来。不久，联邦间谍截获了寄给他们的信，立即交给密码处的密写墨水检测科，冲洗后没发现什么内容。继尔邮差又送来一信，奇怪的是该信信封上写的是一个男人名字，但内容却是给一个女人的。这次使用了一种新型药剂冲洗这种超保密的德国隐显墨水，化验员高兴地报告说，在信的空行之间发现了依稀可见的德文字。经进一步查验发现，该收信人深深陷入旨在破坏船只和军火工厂的阴谋活动中。

调查人员根据信封找到发信人地址，那是位于西城区的一家小旅店，经盘查，一条挪威船上的服务员惊恐不已，承认信是自己寄的，至于信上写的什么，他不知道，一位熟人开船前在奥斯陆给他两封信，叫他到美国后寄走，一封是写给一个女人的,另一封给一个男人。那他为何将两封信装错了？那位服务员窘迫地回答那肯定是在他给信重写信封时出的差错；他把原信藏在鞋中带到美国，结果信搞脏了。问他那女人是谁？她住在哪里？服务员给调查人员一个地址，那是纽约德国人集中居住的约克维尔。

密探们终于在住宅区找到那个上了年纪的寡妇。哦，对，她收到过一些神秘的信。不，她已销毁那些信，无法回忆起

信上的内容，她只记得一个名字：维多利卡。陆军情报部立即抓住蛛丝马迹，问伦敦和巴黎是否熟悉这个名字。英国人马上回电说，自1914年来，他们一直在设法抓获一个搜集政治情报的德国女谍维多利卡；也许现在她已扩大了活动范围。不久，华盛顿又接到通知，同他们追查目标相仿的一位女人1917年初通过护照检查后去了纽约。

这位名叫玛丽亚·维多利卡的德国女谍相貌达到好莱坞演员标准。她是一位德国将军的女儿，白肤金发，婀娜多姿，受过良好教育，精通数门外语。在来美国前，她曾受德国海军情报机构派遣，先后去俄国和南非，并在南非嫁给一个也从事间谍工作的名叫维多利卡的智利人。

听说维多利卡可能在纽约市，密探们奉命检查每一家豪华旅馆、饭店和公寓，寻找一位有倾城倾国之美，年约35岁的白肤金发女郎。第一条线索是在尼克博克饭店找到的，但是她已付帐离开。接着又在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找到线索，她也预付了数月租金后不知去向。在其它几家饭店也发现了这一令人迷惑的现象，然后线索断了。

不久伦敦提供的新线索使此案有可能查个水落石出：一份截获的汇款电报表明她同纽约一家银行有联系。银行官员证实已将35000美元转到她的名下。密探根据她给银行留下的临时地址去找，发现她人不在，但有几封她收的信，便立即送往化验室检验。

这些信表明维多利卡参加了各种阴谋活动，包括破坏活动，使用潜艇向墨西哥运送武器。她同在美国活动的一些极端危险的破坏分子有联系。另外，她还以从苏黎世进口神像为名，诱骗不会令人怀疑的牧师帮助填写必要的证明，其实这些神像中塞满了破坏分子需要的新型烈性炸药。

那么维多利卡到哪里去了呢？调查人员严密监视那些信中提到的每一个人，几个星期后终于有了突破。一位密探发现，被监视人中的一位上中学的表妹每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去第五号大街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当然这位姑娘每星期去教堂祈祷并不奇怪，但为何在同一时间去呢？她有某种任务吗？

1918年4月6日，黎明的曙光渐渐消去，密探看到这位姑娘随着悠扬的钟声进了教堂，手里抓着一份叠着的报纸。她像往常一样来到平时去的那张靠背长凳旁，跪下祈祷了片刻起身离去。那位密探正想走开，突然发现她把报纸留在原处，他顿生疑窦，向那张长凳走去，但是一位也拿着报纸的绅士模样的长者已经占了那个位置，作了短暂祈祷后便拿着姑娘的报纸走了，密探谨慎地保持距离跟踪这位绅士。此人乘坐出租车去了宾夕法尼亚火车站，然后搭上去长岛的火车。在长滩下车后，又叫了一辆出租车，驶向海滨豪华的拿骚饭店。密探仍然跟踪追击。

这位绅士在休息室坐了约1小时，惬意地抽着雪茄烟，懒洋洋地望着周围的客人，突然起身向门口走去，密探正要跟上去，却发现此人把那份报纸留在一张桌上。正当不知怎么办时，一位打扮入时的金发女郎——显然是该饭店的一位客人——占用了那个刚刚空下的位置。她把自己带来的几份报刊放在留有报纸的那张桌上，抓起一本杂志翻阅了约一刻钟，然后收拾起所有报纸，慢慢穿过门厅，走进一部电梯。

就这样，联邦密探找到了玛丽亚·维多利卡，立即将她逮捕。审讯时，尽管她狡猾地避免正面回答问题，但在她房间搜出的密写工具和其它间谍活动器材证实了她的身份。那份报纸是怎么回事呢？里面包着德国驻墨西哥公使给她的

20000美元，作为她领导的间谍网的活动经费。维多利卡被联邦大陪审团指控在战时从事间谍活动，但没有受到审判。由于多年紧张劳累，她精神崩溃了。此外，像许多间谍一样，她染上吸毒的恶习，美丽的容貌枯萎了，1920年，她死于贝尔维尤医院的囚徒病房。由于一位高度警惕的密探顺藤摸瓜和密码处密写墨水检测科精湛的破案技艺，她才落得这样的下场。

这些成就仅仅是国内秘密工作的一部分。那些有关德国间谍破坏和颠覆的真真假假的报告，加上政府和敏感的新闻媒介推波助澜，在美国形成了一股恐间谍浪潮，一个巨大的阴谋集团在活动的谣言风靡全国，搞得人心惶惶，草木皆兵，仿佛每个角落都有间谍，任何“敌国”侨民都可能被怀疑为间谍。海军部副部长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曾建议，海军情报部监视新罕布什尔州朴茨茅斯海军制船厂附近的美籍德国人云集的社区，据说他们可能购买飞机轰炸那里的设施。

为了根除间谍，治安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其中最活跃的一个是芝加哥一位商人在司法部鼓励下建立的超级爱国组织护美联合会。美国宣战数星期后，该会在全国已有100多个分部，据说最后达到35万会员。会员们宣誓，一旦发现任何变节行为、工厂动乱或其它有碍战争的事情立即报告，即使批评美国政策，也会马上引起怀疑。由于到处都有护美联合会的成员，人们在发表看法时必须十分谨慎。护美联合会同保守的商业利益相联系，认为工会，特别是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是激进宣传的危险来源。和平主义组织、社会主义组织和世界产业工人联盟这样的工人组织被渗透和窃听，和平集会被驱散，公民集会和罢工的权利被剥夺了。

范德曼上校也为国内安全忧心忡忡，他告诉当时陆军部长的特别助理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我们大多数人认为，德国间谍和德国宣传与这里发生的严重干扰战争的许多事件密切相关。”为了同军队内部的颠覆活动作斗争，陆军情报部建立了一个“无声哨兵”系统，专门揭发军人和文职人员的可疑活动。范德曼还为敏感的政府部门、港口和工厂建立了安全系统，建立了有颠覆嫌疑人的档案。

从理论上说，这些措施更有助于陆军情报部发现在美国活动的潜在敌人，但是不久范德曼却遇到美国职业情报人员后来长期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在保卫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家时，情报人员必须经常使用妨碍这些自由的手段；维护国家安全和对人民采取间谍手段之间的界限一旦突破，那就很难说不严重违犯法律。除了陆军情报部、特工局、司法部和海军情报部都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下有过极端行为，为了打击国内敌对势力而制订的战时法律本来就含糊不清，执行中又有很大偏颇，实际被曲解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重叠的情报机构和激烈的竞争加剧了这种混乱。为了使自己领导下的情报机构成为中心，范德曼避开司法部和特工局，与护美联合会及其反间积极分子建立了同盟。使用护美联合会反间积极分子的理由之一是陆军情报部的调查员行动时只能穿制服，这会引起可疑分子的警惕。为了进一步加强合作，陆军情报部在纽约、芝加哥、费城、南方和远西部都设立了办事处。

陆军情报部使用护美联合会的反间人员进行忠诚考查、调查护照申请者的背景、审核移民的条件、加强军事基地附近烈酒和犯罪活动的控制，但是这些义务反间人员的主要工作是监视社区邻居，寻找叛国的任何迹象。尽管他们获取的

部分情况也许有点滴价值，但多数只不过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护美联合会依仗陆军情报部撑腰，胆大妄为，恣意扩大工作范围，对外国侨民、反战主义者、有激进分子和颠覆分子嫌疑的人发动了凌厉的攻势。

一些反间分子走得太远，他们携带武器，配戴“特工局”的标记，指挥大规模的搜捕，未经正式批准就随意抓人。一次，他们把近5万人集中在一起寻找“懒汉和逃避服兵役者”，在美国历史上，开创了镇压无辜公民的先例。

不久，公众对这些行为的抗议像雪片一样飞向华盛顿，范德曼铤而走险，对内使用间谍手段，终于使他丢了官。财政部、司法部的对手们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强烈声讨护美联合会中他的支持者的暴行。陆军部长贝克对大规模的镇压运动十分震惊，下令陆军情报部的业余侦探停止活动。1918年6月，范德曼被撤销了陆军情报部部长职务，调往海外工作。在他被撵走后不久，陆军情报部重新组建，成为总参谋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继任者被任命为准将。

11. 情报工作的低谷时期

1919年6月2日黄昏时分，海军部副部长富兰克林·罗斯福与妻子埃莉诺在离家约一个街区的华盛顿使馆区附近停车时，突然一声轰响，对面大街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的住宅正面被炸得粉碎。罗斯福赶紧回家看孩子是否安全，发现自家台阶上有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碎片。显然，企图杀害帕尔默的恐怖分子自己被炸死了，此人是战后反对所谓激进

分子和鼓动家运动的领导人。

1919年夏天，恐怖和暴力活动在美国蔓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通货膨胀、失业、工人闹事、少数民族骚乱、强烈反对美国参加国际联盟，以及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浪潮即著名的“赤色恐慌”。激进主义与恐怖主义一样肆无忌惮，新闻媒介和那些企图刺探出颠覆分子来证明自己价值的政府密探把美国出现的丑恶现象归罪于外国人，千方百计煽动愤怒情绪，仅在几星期前，就有36位著名的美国人，包括帕尔默、摩根、洛克菲勒和最高法院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收到炸弹邮件，其中一个邮件爆炸后炸伤了一位前参议员的妻子及其女仆。

帕尔默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辉格党成员，作为革新主义者步入政坛，他想利用“赤色恐慌”实现取代伍德罗·威尔逊入主白宫的野心。他抓住战时间谍热，鼓吹危险来自激进分子、外侨和布尔什维克。在他家被炸之后，这位司法部长得到国会50万元拨款，建立一个反激进的总情报处，隶属于司法部调查局，雄心勃勃的青年埃德加·胡佛被任命为该处处长，主要任务是清除非美主义。

反对赤色威胁的斗争很快成为司法部的主要工作，经费和人力不断增加。超级爱国主义的护美联合会重新活动，陆军情报部的间谍打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和美国犹太人代表会议。曾经在国会图书馆编过索引的胡佛，建立了20万张卡片的档案，搜集每个激进组织和出版物的详细情况。到1919年年底，索引资料中收集了6万名被认为是危险的颠覆分子的姓名和个人简历。

由于现有情报机构工作不力，才会出现“赤色恐慌”，但陆军和海军情报机构中也有帕尔默的合作者，只要这两个情

报机构保持战争期间扩大的编制和经费，那它们将继续是行动机构而不是储存过时资料、地图和照片的仓库。

为了不让帕尔默和胡佛超过自己，范德曼的继任者、陆军情报部部长马尔伯勒·邱吉尔将军设法搞到50万美元调查激进分子的经费，并请求陆军部训练对付激进反叛组织的军官。邱吉尔担心赤色威胁成为“永久性问题”，制订了“白色战争计划”以迎接即将来临的革命挑战。海军情报部长艾伯特·尼布拉克将军警告说，埃玛·戈德曼、亚历山大·伯克曼和“其他几位无政府主义者”领导了一起恐怖阴谋，他把耸人听闻的事情统统挖出来，声称参与这场恐怖活动的有俄国人、俄裔犹太人、墨西哥土匪、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中的颠覆分子和名叫加藤贺元的日本间谍头子。“这场恐怖在我国将是史无前例的，这个阴谋的领导人已经到达大西洋海岸，”尼布拉克说。

胡佛和邱吉尔极不协调地合作着。陆军情报部从资料中寻找证据说明反对帕尔默活动的批评家同激进组织有联系或在战争中全力支持过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他们反复比较索引卡片内容，重新汇编档案资料，纠缠评论家发表看法，千方百计搜集证据。1919年10月，派密探打入加里钢铁厂的罢工工人队伍，次年又派密探打入比尤特铜矿罢工工人队伍。当他们激起暴力行动后，便以罢工者是危险的革命者为由实施戒严，可疑的激进分子被拖到陆军情报部审讯，有的被投进监狱，还有的受到威胁说，如不上班，就要驱逐出境。

一次，邱吉尔直言不讳地承认，各种情报机构中的混乱导致动用联邦军队镇压罢工。“照理说，地方的调查机构，如司法部和财政部的特工局应该调查必须弄清的一切问题并转告我们，”他说“而实际上，现在他们在无法克服的困难中工作，这

些困难可能使形势更加复杂，使地方当局与军队当局之间不可能有正常关系。”

所谓的帕尔默大搜捕使“赤色恐慌”达到顶峰。胡佛指示他的密探们于1920年1月2日晚在全国33个城市召集可疑组织开会，然后联邦特务突然袭击，冲进会场拘留与会者，不发逮捕证就抓了许多人。不少家庭被隔离，对被拘留的人不起诉，也不准他们请律师。在底特律，约800人被关在一所废弃的联邦大楼整整6天。在纽瓦克，有一个人仅仅因为“看上去像激进分子”就被逮捕了，另一人在停下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时被抓起来。这天夜里，全国一共逮捕了4000多名有激进分子嫌疑的人和外侨，包括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领导人。

民众被这次突然大搜捕搞懵了，一时间帕尔默被欢呼为共和国的救星。华盛顿《邮报》声明：“不要浪费时间去指责这是侵犯自由。”但是这股狂潮来得突然去得迅速。被捕的大多数人因缺乏证据而获释，屈指可数的有劣迹的外侨被驱逐出境。不久，治安人员的极端行为激起公愤，人们渐渐认识到，尽管在浓烟后边有一点火星，但是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军队和地方的情报机构名誉扫地。1921年帕尔默离职，成为人们的笑柄，门肯说他是“公众生活中最令人讨厌的江湖骗子”。

拉尔夫·范德曼饶有兴味地注视着这一切。他被免去陆军情报部长职务后，一直在潘兴将军的参谋部工作。战争结束后，他成为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反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巴黎沉浸在狂欢之中，每家大饭店都悬挂着某个国家代表团的旗帜——美国人在克里莱饭店下榻——宽阔的大道上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控诉者和哀求者。投机家们叫卖石油矿和宝石矿开采权，冒充国家首脑的人比比皆是，出卖情报的

俄国大公成群结队，密探、歹徒、妓女、狂热分子带着各自的目的猖狂活动。在这种色彩斑斓的混乱中，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企图刺杀法国总理乔治·克莱蒙梭，提醒了人们对安全工作的重视。

和平谈判的序幕一拉开，间谍活动也随之开始，每个国家都想摸清其它国家的意图，整个会议像一场大规模的扑克游戏，情报机构躲在幕后出谋划策。对范德曼来说，这出戏最有趣的一幕是他有机会重新结识克劳德·丹西。这位英国情报官曾于1917年帮助他建立陆军情报部，可这时在巴黎却成为范德曼的对手。当他们共进午餐时，美国陆军情报部的赫伯特·亚德利正在破译英国代表团的电报，而英国人也在截获美国人的信息，他们一定为此暗觉好笑。

范德曼努力使陆军情报部永远存在，与英国情报机构共商战后继续合作的问题。此外，他提出美国将仿效英国做法，在敏感地区的领事馆派驻护照管理官员，以此掩护身份从事间谍活动。展望未来，范德曼建议，新建立的国际联盟应该创立一个国际情报机构，但当权者们对此反应冷淡。“没有这样的机构，很难想象国际联盟怎样能发挥作用，肯定最终会建立这个机构，”他写信告诉邱吉尔将军。

这时范德曼的注意力转向一个新目标——布尔什维克主义——他生命后期一直盯住这个目标。像大多数军官一样，他对激进主义恨之入骨；当了解到整个欧洲发生革命后，他的这种态度更加强烈。“意大利，特别是意大利北部随时会发生爆炸；奥匈实际已土崩瓦解；比利时似乎政权旁落；法国和波兰岌岌可危；荷兰与瑞典千疮百孔；俄国的形势不说自明，”他告诉邱吉尔。“因此，综观全局，我们虽然刚刚脱离深渊，但似乎我们将经历更加危险的时期才能走向世界文明。”

为了监视这些令人惊恐的变化，范德曼要求授权选派情报军官去美国救济署，该署由赫伯特·胡佛领导，正在东欧工作。虽未获正式批准，但他的人还是渗入其中。年轻的外交官威廉·蒲立德被威尔逊总统派往俄国调查那里的形势，回国后建议协约国停止旨在推翻布尔什维克的干涉活动，范德曼大为不满。“像你主张的这种和平难道不是给苏维埃政权助威而无视世界其它各国利益吗？”他质问道。两人互相通了一封信后，范德曼视蒲立德为“危险分子”，暗中对他监视。

煽动驻扎在莱茵地区的美军造反的传单特别令范德曼心神不安。经追查，这些传单源自美国一名主要的激进分子罗伯特·迈纳。迈纳在德国被捕，但没有足够证据定他的罪，范德曼请求担任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同时又是陆军情报部密探的玛格丽特·哈里森帮忙。

哈里森是巴尔的摩上流社会的年轻妇女，丈夫死后穷途潦倒，经朋友帮忙，她在《太阳报》当上社会新闻助理编辑，接着搞音乐和戏剧评论，最后成为综合新闻记者。由于她精通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停战以后她被派驻国外。经弗兰克·肯特总编辑的同意，她兼任了陆军情报部的间谍。在巴黎，她帮助范德曼监视采访巴黎和会的记者团。无疑因为她有过情报工作经历，在1919年的革命大动荡中她是第一个到达柏林的美国记者。

为了获得指控迈纳的证据，哈里森装成一家社会主义报纸的记者，劝说迈纳的一名印刷工告诉她是谁印刷了那些煽动性传单，那位印刷工说传单印好后是送给迈纳的。然而迈纳没有受到审判，因为威尔逊总统的顾问豪斯上校和一位朋友推翻了指控。最后这个插曲对迈纳倒没有什么，而哈里森却付出了巨大代价。

事隔不久，哈里森作为陆军情报部间谍和《太阳报》兼美联社记者去俄国。她去得正是时候。自1917年3月革命以来，协约国在俄国的情报工作十分活跃，起初企图支持亲协约国的临时政府，后来企图破坏11月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

当哈里森1919年从波兰偷偷进入俄国边境时，俄国正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边缘，反革命白匪遍布农村，协约国的经济封锁加剧了这种混乱，有人怀疑共产主义政权能否长久维持。哈里森虽无签证，并且外国记者常常遭到怀疑，但她获准留在苏联的新首都莫斯科。她到处活动，会见了一些政府要人，包括托洛茨基。在她写的报刊文章和给陆军情报部的秘密报告中——由离开苏联的外交官偷偷带出去——她客观地阐述了俄国国内的情况，包括她认为苏维埃不会被推翻的观点；她还在军事情报中提到派往美国的俄国间谍名字。

到达俄国几个月后，哈里森被苏联秘密警察契卡逮捕。令她吃惊的是，契卡一直知道她同美国情报机关有联系。当她申辩自己无罪时，审讯者们向她出示了刊载于《陆军和海军》杂志上谈及她参与迈纳一案调查的一篇文章，以及显然来自陆军情报部档案的她写的一份报告的复制品。她清楚地知道对间谍的判决是死刑。

然而，契卡给了她活命的机会，如果她愿意提供有关其它国家的情报，可以允许她继续从事记者工作。哈里森走投无路，只好同意了。“那时我告别了使我真正存在的一切，”后来她回忆说。“那一切已经结束，我似乎觉得自己死了，重新诞生在一个可怕的世界里。”她暗自下决心只提供部分的、使人误解的情报，以便她不坐班房，能搜集更多的情报。

哈里森获准继续自由活动数月，在此期间，她的情报工作获得一次重大成功。原来，俄国人请了一位美国专家详细

估价苏联的工业能力，由于他的评价报告过分悲观而没有被采纳，这位美国人也因掌握重要情报而不能离开苏联，他料想自己随时可能被捕，偷偷把报告复制本给了哈里森，她又说服一位拉脱维亚外交信使把报告装进邮袋带出苏联，最后平安交给了美国驻里加陆军武官。

哈里森知道不会让她无限期地自由活动下去，不久的一天半夜她终于听到了敲门声，契卡再次捆着她押往监狱。尽管美国政府和她所在的新闻机构设法使她出狱，但这次她仍被监禁了1年多。各方都否定她是间谍，最后她因俄国人希望得到美国食品缓解全国性大饥荒而获释。

哈里森一回到华盛顿，邱吉尔将军便向她了解情况，并说她给陆军情报部提供的“有关俄国的情报比任何其他间谍都要多”。这位情报部长还告诉她，当时连累她有罪的那份文件也许是由一个同情共产主义的预备役军官提供给俄国人的。那《陆军和海军》杂志文章是怎么落入俄国人手中的呢？邱吉尔摇摇头，表示无法解释。

除了若干突出的人与事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情报工作处于萎缩和衰败阶段。从总体上讲，情报界暂时停止了活动，因为孤立主义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安全的目标收缩成两个基本点：保卫美国大陆及其海外殖民地和阻止欧洲干涉西半球事务。“制订国策必须依靠对世界未来的正确预报，”马尔伯勒·邱吉尔说。但是美国政府对他的警告置若罔闻，情报机构也像整个部队一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加裁减。

1921年由于经济萎缩被迫召回了驻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厄瓜多尔、荷兰、匈牙利、瑞典和瑞士的陆军武官。调

查局和特工局都放弃了反情报工作，国务院废除了情报工作。陆军情报部的人员，大战最后1年达到1441人，可是到1921年只剩下90人，而每年预算从250万美元垂直下跌为225000美元。在大萧条时期作了进一步裁减，1937年美国的情报经费不到苏联和日本的百分之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我们获得的国外情报大概同一位武官在吃饭、喝咖啡时了解到的情况差不多。"

军官出身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月，只有富裕得无须为生计操心的军官才想当武官，因为政府经费短缺。"通常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在交际中受欢迎的贵客，但是他们之中知道情报工作要素的人寥寥无几，"他回忆说。情报工作如此没有地位，以致美国军舰上的一些情报军官的主要任务是照看洗衣房。美国驻里加使馆是20年代观察俄国的窗口，虽然苏联称之为"邪恶的谍报中心"，但是，国务院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更了解内情，他挖苦说："美国政府还未达到那种尖端水平。"

范德曼与情报工作的正式联系也割断了，他从欧洲回国后到部队任职，大部分时间在菲律宾度过，共服役38年，1929年退休时是少将。战时陆军情报部的工作只有亚德利的密码破译工作没有砍掉。亚德利不愿回到国务院密码室干枯燥无味的工作，他逢人便讲，如果美国要保持与其它重要国家相同的地位，密码处的工作必须继续下去，"这是美国深入了解其它国家观点和意图的唯一途径。"

亚德利估计这项工作每年约需10万美元经费。国务院提出，只要把海军部排除在外（它拒绝同海军分享机密）它同意从"特费"中拿出40000美元。陆军情报部在答应让国会领导

人分享机密后，从国会硬挖到另外60000美元。然而这里有个意想不到的障碍，国务院的秘密经费在哥伦比亚特区内使用是非法的，因此，亚德利只好把他的工作班子迁到纽约市。

这是美国“黑屋”的发端，它于1919年10月1日在38号大街开始工作，约1年后，又迁到列克星顿大街附近的第37号东大街141号一幢4层褐色沙石楼房办公。狭窄的房间内放满了词典、语言统计资料、剪报档案、地图和破译密码所需要的其它用具。“黑屋”与政府断绝一切公开联系，每人的工资都是秘密领取的，保密极为严格，办公室的锁定期更换，亚德利的名字没有列入电话号码簿。“我们的工作是使用一切可能使用的办法破译外国政府的密码和秘密外交电报，”亚德利曾回忆说。

这个机构的首要任务之一是破译在柏林的一位俄国间谍同他在莫斯科的领导人之间互通的电报。这名间谍负责苏联国外间谍网的部分工作，其中一份电报中提到曾派往美国的间谍古拉尔斯基。这些电报在华盛顿引起轰动，亚德利说：“它们是政府掌握的有关苏联国际活动的第一批可靠文件”。

不久，日本成为“黑屋”的主要目标。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日本是盟国，但两国间不断发生摩擦。日本人认为美国阻碍他们在东亚的合法追求，而美国则担心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同时担心它对国际联盟授予的托管地——太平洋中部与西部的一些小岛——采取下一步计划。更加令人忧虑的是美国、英国、日本战后大力发展海上力量，相互展开激烈竞争，各家以疯狂的速度建造军舰，只要别人继续建造，自己就不甘落后；大家都谈论太平洋战争不可避免。

亚德利接受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任务，立下军令状保证1年内破译，否则便辞职。很快他后悔不该轻率许诺，因为日本语言错综复杂，他的努力几乎失败。国务院交给亚德

利约100份截获的日本密码电报，他同一边工作一边自学日语的语言专家弗雷德里克·利夫西刻苦攻关，但进展十分缓慢。几个月后亚德利有点气绥了。想冲进日本驻纽约领事馆去查阅那里的电码本。他无可奈何地打消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又拿起本子、铅笔工作了。

一个个夜晚，亚德利疲惫不堪地爬上楼梯到4楼宿舍去，倒下便睡着了，但过不了几小时，一个好主意又使他醒来——每次总是陷进死胡同。以下是他自己的回忆：

> 到现在为止，我对这些密码电报已琢磨好久了，每份电报，每行字，甚至每个密码符号，都深深印在脑子里。我能够躺在床上，在黑暗中搞研究。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如此不断反复。一天半夜我醒了，黑暗中我突然悟出密码词Airuando肯定与[爱尔兰]相同，接着其它词迅速闪进脑海：dokuritsu[独立]，Doitsu[德国]，owari[停止]。谜底终于揭开了！我的心顿时停止了跳动，我不敢动一动。我是在做梦吗？我醒着吗？我疯了吗？问题解决了吗？经过好几个月的努力，总算解决了！

亚德利急于赶去工作，几乎从楼梯上滚下来，他用颤抖的手转动储藏档案的保险柜的锁，迅速研究起文件来。1小时后，他相信终于摸到了门道。他喜出望外地回到楼上，喊醒妻子一同去一家小酒店庆祝成功。虽然亚德利只是刚刚撬开日本密码系统，但这一突破使“黑屋”最后能辨认16种不同的日本外交密码，包括被称为超级绝密的那一种密码。

1921年11月在为了结束军舰竞赛的华盛顿裁军会议上，

“黑屋”取得辉煌的成绩。参加会议的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代表。会议试图通过确定各国之间的吨位比例来限制主力舰——大型战舰——的数量。代表们尽力争取对本国最有利的比例。日本要求与美国、英国的比例为10：10：7。美国海军战略家担心这样的比例会确保日本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因为日本舰队通过在其基地附近活动，可以弥补数量上的劣势。

日本谈判者们不知道，亚德利和他的小组当时正在破译日本政府给他们的电报指示。海军情报部已经发现，尽管日本人表面上好战，但他们还不想得罪美国，因为他们还没有现代化海军大国必须具备的经济和工业基础。1921年11月28日“黑屋”破译的一份电报证实了海军情报部的看法。东京外务省指示日本代表团，如果原先的意见遭到坚决反对，那就采取 10：10：6 的比例。美国谈判者们掌握了这一重要情报后，坚持要降低吨位比例，结果日本人只好让步。为此亚德利荣获优秀服役奖章。

“黑屋”在其存在的近10年中破译了包括英国、法国、苏联和日本在内的20个国家的55000多份密电。为了对破译材料来源保密，“黑屋”报送给国务院和陆军部的材料采用了“新闻简报”形式，文章之首语气含糊地写道“我们从据信可靠的来源了解到……，”然后是稍加改变的截获电文内容。大多数截获的电报是从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和邮政电报公司的高级官员那里秘密获得的。

接着一切都结束了。1929年，新当选的总统赫伯特·胡佛喋喋不休念起道德经，亚德利对此不无忧虑，相信胡佛不会容忍“黑屋”的存在。果然不出他所料，当国务卿亨利·斯廷森了解到亚德利的工作后，表示完全不能同意，命令国务院

立即停止拨给“黑屋”经费。他认为破译别国的外交文电是肮脏的活动，破坏了他在私人交往与制订外交政策中一贯遵循的互相信任原则，有人认为他曾说“君子不互相偷拆信件”。

1929年10月31日，“黑屋”彻底关闭了，亚德利和他手下的人各领了3个月工资的解职费便自谋生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指出：“这一良好姿态将受到那些试图在政府间建立与个人之间相同道德的所有人的欢迎。”然而实际上，君子继续互相偷拆信件，曾经给“黑屋”提供了百分之六十经费的陆军情报部只是改换了手段而已，亚德利曾经从事的工作转交给了新成立的绝密通信情报局，隶属于陆军通信兵。该局局长威廉·弗里德曼曾经是植物遗传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在陆军工作，是位卓越的密码学专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年，海军情报机构一直觉得日本可能正秘密使从夏威夷到菲律宾一线的加罗林、马绍尔、玛丽安娜珊瑚群岛军事化。一旦美日交战，这些岛上的海军基地和简易机场将有重大战略意义。海军情报部不断收到日本加紧军事准备的传闻，但无法辨别真伪，因为日本人对外封锁了这些岛屿，当局强迫不必要的来访者迅速离开。

1920年美国派出一个考察队去寻找约70年前佩里准将率团访日期间不幸遇难的美国水手墓地，海军情报部随团安插了情报军官。日本人没有受骗，他们很客气地批准在冲绳岛已知墓地举行纪念仪式，但是拒绝考察团到其它岛屿寻找坟墓。在这种情况下，海军情报部决定派遣间谍去发现这些托管岛屿上的秘密，这一决定产生了美国谍报史上一个最奇妙的故事。

1922年夏末，驻东京海军副武官埃利斯·扎卡赖亚斯新少

校对刚刚抵达横滨的一位美国商人的活动发生兴趣。这位嗜酒如命的来访者似乎没有客户，终日泡在下九流的酒馆和艺妓馆。每当酒后失态时，他声称自己是美国密探，使命是"查明托管岛屿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扎卡赖亚斯怀疑此人受到日方反情报人员的监视。

不久，"商人"病倒了，被送进横滨的美国海军医院，经查他患了肾病。他自称是海军陆战队的厄尔·埃利斯中校，是到日本度假的。在后来几星期中，埃利斯不断出入于医院。1922年9月，他因酒精中毒引起严重震颤性谵妄症送进医院。当他气息奄奄时，由药剂师劳伦斯·曾布奇照料他。海军武官莱曼·科顿上校认为埃利斯病情严重，不能继续留在日本，便让他选择立即乘商船回国或等待乘政府的运输船回国。可是埃利斯偷偷溜出医院不见了。

也许此事难以令人置信，实际上埃利斯在执行情报任务。他是海军陆战队一名重要战略家，1900年从堪萨斯一所中学毕业后便入伍，1年后任命为少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埃利斯在海军陆战队司令约翰·勒琼将军手下工作。当时海军陆战队正在寻找新的任务，1921年埃利斯提出，一旦太平洋战争爆发，便夺取日本占领的岛屿上的基地，并拿出了作战方案。尽管1915年英军在加利波利登陆时惨遭失败，战略家们相信，任何攻击敌方海岸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埃利斯的作战计划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功的越岛作战提供了模式。

埃利斯并不满足于提出未来战役的战略，他想弄清日本人在托管岛屿上干些什么，主动要求前往侦察。勒琼将军尽管担心他的身体，但还是批准了他的要求。虽然埃利斯是个出类拔萃的参谋，但他长期患有心理疾病，并因"神经衰弱"

而周期性地住院。他还极爱喝酒，但酒精中毒在当时一般不认为是严重问题，再说他有亲如兄弟的其他军官们保护。显然不久他将被迫退休，也许他认为到那些托管岛屿上执行任务是考验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

埃利斯从横滨海军医院失踪几个月后，东京海军部召见科顿上校，告诉他那位失踪者在托管的加罗林群岛科罗岛被发现，并将不久于人世。科顿要求立即将埃利斯送回日本，获得日方同意。科顿认为日方肯定隐瞒了一些情况，他告诉扎卡赖亚斯说埃利斯可能不会"活着回到这里"。不久，他们便接到通知说埃利斯死了，尸体已经火化，骨灰可以按照他们的要求处理。

科顿上校想揭开埃利斯亡故之谜，同时了解托管岛屿的内幕，便派曾为死者搞过护理工作的劳伦斯·曾布奇去科罗岛取回骨灰和能够找到的任何文件，并指示他注意日本人在该岛建立的工事和海、空军基地的情况。几个星期过去了，科顿和扎卡赖亚斯焦急不安地等待着，终于盼到这位药剂师回来的那一天，他们到码头去接，可是船靠岸后却不见他的踪影。他们上船找到曾布奇的舱位，吃惊地发现他蓬头垢面、神情恍惚地蜷缩在床铺上，手上捧着一只日本式样的白色骨灰缸。

曾布奇被送进海军医院，医生们怀疑他被注射了毒药，经过治疗，不见好转，1923年9月10日他在地震中丧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埃利斯—曾布奇事件在情报界成为传奇故事。美国情报军官认为，日本人为了防止他们揭露托管岛屿上的秘密而把他们除掉了，其实现在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埃利斯似乎是自然死亡，曾布奇也许是接受任务后的巨大压力造成精神崩溃而死。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岛屿被占领时，人们发现在20年代日本人一直企图掩盖他们的弱点而不是掩盖他们的实力。没有任何防御工事是1935年前建造的；多数于1941年后建造。

埃利斯事件发生后，海军情报机关继续进行对日秘密战，只是把战场从太平洋转移到美国。这场战争中的武器是偷盗、欺骗和窃听，一切都避开或超越法律限制。海军情报部说服费城一家银行准许其间谍了解被怀疑将废旧物品卖给日本人的一位商人的帐目，负责监视一位据说派来窃取海军航空兵机密的日本间谍的其他特工员偷走了一位来美国访问的日本军官行李中的文件，同时错偷了一位美国大学教授的行李。

海军情报部还截获日本的无线电通讯，在世界各地建立了潜听站。1927年，埃利斯·扎卡赖亚斯在舰队演习期间，偷听日本海军的无线电通讯，并在中国上海设立了侦听站。最后，无线电截获网络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西岸。

海军情报部的主要目标是日本驻美领事馆和商务机构。1929年9月连续5个晚上，由纽约市地区情报主任格伦·豪厄尔中校领导的一个小组袭击了日本机器检查处的若干办公室。他们撬开保险箱，把密码本和提到日本飞机和武器重要情报的秘密文件拍下照片。豪厄尔在日记中写道："此事妙就妙在他们丝毫没有觉察我们搞到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们仍在使用老密码。当然，我们随时都能获取有关他们计划的第一手情报。"对设在曼哈顿的日本帝国铁路办事处也作了类似的突然搜查。

豪厄尔不仅洗劫了日本人的办事处，而且对反战的联邦基督教协进会和共产党的办公机构也采取了同样行动。这次行动以调查共产党有瓦解海军士兵嫌疑为由，疯狂破坏公共

财产、抢劫销毁档案、洗劫办公室、砸坏保险箱。"我们还偷走支票本、银行帐簿，制造了许多麻烦，"豪厄尔得意洋洋地说。

在大萧条的冲击下，胡佛总统大幅度削减政府财政支出，武装力量也被迫裁减人员、暂停使用船只并减少活动。但是海军情报部为了胡佛的利益继续进行活动。作为满口仁义道德的辉格党成员，胡佛一般是不会采用豪厄尔那些随心所欲的方法的，但是由于遭到人身攻击和政治压力，他受到这些方法的诱惑。1930年他听说民主党政客奥布赖恩收集了对他人身攻击的大量炮弹，一旦透露出来，他会名誉扫地。于是，胡佛把自己通常的道德观念抛到九霄云外，决心把这些材料搞到手。

总统请前私人秘书路易斯·斯特劳斯帮忙。斯特劳斯这时是华尔街库恩-洛布银行威廉·怀斯曼爵士的伙伴，也是与海军情报部关系密切的海军后备役军人，他又选择豪厄尔完成这个任务。"斯特劳斯告诉我总统渴望知道那些神秘文件的内容，"1930年5月豪厄尔秘密会见这位银行家后写道。然而不久，甚至劲头十足的豪厄尔也犹豫起来了。此前他的秘密活动是针对美国的潜在敌人的；而这项工程却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当然，我愿完成这件棘手的事，但弄不好到头来我可能会惹得一身臊，"豪厄尔说。

40多年后水门事件的预演就这样开始了。豪厄尔与助手、前纽约市巡警罗伯特·彼得金监视起奥布赖恩的办公室来，一天半夜突然闯进去。令他们吃惊的是，室内一无所有。懊恼的密探们又跟踪奥布赖恩。不久，他们开始意识到，一旦被发现，可能使参与此事的人名誉扫地。"我终于认识到美国任何总统都不必害怕像奥布赖恩这样的无名之辈，"豪厄尔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斯特劳斯。1930年6月30日，这项计划取

消了。

在此期间，陆军情报部像海军情报部一样不景气，特别是在处理“补偿金大军”问题上。政府曾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老兵许诺1945年发给补偿金，但是由于1932年经济危机加剧，成千上万的无业老兵，即所谓的“补偿金大军”，涌向华盛顿，要求国会批准立即发给补偿金。许多人担心这场运动的背后有激进分子，陆军情报部给各军发了一份密报：“赴华盛顿要求领取补偿金的请愿者来自或路经各军驻地时，希望用密码简要电告陆军部共产主义分子的参与情况——如果有的话——以及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领导人姓名。”

陆军部收到的大部分报告都很实在。第9军未能发现俄勒冈的请愿队伍什么时候离开波特兰，尽管此事报纸已作报道；而对于加利福尼亚请愿者及其领导人罗亚尔·罗伯逊的政治观点作了精确汇报，提到没有出现共产主义分子，并说罗伯逊“坚决认为不能容忍共产主义分子”。但在毗邻的第8军，妄想狂占了上风。得克萨斯州萨姆休士顿要塞的情报军官相信加利福尼亚人是危险的赤色分子，并且认为米高梅电影公司资助他们向华盛顿长途跋涉请愿。为了保证上司理解这一情报的意义，詹姆斯·托顿上校进一步说：“众所周知，米高梅电影公司的主要人物都是犹太人，而且该公司的高级官员都跻身政坛。数月前盛传苏联间谍与加利福尼亚的电影公司有联系，为了在电影中插入对苏联政策的宣传，给其中一些公司捐过款。”

其它报告提到请愿者带着机关枪。费城的一位情报军官声称，芝加哥一位当铺老板出售假子弹，每颗50美分。另一军官报告，“补偿金大军”的领导人沃尔特·沃特有“纽约和华盛顿枪炮工人的支持……只要‘补偿金大军’在华盛顿淌下第

一滴血，那将成为各大城市共产主义暴动的信号。”

那年夏天在华盛顿确实发生了流血事件。当立即发放补偿金的议案在国会否决后，请愿大军开始散去，多数人同意免费乘火车回家，可是仍有数千人不肯离开。他们没有地方栖身，大部分人住在国会大厦南边安纳卡斯蒂亚大楼底层的小房间或帐篷里。华盛顿当局忧心忡忡，白宫大门全部锁起来，附近街道作了清场。7月28日，军队奉命驱散在宾夕法尼亚街南端宿营地的人。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少校协助下，亲自指挥了这次行动。

当这支约800人的军队——骑兵由乔治·巴顿少校指挥，步兵都上了刺刀，另有几辆轻型坦克——接近闹事区域时，他们受到老兵和数千旁观者的欢呼。突然暴力冲突发生了。骑兵挥舞着军刀冲进人群，步兵猛掷催泪弹。男人、妇女和儿童被踩伤、被烟呛，老兵和旁观者纷纷离去。军队冲过一座桥来到安纳卡斯蒂亚大楼，放火烧掉帐篷，国会大厦周围通宵火光冲天，“补偿金大军”向四面八方撤走了。

“补偿金大军”被镇压几个月后，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掌握了政权。随着希特勒的崛起，他的盟国意大利和日本侵略野心也不断膨胀。纳粹分子抵制凡尔赛条约，实施大规模重新武装计划。一心想征服中国的日本宣布，它不再受1921年华盛顿海军条约的限制，而意大利不顾国际联盟的反对入侵埃塞俄比亚，新的世界大战迫在眉睫。

在美国，间谍活动日益猖獗。间谍打入飞机和军舰制造厂，企图获取试验飞机的绝密资料和其它情报。1936年3月，美国一位前海军军官汤普森因向日本出卖海军机密而被捕，3个月后另一名前海军军官约翰·法恩斯沃斯受到同样的指

控。据传日本与德国建立了谍报联盟，德国军事情报部将向日本间谍不便活动的地区派遣间谍，并且两国将分享谍报成果。报纸披露了日本在巴拿马运河区和墨西哥与加利福尼亚州交界地区进行罪恶活动。1933年美国承认苏联后，俄国人在美国积极开展间谍活动，使用商务和军事代表团搜集情报。同时，苏联海军武官则要求自由参观海军造船厂、军舰、基地和为海军生产设备的民品工厂。

在白宫，罗斯福总统对这些日益扩大的颠覆活动深感震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海军部副部长时，他就对情报工作感兴趣。1936年8月24日，他在椭圆形办公室私下会见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由于胡佛在大萧条年代成功地追捕了约翰·迪林杰和俊小子弗洛伊德等罪大恶极的歹徒，联邦调查局重建了威信，树立了新的形象，胡佛也成了美国民间传说中人们喜爱的人物。这时罗斯福考虑交给胡佛和他的间谍一项新任务。

罗斯福从堆满文件的办公桌上抬起头，挥手叫胡佛在椅子上坐下。总统说："我要叫你办件事，一定要保密。"

罗斯福解释说，他想知道在美国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组织在干些什么。难道无法使他更好地了解这些活动吗？

事后胡佛告诉编写联邦调查局荣誉史的一位朋友，他当时回答，调查局自"赤色恐慌"以来就不搞反情报工作了，他无权去搞这些调查。但他指出，根据现有法律，只要国务卿要求司法部长授权，联邦调查局可以从事这项工作。

罗斯福听了怏怏不快，他不想通过国务院办这件事，因为这容易泄密。最后，总统同意非正式会见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为了确保一切合法，总统打算把此事写一份备忘录存放在私人保险箱内。

次日，胡佛去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总统和国务卿。罗斯福告诉赫尔，他为缺少在美国发生的那些颠覆活动的情报而深感不安，所以他要联邦调查局与陆海军情报机构以及国务院联合调查。

“埃德加答应干这件事，”总统又说，“但此事得由你提出来才合法。”

赫尔鬓发斑白，面孔严峻，仿佛像个圣徒，但他的性情，他说话的语气则像田纳西州慓悍的山里人。

“行，开始调查这些狗杂种吧！”他粗声粗气地说。

12. 内部和外部的敌人

1937年10月初，德国班船“不来梅”号在海鸥的追逐下缓缓驶进诺思河。尼古劳斯·里特尔少校凭栏而立，望着曼哈顿秋雾中隐现的灰白高楼不由地喜上心头。在一定意义上他算是回到了故乡。里特尔曾在美国经营纺织厂长达10年之久，他讲美国英语，有许多美国朋友。他的头开始脱发，套装领带使他显得很稳重，一副普通商人模样。然而，他肩负着邪恶的使命，这位德国军事情报部航空处处长回到美国只为一个目的：窃取诺登公司的轰炸瞄准具，这是美国军工厂最重要的机密。

在人头浮动的码头，海关检查员草率地检查了他的两只破旧衣箱后，对他的雨伞发生了兴趣，雨伞包装在一个木套里，看上去像根拐杖。检查员叫他表演一下如何使用。“简直像间谍用的玩意儿，”检查员咧嘴笑着说，里特尔也跟着笑起来。

在后来几天中，里特尔伪装成德国几家纺织公司的代表住在市中心一家旅馆里。不久，他以“阿尔弗雷德·兰丁”的名义在里弗赛德路一家小旅馆订了房间，并且给“兰丁”寄了几封信，保存在口袋里用作证实自己的身份。最后，他在保管公司租了一个保险柜，把他的德国护照和文件全部寄存起来，这样，尼古劳斯·里特尔就不再存在了。

在到达纽约后的第二个星期天，“兰丁”到位于布鲁克林为其提供消息的亨利·索恩家去，会见了一个叫波尔的人。4个月前，索恩给负责西半球谍报工作的德国军事情报部汉堡办事处寄送了一批材料，那是画着由虚线连接起来的一套正方形和圆形草图，虽然引起注意，但因不解其意而被搁置一边。后来，索恩报告军事情报部那套图是自称为“波尔”的神秘人物提供的，此人在曼哈顿拉斐特街诺登轰炸瞄准具厂工作，他说，如果从德国派一名特使来同他联系，“波尔”乐意提供更多情报。

诺登轰炸瞄准具！大西洋两岸对此装置已有传奇式的评价。这种瞄准具由为美国海军服务的文职人员卡尔·诺登发明，据说能帮助飞机从高空实施准确轰炸。有关人士声称，这种瞄准具精确度甚高，能从25000英尺高度把炸弹投进一个泡菜坛内。德国空军一直希望搞到一个样品，立即派里特尔去美国同“波尔”联系。

“波尔”的真名叫赫尔曼·兰，35岁，是个说话温和的德裔美籍机械师。他是个极为平凡的人，同妻子女儿住在长岛中下层阶级居住的郊区。他似乎只对家庭感兴趣，一心当好诺登工厂生产线检查员。然而他是在美国活动的一名最成功的德国间谍。他为什么要当间谍呢？兰几乎不了解希特勒，没有向里特尔要钱，并声称他侨居美国万事如意。他之所以给

里特尔提供诺登轰炸瞄准具图纸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名爱国的德国人。

兰在诺登的工作之一是每天下班前，从其他检查员手中把轰炸瞄准具的秘密图纸集中起来收进保险箱，可是他却将图纸带回家，妻子女儿熟睡后，他便通宵达旦地在厨房摹制图纸。兰无法搞到一套完整的图纸，但他向里特尔保证，德国工程师完全能够把所缺部分自己补上。

唯一的问题是这些图纸太大了，里特尔或信使无法避开美国海关密探的注意带上"不来梅"号轮。里特尔把图纸裹在伞的周围，装进一个木套盾，请在轮船上当服务员的信使把伞带回德国，但是信使拒绝说，他离船时没有带伞，如果回船时带上一把伞，必须让海关检查，他提出在"不来梅"号启航前再碰一次头，商定下次他离船时带上一把伞，让海关检查一下，然后与里特尔交换伞带上船，这样所换的伞就不用再检查了。

第二天，信使拄着一把阔伞来到里弗赛德路里特尔下榻的旅馆。"今天天气这么好，我离船时胡编了个理由说明为什么带上这鬼伞，"他解释说。"我告诉他们我的脚踝扭了，得拄着这把伞帮助行走。"1937年10月31日，诺登轰炸瞄准具的绝密图纸被悄悄运出了美国。

窃获诺登轰炸瞄准具是希特勒时代德国情报工作最成功的范例。然而，总的说来，德国在美国的谍报工作由于用人不当、计划不周、执行有误、以及平行机构之间的明争暗斗而受到严重妨碍。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事情报工作的神秘人物威廉·卡纳里斯将军领导的德国陆军情报部负责情报搜集、反谍报和破坏活动，但是它受到纳粹党保密局的挑战；

外交部、海军和空军都有各自的情报机构。这些机构互不信任，互相妒忌，工作常常扯皮，争夺重要情报，德国人匆忙建立的全球性情报网络队伍庞大但效率很低。

1939年美国破获了一直在曼哈顿活动的一个纳粹间谍网，这充分证明美国人对德国人广泛从事间谍活动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原来，在苏格兰的邓迪，一位邮递员发现中年女理发师杰西·乔丹收到从美国、法国、荷兰、加拿大、南非来的大量信件，便报告了英国反谍报机构5处，这样，这个女人收的所有信件都要受到邮检。

结果发现，乔丹为德国军事情报部经营着一个秘密情报中转站。虽然信封上写的是她的姓名和地址，但是信中却写的是不来梅的"N·施皮尔曼"，显然此人是德国的一名间谍头子。有几封信上盖着纽约市的邮戳，是一个叫"克朗"的人写的。美国驻伦敦陆军武官接到英国陆军情报局5处的通报后，把这些信的复本电告了华盛顿陆军情报部，陆军情报部无力调查此事，便转给了联邦调查局，因罗斯福总统已授权该局调查此类问题。

"克朗"的信表明纳粹正密谋窃取东海岸防御计划、陆军航空部队的密码和地图，以及美国最新航空母舰"企业号"和"约克敦"号的蓝图。联邦调查局掌握的唯一线索是在"N·施皮尔曼"收的信的末尾用打字机打的名字"克朗"。

这些信交给了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的密探利昂·特罗，特罗几乎算不上典型的联邦调查局密探。他1895年出生于波兰，3个月后沦为孤儿，在进口公司工作的父母的朋友将他收养，带到埃及和中国，接着又去敖德萨、伦敦、柏林，然后移居美国。1915年，他回欧洲参加了沙皇军队，战争结束后，他先在纽约一家反尔布什维克的俄语报社工作，后来参加

了海军陆战队。在1929年参加联邦调查局之前，他当过百货公司侦探和邮局调查员。他还参加过著名的林白被绑遭害专案调查。

特罗从那些信入手构想出“克朗”的外形：这位德国间谍住在纽约，受过一定教育，精通德语和英语，曾在美国陆军当过军官或军士，已婚，至少有一个孩子，经常缺钱用。分析出这些特征后，他便开始搜寻，但是没有找到“克朗”的踪迹。“我们时刻盼望有人来电话报告惊人的突破，”特罗回忆说，“那时为了破案真是绞尽脑汁、伤透脑筋。”

当纽约市侦探抓到一个化装成国务院高级官员、企图盗窃空白护照的嫌疑分子时，特罗获得期待已久的突破。这位自称为冈瑟·古斯塔夫·拉姆里奇的人大叫冤枉，说真正的罪犯是他在市中心一个酒吧遇到的韦斯顿，韦斯顿答应付给他钱，叫他取一个包裹，他只知道这些。警方审讯了3天，拉姆里奇死不改口。警方知道他在撒谎，但不知拿他怎么办，最后把此案转给联邦调查局。

在审查拉姆里奇时，特罗发现，这个嫌疑分子同正在寻找的“克朗”的特征相仿。拉姆里奇1911年出生于芝加哥，父亲曾在奥地利驻美领事馆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被家人带回去，18岁时，他申请加入了美国国籍，回到美国后闲混了一阵子，在大萧条生活极其艰苦的那年参加了陆军。虽然他曾想逃跑，但14个月后他在卫生队晋升为中士。1935年，他在蒙大拿服役时同一个漂亮的农家姑娘结婚。后来，他因贪污基地医院的经费而逃到纽约，在一所语言学校谋到教德语的差事。最后，他的妻子和新生儿在纽约同他团聚。

特罗决定冒险诈他一下，冷不防将几封“克朗”写的信猛地甩在拉姆里奇面前的桌子上，厉声吼道：“别再装糊涂了，

让我撕下你的画皮：你就是那个混蛋间谍'克朗'！"

拉姆里奇听到他的化名，眼睛睁得大大的，从椅子上惊跳起来，接着便瘫成一团泥。他知道戏演完了。"是这样，特罗先生，"他有气无力地说。"让我见一下妻子，安排她回老家，然后我交待。"

冈瑟·拉姆里奇是在纽约公共图书馆萌发充当纳粹间谍念头的。1936年初的一天，他在浏览间谍书籍时看到一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德意志帝国军事情报部长瓦尔特·尼古莱的回忆录，他想，为何不利用自己的军队经历给德国充当间谍发点财呢？他找不到尼古莱的地址，便给柏林纳粹党报写信转交，主动要求报效祖国。拉姆里奇自称是美国陆军军官，希望尼古莱把他的想法转告有关当局，如果需要他服务，那就在《纽约时报》的公共广告栏中登一条给"西奥多·柯纳"的秘密广告。

在后来几周内，拉姆里奇迫不及待地查阅这一栏目，但是没有给他的消息，直到1936年4月6日，"西奥多·柯纳"的名字才出现在会议通知和离婚启事中："信收到了，请将答复寄至德国汉堡1号629信箱桑德斯。"

拉姆里奇立即给"桑德斯"写信，讲出自己的真名，吹嘘自己如何重要，说他渴望为德国服务，虽然不是为了钱，但也要讲报酬。

此广告是德国军事情报部汉堡办事处刊登的。收到拉姆里奇的答复后，在"欧洲"号班船上担任服务员的德国军事情报部信使和该船纳粹头子卡尔·施吕特便同他联系。两人在约克维尔的一家德国咖啡馆碰头，拉姆里奇经面试合格。起初交给他的任务很一般，如讲出驻守在巴拿马运河区的部队番号，因为他曾在那里服役，同样付给他的报酬也不高，一

次仅40美元。但在以后的20个月中，交给他的任务越来越重要。德方给他取了个隐名“克朗”，要他通过苏格兰的那个秘密通信站与“N·施皮尔曼”联系，“施皮尔曼”是德国军事情报部海军处处长埃里克·法伊弗中校的化名。

拉姆里奇发现在美国搞间谍活动易如反掌。当德国人想获得美国陆军的性病资料时，他给汉密尔顿要塞去了3个电话，自称是医疗队“米尔顿少校”，是从华盛顿来给部队作防治性病报告的，可惜忘了带笔记，请秘书把要塞官兵人数和患性病人数统计一下送到布鲁克林某条大街。秘书很快统计好材料，交给一名二等兵，该士兵乘坐出租车到“米尔顿少校”约定的地点。

看到“克朗”不费吹灰之力搞到这个情况，德国军事情报部的胃口更大了，要他获取更为复杂的情报，1937年11月，指示他搞到海岸炮兵连与近海舰队联络的通信密码。他以30美元的代价，从驻长岛米切尔菲尔德的老朋友、二等兵埃里克·格拉泽那里买到这种密码。后来，施吕特告诉拉姆里奇，“施皮尔曼”希望得到空白美国护照以便向俄国派遣间谍，这一行动的特别价格是1000美元。1000美元！从未给他出过如此大的价钱，他决心冒险一试，没料到这下他把德国在美国的间谍活动全给暴露了。

在“欧洲”号下次停泊纽约时，特罗去接船，希望能逮捕施吕特和他的助手、年轻漂亮的美发师约翰娜·霍夫曼，结果施吕特没乘这班船，霍夫曼束手就擒。她吓得魂不附体，当从她行李中搜出一捆密信后，她承认自己是纳粹信使。她为联邦调查局破译了那些信，供出该间谍网中的其他人，包括德国在美国的间谍头子、约克维尔著名的医生伊格内茨·格

里布尔。

身材矮胖、戴着眼镜的格里布尔博士一副委屈的样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德军担任炮兵军官，1925年来到美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希特勒崛起后，他成为在美国的纳粹运动领导人，与德美联盟头子弗里茨·库恩频繁往来。但是格里布尔向特罗指出，他也是个爱国的美国公民；他甚至还是美国陆军预备役军官。当霍夫曼与他对簿公堂，谴责他搞间谍活动时，他口出秽言，说她的指控荒唐无稽。

当特罗在格里布尔办公室搜出与女美发师使用的同一种密码本时，格里布尔才像泄了气的皮球。他的辩解被彻底驳倒，最后承认有罪。在交代纳粹间谍在美国的全部活动时，格里布尔声称几家飞机和军舰制造厂有人向他提供了有关新型飞机和驱逐舰的情报。

被破获的格里布尔间谍网中共有18人被指控充当德国间谍，大多数在德国，无法起诉。令特罗气愤的是，格里布尔这个间谍头子在审讯后受到保释，为了免受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他在保释期间乘坐“不来梅”号逃离了美国。最后实际只有 4 人受到审判：拉姆里奇和埃里克·格拉瑟在联邦监狱监禁 2 年，霍夫曼监禁 4 年，另一名间谍奥托·沃斯监禁 6 年。

对拉姆里奇的审判引起了轰动。许多美国人本来就担心在美国充斥着德国间谍，此案证明他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并提醒人们注意独裁者们对美国日益严重的威胁。同时，此案也间接说明，美国对纳粹的情报活动是何等麻木不仁。利昂·特罗在离开联邦调查局后写的一本书中，竟把德国军事情报部同盖世太保混为一谈。另外，许多被告逃离美国，使人们重提加强各情报机构之间合作这一长期争论的问题。

实际上，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年，贯穿美国

情报史的主线是努力在情报界建立良好秩序。罗斯福总统告诫人们，绥靖与中立不是反对侵略的良策，他下令加强国家的武装力量，特别是海军。但是当战争临近时，人们才遗憾地发现，美国情报机构没有作好全球战争的准备。华盛顿的陆军情报部，包括速记员和秘书在内，一共只有66人，并且陆军武官寥寥无几。海军情报部的情况同样糟糕。"一个真正能从事谍报与反谍报的秘密外交情报机构尚未建立，"海军情报部长沃尔特·安德鲁斯少将作出这样的评价。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情报工作的最大失败之一，是在日本拒绝承认华盛顿海军条约对其限制以后，海军情报部未能发现日本建造两艘新战列舰"大和民族"号与"武藏"号的秘密，让它们于30年代末建成下水。当意大利新闻媒介披露日本正建造超级战列舰时，美国驻东京海军副武官埃德温·莱顿奉命调查。日方的回答完全是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海军部说它对"意大利新闻媒介推测同意大利人无关的问题"不作评论，这样，莱顿的上司通知他停止调查，美国海军对日本建造超级大舰的事也就全然不知了。这两艘舰是当时最大的战列舰，总排水量为68000吨，装备了 18.1 英寸口径的大炮，大大超过美国根据华盛顿条约建造的大型舰艇上装备的16英寸口径武器。海军情报部也未能获得有关帝国海军威力巨大的长矛式鱼雷和零式战斗机的资料。

除了情报工作令人十分不满之外，罗斯福总统还为情报系统内部责任混乱而大伤脑筋。为了强调合理改革情报工作的必要性，总统努力协调反颠覆斗争，结果却引发了官僚机构之间的一场大争吵。原来，1938年末，罗斯福批准给联邦调查局拨款 5 万美元——后来国会增加到30万美元——扩大其反情报工作。由于其它非军事情报机构均未得到类似款项，

埃德加·胡佛认为他的机构比其它非军事情报机构高人一头。他订出规划，准备同海军情报部和陆军情报部交换情报，但是国务院、财政部和邮政总局不愿削弱自己的情报工作职能。作为华盛顿玩弄权术的老手，胡佛将此事直接提交白宫处理。

罗斯福总统必须当机立断。希特勒已经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正想吃掉波兰，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日本宣布在远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轴心国已经行动之际，罗斯福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允许长期争论由谁控制反情报工作问题。1939年6月26日，总统发布秘密指示，把“全部谍报工作、反谍报工作和对敌破坏工作”交给联邦调查局、陆军情报部和海军情报部，以此解决这一因权限不清而争吵的问题。紧接着他又增拨情报经费，授权联邦调查局在美国后院拉丁美洲针对轴心国间谍开展反情报和安全工作。

这些措施并不算早。世界大战势在必然。希特勒和斯大林多年来一直互相攻击，可是1939年8月23日他们却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全世界为之震惊。根据条约中的秘密条款，德国和苏联瓜分了东欧。把波兰孤立起来后，纳粹加紧舆论宣传，挑起边境事端，为进攻作准备。白宫继续作持久的应急准备，陆军和海军情报军官开始每天向总统简要报告军情。1939年9月1日，德国用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扫平道路，坦克长驱直入开进波兰。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

通信情报机构，特别是陆军部的绝密通信情报局，是战争前夕强调改进情报工作后首先受益的单位之一。武装部队和政府其它部门越来越多地使用无线电通信，为采用监听手段获取可靠情报提供了新的机会，使用尖端无线电测向和通

信设备的侦听站纷纷建立，在通信情报局投入了更多资金和人力从事密码破译工作。

该局在陆军密码学权威威廉·弗里德曼领导下，从赫伯特·亚德利的“黑屋”没有做完的事情开始，但它的工作要困难得多。这些年来，情报搜集工作经历了一切革命，各种各样的机电加密系统投入使用，大部分这样的机器——尤其是德国的“迷”字机——能编制比过去复杂得多的密码，能够产生比人的大脑容量更多的字母与数字组合。为了使密码分析员的任务更加困难，与该机配对的另一种机器必须适当安装才能破译文电。各国保密极为严格，每个政府机构——外交部、陆军、海军——都有自己的加密系统，通常其它机构是无法弄懂的。

自从亚德利透露日本的密码被破译后，日本外务省一直在发展新的密码。1939年初，弗里德曼注意到外务省已把一种复杂的新密码用于同驻外使馆联系的大部分秘密通信。日本人把编制这种密码的机器叫做97型打字机；美国人称之为“紫密”。弗雷德曼立即把破译“紫密”机的密码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但这似乎比登天还难。

“紫密”是由复杂的电线连接起来的两部打字机。德国的“迷”字机在加密系统中使用转片，而“紫密”不一样，原理相当于电话交换机，使用转换器变换字母和数字。当编码员在一架打字机上打明文时，另一架打字机自动译成密码；使用相反的程序就可得到明文。日本人认为这种新密码是无法破译的，因为任何企图破译的人必须制造一部能够复制无数组电子制导字母或数字组合的“紫密”机。

弗雷德曼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一直编制、破译密码并取得巨大成功。他1891年生于俄国，父亲是沙皇邮政系统

的一名犹太翻译。后来全家人移居美国，在匹兹堡安家。弗雷德曼被卷入使许多美国青年激动的“归田”运动，报考了密执安农学院，该院唯一的吸引力是免费读书。不久，他发现自己对农业不感兴趣，听说在科内尔读遗传学也是免费的，于是他转学并改换新的学科。

1915年毕业后，弗雷德曼被乔治·费边“上校”聘用，此人是个性格古怪的富豪，在伊利诺伊州日内瓦附近的里弗班克他自己的庄园办了声学、化学和遗传学实验室。弗雷德曼本来致力于改进该农场粮食和家畜品种，可是不久他又参加了费边的另一项工程：根据莎士比亚剧本中的隐含线索证明这些剧本是弗朗西斯·培根写的。他突然对密码术发生兴趣是因为他爱上了女密码员伊丽莎白·史密斯。1917年5月他们结了婚，成为密码史上最著名的一对密码员。

当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于里弗班克是美国仅有的密码学机构，若干部门恳请他们服务。弗雷德曼处理的最重要的案子与一班印度人有关，他们计划发动一起反对英国控制印度的暴乱，谋求德国的支持。他很快破译了这些印度人与柏林联系时使用的数字密码，他的证词使这班人受到审判。后来，弗雷德曼夫妇被陆军部请到华盛顿工作，丈夫还去国外潘兴将军的参谋部服务过。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弗雷德曼任通信情报局局长，他聘用了数学、语言学等领域的学者，把他们训练为密码破译专家。同时，伊丽莎白在海岸警卫队当密码破译员，破译禁酒时期酒类走私贩的密语。弗雷德曼是美国首屈一指的密码破译专家。一天，在3名助手的协助下，从上午11点12分到下午2点43分，除掉吃午饭的50分钟，他便破译了被认为是无法破译的密码。

弗雷德曼带领一班助手努力攻克“紫密”机，18个月过去了，他们精心研究截获的文电，企图从一堆杂乱无章的密码字母中发现出规律，一天天，一月月，他们焦急地期待着成功，但总是一次次落空。弗雷德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不能同妻子商谈自己遇到的麻烦，因为这是一项绝密工程。他的一位助手把这一阶段比作“漫长的极夜”。

1940年8月，弗雷德曼和他的小组终于造出一个简易的奇妙装置，由许多彩色导线、开关和有时能产生电火花的接触器组成。他们没有见过“紫密”机，但是他们似乎创造了奇迹，复制出该机的工作模型。不久，由于工作上的巨大压力，弗雷德曼患了精神崩溃症。但是凭着一股猛劲，他与同事们总算给美国武器库造出了一件强大的武器。

海军的密码破译和无线电通信机构通信安全处表现了罕见的部门合作精神，帮助陆军取得了突破。该处接管了全部破译工作，让弗雷德曼领导的小组从攻关劳累中得到休整，提供资金帮助他们又建造了4部“紫密”机，其中一部留在本处使用。阿留申群岛、夏威夷、萨摩亚群岛、关岛和菲律宾群岛的海军无线电侦听网络给解密员们提供电文材料。为了防止重复劳动，截获的信号按照东京发出的日期分类，陆军和海军分别在双日和单日负责破译工作，并把日文译成英文。

破译过的截获材料叫作MAGIC，保密极为严格。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认识到，只要日本人不知道有人已在阅读他们的通信电文，那么破译日本绝密外交密码的事便可永远保密，于是他拟定了一个“高级名单”，MAGIC只发送总统、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以及少数陆海军高级军官。日本人虽然虚惊几次，但是他们没有发现“紫密”机之谜已被揭开。日本外务省为他们的成就而骄傲，继续认为

97型打字机编制的密码是无法破译的。

欧战爆发不久，一位德裔美籍飞机机械师威廉·西博尔德在曼哈顿百老汇和第42号大街的尼克博克大楼建立了内燃机研究公司。尽管该公司似乎不做什么生意，并且西博尔德大部分时间呆在长岛顶端森特波特的一座房子里，但他经济一点也不拮据。实际上他是一名德国间谍，隐名为"特兰普"，开设内燃机研究公司是为了掩护他的间谍工作的。那座在森特波特的房屋设有无线电发报机。德国军事情报部并没有因格里布尔间谍网的覆没而罢手，他们又在美国建立了新的间谍网，并使之成为轴心国情报的主要来源之一。

西博尔德的真名叫德鲍斯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军服役，1923年在加尔维斯顿弃职离船，结婚后成为美国公民，在圣地亚哥的联合飞机公司谋得一职。1939年初他回到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家乡米尔海姆看望母亲，并顺便在作了溃疡手术后回乡休养。不久，德鲍斯基收到盖世太保一封信，叫他到附近杜塞尔多夫的盖世太保分部去。

西博尔德有美国护照保护，对盖世太保的传唤置之不理，但是第二封信令他吃惊。原来盖世太保发现，他在离开德国前曾因走私坐过班房，而他在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时隐瞒了这一事实。如果他不愿合作，那就通报华盛顿，他会因隐瞒犯罪经历而被开除美国国籍。一位盖世太保警官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回美国充当德国间谍，要么在开除美国国籍后送进集中营。"就这样我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的条件，"事后西博尔德回忆说。

西博尔德被交给来自汉堡德国军事情报部总部的"兰金先生"，实际他叫尼古劳斯·里特尔，负责在美国建立无线电

发报站。盖世太保告诉里特尔，西博尔德志愿担任间谍，已经审查过。于是里特尔安排他去汉堡的间谍学校学习。

“学多久？”西博尔德问道。

“也许三四个月，”里特尔回答。

西博尔德不愿意，他一直想尽早回美国，如果要他在德国呆那么久，最好让他给妻子寄些钱。里特尔向他保证此事会有人办的，但是西博尔德坚持由自己处理：“我想最好让我通过美国驻科隆领事馆办理此事，这样就不会对我们产生怀疑。”

在间谍学校，西博尔德是个聪明学生，在7周时间里，他学会了编码、解码、密写墨水的使用、微型胶卷的制作和短波发报机的操作。在去美国之前，他得到1000美元现金，另有5000美元已给他存在墨西哥的一家银行。他带着到纽约后将要联系的“收藏家”的姓名与地址离开了德国。他的主要工作是将他们搜集的情报用无线电发往汉堡，或制成微型胶卷寄送。

曾经给里特尔提供诺登轰炸瞄准具的赫尔曼·兰是给曼哈顿中心西博尔德公司提供情报的间谍之一，其他间谍有利·斯坦，这位出生于维也纳的艺术家模特儿负责吸收新间谍并充当信使间的联系人；埃弗里特·罗德，这位斯佩里仪器厂的制图员可以搞到该厂著名的陀螺仪；还有弗雷德里克·朱伯特·杜凯森，这位好闹事的布尔人对英国人怀有刻骨仇恨，是个老牌的德国间谍。

1940年初，西博尔德开始把这些间谍提供的情报发往汉堡。该间谍网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发现美国让英国获得诺登轰炸瞄准具，另外还报告了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号战列舰载着新任大使到达安纳波利斯不久，罗斯福总统秘密视察该舰

的消息。

然而德国人违背了情报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即平行机构必须独立工作，德国军事情报部的许多军官和机构中的人都指示他们的间谍通过“特兰普”发送情报。结果西博尔德同在美国活动的许多德国间谍有联系，这些间谍包括在纽约码头工作的一个技工，修船厂的一个铁工，轮船公司的一位秘书，“美洲”号班船上的一名厨师。西博尔德总共向他的主子拍发了300多份电报。

突然，整个间谍网一朝覆亡。1941年6月29日，联邦调查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批将该间谍网中的大小间谍一网打尽。埃德加·胡佛自豪地称之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间谍围捕”。令德国军事情报部懊丧的是，原来的审判表明，西博尔德一直在同联邦调查局合作。他曾向美国官员坦白，说在他访问美国驻科隆领事馆期间，有人逼他充当德国间谍。联邦调查局指示他把戏演下去，从他到达纽约那天起就把他监视起来。

凡是去西博尔德办公室的德国间谍，都被联邦调查局的人从一面镜子后边秘密拍摄下来，这样便记录下他们每次接头的情况，房间里的挂钟和日历也巧妙摄入照片，记下每次会见的日期和时间，而秘密安装的话筒则录下交谈的全部内容。美国政府密探对拍发到汉堡的每一则电报都要检查，确保其价值不大，对可能带来危害的内容都要删除。在学会模仿“特兰普”的发报指法后，他们甚至在森特波特也设立了一个无线电台。

与格里布尔间谍案不同的是，西博尔德间谍网中被捕的每个人都被判了重刑。经过这次打击，在美国的德国间谍活动一蹶不振。虽然在珍珠港事件前一段时期仍有间谍活动，但

他们收获甚小，并且联邦调查局几乎都掌握他们的情况。"他们犹如瓮中之鳖，"联邦调查局一位密探说。

当西博尔德间谍网开始活动的时候，纳粹在欧洲连连获胜，美国人民大为震惊。"特兰普"到达美国不久，希特勒突然占领丹麦和挪威。1940年夏天，德国发动闪电战，一举征服比利时、荷兰和法国，这样英国单独同凶恶的纳粹正面对峙。当听说德国第5纵队在敌后有效地活动时，全国进一步觉得形势危如累卵。实际上，在纳粹的胜利中，颠覆活动发挥了极小的作用，但许多人把道听途说信以为真，强烈要求对德国人采取同样行动。

当认识到希特勒的胜利对美国造成的危险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再也不假装中立了。在后来几个月中，他扩大自己的职权——一时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支持被围困的英国。作出这一决定时，破例地第三次让他当选总统这件事尚未确定，孤立主义者们起劲抨击他使美国秘密卷入战争。

罗斯福总是寻找官方渠道之外的情报，把私人情报网张得更大。"罗斯福喜欢抛开部门机构，非正式地使用他一手挑选并直接对他负责的人，"经常接受总统秘密任务的外交官罗伯特·墨菲说。给总统提供情报的人有伯纳德·巴鲁克、驻华海军副武官埃文斯·卡尔森上校。不可能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的知名人士有时也应要求秘密搜集情报，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就是其中之一，他向总统汇报在墨西哥写作时的所见所闻。通过这种观察员，罗斯福获得从官方渠道得不到的有关人物与事件的内部详情。

总统向外部索取情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不信任国务院。同某些未来的总统一样，他认为国务院思想僵化、容易

泄漏机密、本能地反对他的政策，例如，美国驻伦敦公使约瑟夫·肯尼迪认为美国不能顶住希特勒的进攻。同时，国务院也搞不到什么情报。相比之下，《纽约时报》常常是外国情报的好来源。总统也不相信国务院的灰色密码，实际上该密码已被德国破译。

从泰勒·肯特一案可以看出罗斯福对固定的外交渠道存有戒心是很有道理的。肯特是美国驻伦敦大使馆一位年轻的译电员，顽固坚持孤立主义和反闪米特人的观点。总统与当时的海军大臣邱吉尔之间的秘密电报来往使他担心罗斯福与邱吉尔取得默契后美国参战。肯特认为他有责任把这种危险告诉众议院，于是他复制了两位领导人之间的通信电文。

其间，英国军事情报局5处发现德国驻意大利大使经常给希特勒提供美国驻伦敦使馆档案中的文电复本，包括极为敏感的罗斯福与邱吉尔联系的文电。后来查到意大利海军武官身上，他是从一位白俄罗斯女人安娜·沃尔科夫那里获得的。通过监视这位女人，发现肯特经常同她来往。经过美国大使肯尼迪同意，取消了肯特的外交豁免权，于1940年5月20日，也就是在邱吉尔担任首相10天以后由英国人将他逮捕。英国情报人员搜查了肯特的住处，查获了约1500份绝密文电，包括罗斯福与邱吉尔联系的部分文电。根据《国家保密法》，肯特因“怀着有损于国家安全与利益的动机获取情报”而被判处7年监禁。

1941年初，罗斯福在白宫设立了一个情报与研究临时机构，由约翰·富兰克林·卡特负责，此人以“杰伊·富兰克林”的化名，在多家报纸上同时发表亲政府的专栏文章。他的记者身份使他进出白宫自如而不引起怀疑。他还同在轴心国开设工厂或办事处、能够提供这些国家情报的美国经理、董事

们有联系。罗斯福给卡特的机构提供秘密经费，最后，这位记者在已建立的情报网络之外领导着100多人。

卡特调查一切问题：从政府主要官员的政治态度到加勒比海法属马提尼克岛上纳粹第5纵队的活动。他到西海岸调查一旦日美交战日裔美国人中发生暴乱的可能性，并且研究中东部的人口趋势。1945 年前，他一共给总统提供了660 份报告，并指导了几项秘密研究。

然而，罗斯福最亲密的密探是在达奇斯县的邻居和远亲文森特·阿斯特。阿斯特是海军预备役中校，一个情报迷，20年代就与罗斯福结为相知，那时他请罗斯福到自家室内热水游泳池锻炼因小儿麻痹症致残的双腿，后来他慷慨资助罗斯福的政治竞选，并且让罗斯福使用自己的豪华型游艇“诺马哈尔”号到深海垂钓。经常陪他们在一起的有西奥多·罗斯福的第二个儿子克米特·罗斯福，以及社会地位相同、都参加了一个奇怪组织“鲁姆”的其他人。

该组织1927年由阿斯特、克米特·罗斯福和克米特的哥哥小西奥多发起，约有20多个有钱有势的人组成，包括银行家温斯罗普·奥尔德里奇、后来驻伦敦和北京的大使戴维·布鲁斯和著名的探险家苏伊丹·卡廷。有的是情报战线上的老兵，朋友众多。总统不是“鲁姆”的成员，但是在共同乘坐“诺马哈尔”游艇时他认识了“鲁姆”的大多数成员。毫无疑问，阿斯特和克米特努力使“鲁姆”成为总统的私人情报网。

阿斯特与海军情报部保持着密切联系，能给总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1938年他伪装巡游大西洋，把游艇开到由日本托管的马绍尔群岛搜集埃尼威托克和沃杰环礁上有关码头、燃料库和简易机场的情报。欧战爆发以后，他向总统提供了交战国和中立国在美国情报活动的内部情况。他利用自己西部

联合电报公司总经理的身份，下令截获轴心国的间谍发往拉丁美洲的有线电报；蔡斯国家银行行长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向他提供苏联一家挂着贸易公司招牌的间谍机构在银行的存款金额。因家庭、社会和商务关系而亲英的"鲁姆"的其他成员都在重要银行和公司任职，也提供相同的情报，阿斯特汇总后送给总统。"谍报工作和破坏活动需要经费，"他说，"到一定时候必然通过银行转帐。"

在白宫支持下，总统通知海军情报部，由阿斯特在纽约地区协调情报活动。这位业余情报领导人迅速扩大其工作范围。1940年初，阿斯特与威廉·斯蒂芬森联系，这位精明能干、足智多谋的加拿大人是英国驻纽约市安全协调处处长，该处为英国在西半球情报活动中心。阿斯特和斯蒂芬森一起阻止了法国亲德的维希政府在纽芬兰附近的圣皮尔岛建立大功率无线电台的企图。如果电台建成，轴心国间谍就可能避开英国侦听站的窃听。经过英国官员批准，阿斯特还在百慕大秘密搜查过中立国的外交邮袋。

然而，阿斯特这颗新星上升得快，陨落得也快。他的协调工作遇到现有情报机构的竞争、捣乱和妒忌，同时他也成为罗斯福变化无常性格的牺牲品。总统的偏爱是捉摸不定的。像许多其他人一样，阿斯特莫名其妙地失宠，被总统的心腹集团抛弃了，随后代替他的是威廉·杜诺万。

人们通常对外号叫"莽汉比尔"的杜诺万的评价是勇敢大胆、喜欢冒险、无法预测。他颇有心计，有些想法切实可行，有些则完全是胡思乱想。他是自拉尔夫·范德曼之后美国情报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按照自己的设想铸造情报机构。现在，他的照片当之无愧地悬挂在中央情报局总部的门厅

杜诺万的门徒。后来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凯西曾想在总部大楼外建立杜诺万的塑像取代内森·黑尔的塑像。

杜诺万似乎不可能被选作罗斯福总统的心腹密探。作为来自纽约州北部地区的顽固守旧的共和党人，他曾反对新政；作为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他应受到仍为肯尼迪大使的失败主义而感到痛苦的英国人的怀疑。但是杜诺万是从事特殊工作的特殊人物。这位57岁、头发斑白的长者是功勋卓著的战斗英雄、华尔街的百万富翁律师，在全世界有许多朋友。他与罗斯福曾是哥伦比亚法律学校的同班同学，虽然表面上他俩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但骨子里他们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他们都是强硬派人物，坚信美国无所不能。

1916年杜诺万跟随潘兴将军远征墨西哥时获得"莽汉比尔"的绰号。据报道，一次当他的部下抱怨长途行军时，这位上尉回答："看看我吧，我连气都不喘。如果我能吃得消，你们也能。"接着队伍后边有人大声叫道："我们可不像你那样结实，莽汉比尔。"杜诺万喜欢这个绰号，就这样到处传开了。后来他在法国第69团担任中校时3次负伤，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荣获最高荣誉勋章、优秀服役十字勋章和优秀服役奖章3项功勋章的唯一军人。

虽然杜诺万怀有远大政治抱负，也许希望成为美国第一位信仰天主教的总统，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代里他的政治抱负没有实现，这使他失望。1922年他在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纽约州副州长时遭到失败，10年后竞选州长也未成功。但是他仍然担任了公职，1924年他去华盛顿任司法部副部长，主管刑法司的工作，新提拔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在他领导之下，后来成为他的竞争对手。

1928年夏天，杜诺万担任司法部代部长，人们以为他会

被任命为正部长，因为他的好朋友赫伯特·胡佛那年年底当选总统，然而胡佛没有作出这一任命。许多年后，杜诺万的妻子罗斯承认，未能当上司法部长“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政治上的梦想破灭后，杜诺万只好另谋出路，在华尔街开办了一个律师事务所。但是如此雄心勃勃的人不会满足于乏味的律师工作，他经常把事务所的工作交给伙伴们，自己到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场和西班牙内战前线去巡视。他参观德军军事演习，视察法国和英国防御设施，注视极权主义的发展。他的许多委托人反对新政，但是当战争爆发时，杜诺万对外交政策的看法与总统一致。他呼吁美国作好战争准备，极力反对给外国“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决不参战的印象……在暴徒肆虐的时代，我们不能当胆小鬼。”

由于罗斯福需要两党支持，杜诺万被拉进总统运行的轨道。1940年6月，总统采取措施挫败孤立主义者，任命亨利·斯廷森为陆军部长、任命弗兰克·诺克斯为海军部长，两人都是老资格的共和党人，拥护全面支持英国的方针；斯廷森是胡佛任总统时的国务卿，诺克斯在1936年获共和党副总统提名。诺克斯一上任便向总统建议，派遣杜诺万了解英国人在如何对付第5纵队的威胁，并全面评价他们抗击纳粹的能力。毫无疑问，杜诺万高昂的情绪和丰富的想象力深为罗斯福所爱。“莽汉比尔”开始了为总统担任密探的生涯。

在英国，杜诺万受到极其隆重的欢迎，他面晤了国王乔治六世，同邱吉尔多次会谈并提出无数问题。所到之处，他都看到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随时准备抗击敌人的入侵——这一切都是故意安排的假象，目的是使他相信英国人不仅有决心而且有办法坚持战斗；小心谨慎的英国人没有让他参观刚刚开始探索德国“迷”字加密机的绝密破译工程。杜诺万

回国后，极为乐观地报告说，如果美国给予后勤支援，英国完全能击败德国的进攻。杜诺万上校的汇报，促使犹豫不决的罗斯福答应邱吉尔的请求，出借50艘老式驱逐舰对付德国控制挪威和法国海岸后带来的严重的潜艇威胁。

1940年12月，杜诺万到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为总统再次执行秘密任务。在旅途的第一站，他由威廉 斯蒂芬森陪同。"无疑我们能够通过杜诺万获取比通过其他人更多的东西，"斯蒂芬森向他的上级报告。"他接受能力很强……可以相信他能很好代表我们的需求。"

杜诺万和斯蒂芬森都是实干家，是一对情同手足的好朋友。斯蒂芬森这位加拿大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战斗机飞行员，曾击落数架敌机。战后他改进了用无线电传播照片的技术，30岁之前就成为百万富翁，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上，他建立了一个工业帝国。他对德国钢铁生产投资，从内部观察到希特勒的战争准备，30年代后期，他给邱吉尔提供了德国重新武装的详细情报。

法国沦陷前夕，邱吉尔派遣斯蒂芬森去纽约执行"特别任务"，首先担任美国护照检查官，然后担任英国安全协调处处长。斯蒂芬森的隐名为"英特雷皮德"，在洛克菲勒中心美国无线电公司大楼3603号房间指导着任务繁杂的情报机构。像第一世界大战中的怀斯曼爵士一样，他领导反破坏和反情报工作以及旨在左右美国舆论的宣传活动。斯蒂芬森在商务活动中的广泛联系、从容处世的个性以及惊人的酒量使他结交了大量朋友。他同美国官员保持了友好的工作关系。由于害怕无孔不入的纳粹第5纵队，美国官员渴望同英国人合作，联邦调查局曾与英国军事情报局5处在和平时期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胡佛完全清楚设在纽约的英国护照检验处及其后继机构

的真正作用。

在情报界，身材瘦小、性格文静的斯蒂芬森被大家称作"小比尔"，而杜诺万被称作"大比尔"。这位加拿大人对美国人作出的贡献相当于前次战争中克劳德·丹西对拉尔夫·范德曼发挥的作用。后来他声称曾向杜诺万建议美国应该建立从事世界性秘密活动的机构；然而杜诺万不需要别人促进，他已在考虑建立一个秘密机构对付纳粹的挑战，在伦敦时，他曾同英国陆军情报局6处处长斯图尔特·孟席斯上校和海军情报局局长约翰·戈弗雷少将长时间会谈。1941年3月从欧洲回国时，他已准备向总统直陈己见。

"我们正面临着危险，"杜诺万提醒罗斯福，"但我们仍缺乏从事情报分析、理解和估价的有效机构……那些可能获取的潜在敌人的情报。"战争的性质已发生根本变化，现有的情报机构显然不能适应需要。"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负责搜集潜在敌人情况的中央情报组织，"他说。该机构的唯一任务是国外情报工作，有权协调陆海军武官和其他情报人员的活动，并有责任评价情报，为总统提供分析意见。

海军情报部、陆军情报部和联邦调查局担心杜诺万提出的超级机构把自己吞并掉，极力阻挠这一建议付诸实施。他们说杜诺万随心所欲、无法共事。陆军情报部长乔治·斯特朗将军说："如果足球场上有个没人抢的球，那可以让他接住带着走。"有权与白宫直接联系的"小比尔"斯蒂芬森对此发动了反击，戈弗雷也亲赴华盛顿表明他的支持态度。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对昔时的俄国盟友发动进攻，进一步扩大了战争，罗斯福反复权衡利弊，7月11日，任命杜诺万为情报协调局局长，"有权搜集和分析有关国家安全的一切情报和资料……并随时向总统提供。"这样，美国为建立中央情报机构迈出了

第一步。

有人曾经评论，比尔·杜诺万具有“把看到的橡树果说成是橡树的本领”。尽管他没有军衔，也不领取情报协调局局长的薪金，但是他在华盛顿领导机构的影响简直像一股旋风。预算局认为情报协调局只需要少量工作人员和有限的经费，因此划拨了未说明用处的45万美元，并在紧挨白宫的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旧大楼分配了3个光线暗淡的房间用作办公室。

由于美国在战略情报方面是白手起家，杜诺万组织了他认为最精明强干的一班人，这批精英包括詹姆斯·巴克斯特，这位威廉斯学院院长被任命为研究分析处处长；威廉·兰格，这位哈佛大学外交史学家领导该处第一流的分析家理事会；国会图书馆专家、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荣获普利策奖的剧作家和总统演说起草者罗伯特·舍伍德；纺织厂助理厂长爱德华·巴克斯顿；纽约投资银行家詹姆斯·沃伯格；夏威夷“菠萝大王”阿瑟顿·理查森；总统长子詹姆斯·罗斯福；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的女儿埃斯特尔·法兰克福特以及电影导演约翰·福特。

几个月后，预算局对杜诺万创建帝国的卓越才能刮目相看。情报协调局的工作人员猛增至600多人，在华盛顿许多地方和纽约都设有办事处。有一个笑话说，如果一位工作人员一天没有上班，他也许需要两天才能找到新搬迁的办公室。而这仅仅是开始。杜诺万计划该局发展到1300人，年预算为1400万美元。他置行政机构的有关规定于不顾，以惊人的速度招聘了一批学者、律师、记者和商人，大多数人对情报工作一窍不通，甚至如何领取打字机、色带、回形针这样的机关工

作常识都很生疏。

结果，杜诺万在情报界的影响从战争年代一直延续至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央情报局中有 4 位领导人曾在情报协调局或后来的战略情报局工作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瑞士工作的阿伦·杜勒斯1942年末回到波恩领导打入德国政府上层的一个间谍网；曾经当过通讯社记者并会见过希特勒的理查德·赫尔姆斯帮助组织了反对德国的秘密活动；威廉·科尔比空降到挪威和被占领的法国执行骚扰和破坏任务；威廉·凯西组织并领导了潜入德国的间谍小组。

在情报协调局存在期间，杜诺万同海军情报部、陆军情报部、国务院和联邦调查局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些机构坚决反对他抢夺他们的地盘。作为华盛顿一名经验丰富的政客，杜诺万在这些斗争中有输有赢。舍伍德领导的电台宣传机构国外信息部与美国内部事务协调员内尔森·洛克菲勒发生权限争执。埃德加·胡佛称设立情报协调局是"罗斯福干的蠢事"，阻止它在拉丁美洲活动。杜诺万的一些职员粗暴无礼触怒了军方，军方说这"一捆枯树枝"毫无保密意识，拒不提供手中的秘密材料。

情报协调局的工作分公开的与隐蔽的两部分。招聘来的学者分配到该局研究分析处，学者的研究方法首次运用到情报工作中去，他们在华盛顿雾谷曾经用作国家卫生研究所实验室的破损不堪的几幢大楼里办公，监听轴心国的无线电广播，钻研农业报告、深奥的技术杂志和当地报纸，准确地了解德国占领下的欧洲正在发生的一切。

该局的隐蔽工作仿效了英国特别行动执委会的职能，主要在德国等敌后地区从事破坏、游击战等活动。海军情报部的影子机构"K"，在一位驼背商人威廉·菲利普斯的领导下管

理密探，后来该机构被情报协调局接管过去，成为其秘密工作的主要部分。情报协调局和后来的战略情报局共有5个专业处组成：秘密情报处，从事谍报工作；特别行动处，从事破坏与颠覆活动；反情报处；心战行动处，制造和传播“黑色”宣传；作训处，训练打入敌占区的游击分队。

此外，还有财务管理、通信联系、人员招聘和训练等单位。当然还有一个研究开发处，由发明家与科学家组成，负责开发情报工作、破坏与颠覆活动所需要的工具，为潜入敌区的特务制造假币和假身份证，生产一些特别武器，包括暗杀使用的无光无声手枪和各种各样的爆炸装置。一种叫做“凯西·琼斯”的精巧装置专门用于破坏铁路，它用磁铁吸在火车头和电眼的下部，这样火车只会在隧道爆炸，造成的损失就更大。

研究开发处处长斯坦利·洛弗尔表面上郁郁寡欢，实际上充满幽默，喜欢恶作剧。听说希特勒吃素，洛弗尔萌发了一个稀奇古怪的主意，想在元首的蔬菜中注入女性激素，这样他的胡子就会掉光，声音变得像女人那样尖。听说日本人特别讲究个人卫生，他便发明了一种刺激腹泻的药，他认为可以把这种药悄悄运往中国被日本占领的城市，那里的儿童在拥挤的街道上跟在日本兵后边，可以把药喷洒到他们裤子的臀部，使日本人丢脸。

在建立情报协调局特别行动处时，杜诺万倾听英国人的建议，要求他们支持。威廉·斯蒂芬森派了专家帮忙，包括他的副手查尔斯·埃利斯上校。“没有他的帮助，美国情报工作就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顺利进行，”杜诺万的秘密情报处长戴维·布鲁斯说。埃利斯曾荣获美国功绩勋章。然而，最近出现了争议，有人说埃利斯在帮助组建美国战时情报机

构时是个德国和苏联间谍，处于危及特工人员和秘密行动的地位。

英国专家在安大略湖加拿大一侧秘密开设了一所训练学校，美国人在那里学习隐蔽活动技能：绘图，武器使用，破坏手段，通信联络方法和如何暗杀敌人。曾经当过谍员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去时像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大家都天真无邪，一投入我们这个肮脏的情报妓院，他们很快就腐化堕落了……"

当杜诺万在官僚机构这个丛林中披荆斩棘、开拓前进的时候，在大西洋没有宣布就打了一仗。1941年夏末，美国海军奉命护送一支护航队去英国，对四处活动的潜艇发动了攻击。德国人给予回击，"卡尼"号驱逐舰被鱼雷击中，几名水手丧生。10月27日海军节，总统慷慨激昂地谴责德国人的攻击是"海盗行为"。在回顾1917年的齐默曼电报时，总统说自己手头有一张地图无可辩驳地证明，纳粹对巴拿巴运河怀有企图，计划占领拉丁美洲并将现有的14个共和国合并为"5个附庸国"。

这张地图是由斯蒂芬森转交给杜诺万的，杜诺万又交给了白宫。记者们吵吵嚷嚷要审查这一证据；而柏林则谴责这张图是赤裸裸的伪造。但罗斯福避开所有质询，声明如果公布这张地图，将会"截断今后的情报来源"。显然，他怀疑这张图经不住公众的仔细检查。

1941年最后几个月，和平与战争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孤立主义仍然甚嚣尘上。如果强行宣战，肯定会导致美国分裂。为了使全国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罗斯福像1861年的林肯一样，只好诱使对手打第一枪，等待希特勒发动引人注目的挑

辟，然而，根据情报估计，同德国打起来的可能性不大。10月份，陆军战争计划部宣布，德国“至少在1年内不会对西半球发动重大进攻，即使1年以后它也必须获得大批英国船只才能行动。”

在这形势朦胧的时期，杜诺万是椭圆形公办室的常客。总统对他的努力甚感满意。他告诉助理国务卿阿道夫·伯利：“比尔的宣传工作干得相当出色，情报工作也不错。”杜诺万源源不断地给罗斯福提供报告，包括德国总参谋部表示的“和平愿望”，对苏联工业生产损失的估计，以及每天对纳粹对美短波广播的综合与分析。相当奇怪的是，两人谁都没有提及对日作战的可能性。但是当美国准备渡过大西洋作战时，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

13. 珍珠港事件之后

埃德温·莱顿少校是个容易烦恼的人。1941年末，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这位情报军官有许多忧烦。太平洋战争迫在眉睫，12月1日，日本海军突然改变了所有舰艇的无线电呼叫信号，这是两个月中作的第二次改变，是个不祥的征兆，因为驻珍珠港的通信情报分队通过截获这些信号能测出日本舰队的位置，但现在电信分析很快查明最常用的新呼号，却无法找到任何一艘日本航空母舰的位置。尤为严重的是，自从11月25日以后，再也没有收到任何日本航空母舰的信号，似乎这些航空母舰一下子从地球上消失了。

正当海军无线电监听台继续徒劳地寻找这些航空母舰

时，12月2日上午莱顿向太平洋舰队司令赫斯本德·金梅尔上将简要汇报了情况。莱顿根据无线电通信，向上将讲了日本舰队的大体位置，他告诉金梅尔，据报道，一支庞大的海军部队在运输船的陪同下正沿着泰国海岸运动，但是帝国海军的两支航空母舰部队下落不明。

"什么?"他大声问道,"你不知道航空母舰在哪里?"

"是的，先生，不知它们的行踪，"莱顿回答。"那正是我对'本土水域'怀疑的原因。"

"你是说它们可能正从戴蒙德角那边过来，而你却不知道?"

"但愿它们这时已被发现,"愁眉苦脸的莱顿回答。

11月27日华盛顿就向太平洋美军司令包括金梅尔和夏威夷陆军司令沃尔特·肖特中将发出了"战争警报"。与日本的谈判已经破裂，几天内日本可能对菲律宾、马来亚、泰国或婆罗洲发动进攻。虽然上级命令两位司令实施"适当的防御部署",但是没有迹象表明珍珠港是攻击目标。肖特采取的唯一行动是把飞机集中起来防止遭到破坏。金梅尔下令局部进入战备状态，但是没有命令昼夜空中巡逻。他曾考虑把主力舰队开到海上去，但后来打消了这一想法，因为美国在太平洋仅有的两艘航空母舰已经运载飞机驶往中途岛和威克岛。防鱼雷网没有建起来。海军部认为，在珍珠港的浅水水域鱼雷攻击是无效的。

在"战争警报"发布前一天，挂着日本国旗的6艘航空母舰在浓雾掩护下悄悄驶进北太平洋。日本飞行员经过特别训练，飞机上装着改进后的鱼雷，能在浅水准确发射。这些航空母舰严格保持无线电静默，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夏威夷行驶。莱顿不断警告在远东而不是在珍珠港即将发生战斗，作

战部队的军官们认为他无事自扰。“经常散布星期六危机的莱顿又来了!”12月 6 日当莱顿与其他参谋人员共进午餐时有人说。

次日凌晨，一批又一批的日本飞机轰炸毫无警惕的珍珠港美军基地。偷袭获得圆满成功，19艘舰艇——几乎包括太平洋舰队的全部作战舰只——被击沉，排列整齐似乎等待检阅的 256 架飞机被击毁，2400多名海军、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官兵丧生。这是美国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严重灾难。一颗乏弹击中了金梅尔上将的胸部，他喃喃地说：“好险哪，差点把我报销了。”

偷袭珍珠港在国内引起巨大震惊，人们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没有警报？为什么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次攻击？这个责任应由谁来负？

珍珠港事件不仅仅是情报工作的失败，而且几乎是政府各级机构指挥与领导的失败。肖特和金梅尔被解除了职务，但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没有受到指责，尽管他驻菲律宾的部队在偷袭珍珠港 9 小时后也遭到突然袭击。显然，不管金梅尔和肖特犯了什么错误，他们只是政府为了掩盖罪责与失职而被信手拉出来的替罪羊。

多年来，神话编写者们千方百计证明，罗斯福总统预先知道日本的偷袭，故意牺牲太平洋舰队以换取美国从后门对德宣战。谋略理论家则认为，白宫的这位谋略大师故意对日本偷袭的明显信号置之不理以便把他领导下的美国人民团结起来。大多数研究人员否定这一谋略理论，但这是一个不会消失的神话。例如，1982年，约翰·托兰坚持认为罗斯福预先知道这次偷袭，因为他从英国一名两面间谍“三轮车”那

里获得有关这次偷袭的“详细计划”，当在档案中找不到这一“确凿证据”时，托兰便推测说，由于罪过已从白宫转嫁到那两位司令身上，为了进一步掩盖真相，这些重要文件已被清理掉了。

“三轮车”是南斯拉夫一位花花公子兼冒险家，名叫达斯科·波波夫，受德国军事情报部雇用监视英国动向，但他不久投靠英国而成为双面间谍。1941年夏天，德国军事情报部派他去美国建立间谍网，并交给他一张列着许多问题的单子，经过缩微处理后贴在一张电报表上。单子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船运、飞机生产、部队运动等一般问题，但三分之一的内容对珍珠港及其周围的机场与防御工事表现了强烈兴趣。显然，德国人想为他们的日本盟友获取这方面的情报。

波波夫到达美国后受到埃德加·胡佛的接见。托兰暗示，联邦调查局把这张谈及珍珠港的问题表交给了罗斯福，他不仅把这张问题表称作“详细计划”，还在他发表的著作中省掉此表中的大量其它内容，给读者留下了此表几乎全部与珍珠港有关的印象。

然而，实际上胡佛基本上没有重视那张缩微表，因为他内心不喜欢也不信任波波夫。托兰无法找到他的“确凿证据”，因为胡佛只向白宫送去问题表中约四分之一的内容，并且不包括有关珍珠港的那部分；显然他只把此表看作可能使总统感兴趣的奇事；胡佛也未将问题表的全文提供给海军或陆军情报部。

虽然可以肯定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罗斯福对参战问题不再进退两难，但是如果说他有意牺牲整个太平洋舰队，那几乎不可能，因为那时他需要依靠这支舰队赢得战争。不错，在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罗斯福、内阁和陆海军司令已经掌握

了有关日军活动的大量情报，但大部分情报内容互相矛盾、很不可靠。常识认为，日本人在中国陷入持久战的泥潭，由于美国禁运，生命攸关的石油进口线又被切断，因此，他们很可能去抢夺东南亚和东印度群岛的石油和其它矿物资源；也许在南进时，他们会占领菲律宾以保护侧翼。也有分析家预言日本会进攻苏联，因为当时苏联在德国的打击下节节败退。尽管事实上日本乘美国海军舰队演习之机成功地偷袭了珍珠港，但当时人们没有预见到这种可能性，因为据信日本人缺乏发动这一攻击的能力。

缺乏这种预见同对日本人的偏见有很大关系。美国人把日本人看作长着獠牙、戴着眼镜的黄种矮人，总是带着照相机拍照模仿别人的东西。"日本起劲地创建海军航空兵，但总是处于落后地位，"海军情报部前部长威廉·普利斯顿1941年写道。"日本的舰载飞机没有美国多，同样重要的是，日本的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降的速度不及美国的快。"

华盛顿收到来自各个渠道的情报：有日本外务省与驻美外交人员联络时被截获破译的情报，有日本驻火努鲁鲁领事馆用 J-19 密码拍发的电讯，有跟踪日本海军舰艇的情报，有美国外交官从东京发回的情报，以及监视日本军队与舰艇动向的情报。在这些繁杂的情报中，也有袭击珍珠港的零星线索，但密码分析员无法迅速去伪存真、分清主次，作出正确的评估。

只是根据事后认识，人们才看出日本即将攻击的有关迹象。例如，1941年2月，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上将开始秘密计划袭击珍珠港之后，该计划已走漏出风声。美国驻日本公使约瑟夫·格鲁报告华盛顿，他"从许多来源包括从日方获悉，如果美日交战，日本人将偷袭珍珠港。"这一

情况报送给了金梅尔，但同时附有如下评注："海军情报部不信这一谣言。"

"事后看迹象总是清楚的，"罗伯塔·沃尔斯泰特在谈到珍珠港事件的情报问题时说。"我们现在能看出它当时预示着什么样的灾难，因为灾难已经发生，但在事发之前迹象总是模糊不清，有各种互相矛盾的理解……总之，我们未能预见到珍珠港事件，不是因为缺乏有关资料，而是因为无关资料太多了。"

情报工作的主要危险之一是过分依赖某一个来源。像1781年自信掌握了乔治·华盛顿计划的亨利·克林顿爵士一样，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相信MAGIC给他们提供了了解日本意图之谜的可靠钥匙，从而贬低或忽视其它来源的情报。但是"紫密"仅仅透露了外务省给其驻外主要代表的信息，日本海军的绝密密码没有破译，而"紫密"几乎没有提供有关帝国海军活动的情报。其实MAGIC没有暗示日本即将攻击珍珠港，这样，MAGIC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让美国决策者们深入了解到日本的意图，同时，它也给他们带来过份的自信。迷信MAGIC的可靠性以及这些破译材料通报范围的限制都是有害的。金梅尔和肖特得不到MAGIC材料，否则他们有可能注意到在华盛顿的日美谈判进程。实际上华盛顿认为外交情报与他们无关。

错误使用截获的日本外交情报MAGIC是珍珠港灾难的主要原因，没有一个情报交换所对有关日本意图的一切原始情报加以全面集中、分析和估价。允许参与MAGIC工作的所有人员必须是他们自己的情报军官，并且由他们自己分析和解释原始情报——而在这方面他们几乎没有经验。此外，每一份情报只代表一部长篇电影中的一个镜头，而他们看不到

整部电影。情报处理过分严格地按部门进行，每个单位只处理自己获取的那部分情报，在很少情况下，从某一来源的情报才与另一来源的情报作比较。

MAGIC 对珍珠港问题只字不提，而日本驻火努鲁鲁领事馆用 J-19 密码拍发的电报却表现了对珍珠港和太平洋舰队活动的强烈兴趣。然而 MAGIC 比 J-19 电讯更受重视，美国解密员把主要精力花在MAGIC上，而破译、翻译、发送一份 J-19 密码电报则常常要拖两周多时间。1941 年 9 月 24 日，日本领事馆奉命把珍珠港划分为以字母为顺序的 5 个密码区，以便太平洋舰队停泊时报告出舰艇的准确位置。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华盛顿没有特别重视日本给其领事馆的这一指示电报，没有转告夏威夷。

“可以肯定，即使我们看到与珍珠港有关的电报，对这些情报也会有许多不同的评价，”莱顿后来说。“印第安人有句老话，叫做自家墙角的蛇最大，情报也是如此。当你获取的情报与你有关时，你往往更加重视它。1941年秋末，华盛顿致力于在大西洋的海战而无暇顾及与太平洋有关的情报。如果我们能看到 MAGIC的脱密情报，我们肯定会对偷袭珍珠港的可能性有所警觉。”

华盛顿不给金梅尔和肖特提供 MAGIC 情报，不经常向他们报告变化的形势是错误的，陆海军高级军官没有确保驻夏威夷的军事指挥官处于戒备状态也铸成大错。合理的军事原则认为，野战指挥员应该获得可以帮助他决策的一切情报，否则，则应对他下达明确指示，可是金梅尔和肖特既未获得情报，也未得到明确指示。

海军部为最终控制情报的内部倾轧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通信局和海军情报部长期不和，互相争夺对无线电情

报的评价与报送。在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由于战争计划部锋芒毕露的部长里士满·凯利·特纳将军企图控制海军情报部，这种激烈的竞争进一步加剧。虽然特纳对情报处理几乎一窍不通，但在分析和解释战略情报时，他却自以为比海军情报部高明。1941年5月，海军情报部长艾伦·柯克上校写信给特纳，向他发出警报说："日本人不久会突然行动。"在信的空白处，这位将军大笔一挥批道："我认为日本人现在不会、也永远不会行动！"

如果有一个精干的中央系统对罗斯福和他的核心集团获取的大量情报进行分析，人们也许能在一片喧闹声中看到迫在眉睫的危险。后来威廉·弗雷德曼声明，珍珠港灾难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陆军或海军情报机构中没有一个人负责研究 MAGIC 情报，这件工作尽管不是唯一的，然而却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人负责把互相交错的秘密情报加以综合整理。"此项工作本来可以由情报协调局的分析家委员会完成，但是杜诺万不在获准阅读 MAGIC 情报的高层人员名单之列。军方对地方情报机构疑心重重，不予提供 MAGIC 情报。

当日本人轰炸珍珠港时，杜诺万正在波洛运动场观看纽约巨人队和布鲁克林飞毛腿队之间的足球赛。飞毛腿队刚首次突破巨人队的防线，突然高音喇叭响起来："请注意！紧急通知，请威廉·杜诺万上校给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号话务员打电话。"原来，吉米·罗斯福来电话告诉杜诺万有紧急情况，要他立即回华盛顿面晤总统。

杜诺万到了首都后立即召集情报分析家们开会，准备给总统和内阁提供形势分析材料，但他们无法对日本未来的意图提出看法，因为海军情报部和陆军情报部只顾自己搜集情

报，无视杜诺万索要情报的请求。半夜时分，杜诺万和广播新闻记者爱德华·默罗被带进椭圆形办公室。听说发生偷袭后罗斯福惊魂未定。“他们把我们的舰艇打得像跛鸭！跛鸭，比尔！”他宣布。在半小时会见中，总统还说：“你已着手替我搞情报分析，这很好。”讨论的主题是美国人民的情绪怎样，珍珠港事件是否能把人民团结起来对付轴心国，杜诺万认为这是可能的。

在后来数月中，日军在太平洋全面进攻，占领了关岛、威克岛；菲律宾、新加坡和荷兰手中的东印度群岛也先后沦陷。其间，在美国近海，潜艇使用鱼雷攻击油轮。在北非和俄国，德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德国和日本向美国沿海派遣破坏分子的消息也纷纷传来，不胫而走。举国上下加强安全保密，罗斯福自己的情报员约翰·富兰克林·卡特要求增加侦探和经费“控制国内某些组织”，联邦调查局扩大了反谍报职能，监视可疑的颠覆分子。

在西海岸，对美籍日本人的惊恐和偏见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人们纷纷议论日本即将入侵夏威夷、一群群化装的日本兵在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州毗邻地区秘密活动。尽管没有发现暴乱和间谍活动的证据——海军情报部也断言美籍日本人不构成安全威胁——但是当地领导人，如当时加利福尼亚州的司法部长、后来当上美国最高法院院长的厄尔·沃伦，强烈要求军队强行重新安置日本人。“他们毕竟是日本人，我不想让他们在这里，”西海岸防御指挥部的约翰·德威特将军说。

杜诺万给总统转交了西海岸公民代表证明美籍日本人忠于美国的声明，企图减缓反日情绪。居住在圣地亚哥的拉尔夫·范德曼称重新安置日本人的计划是不必要的、不切实际的，是“我所听说过的最愚蠢的主张”。然而这些合理的声音被

置若罔闻，1942年4月，罗斯福签署了拘留12万日本人的命令，其中三分之二是美国公民。为了保险起见，情报协调局和海军把美籍日裔笔译员调离了要害岗位。

海军情报部和陆军情报部在珍珠港事件后寻找替罪羊的风潮中处于守势。陆军计划部部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声明，由于“年月日深的明显缺陷”，陆军情报部无法提供判断轴心国意图与能力的重要情报，“陆军情报部长只能到总参谋部计划部和作战部十分可怜地问能替我们干些什么事。”海军作战计划部部长特纳将军抓住海军情报部的过错大做文章以便取而代之。在珍珠港事件后被任命为海军作战部部长和美国舰队总司令的欧内斯特·金将军把海军情报部抛到一边，另外成立了自己的情报机构，这样海军情报部形同虚设，几乎成为档案室和图书资料室。

在这混乱期间，任何荒唐无稽的方案都可能出笼。杜诺万怂恿总统派遣剩余的太平洋舰队的一半兵力和10000至15000名突击队员——美国没有这样的突击队员——去攻打日本本土北海道。约翰·卡特建议美国轰炸日本火山，造成火山喷发，将日本埋葬在熔岩和灰烬之中。当有人向罗斯福报告，说日本人极端害怕蝙蝠时，总统竟认真考虑了向日本空投蝙蝠扰乱人心的计划。结果，没有查明日本人是否真的害怕蝙蝠——其实他们不怕——就向日本空投蝙蝠，许多蝙蝠没有落地就在高空中冻死了。

杜诺万根据旅游者提供的情况整理后送往椭圆形办公室的部分材料是有价值的。1941年11月离开德国的一位美国商人较早地提供了最后解决方案[1]第一阶段的情况——把犹太

①纳粹德国消灭犹太人的屠杀计划。

人驱逐出东欧。不过杜诺万提供的大部分材料是错误的，日本人没有派船去智利获取铜，德国人没有在1942年春经西班牙入侵摩洛哥。不久，杜诺万与情报协调局国外情报处处长罗伯特·舍伍德之间的长期恩怨终于爆发，使协调局内部情报与宣传无法结合起来。甚至罗斯福对秘密活动的热情也冷却了，1942年4月他提出把杜诺万派往“某个宁静而美丽的孤岛，在那里每天早饭前他可同日本人争吵一番。”

战争期间，情报协调局也同其他对手发生了纷争。胡佛已经对斯蒂芬森在美国随心所欲的活动表示不满，1942年3月，田纳西州的参议员肯尼思·麦凯勒提出一项议案，一旦通过，斯蒂芬森将被迫向联邦调查局公布他的特工员名单和其它材料，英国安全协调处也将被迫停止工作，并且美国情报协调局的活动也将受到损害。虽然该议案最后被总统否决，但精明的斯蒂芬森认识到，更加尊重美国法律的时机到了，于是他将部分特工员和任务移交给了杜诺万。其中一项任务是定期到西班牙驻华盛顿使馆秘密搜查，把亲轴心国的佛朗哥政府的密码本和其它文件偷偷拍摄下来，正在攻克德国“迷”字机密码的英国破译员们需要这些材料。

听到这种秘密搜查的风声后，胡佛怒不可遏，因为这属于他管辖的事情。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没有向白宫提出正式控告，而是在一天夜里，当情报协调局的密探袭击漆黑一团的西班牙使馆后，联邦调查局出动两辆小车，出其不意地来到使馆，打开紧急信号灯，高放警报器。整个社区的灯光一下亮了，惊慌失措的情报协调局密探逃离使馆，未料他们还被警察扭送到联邦调查局。杜诺万气愤地向总统提出抗议，但罗斯福没有训斥胡佛，而是下令把这项任务转交给联邦调查局。

1942年整个春天，情报协调局为其生存而斗争。为了结

束混乱局面，总统打算取消情报协调局，把该局工作分到其它机构去，研究分析处分到国务院，秘密情报处分到陆军情报部，正在建立的突击分队暂时分到海军陆战队。

杜诺万在拯救情报协调局免遭吞并的斗争中意外地找到了一个盟友，他使美国最高军事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信服必须有一个机构从事对敌秘密战争。传统的美国军事原则主张依靠武力毁灭性打击敌人，但是杜诺万认为，美国民众将不愿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重大伤亡的重演。他极力主张使敌人失去平衡的间接战略，而不主张歼灭战略，这样，希特勒和日本人将被迫分散兵力，结果他们想到处强大，到头来只能是到处弱小。

经过激烈的内部争斗以后，1942年6月13日总统发布行政命令，取消情报协调局，将其宣传工作转交给新建立的战争情报局，并组建战略情报局。措词含糊的指示规定战略情报局只有两项任务：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搜集并分析战略情报，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特种行动作出计划并给予指导。战略情报局的人员只有情报协调局的一半，并且是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汇报工作，而不是直接与椭圆形办公室联系。然而杜诺万挫败了一直企图搞掉他的对手，新建立的战略情报局局长不是别人，正是威廉·杜诺万上校。

当美国战争机器的齿轮运转发生故障时，获胜的日本人巩固了他们的征服地。然而山本五十六上将没有幻想日本会轻易取得最终胜利。当他在华盛顿任海军武官时，他就亲眼看到美国的工业能力。他认为日本必须在美国动员这种工业力量之前赢得决定性胜利。"如果让我不顾后果地打，我要在开始6个月或1年中猛打猛攻，"他说。"但是如果战争拖到第二年、

第三年，我就完全没有信心了。”山本五十六一直认为，在偷袭珍珠港后，有必要一鼓作气歼灭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残余力量，因此他选择夏威夷以西约1100英里的中途岛作为战场。

像日本进行的大多数海战一样，中途岛行动使用了偷袭和计谋，并且作了旨在使敌人失衡的兵力分配。山本五十六把他的舰队分为3个主要部分：4艘航空母舰组成攻击部队；十几条运输舰由两艘战列舰和一艘轻型航空母舰护送，运载5000军队去占领中途岛；主力部队由7艘战列舰组成，包括他那巨大的“大和民族”号旗舰。在大舰队行动之前，一支由两艘航空母舰组成的牵制部队去攻击阿留申群岛中的荷兰港并占领埃达克岛、阿图岛和基斯卡岛。攻击阿留申群岛的意图是在占领中途岛时把美国太平洋舰队吸引到北部去。当美国人识破这一计谋匆匆南下时，山本五十六的航空母舰与战列舰将把他们歼灭。

日本的兵力占绝对优势，但是太平洋舰队司令切斯特·尼米兹上将已基本掌握了日军的作战计划。通常称作“海波”站的珍珠港作战情报处已经破译了日本海军舰艇与陆上通信的密码，美国人称之为JN 25。海波站是海军的3个密码破译站中的一个，当时正在破译新版密码JN 25b①；另外两个站是华盛顿的尼加特站和过去在菲律宾工作、此时已撤到澳大利亚的卡什站。

海波站设在珍珠港第14海军军区办公大楼没有窗户、装有铁门的地下室内，由约瑟夫·罗切福特少校负责。罗切福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海军，1925年调到海军第一个密

①“JN”意为日本海军，“25”意为海波破译的第25号密码，“b”指的是该密码的第二版。

码破译机构工作，成为海军首批密码破译员之一。罗切福特和被尼米兹将军挑选的舰队情报军官埃德温·莱顿是老朋友，一起在日本学过语言。与其他破译员不同的是，罗切福特在海上工作过多年，对海战十分熟悉。

罗切福特本人对珍珠港事件承担了相当的责任。他认为，一个情报军官有责任使上级掌握敌人的意图，但他没能向金梅尔将军提供有关这方面的情报。为了弥补这一过失，他带领破译员、翻译、秘书们刻苦地工作。在3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通宵达旦地忙碌，送来的材料堆积如山，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制造的制表机、分类器卡嗒卡嗒的声音震耳欲聋。罗切福特的副手托马斯·戴尔少校首先用这类设备接替密码分析中劳累而又枯燥的脑力劳动。当人手不足时，被重创的战列舰“加利福尼亚”号上的军乐队队员则被调来协助工作，没料这些音乐工作者对密码分析特别熟练。

罗切福特很少离开地下室，每次值班达16至20小时，并在办公室安了一张吊床，以便随时能找到他。空调机工作不稳定，他穿着毡制拖鞋到处走动，有时在军服上穿一件吸烟服挡挡寒气。大家同心协力地工作，互相交流成果与看法。戴尔与他的领导工作一样卖力，每天值班12小时，一次连续好几天。当身体吃不消时，罗切福特就从桌上盒子中倒出几片氨基丙苯服下去。“当个破译员不一定需要刺激，”罗切福特说，“但是服些药管用。”

JN 25密码跟“紫密”外交密码或德国的“迷”字密码不同，给电报加密时不使用机器。为了节省费用，帝国海军将印制的代码本和密码表发至各舰队。这种密码由代表单词与短语的45000个5位数号码组成。在发出电报前，通信军官从密码表中任选一个5位数的号码，把此号码从电报第一

个字的代码号中减去，用这种方法给电报加密。下一个密码号也要从下一个代码号中减去，依此类推，直至将整个电报加完密。为了使收报人能破译该电报，电报内容中包括了发报人从密码表中所选号码的页、栏、行数。

日本这种密码系统的缺陷是代码本和密码表使用不了几个月就要变更。珍珠港的密码破译员从中观察到在同一指令序列中经常使用相同的号码。他们还通过无线电测向器找到拍发电报舰艇的位置。罗切福特的一些参谋人员甚至还能辨别出日本报务员的发报指法。例如，航空母舰“赤城”号上的报务员按键很重，据说他是在用脚踢键。

海波一点点攻克 JN 25，到1942年春天，海波站能够弄懂百分之三十这样的密码通信，由于单独的片断信息频率加大，数量增多，互相联系，破译员们便从这些信息中推测日本舰队的活动情况。如果一条小船经常与航空母舰在一起，那就很可能是一条加油船。每当航空母舰呼喊油船时，出现的密码组合与明显的加油地点名字在一起，就可能表示“加油”或“地点”的意思。不是每份电报都能破译的，但是破译员们取得长足的进展，自己编出了日本密码本。他们仿效英国的做法，把破译的这些信息列为“超级机密”，代号为ULTRA。

到了4月中旬，金将军要求海波站提供对日本意图的长远估计。罗切福特预见日本人会发动进攻，占领新几内亚东部地区的莫尔兹比港，孤立澳大利亚，然后在中太平洋举行更大的军事行动。尼米兹将军阻止了日本对新几内亚的远征，紧接着在珊瑚海打了一仗。这是首次单独使用舰载机的战役，也是日本的进攻首次受挫。尽管美国海军损失惨重，但是日本一艘航空母舰被击沉，另两艘重创，无法参加即将到来的中太平洋行动。

其间，罗切福特指出，中途岛是日本下一个行动目标，并把自己的发现报告了尼米兹。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海军指挥员在战略上遇到比这更大的困惑。日军的运动可能是为了再次攻击珍珠港、甚至攻击西海岸而玩弄的阴谋。事实上，金将军在华盛顿的参谋部就是这样看的。但是莱顿和罗切福特据理力争，认为无数证据表明山本五十六的目标在中途岛，尼米兹将军把全部赌注押在罗切福特的分析上，把他处于劣势的兵力调去防守中途岛。5月25日海波向他提供了最重要的情报，罗切福特亲自把截获的一份长篇电文送往司令部，电文中包含了日军作战命令的主要内容、攻击时间和地点。

然而华盛顿仍有人持怀疑态度，罗切福特和他的参谋人员寻找到一个说服怀疑者的办法。他们注意到敌人无线电通信中许多地方提到“AF”，他们认为指的是中途岛。为了敲定“AF”的意思，霍姆斯少校建议指示中途岛美军用明语发报，说明淡水厂出了故障。日本人像饥饿的鲨鱼吞下这个诱饵，两天后，海波截获的一份日本电报说“AF”淡水紧缺。

决一雌雄的日子临近了，尼米兹命令他的3艘航空母舰从太平洋西南部开到中途岛东北方向日本舰队的侧翼隐蔽起来。接着，雷达荧光屏上什么信号也收不到了。5月25日截获的电报是海波在战前成功破译的最后一份JN 25b电报，过了很久，日本人更换了一种新式密码JN25C，几个月后罗切福特领导的小组才破译了这种密码通信。接着美军在浓雾笼罩的阿留申群岛与日军遭遇，6月3日日本轰炸机攻击了那里的荷兰港。由尼米兹派出的一支巡洋舰部队的指挥官，把向他提供的情报抛到九霄云外，结果被日军智胜，只好把部队送上荒凉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

在日军攻击荷兰港的过程中，美军一架巡逻机在中途岛

以西约700英里的海面上空寻找敌人的先头部队。突然从浓云偶尔露出的空隙下面，飞行员发现了日本的运输船和护航队。这一情况立即报告了珍珠港，尼米兹将军闻讯后，用埃德温·莱顿的话来说，“脸忽地一亮，露出淡淡的微笑”。中途岛之战的帷幕拉开了。

虽然美国海军兵力、火力处于劣势，但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取得辉煌的胜利。在几小时内，美国俯冲轰炸机炸沉4艘日本航空母舰和数艘其它舰艇，而美方仅损失了一艘航空母舰和几艘小舰。这一仗标志着日本的征服开始走下坡路，面临着山本五十六不想打的持久战。尼米兹评论说，中途岛之战“从根本上说是情报工作的胜利。日本人企图偷袭，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自己反而遭到偷袭。”

中途岛之战以后，为了对密码破译工作保密，海军把成功归因于巡逻飞机和潜艇提供的情报。但是海战结束几天后，华盛顿吃惊地看到芝加哥《论坛报》头版披露说，美国海军早就知道日本舰队的兵力和部署。该报军事记者斯坦利·约翰斯顿从担任海军军官的一位朋友那里获得一份破译的山本五十六的作战计划，把其中大部分内容引进自己的文章。海军担心此事危及密码破译工作，坚决要求司法部违心地控告约翰斯顿和《论坛报》搞间谍活动。据说一位将军恼羞成怒，扬言要派海军陆战队占领《论坛报》大楼。

此案提出了一个当今反复出现的棘手问题——新闻媒介在报道敏感的情报问题时应负的责任。当大陪审团建立后，《论坛报》出版商罗伯特·麦考密克控告说，此案的要害是对该报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所持孤立主义立场进行惩罚，违背了宪法中的第一修正案和新闻自由。出于保密考虑，海军决定不将其破译工作向大陪审团公布，此案也就不了了之。海军

也非常担心议会的朋友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讲漏嘴，众议院议员埃尔默·霍兰上台谴责《论坛报》时说："我国海军以某种方式获得并破译了日本海军的密码……"海军密码破译员们简直气疯了，幸好日本人没有看到国会议事录。

1942年6月中旬，当美国人仍在欢呼中途岛之战胜利的时候，[3]纳粹德国根据希特勒的直接指示，对美国发起了破坏运动。两个破坏小组。每组4人由潜艇送至美国海岸，一组在长岛东端的阿默甘西特登陆，另一组在佛罗里达海岸杰克逊维尔附近上岸。德国军事情报部给他们的任务是破坏美国的工业，每个小组携带了大量现金、爆炸器材和精密定时装置，足足可以使用两年。

德国之所以派遣新的小组是因为在美国活动的所有德国间谍在西博尔德事件后已被联邦调查局一网打尽。负责该计划的是沃尔瑟·卡普，此人一度是德美同盟的领导人，1937年回德国，成为军事情报部一名中尉。卡普从曾在美国生活过、英语流利、熟悉美国风俗的人员中挑选了破坏者，年龄在22岁至39岁之间，每人都掌握能在美国军工厂找到职业的一门手艺，并且每人都对纳粹忠贞不渝。略带讽刺意味的是，卡普根据1683年移居宾夕法尼亚的德国侨民领袖弗朗兹·丹尼尔·帕斯托里斯的名字，将该计划称为"帕斯托里斯行动"。

这8个人在柏林附近一所学校受到两个月训练，学习了爆炸器材、导火索、定时装置的性能与使用方法，还学会用研磨材料使机器转不动的破坏方法，并且记住了对战争起重要作用的美国工厂的地点。飞机厂和铝厂是他们的主要目标，铁路与桥梁也在破坏之列。根据规定，他们不能走亲访友，每人都编造了自己的掩护身份，并像演员一样作了排演。由于掩护身份是公开的，他们携带了伪造的出生证、缓役证、社

会保险卡和汽车驾驶执照。两位组长各领到50000美元经费，另外20000必要时在全体人员中分配。每人除了腰间捆了4000美元外，另外带有一个钱包，内装400美元小面额钞票。破坏者们一共携带了175000美元，大部分是50元面额。他们一到美国，就要分两组到各自预定目标去。

1942年6月12日半夜时分，由乔治·达施带领的小组在阿默甘西特附近浓雾笼罩的海滩上岸后，立即脱下在潜艇中穿的德国海军工作服换上便衣。突然一束灯光从沙丘对面移来，当灯光接近时，达施看出那个影子是拿着手电的海岸警卫队员，那是阿默甘西特海岸警卫站的二等水兵约翰·卡伦正在执行深夜海滩巡逻任务。

“干什么的？”他喝问道。“你是谁？”

“我们是东汉普顿的渔民。我们的船搁浅了，在这里等候天明，”达施漫不经心地说。

卡伦说离天亮还有4小时，叫达施跟他去站上查验一下身份。达施把同伴们留下，跟着卡伦在沙滩上走了一程，看到这位年轻人赤手空拳，达施不肯继续走了。当卡伦坚持要他去站上时，这位德国人吼叫起来：“你多大了？”

“21岁，”卡伦回答。

“你有父母亲吗？”

卡伦点头回答：“有。”

“好吧，我不想杀你，”达施说。“你不知今天是怎么回事……那就忘了吧，我给你些钱，好好玩个痛快。”

卡伦不禁一愣，拒绝收钱，紧张地环顾了一下，希望能脱身，但达施已将一叠钞票塞到他手中，并紧紧抓住他的胳膊。

“看看我的眼睛！”他大声说。“看看我的眼睛！你定会在东

汉普顿见到我的，你认识我吗？”

“不，先生，”卡伦回答。“我从未见过你。”他慢慢后退，接着拔腿就跑，迅速消失在雾霭中。

达施回到伙伴那里，大家赶紧把军服和几箱器材埋在沙丘中，然后向阿默甘西特的林子走去。卡伦回到海岸警卫站，把同伴们叫醒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并出示了260美元作为证据。天亮时，他们去沙滩，顺脚印找到窝藏的爆炸器材和德国军服。联邦调查局接到报案后立即搜捕潜入的敌特。

其间，破坏者们已经到达曼哈顿。达施与欧内斯特·伯格在克林顿总督饭店合住一个房间，另两人在另一家饭店下榻。达施和伯格考虑了面临的处境，决定向联邦调查局投案自首。事后达施声称他一直反对纳粹，而曾经当过冲锋队员的伯格与盖世太保有牵连。也许他们认为，与那位海岸警卫队员相遇后他们已成为追捕的目标，一旦被抓获，肯定死路一条；或许他们想把随身携带的钱私吞了。究竟是何原因，至今仍然是个谜。

6月19日，达施去华盛顿向联邦调查局自首，将全部情况和盘托出，供出另一个破坏小组将在佛罗里达海岸登陆——事实上，该小组的4个人两天前就登陆了——说出了未被抓获的两个小组成员和他在美国联系人的姓名。联邦调查局的反情报人员从战前回德人员的档案中，查到达施同伙们的亲友，把他们监视起来，有几名破坏者不顾上级指示同亲友联系，结果未及实施破坏计划便束手就擒。

从第一组破坏者在长岛登陆起，仅仅过了14天，8名破坏者都先后落网，他们因破坏罪被秘密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其中6人1942年8月8日在哥伦比亚特区用电椅处死，达施和伯格减为无期徒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人被放逐德国。希特

勒听说帕斯托里斯行动失败的消息后暴跳如雷，臭骂军事情报部笨拙无能。

两年后德国人再次铤而走险。1944年11月29日，德裔美国人威廉·科勒普和德国公民埃里克·金佩尔乘潜艇在缅因州弗伦奇曼湾上岸。这次行动是由与军事情报部合并的德国安全部组织的，他们的任务是搜集舰艇、飞机和火箭的秘密与公开的技术资料。他们携带了60000美元现金和准备出售的99枚小宝石，这笔费用足以让他们在美国执行两年任务。

两人上岸后，没戴帽子，没穿保暖衣，顶着暴风雪来到大路旁，乘坐出租车到达班戈，转乘火车到纽约后，两人在东区比克曼大街租了一套公寓。

这两个间谍也许觉得在人口稠密的大都市能够暗藏下来，其实联邦调查局早已盯上他们。12月3日，英国一艘货船在芒特迪瑟特岛附近被鱼雷击中，联邦调查局推测，发动攻击的这艘潜艇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在人迹罕至的缅因海岸送间谍登陆。一队反情报人员在该区域展开扇形彻底搜寻，几名居民，包括一名童子军成员，报告说，他们发现有两个人步履艰难地在路上行走，在寒冷的天气里竟没戴帽子没穿防寒衣，令人感到奇怪。

其间，两位间谍不紧不慢地准备执行任务。他们买了一架收音机，打算改装成发报机，但是他们大部分时间用于购物、看电影、在高级餐馆吃饭。接着，科勒普像乔治·达施一样，也临阵畏缩了，乘金佩尔不备，到昆斯一位朋友家说明自己是纳粹间谍。那位朋友犹豫了几天，最后还是报告了联邦调查局。圣诞节后的一天，科勒普被关押起来。

科勒普立即作了坦白交代，并向联邦调查局讲了金佩尔的模样和他们合住公寓的地址，但是金佩尔已经溜走了。联

邦调查局人员检查了全市的饭店、旅馆，并且监视起时代广场的报摊来，因为科勒普告诉他们金佩尔经常买报纸，还有把零钱放在胸前口袋的习惯。1944年12月30日，监视报摊的两位密探发现了一个长相与金佩尔相同的人，选了一本平装书，从胸前口袋掏钱付款。密探们会意地点点头，上去将他抓住。科勒普和金佩尔因间谍罪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但都被减为终身监禁，战后被驱逐出境。

夭折的科勒普—金佩尔破坏计划是德国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最后一次尝试。像先前几次一样，这次失败也是因为选人不当和准备不充分，例如未能给科勒普和金佩尔提供不会引人怀疑的冬服。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的是，轴心国未能在美国建立有效的间谍破坏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调查局一共调查了 19649 起可疑的工业破坏活动，但是最后查明，每个案子都是由于疲劳过度、玩忽职守、对雇主不满引起的一般事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两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问题支配着同盟国之间的关系。迫切希望摆脱德国攻击的斯大林催促盟军立即进入西欧以便迫使希特勒从东线调走部队。邱吉尔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流血心有余悸，反对采取正面突击，因为他担心在法国大规模登陆有很大危险，也许会导致重大伤亡，因此他主张边缘战略，在大规模轰炸德国工业区的同时，在挪威和地中海发动进攻，消耗德国实力。罗斯福比较同意斯大林的主张，但在1944年前因缺少船只和设备而无法作出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所以他暂时选择了邱吉尔的战略。斯大林表面上对这些争论不屑一顾，实际上十分担心战时让苏联与德国互相残杀，战后资产阶级主宰欧洲。

珍珠港事件两星期后，邱吉尔飞抵华盛顿与总统面晤，举行了著名的阿卡迪亚会议。他强烈地主张立即进入北非法语国家，用两支盟国部队夹击德国非洲军团，并向盟国重新开放地中海。这一行动除了减小德军对俄国人的压力外，也许会沉重打击意大利，迫使它退出战争，提高盟国的士气。美国军事领导人认为地中海是个"枝节问题"，但罗斯福最后被说服，他渴望美军在1942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同意了该计划，决定在10月底或11月初实施火炬计划。

入侵北非将是对美国新成立的情报机构的考验。"我们整个未来将取决于火炬计划的结果和我们情报的准确性，"杜诺万对参谋人员说。但是华盛顿对北非的形势几乎一无所知。战略情报局一位资深的分析家舍曼·肯特说："1941年秋天，陆军情报部的人员竟不知道阿尔及利亚和赤道非洲法语国家的区别。"当要了解利比亚的供水情况时，他们抽出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一份1927年的有线电报，一篇积满灰尘的报纸副刊文章，题目是《沙漠之渴》，还有一份折叠式旅游宣传材料，上面有一个沙漠绿洲和两棵枣椰树的照片……这些就是有关利比亚供水的资料。"

美国为德国在北非法语国家的活动而担忧，早在珍珠港事件前就关注该地区的情况。自从法国战败后，法国及其殖民地由亲纳粹的贝当维希政权统治着。1941年2月，美国人允许维希政权进口有限的美国棉花和石油产品以换取一个观察所。美国在北非主要城市驻有12名副领事以保证这些物资不落入轴心国手中。这些"食品控制官员"驻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和奥兰、突尼斯的首都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实际上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在港口活动或在赌场同德国和意大利军官、间谍、告密者、双面间谍以及高级妓女混

在一起的机会搜集情报。

这些著名的“耶稣12门徒”是由海军情报部、陆军情报部在国务院协助下精心挑选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大家都能流利地讲法语。不知内情的领事官员们抱怨他们不干工作，德国人马上猜出他们是间谍，但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的兴趣集中在社交、做爱和烹饪上；他们互相妒忌，几乎天天争吵，”盖世太保报告说。“使我们庆幸的是，敌人选用的这班间谍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

然而纳粹完全想错了。1941年夏天这班业余间谍到达北非几星期后，便通过驻阿尔及尔总领事、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政治间谍罗伯特·墨菲向华盛顿发回了重要情报。他们搜集有关法国殖民地军队和法国海军作战准备的资料、绘制港口设防与设施分布地图，并且分析当地人民对维希政权的反应。他们也建立了情报员和无线电发报员的秘密网络。在美英决定入侵北非后，这个地下机构转交给了情报协调局及其继任单位战略情报局。

杜诺万委派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功勋卓著的海军陆战队员威廉·埃迪上校管理北非情报机构。埃迪的公开身份是驻丹吉尔总领馆的海军武官，领导情报工作十分合适。他出生于叙利亚，父母是传教士，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和法语，担任过开罗美国大学英语系主任。

起初，埃迪同德国人的麻烦倒不算大，与英国人却发生不少纠葛，因为英国人对美国人进入他们领地不满。驻丹吉尔的英国军事情报部6处负责人是个“为了蝇头小利不惜出卖祖国、出卖灵魂、甚至出卖自己母亲的人”，他汇报说，此人对美国人小心提防，据说阴谋毒害自己的助手，因为助手对美国人“无话不说”。

驻北非的法军是欢迎还是反对盟军入侵呢？高级军官们已经宣誓效忠维希政权的首脑贝当元帅，拒绝宣誓被认为是背叛。认为法德仍在交战的其他法国人支持自由法国阵线领导人戴高乐将军。戴高乐虽有英国人支持，但美国人不喜欢他，负责北非情报工作的墨菲另外选择曾经逃脱德国搜捕、有勇无谋的亨利·吉罗将军作为法国各派力量最能接受的人物。

当墨菲要弄法国各个派别时，埃迪用杜诺万给他的200万美元经费，建立了一个扩大现有法国地下组织的秘密网络。战略情报局的间谍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和曾在卡萨布兰卡经营毛皮的戈登·布朗谋求当地领导人的支持，其中有活动在摩洛哥沿海山区的里夫部落首领、隐名为"塔塞尔斯"，还有摩尔人宗教领袖斯特林斯——他动员数千信徒为美国人搜集情报。武器、弹药用外交邮袋从直布罗陀的英国军火库运到丹吉尔，由走私者再送往卡萨布兰卡。西班牙内战期间留下的一批手榴弹伪装成走私茶叶和食糖用骡子从摩洛哥送去。

尽管出过几起差错，埃迪的间谍提供了大量有关海滩情况、防御工事和法军兵力的详细情报，加上破译截获的无线电信息等其它来源的情报，北非远征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对作战条件有了极其全面的了解。1942年8月，埃迪去伦敦向盟军领导人介绍情况。他过去负过伤，走路一拐一拐的，军服上佩戴着5排勋表，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兔崽子总是大难不死，"乔治·巴顿将军不无敬佩地说。甚至陆军情报部部长、无情抨击杜诺万的秘密战争的斯特朗将军也对埃迪出色的情报工作深表敬意。

然而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部对埃迪非正统的一些行动不热心。登陆一开始，埃迪便主张暗杀驻北非德国机构的负责人，

其中不少是盖世太保成员。但这一建议被否定了，战略情报局继尔求助于一个应急计划：由一位非洲黑人在纳粹官员的饮料中投放蒙汗药。在另一次行动中，埃迪组织劫持了北非沿海季风与潮汛专家、莱奥蒂港的领航长；此人被藏在汽车尾部行李箱中，在去丹吉尔途中几乎窒息而死。

一支由10万大军和大量给养、装备以及一支舰队组成的远征军行动要想保密谈何容易，因此精心制订声东击西、迷惑敌人、使德国人摸不清盟军目标的计划很有必要。战略情报局的间谍传出假情报，说该远征军将去离卡萨布兰卡约1500英里的法属西非海岸的达喀尔；至于集结在直布罗陀港的大量船只，他们则放风说这些船是为了去援救受围困的马尔他。这些谣言正好与德国人自己的分析不谋而合，像美国人当初认为日本人没有力量进攻珍珠港而排除了偷袭可能性一样，德国人确信盟军没有力量入侵北非。

1942年11月8日，罗斯福总统在西马里兰的卡托克廷山香格里拉休养所，心事重重地等待着重要消息。当秘书报告华盛顿陆军部打来电话时，罗斯福用颤抖的手接过听筒，专心致志地听完电话后，突然大声说："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简直太妙了，值得庆贺！"

总统放下话筒喜笑颜开地转向客人们。

"我们已在北非登陆，"他宣布。"伤亡比预料的小，我们正在反击。"

盟军入侵使德国人和法国的维希政权如梦初醒，直到登陆船以排山倒海之势把突击部队送上岸时他们才意识到盟军在登陆。守港海军仍然效忠贝当政府，战斗十分激烈。在登陆的同时，战略情报局指挥的法国地下组织发起了暴动，但

是在许多地方战斗打不响，因为预约的武器弹药供应不上来，一些抵抗组织没有接到入侵时及时动员的通知，上层有人突然叛变，部队登陆的地点搞错了。在美军进入北非首府阿尔及尔前，该市被抵抗组织和维希部队轮番控制。

一些特别行动仍然获得成功。入侵盟军登陆时，友好的向导前去迎接，并给他们提供地图，介绍道路、设防情况和机场飞机数量。战略情报局的间谍陪同盟军，向他们介绍地形以及法军和德军司令部的位置。一名间谍及时拆除了爆炸装置上的盖子，粉碎了维希部队炸毁一条重要隧道的企图。在入侵进行时，7个中队的德国飞机在约300英里以东的邦角半岛上空徒劳地盘旋，它们上当受骗，去追赶根本不存在的开赴马尔他的护航队。

大规模的巷战持续到第二天，吉罗将军被从法国带到北非，劝说维希部队停火，但他的努力未能成功。这时墨菲只好请在阿尔及尔的琼·达兰将军帮忙。众所周知，贝当的副手达兰与贝当狼狈为奸，但墨菲和艾森豪威尔认为他是能够说服亲维希人员结束流血的唯一人物。这位海军上将耐心听从规劝，当听说德国人已经占领了维希政权控制下的法国时，达兰宣布希特勒违犯了1940年的停战协定，表示愿意同美国人合作。艾森豪威尔当即承认达兰为法国驻北非的高级专员，反过来，达兰也于11月10日命令维希部队放下武器。

“达兰交易”使“火炬计划”的军事胜利黯然失色。在达兰统治下，曾经积极支持盟军的法国军官受到惩处，反犹太人的维希法令继续有效，戴高乐将军的支持者们被投入集中营。罗斯福总统辩解这一安排“只是权宜之计”，可是自由主义者们谴责这一卑劣做法出卖了这场战争所争取的民主思想。登陆前就在北非与反维希力量合作的战略情报局的军官们尤为

气愤，他们中许多人来自学术界，对法西斯主义深恶痛绝，他们以消极执行命令表示对“达兰交易”的抗议。在华盛顿，杜诺万也同样为此忧虑，因为这一做法损害了盟军对被占领欧洲抵抗力量的号召力。“实际情况要求我们除掉达兰政权，此事不能久拖不决，”他写道。

当时杜诺万是准备派人暗杀达兰还是打算更换这位领导人，现在不得而知。不久，有人给他解决了这一难题：1942 12月24日，达兰将军被一位狂热的法国青年击毙。美国人如释重负，任命吉罗将军接替达兰高级专员职务。

达兰遇刺后北非兴起一股怀疑浪潮。人们把目标指向各种秘密机构，包括战略情报局内的亲法人员。当有人揭露刺客曾经参加由战略情报局卡尔顿·库恩指导训练的突击队时，库恩成为警方注意的目标。他曾去过刺杀现场附近，有一支与刺杀达兰相同型号的柯尔特手枪，对达兰恨之入骨，并极力主张把刺杀作为一种政策手段。尽管库恩否认与刺杀事件有牵连，但埃迪上校很快派他去了突尼斯前线。“为了别人，也为了他自己，让库恩离开似乎是最好的办法，”他说。

然而总的说来，战略情报局在北非战役之后提高了声望，虽然它的特别行动没有全部成功，但它在准备阶段和入侵期间都提供了重要情报。部分地由于它的工作，不可一世的非洲军团受到埃及方向的英军和阿尔及尔的美军的前后夹击。盟军也赢得了入侵南欧的基地。这些成就不仅使华盛顿、而且使持怀疑态度的军事指挥员对新建的战略情报局刮目相看。军方发现，该局可以成为指导战争的有用伙伴，并且能够与之合作。这种新的气候为该局完成未来的艰巨任务创造了条件。

14. 秘密部队

1943年1月27日，在日本占领的缅甸北部上空，12顶降落伞像巨大的白花徐徐下落，投向丛林中一小块空地；如果谁没有进入空投场，他很可能会挂在高高的树枝上绝望地饿死，或活活被丛林蚂蚁吃掉。大家平安着陆后，把降落伞藏进草丛，并寻找空投的武器、给养和爆破器材。这是战略情报局新成立的101游击分队开始执行打击日本人的第一次任务。

4个月前，中国-缅甸-印度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勉强批准了101分队的这次行动。“希望你们从缅甸丛林发出巨大轰鸣，”他对分队长卡尔·艾夫勒少校说。史迪威曾被日本人从缅甸赶跑，撤退的盟军遭到夜袭和伏击，被搞得大伤元气。这次派遣101分队就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艾夫勒的任务十分艰巨。邱吉尔称缅甸北部是“极其困难的作战地区”，可是本来计划去中国执勤的101分队25名成员都没有丛林作战经验。丛林覆盖的山峰连绵起伏，巨大的水蛭和疟蚊会把人咬得遍体鳞伤，猛虎、毒蛇更使人随时可能丧命。丛林中极其潮湿，制服和皮靴很快会腐烂，武器如不经常保养也很快会锈蚀。而日本人却善于丛林作战。

艾夫勒虎背熊腰，体重250磅，身高6英尺，像“莽汉”比尔·杜诺万那样喜欢冒险，史迪威曾戏谑地称他是美军“头号暴徒”。他精通柔道和拳击，会驾驶飞机，射击百发百中，在担任边境巡逻兵时，学会了走私分子秘密活动的一些诀窍。他喜欢命令新兵用拳猛击他的腹部而他却岿然不动，

以此显示自己。当华盛顿战略情报局决定组织小分队去亚洲开展游击行动时，艾夫勒被迅速从夏威夷召回，由他亲自挑选小分队成员。“我叫大家自愿报名，并告诉他们，也许他们在领取去地狱的通行证，”后来他回忆说。

艾夫勒在印度边境纳济拉的一个茶叶种植园建立了训练基地，招募了数百名卡钦部落的人作为101小分队的骨干。他们个子瘦小，身体结实，由于吃槟榔子，牙齿发黑，但他们非常适合在丛林作战。他们祖祖辈辈居住在缅甸、泰国和老挝接壤的金三角，靠走私鸦片或参加当地军阀的雇佣军维持生计。美国人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在丛林生存的方法：食用白蚁和野蜂，用暗箭和绊网猎取野猪——也用同样的方法与日本人作斗争。卡钦部落最喜欢的武器是削尖的竹桩，插在敌人巡逻队出没的道路两侧，日本人遭到伏击后，常常会逃进丛林隐蔽，结果就扎在尖尖的竹桩上了。

卡钦部落的人不敢使用复杂的机枪而喜欢滑膛枪，因此艾夫勒向华盛顿索要500支，陆军部把内战期间库存下来的滑膛枪运去，卡钦人自豪地扛着这些枪去打仗。

接到史迪威将军命令4个月后，艾夫勒认为101小分队向史迪威将军送去丛林中发出的轰鸣的时机到了。由8名西方人和4名卡钦人组成的精干小组将空投到缅甸北部，破坏联结曼德勒和日军主要基地密支那的铁路线。跳伞训练采取了原始方法，装备是临时凑合的。由于没有空降步兵使用的背包式降落伞，他们只好使用机组人员穿的坐垫式降落伞。空投场是柚木砍伐工在丛林中砍出的一块空地。

平安着陆后，行动小组建立了大本营，一半人留下来，另外6人带着食物、武器和C型熔注炸药向铁路走去。从地图上看，他们的目标在50英里以外，但是丛林中的山路蜿蜒

曲折，实际路程有100英里。来到岔路口，卡钦头领拔下一根头发，向空中一扬，头发慢慢飘到左边岔道上。"日本人在那边，"他说。

两天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在路边埋设爆炸装置，刚刚埋完就被日本巡逻队发现。一人在掩护时丧生，其他人躲进丛林，一会儿，身后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5个月后，当人们以为他们早就完了时，从日本人的追赶下虎口脱险的11位幸存者回到纳济拉营地。他们炸毁了几英里铁路和几座桥梁，使铁路暂时瘫痪。

这段插曲标志着长期而又艰苦的游击战的开始，说明在没有大部队的时候，隐蔽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大部队。1944年底，101分队在整个缅甸开展活动，破坏日本的通信，骚扰敌人的巡逻队，并营救降落在丛林中的盟国飞行员。该分队鼎盛时期有566名美国人和近万名卡钦人，估计杀死杀伤敌人5500名，营救飞行员200多名。只有15名美国人和不到200名卡钦人在战斗中丧生。

史迪威将军对卡钦人报告的杀死敌人的数字有怀疑，一天，他问一名卡钦人他们是怎样准确统计数字的，这位卡钦人打开腰间一个盒子，在将军面前倒出一堆干果一样的东西。

"那是什么？"史迪威不解地问。

"日本人的耳朵。"对方回答。

战略情报局开始时只不过是比尔·杜诺万的设想，但后来它的人员遍布全世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已聘用近16000名男女雇员，相当于一个小型陆军师。它的年预算猛增至约5700万美元，大部分来自特工费。杜诺万本人也晋升为两颗星的少将。多数人认为，能在战略情报局工作，

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光荣。"我们是志愿服务的堂堂男子汉，"卡尔顿·库恩回忆说。"从来没有人向我们发号施令，上级总是客气地问我们，'你愿意……（比如献出生命）吗？'我们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愿意'。"

战略情报局人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名牌大学的学生、华尔街的银行家、酒吧服务员、律师、专业运动员、马球赛手、白俄罗斯王公贵族、百万富翁、电影名星、流亡知识分子、改恶从善的窃贼、风流女人。也从那些知道一国一地语言、地位不太高的人中，或杜诺万认为有重要专长的人中物色对象。"有的人干不担风险的学术工作，有的人干会引起轰动的危险工作，不过也有人什么也不干，只是用政府的钱优先周游世界，"曾在战略情报局工作过的斯图尔特·艾尔索普说。

比较著名的成员有向南斯拉夫游击队走私军火的电影演员斯特林·海登，特迪·罗斯福的孙子克米特·罗斯福，圣母院足球队的后卫和职业摔跤运动员江平·乔·萨沃尔蒂，后来成为最高法院法官的战略情报局人事处处长、芝加哥律师阿瑟·戈德伯格，空投到南斯拉夫和挪威的波士顿棒球运动员莫·伯格，俄国小说家托尔斯泰的孙子伊利亚·托尔斯泰，后来成为内阁部长的约翰·加德纳，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建人约翰·费尔班克，出生杂技世家的亨利·林林·诺思，后来成为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拉尔夫·邦奇，因与法国地下组织合作而荣获优秀服役十字勋章的好莱坞替身杂技演员勒内·杜萨克。

花名册上有许多社会名流的名字，如梅隆、布鲁斯、格斯特、瑞安、杜邦、范德比尔特、摩根和拉瑟弗德，难怪嘲笑战略情报局的批评家惊叹道："啊，如此社会化！"也许其他

人认为此话改为"啊，如此社会主义化"更合适，因为该局在政治上是极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赫伯特·马库塞和激进的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与其他几名公认的共产主义者也在受雇名单之列。曾经在西班牙内战中为效忠派服务、由共产党资助的亚伯拉罕·林肯营加入了游击队到敌后去战斗。当一名助手反对吸收这些左派分子时，杜诺万耸耸肩说："只要能帮助打败希特勒，我会同意斯大林参加战略情报局。"

杜诺万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把学者和学者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情报工作。"我们没有依靠'妖艳的金发女郎'，也没依靠江湖骗子，"他说，"我们着眼于脚踏实地、艰苦细致的工作。"战略情报局总是吸收学术天才从事情报工作，它研究的领域为在美国建立相同学科打下了基础。研究分析处处长威廉·兰格说："总之，在研究外国实力与意图方面，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大进了一步。"

随着战略情报局的扩大，研究分析处也扩大了。一些小组分赴各个战区，去判断可能的轰炸目标，提供作战简令，审问俘虏。侦察小组在非洲和欧洲战场寻找被击毁的德国坦克，抄下它们的顺序号码；在专家手中，这些号码是研究德国坦克生产的可靠数据。战略情报局的经济学家把他们的研究方法用于战略轰炸，对轰炸目标的选择提出分析意见。

1942年11月美军在北非登陆后，法国维希政权封锁了法国与瑞士的边境，艾伦·杜勒斯偷越边境到达瑞士首都伯尔尼。他悠闲自在，温文有礼，嘴上总是叼着欧南石烟斗，看上去像名牌大学教授而不像间谍头子。他以美国总统特别代表的身份旅行，破旧的手提箱中装着一套衣服和1万美元的信用卡。虽然他后来说，一名好间谍应该甘当无名英雄，但

他在俯瞰阿勒河的富丽堂皇的大厦租了一套高级公寓，雇用了一名女管家兼厨师——后来发现她是一名德国间谍——并向当地新闻界透露了他的存在，等待有人来向他提供情报。

杜勒斯对活动隐蔽的影子世界并不陌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任驻中立国瑞士领事，实际上是一名间谍，受威尔逊总统派遣参加过巴黎和会，担任过驻若干国家的外交使节。在30年代，他与兄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一起，成为华尔街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主要合伙人。他对间谍活动总是怀有浪漫主义想法，1941年当杜诺万请他领导情报协调局驻纽约办事处时，他欣然接受。但他同杜诺万和戴维·布鲁斯的关系很别扭；他认为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杜诺万与布鲁斯是潜在的竞争对手。

战略情报局成立后，杜勒斯同意到瑞士去开设一个潜听哨。由于伯尔尼、里斯本、马德里、斯德哥尔摩和伊斯坦布尔都与柏林和伦敦有直线民航服务，因此这些中立国首都是情报的重要来源。在伯尔尼，杜勒斯与移居国外的反纳粹政治家、商人、知识分子广交朋友。起初，战略情报局驻伯尔尼办事处报回华盛顿的情报，经过同破译的德国密码对照，发现有错误。“近来伯尔尼发回的消息陆军部一概认为不可靠，”一次杜诺万对杜勒斯说。不久，杜诺万强调，杜勒斯有必要“认真核对一切情报来源”。通常，盛气凌人的杜勒斯会火冒三丈，但这次他没有发作，因为他正在与他后来称作“全世界情报机构中首屈一指的间谍”建立关系，开辟情报来源。

此人叫弗里茨·科勒，是负责德国外交部与德军最高司令部联络工作的小助理。每天他把来自德国驻世界各国大使馆和情报机构的电报筛选后整理一份摘要。这一极为敏感的

岗位使科勒——虔诚罗马天主教徒和反纳粹的坚强战士——有机会帮助消灭第三帝国。起初他希望"黑色管弦乐队"——由德国将军和军事情报部成员组成的反希特勒秘密组织——推翻纳粹政权。1943年，当他认识到只有德国战败才会实现这个目标时，他决定自己采取行动。"一个人捏紧拳头藏在口袋里是无用的，"后来他说，"拳头必须打出去。"

1943年8月23日，科勒怀揣鼓鼓的公文包悄悄走进英国驻伯尔尼公使馆求见陆军武官——当时他已被任命为外交部信使，使他能经常去瑞士——他被领去见一位年轻助理。科勒说他刚从德国带来重要情报，那位年轻人看到头发脱落、貌不惊人的科勒局促不安地坐在椅子上，认为来访者不是无赖就是疯子，毫不客气地将他撵走。接着科勒决定去找美国人。他不愿再次碰壁，这次他请流亡在伯尔尼的一位反纳粹朋友帮助牵线搭桥。

结果杜勒斯接见了科勒。"我希望德国在这次战争中战败，"科勒一见面便说，"这是拯救我的祖国的唯一办法，我想我能帮忙打败德国。"当科勒从公文包中取出186页绝密材料时，杜勒斯被深深吸引住了，随意拿起一张打印材料，发现那是德国总参谋部关于带翼火箭有效打击英国的绝密报告，另一份是陆军武官从东京发回的日本计划在缅甸发动攻击的报告。这些文件签发日期没有一份超过两星期，大多数是几天前的最新材料；而这仅仅是第一次，科勒许诺今后要提供更多材料。

美国人获得这些宝贵材料极为高兴，但这些文件真实可信吗？科勒是真正投靠，还是德国企图打入同盟国的间谍？即使这些材料是真的，它们也许是德国人故意漏出的一点微不足道的东西，让同盟国造成错觉，今后在重大问题上上当

受骗。这些可能性一一闪进杜勒斯的脑海，因为他自己是个经验丰富的间谍，不会轻易相信科勒送上门的东西。最后，美国人和英国人分工查验这些材料，通过与破译的密码电报比较后发现，这些文件不仅可靠，而且非常重要，不可能是用作欺骗的诱饵，尽管有人仍然怀疑科勒是间谍。

科勒化名为“乔治·伍德”，他提供的材料在华盛顿战略情报局被称作“波士顿系列”。在14个月中，他给驻伯尔尼战略情报局办事处提供了约1600份德国外交部的绝密文件。杜勒斯不知道ULTRA的存在，所以认为科勒的情报特别有用。德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一份电报谈到即将离开大西洋海岸的一支美国大型护航队出发的时间和预定航线。获得这份情报后，航期作了改变，使护航队避免了等候的德国潜艇的攻击。另一份电报证实了西班牙弗朗哥政权把炼钢材料钨伪装成橘子运往德国的消息。那些文件还透露，在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有个化名为“西塞罗”的德国间谍。

在开始几个月，科勒亲自去伯尔尼送文件。在德国加强安全保密工作后，有关方面就发给科勒一架微型照相机，指示他把所有新材料都拍摄下来，把微型胶卷送给瑞士一位“女友”——实际是战略情报局的一位特工员。在一位当医生的朋友帮助下，科勒在柏林一家医院的地下室拍摄照片，遇到盟军轰炸时，在手电下工作。有一次，盖世太保头子出其不意来到外交部，要求查阅一份当时科勒正在拍照的文件。在医院接到通知后，他赶紧回到办公室，一边假装查找，一边把文件悄悄塞进了档案。

同盟国的兴趣转向远东后，华盛顿渴望看到德国驻东京武官的报告，以便了解他们对日本的态度，但是杜勒斯没有办法直接向科勒提出要求。最后他突然想出一个主意，让他在

瑞士的“情妇”给他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她希望给儿子“买些这里的商店过去常卖的日本玩具……不知柏林是否有？”科勒悟出字里行间的含意，在后来提供的一批文件中包括了直接来自驻东京德国使馆的报告。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计划失败后，科勒停止提供情报，他成功地躲避了大搜捕，1945年初逃往瑞士。

杜勒斯通过德国驻苏黎世的副领事、德国军事情报部间谍汉斯·贝尔恩德·吉泽维厄斯同反希特勒的阴谋分子建立了直接联系。吉泽维厄斯身高6.6英尺，眼睛近视，性格拘谨，出生于一个保守的普鲁士家庭，鄙视纳粹政权。“我不能降低身份去当小偷，从办公室窃取无用的东西当宝贝收藏起来，”他告诉杜勒斯，“但我愿给你提供一个希望希特勒死掉的德国将军名单，并愿帮助你同他们联系。”为了表明自己是可信任的，他提醒杜勒斯，驻伯尔尼的美国和英国公使使用的密码已经泄露，并从笔记本上读了几段杜勒斯最近发往华盛顿报告的内容。

就这样他们建立了联系。在后来18个月中，吉泽维厄斯给驻伯尔尼的战略情报局办事处提供了有关反希特勒秘密活动的内幕。吉泽维厄斯每次从柏林回来，总要到杜勒斯公寓去。遇到这些情况，杜勒斯总是让女管家晚上休假。但是一天晚上，女管家回去取围巾时撞见刚到的吉泽维厄斯，她拿起他的帽子，发现上面有他名字的为首字母“H.B.G.”。第二天，她向德国领事馆报告杜勒斯头天晚上会见了一位高个子德国人，并讲出了他名字的为首字母。此人是谁，不言而喻，领事馆两位高级官员想盘问吉泽维厄斯。他假装对他们的干涉十分恼火，说他同杜勒斯一起吃饭是因为这位有名的美国间谍头子是他的最佳情报来源，并威胁说，如果他们向别人

谈论此事，他就立即叫上级把他们从外交岗位上撤下来。最后他们再三向吉泽维厄斯表示道歉。

战略情报局的工作体现了杜诺万对非正规战的爱好，它的名声主要在于秘密行动而不在于战略情报，除了在太平洋地区海军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部门不让其插足外，它派出的特别行动小组几乎遍及世界各地。这些小组在敌后与法国的马基游击队、意大利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缅甸的卡钦部落和西西里的黑手党一起行动。在中国和印度支那他们也开展广泛活动。

特别行动小组很小，每组 3 至 5 人，通常夜间空降或乘渔船登陆。他们与当地地下组织一起行动，同战略情报局总部秘密保持无线电联系。他们安排空投物资与弹药，帮助被击落的盟军飞机机组人员逃走，炸毁桥梁、道路和供电线路，骚扰并阻碍德国人的行动。在希腊，战略情报局给游击队提供了流动野战医院，用骡队从一个村庄拖到另一个村庄。在南斯拉夫，战略情报局在当地游击队协助下建立了简易机场，营救了 400 多名被击落的飞机机组人员。后来，这种特别行动小组补充了装备更精良的三四十名别动队员，与当地游击队并肩作战，狠狠打击被诺曼底盟军突围时急速行进所切断的德军。

由于英国秘密情报局阻止战略情报局把英国或它的殖民地作为从事独立隐蔽活动的基地，因此杜诺万要把间谍派到各地去，必须排除英国人的阻挠。罗斯福总统和杜诺万将军都坦率地表明反对帝国主义，英国秘密情报局，包括拉尔夫·范德曼昔日忠诚的朋友、此时担任副局长的克劳德·丹西爵士，怀疑战略情报局的活动会加快反殖民主义思想的传播。

虽然战略情报局驻伦敦办事处的亲英领导人受到友好接待，但英国秘密情报局与在各地的战略情报局下属机构的关系变得冷淡、甚至敌对，特别是在德里、开罗和锡兰等前哨阵地。

为了监视美国人，丹西建议，英国秘密情报局与美国战略情报局使用相同的通信系统，这样英国人就能了解战略情报局的一切活动，而秘密情报局则将自己的活动包得严严实实。杜诺万没有上这个当，决心在西欧独立组织情报与破坏活动。最后，在贝克街的特种行动执行局总部根据同宗精神作了非正式安排；英国这一非常规战争机构也曾与秘密情报局发生过纠纷。1943年年底，杜诺万已在法国建立了独立的间谍机构。

“杰德”小组是杜诺万准军事力量的精华。作为战略情报局和特种行动执行局的联合组织，这种3人小组由一名美国人、一名英国人和一名该组派往国家的人组成。从1944年5月开始，“杰德”小组在法国空降，准备组织地下抵抗力量支持即将开始的诺曼底入侵。时间安排至关重要。如果暴动过早，德国人可能会将其镇压下去；如果暴动太迟，那将对盟军没有帮助。登陆成功后，抵抗力量便在敌后制造混乱，如截断通信，伏击敌军，防止撤退的敌人毁坏重要设施。他们的基本战术是:“偷袭、歼灭、撤离”。

每个“杰德”小组面临着极大危险。在诺曼底登陆前几周，德国人广播了一则警告：任何民族的人，一旦发现他参加破坏或恐怖活动，或煽动暴乱，立即处决。空投到法国的第一批“杰德”小组中一位领导人杰克·邦斯尔少校在德国人的检查站被拦住，查出身份后被当场枪决。然而制订计划中的差错也与敌人一样有巨大危险。有时上级指示不完整，空投场地不正确。上级向计划在布列塔尼空投的一个分队保

证空投场没有德军，但结果这些人却被投入德国第二空降师驻地中间。有时缺乏训练的空勤人员把“杰德”小组投到预定目标之外，或者引起敌人的注意。除了可能被敌人抓住外，地下组织中也混进叛徒，被人出卖是一直面临的危险。

参加“杰德”行动的共有82名美国人，其中53人荣获优秀服役十字勋章、海军十字勋章、战争十字勋章、功绩勋章、银星或铜星奖章或紫心奖章——据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奖比例最高的单位。足智多谋、勇敢顽强是“杰德”成员的特点。当保罗·西尔上尉和他领导的马基游击队带领几名美国和英国飞行员到达盟军地域后，西尔回到德军占领的地区，忽然听说能获得重要情报：一名在德军司令部担任清洁女工的抵抗组织成员获得一份敌军防御计划。盖世太保知道西尔的模样，随时可能认出他将他处死，但为了获取情报，他两次越过德军防线，并把所获情报送给美军。

在诺曼底登陆期间，战略情报局参加了迷惑敌人的大规模行动，使德国人以为诺曼底登陆只是一种佯攻，盟军的真正意图是在塞纳河以北的加莱海峡省。一时间无线电报频繁传向该地区的抵抗组织，扫雷艇和鱼雷快艇出没于附近水域。加莱对面英国港口与河流的舰只也紧锣密鼓作准备。结果这一计策大获成功，把德军第15集团军共22个师从诺曼底正面牵制过去。大规模进攻日开始后一星期，抵抗组织小分队在敌后到处毁坏铁路，公路运输也彻底瘫痪，因为沿路树木被砍倒、桥梁被炸毁。德军一个精锐装甲师奉命从图卢兹开往诺曼底，通常只需3天，结果15天后才到达前线。

战略情报局协助诺曼底登陆做了大量工作，2个月后，在盟军登陆法国西部时也发挥了关键作用。驻阿尔及尔的战略情报局人员提供了关于德军海岸火炮掩体和雷区分布的详细

情报，并查明油料和弹药仓库的位置。战略情报局的一个分队担任美军先遣部队，同被德国人释放去打击法国抵抗力量的 700 名俄国士兵相遇。一天夜里，这些身穿德国军服的俄国士兵击毙了德国军官，掉转枪口狠狠打击德军其它部队。当美军后续部队赶上来时，战略情报局的人员十分气愤地听说美国已同意把这支前红军部队归还俄国当局。第 7 集团军情报处的威廉·奎因上校当机立断，把这些俄国人编入法国外籍军团，联合起来同德国人作战。总之，战略情报局在法国南部的行动十分成功，他们获得英国的最高奖赏，并受到第 7 集团军总指挥亚历山大·帕奇将军的表彰，他向杜诺万高度赞扬战略情报局提供的情报“极为准确”。

然而一场悄然兴起的谍报革命正使秘密行动的地位下降。MAGIC 和英国的 ULTRA 拉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在这个新时期，通信情报——截获无线电信号、解密破译敌方无线电通信——使作为搜集情报主要手段的间谍工作黯然失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情报工作的最大成功不是间谍带来的，而是破译德国和日本的密码带来的。通信情报局提供的报告比间谍提供的情报更新、更丰富，决策者和战略家们也认为更可靠。总的看来，间谍在情报搜集中的作用，同步兵在竞争技术的战争中的作用一样无足轻重。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宣称“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欧洲指挥的战役和我们在太平洋的一切行动，都与我们通过截获密码信号所得到的情报密切相关”。

ULTRA使英国人控制了在英国活动的全部纳粹间谍，从而帮助盟军入侵欧洲选择登陆地点时制造假象迷惑德国人。盟军登陆后，ULTRA向他们报告德军即将反击，从而

取得了重大战果。1944年8月初，美国从诺曼底灌木丛中冲出来，浩浩荡荡地通过阿夫朗什德军防区的狭窄地带。这个瓶颈地段立即引起希特勒的重视，他命令德军司令从前线抽调4个装甲师前去阻击美军。元首的命令被英国密码破译员及时截获并破译，使盟军能对德军的攻击，作好充分准备，成功地阻击了德军。"我们搞到元首的命令，"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手下一位指挥官宣称。他们的确搞到了。德军攻击的失败标志着希特勒盘踞滩头堡阻止入侵者、延缓纳粹德国垮台希望的破灭。任何间谍都不可能如此迅速准确地提供这样重要的情报，也不可能使人们如此信任他的情报。

通信情报在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单纯密码破译和情报不能消灭敌人，战争仍须在战场上决胜负。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经常提的一个问题是，既然同盟国能够破译德国和日本的密码，那为何他们不能更快取胜？一种回答是，他们获胜的速度已经够快了，另一种回答是，不管同盟国的将军掌握多少有关轴心国意图和兵力的情报，他们必须有军队、舰艇和飞机，必须有武器、弹药和食物，还要用敢于胜利的精神鼓舞军队。

通信情报的作用在大西洋之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参战之初，德国潜艇不断袭击美国船只，因为美国海军对付德国潜艇进攻的准备极不充分，护航舰供应不足，也未及时建立海上护航队。被击毁的油船淌出的油很快蔓及大西洋海滩，不到两星期，美国沿海油船中相当一部分被击沉。在提供燃料和鱼雷的"乳牛"潜艇的支持下，德国攻击性潜艇能在海上潜伏几周。最后当美国护航队建立起来时，德国潜艇战的主要人物卡尔·德尼茨将军把潜艇撤到北大西洋。

密码破译是大西洋战争胜利的关键。起初德国人处于优势。德国海军无线电截获和密码破译机构在战争之初破译了英国海军的密码，使德尼茨掌握了皇家海军的大量情报，包括每支护航队的位置、方向与速度，以及英国海军部对所有德国潜艇位置估计的每日报告，直至1943年7月英国人发现了这一情况后才改变了密码。另一方面，英国密码破译员们破译德国海军密码时遇到困难。德国海军使用的“迷”字加密机比陆军和军事情报部使用的机器更为复杂，并且调节值每24小时作一次改变，迫使敌人每天都要破译新密码。

幸运的是，1941年年中，英国密码破译机构从海上获得一件礼物。在格陵兰岛附近攻击了一支护航队的德国110号潜艇被深水炸弹损坏后浮上水面，惊慌失措的乘员纷纷逃命，英国一支小分队乘小船向颠簸不定的潜艇驶去。突然潜艇的舰长发现他们准备炸沉潜艇的炸弹没有爆炸，拼命游回去完成这项工作，以便阻止英国人强行登上潜艇。他刚要爬上潜艇光滑的外壳，就被英国人击毙。英国水手冒着潜艇随时都会爆炸或沉没的危险，借着令人畏惧的蓝色紧急信号灯的光亮，小心翼翼地爬进驾驶指挥塔。他们惊喜地发现了“迷”字密码机，并且附有连续3个月的每日旋盘调值说明书。这是此次战争中情报工作最重要的突破，英国海军对此事严加保密，伪称德国110号潜艇被炸沉。

德国的这种系统尽管有很大优点，但也有致命的弱点。德尼茨将军坚持要在基尔的司令部集中指挥所有潜艇，这种严格控制需要使用大量无线电通信，传送有关潜艇位置与天气情况，报告护航队活动与发现的目标以及燃料和鱼雷消耗情况。英国人缴获了“迷”字机及其调节旋盘后，能够发现单个潜艇和潜艇群的位置，采取相应措施避开它们。当德尼茨

发现潜艇战突然失去威力时，立即在潜艇司令部广泛调查有无间谍，但是毫无结果。

送往海军部潜艇跟踪室即特种情报处的“迷”字解密文件，使英国人摸清了德尼茨手中所有的牌，但这些截获电讯断断续续很不完整，有时间隔几天或几周收不到。从1942年2月以后的10个月中，截获的通信无法破译了，因为德国潜艇使用了十分复杂的“海神”新密码。在此期间美国刚刚参战，由于美国对付潜艇威胁的准备不足，这一时期是大西洋战争同盟国损失最大的阶段。

1942年末对付德国潜艇的海战达到了高潮。尽管英国破译“海神”密码已有进展，每月被击沉的船只仍达到50多万吨位，超过了能够补充的船只吨位。1943年1、2月间，恶劣的气候条件使同盟国损失减少，但是3月份损失又回升到56.7万吨，而敌人仅仅损失6艘潜艇。护航队避开了一个潜艇群又驶进另一个潜艇群，“1943年3月份前20天，德国人破坏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的联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英国海军部报告说。

当德国人采用了一种新式“迷”字机后危机进一步加深，这种“迷”字机从3个旋盘增至4个。3月中旬，跟踪室沮丧地承认它无法断定德国潜艇的位置。大西洋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破译员们加紧攻关，最后，英国秘密情报局终于成功破译了这种新密码，形势开始好转。破译材料对潜艇活动提供了预报，护航队集中力量保护运输队免遭潜艇群的袭击。在船只损失数量下降的同时，被击毁的敌人潜艇数量增加。普遍认为，由42条赴欧船只组成的ON—5运输队顺利出航是大西洋之战的转折点。5月初，由56艘德国潜艇组成的4个潜艇群在恶劣气候条件下对该运输队发动攻击，12名商人丧生，

但10艘德国潜艇被击沉。这一戏剧性胜利仅仅是开端。1943年5月，占总数三分之一的41艘德国潜艇在作战巡逻后未能返回。

德尼茨在北大西洋遭到失败后把潜艇调到南部，那里有许多满载部队与装备的运输船驶往西西里和意大利，负责保护这些运输队的美国海军准备充分。反潜战由第10舰队集中指挥，该“舰队”没有舰艇，只有数量有限的人员，但它协调指导反潜战，包括不断提供破译“迷”字密码获取的情报。由于精密雷达和测向设备的及时使用，由于远程飞机用于监视船队，情报来源不断增加。成批的猎潜艇在小型航空母舰的保护下，及时搜索和击沉“乳牛”潜艇和其它攻击性德国舰艇。这些猎潜艇由于获得德国潜艇同基地联络的破译情报，攻击取得辉煌成果，两个月击毁潜艇13艘。

虽然反潜战又延续了两年，但规模已大大缩小。最终的胜利应该归功于同盟国商船水手的从容不迫和护航队的大智大勇，同时也应归功于英国秘密情报局密码破译员们的帮助。

通信情报局在美军的太平洋进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8月7日进攻开始后，第一陆战师约16000人在所罗门群岛南部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图拉基岛登陆。惊惶失措的日军未作猛烈抵抗，美军很快占领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尚未建好的机场，这是控制所罗门群岛的关键。这个充满沼泽、热病流行的岛和周围海面很快成为硝烟滚滚的战场。

由于海波站(这时称太平洋舰队无线电小队或FRUPAC)在破译日本海军那年夏天新换用的JN25密码中遇到困难，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很不顺利。截获的电报通常约需一周才能破译出来，往往失去作用。美国指挥官只好主要依靠空中侦察

和澳大利亚海岸观察哨获取作战情报。有时情报太少而造成巨大灾难，不久附近水域因被击沉的船只太多而成为著名的“铁底海湾”。1942年8月9日，掩护瓜达尔卡纳尔登陆的美澳舰队遭到一直保持无线电静默的日本特混舰队偷袭，在激烈的夜战中，4艘巡洋舰被击沉，一艘重创，成为当时美国海军损失最大的一次战斗。然而1943年初，太平洋舰队无线电小队破译了JN25C密码，并且在太平洋战争后期能破译日本无线电通信的绝大多数内容。

4月初，截获的电报表明，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在南太平洋日军主要基地腊包尔建立了司令部，亲自指挥海军航空兵对设在新几内亚和南所罗门群岛的美军基地发动全面进攻。4月7日，约200架日本轰炸机和战斗机飞去袭击瓜达尔卡纳尔岛，山本五十六亲临现场预祝成功。4天后，这位海军上将决定视察该地区的基地。自从他把司令部移到陆上，美军无线电小队就一直监视着腊包尔的通讯联系，这种警戒终于有了可喜成果，山本五十六的行动计划信号被截获和破译，这等于宣告了他的末日。

山本五十六抵离每个视察地点的时间精确到几点几分，从地图上可以看出，他视察的第一程正好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美军战斗机的航程之内。应该截击他吗？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奇怪的是，在这场战争中数百万人遭到屠杀，可起初人们居然不想除掉敌方一名军事将领，但大家很快考虑了尼米兹海军上将提出的更为实际的问题：日本人能找到可以取代山本五十六的更能作战的舰队司令吗？

埃德温·莱顿曾在日本攻读语言，他早就认识山本五十六。他十分肯定地告诉尼米兹，山本五十六的胆略和才能是无与伦比的，截击他将大灭日本的威风，因为在公众眼里，

他是1905年日俄战争中打败敌人舰队的东条英机海军上将的化身。就这样，一份简洁的电报命令决定了山本五十六的命运，截击任务交给了航程可及的美国陆军航空兵P—38战斗机中队。为了对密码破译工作保密，有关山本五十六活动的情报工作交由腊包尔地区的海岸观察哨完成。电报上加了一句简洁的话："目标在航程之内，让我们干掉这家伙。"

截击未出丝毫差错。4月18日，两架贝蒂式日本轰炸机嗡嗡地掠过海面向布干维尔飞去，突然P—38中队的16架飞机在天空出现，这些双尾闪电式战斗机中的多数紧紧咬住6架日本零式护航飞机，同时两架战斗机紧紧盯住日本轰炸机，其中一架战斗机向一架贝蒂式日机射出一串炮弹，发动机着火了，一个机翼掉下来，飞机在岛的一端丛林中坠落，另一架轰炸机中弹后也迅速栽进了大海。

山本五十六之死对双方都象征着太平洋战争结束的开端，尽管日本人继续步步抵抗，但美国人越来越坚定地从防御转入反攻。美军在跨越太平洋的远征中得到大批新造的舰艇与飞机，而日本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充。随着越岛战役步步向日本本土逼近，技术水平日益提高的通信情报工作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信情报也指导了打击日本商船队的潜艇战。日本是个岛国，依靠商船运输战争必需的燃料和原料，同时发展本土各岛之间的商务，因此日本特别容易遭受持久潜艇战的致命打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曾经谴责肆无忌惮的潜艇战，但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也发动了同样的潜艇战切断日本的战略生命线。在战争初期，无线电情报用来测定日本军舰的活动以便对它们实施攻击，但收效甚微，从遥远的地方指挥潜艇攻击运动快速、保护良好的海军部队是很困难的。

1943年初，太平洋舰队无线电分队破译了日本商船每天中午播发轮船位置的"零字"密码，这样，密码破译员能够发现日本运输队的航行路线，能向巡逻的美国潜艇提供最新数据，大大提高了潜艇攻击的效率。被击沉的日本船只数量迅速上升，1944年初，每月达到约30万吨位。日本造船厂很难弥补这些损失，在投放原子弹结束这场战争之前，日本几乎一蹶不振。美国潜艇击毁的日本商船共达486.1万吨位，日本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海上运输线被切断了。

甚至在欧洲和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前，另一场战争的炮声隐隐传来，这就是冷战。在法国、意大利、希腊和南斯拉夫，与共产党游击队合作的战略情报局人员不愿看到战后斗争的来临。这些国家的亲共产党和反共产党力量都抗击纳粹德国，但他们相互间的斗争往往比他们同德国人之间的斗争还要激烈。由于出现了争相控制战后世界的形势，战略情报局在国内受到左派和右派的夹击。保守主义者们谴责说，战略情报局中的左派分子通过向共产党输送武器和其它援助，为即将到来的东西方对峙加强了共产党的力量。自由主义者们也用同样激烈的言辞宣称战略情报局的领导人严重右倾，该局战后处于反共运动的前线。

事实上，战略情报局的观点没有受任何思潮影响，而是从实际出发，着眼于赢得这场战争。杜诺万没有为冷战打下基础，而是尽量在战争结束前同俄国人保持工作关系。同苏联情报机构合作是英国人首创的，他们走得很远，甚至承担了向德国和巴尔干各国空投苏联秘密警察的一切任务。

起初，同美国统治集团有联系的爱尔兰后裔、天主教徒杜诺万小心翼翼地与苏联人打交道。虽然他瞒着联邦调查局

从美国共产党那里获得有关敌方颠覆分子的秘密消息，但是，直到1943年年底，为了获取有关日本和巴尔干国家的情报他才访问了莫斯科，提出战略情报局同苏联秘密警察合作的问题。令他吃惊的是，通常守口如瓶的俄国人立即同意互派代表团和互换间谍器材。

杜诺万没有考虑到埃德加·胡佛会有什么反应。当长期迫害进步分子的胡佛听说此事后，他谴责杜诺万的提议是“极其危险的”，意味着“同意苏联在美国建立能够获得官方各种秘密的特工机构”。胡佛还告诉司法部长弗朗西丝·比德尔，苏联秘密警察的特务“正企图获取陆军部的绝密情报”，此话旁敲侧击指的是陆军曼哈顿工程正在研究的原子弹。

无疑担心胡佛给右翼新闻界送消息，罗斯福总统没有批准签订协议，而是允许杜诺万同俄国人交换情报。美国向苏联秘密警察提供了一批报告，多数来自研究分析处；俄国人提供的报告少些，据说有些报告质量很高。

1944年下半年，巴尔干半岛国家出现了摩擦。面对红军的节节胜利，那里的战略情报局办事处以新的姿态投入工作。8月份罗马尼亚出现的反纳粹政变给战略情报局提供了营救同盟国战俘以及搜集巴尔干半岛国家和德国情报的机会。在俄国人的协助下，一场紧急空运撤走了约1300名战俘。航空救援小组离开后，密探们继续留下来。

战略情报局驻布加勒斯特办事处负责人弗兰克·威斯纳少校30来岁，说话带密西西比地区口音，曾经在华尔街当过律师，化名为“伤寒”。他以准外交机构同盟国控制委员会为掩护，处于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半岛其它国家苏维埃化激烈斗争的前列。

威斯纳发现，德国人和他们的罗马尼亚盟友在俄国人进

军声中仓皇逃跑时丢下许多情报档案，威斯纳带领他的小组冒着随时被俄国人驱逐的危险，抓紧搜集德国间谍和帮助纳粹反对俄国人的罗马尼亚奸细的名单，以及那些愿意改弦更张为新主子效力的人。1945年，俄国人下令战略情报局的人员离开布加勒斯特。

1944年8月波兰地下组织在华沙举行了起义，当波兰人在首都同德国人浴血奋战、付出重大牺牲时，杜诺万为波兰人的命运而深感焦虑，在英国准备了大量空运武器和物资。100多架飞机参加了这次空运，但是当来到华沙上空时，只有少数飞机成功地进行了空投，因为它们下面的华沙市被大火和浓烟吞噬。不久，波兰人投降了。

战略情报局继续同苏联秘密警察合作，但是杜诺万相信，同苏联人对抗终究不可避免。因此，当曾经联合德国反对苏联的芬兰人主动提出向战略情报局出卖俄国4种军事和外交密码以及约1500份文件时，杜诺万求之不得地同意了。令他十分吃惊的是，总统罗斯福和刚接替科德尔·赫尔的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对此举均不满意，命令杜诺万不讲明来源立即把密码与文件还给俄国人。杜诺万在执行命令前，把严重损坏的密码复制后交给联邦调查局，几年后，这些密码帮助粉碎了罗森堡间谍网，并帮助发现了英国叛徒唐纳德·麦克莱恩。

表面看来，罗斯福下令把密码本还给苏联人再次说明他在与苏联打交道时怀有天真想法，在美国极需了解莫斯科的意图时此举似乎是极不负责的表现。实际上，总统面临着更大的问题，他正准备与斯大林、邱吉尔在雅尔塔出席三巨头会议。如果芬兰人或他们昔日的盟友德国把美国秘密获得俄国密码的事泄漏出去，已经对西方国家疑虑重重的斯大林就

能抓住把柄破坏这个会议。

然而，仍有必要为即将到来的斗争作好准备。华沙起义失败后不久，杜诺万警告总统，巴尔干国家最近发生的事情“表明俄国人有意主宰该地区”。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的情报部长埃德温·赛伯特少将深深感到有一个比德国情报机构更精干的情报机构存在着，“那是昔日共产国际的机构，是列宁1919年为传播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而建立的机构。这一机构的人遍布各地，甚至打入我们自己的队伍和同盟国军队中。”

1944年初，罗斯福叫杜诺万为建立战后长期情报机构制订规划，这是杜诺万一直翘首以待的机会。毫无疑问，总统是受到国会调查委员会报告的影响——这些报告把珍珠港灾难部分地归罪于未能协调战前战略情报工作——对苏联政策的担忧也起了作用。总统的这一要求清楚地表明罗斯福打算将来在与俄国人的交往中使用个人魅力以外的东西。

两星期后，即11月18日，杜诺万给总统送去一份绝密备忘录，要求建立类似战略情报局的常设情报机构，由他那样的人领导。“虽然目前战争还在进行，但我们也正处于会把我们不知不觉带到恢复阶段的过渡时期，”杜诺万给罗斯福附信说。“一个合适的、有秩序的情报系统”将有助于作出“有根据的决策”，并且消除战时情报工作普遍存在的混乱、浪费和不必要的重复。

该备忘录提出，新建立的机构将“以公开和隐蔽手法获取情报，同时提供情报工作指导、决定国家情报目标并协调政府各部门所获的情报”。像早期阶段的战略情报局一样，该机构将由总统而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控制，它的工作将包括谍报、研究与分析、反谍报、对外政治颠覆和总统可能交给的“与情报有关的其它工作与任务”。该组织的行政管

理机构是顾问委员会，由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总统可能提名协助——而不是控制——该组织负责人其他的成员组成。该组织将协调其它情报机构的活动。为了抵制联邦调查局的反对意见，杜诺万强调该组织“在国内和国外都没有维护治安和执行法律的功能”。

杜诺万意识到，如果拖延下去，反对者们会集中力量推翻该计划，于是他在白宫极力制造紧迫感。“我们政府内有适合担负此项任务的经过训练的专门人才，这种人才不该弃之不用……你可以立即把这条航船的框架建立起来。”然而总统打算察言观色后再作决定，后因美军在阿登被德军挫败、罗斯福第4次就任总统、筹备雅尔塔会议等一连串事件，该计划被搁置起来。正如杜诺万所担心的，此事走漏了风声，抵制的呼声十分强烈，不仅反对建立集中统一的情报机构，而且反对杜诺万参加该机构。埃德加·胡佛反对得格外起劲，他正在起草让联邦调查局控制所有国外情报工作的计划，并已经开始向巴黎和欧洲其它已解放的首都派遣间谍。约翰·富兰克林·卡特也酝酿了一项计划向总统施加影响。

1945年2月9日上午狂飚终于从天而降，反罗斯福的芝加哥《论坛报》和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在头版刊登了杜诺万的详细计划，醒目标题是：《杜诺万提出战后建立超级间谍系统：取代联邦调查局、特工局、海军情报部和陆军情报部》。与胡佛关系密切的记者沃尔特·特罗安在标题下的文章中谈到“要建立一个权力无限的情报机构，对外监视战后世界，对内监视公民生活”。这场轩然大波给建立战后中央情报局的讨论浇了一瓢冷水。马歇尔将军警告说，现在采取行动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受欢迎的”，因为这样做国会就要听取意见，那将“给我们最好的情报来源ULTRA和MAGIC带来危险”。

两个月后富兰克林·罗斯福逝世，这给杜诺万建立集中、独立的情报局并自任局长的计划敲响了丧钟。继任罗斯福入主白宫的哈里·杜鲁门没有参与已故总统和杜诺万的任何私下安排。由于同德国与日本的战争已胜利结束，广岛、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预示着可怕的新时代的到来，杜鲁门有更紧急的事情要处理。另外，人们反复警告的"美国盖世太保"给战略情报局政治上带来不利。尽管美苏关系已经笼罩着可怕的乌云，美国几乎无人看到战后建立强大的情报机构的必要性。

杜诺万企图亲自去说服总统，但被总统的警卫人员拒之门外。陆海军将军们和预算局局长哈罗德·史密斯长期来对杜诺万随心所欲的做法不满，在他们影响下，1945年9月20日总统下令从10月1日起解散战略情报局。为了缓和气氛，总统对杜诺万表示感谢，他说："你在战时表现了杰出的领导才能……但这种才能和平时期已不再需要"，并安慰他说，"政府的战后情报机构不久将以你创立的组织为基础建立起来"。杜鲁门大笔一挥，美国第一个中央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就这样进了历史博物馆。

1945年9月28日，杜诺万疲惫不堪，两眼充满血丝——自从杜鲁门签发命令后他一直席不安枕——在雾谷总部附近的溜冰场起身向战略情报局的全体成员作告别发言。他说，战略情报局是个"非同寻常的试验"，它清楚地证明，"由不同种族、不同能力、不同气质、不同天资组成的一批美国人能够勇敢地对付训练有素、长期建立的敌方组织……你们可以坚信，你们已经向美国人民表明，国家的决策只有以准确的情报为基础，我们才有可能获得持久的和平。"

事实上，杜诺万领导的机构彻底改革了美国情报工作。

在战略情报局建立之前，军事情报机构死水一潭，没有威信，更谈不上有什么活力，常常是庸人拼凑起来的临时机构。杜诺万热情接纳文职人员，几乎单枪匹马把情报工作转变为富有冒险精神、聪明能干的文职人员的职业，并且在他任职期间，情报成为美国制订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

但是杜诺万根据自己的构想和爱好建立起来的战略情报局也留下其它遗产，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其功绩的宣扬有些名不符实。该局间谍们的勇敢精神和间谍头子们的献身精神是无可非议的，它也的确打击了美国的敌人，鼓舞了轴心国占领地区人民的斗志。该局完成的一些任务，如在北非和诺曼底登陆之前所做的工作，确实为军事上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它的成员帮助营救了被击落飞机的机组人员，并牵制了德军，迫使敌人分散兵力、四面出击。然而总的说来，战略情报局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局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它的大多数活动只不过是些雕虫小技。为了破坏很快就能修复的桥梁或铁路，值得让执行命令的勇士们献出生命吗？或者值得让德国人或日本人为了报复而杀害当地老百姓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几个月，在未来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领导下，战略情报局对德国进行了渗透。让我们以这次大肆宣扬的行动为例。只有一小批间谍空投到风雨飘摇的第三帝国，他们的主要任务只是报告军队运动和军事设施分布之类的小事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获取的情报只是帮助人们在这里炸毁一座发电厂，在那里消灭一支部队护送队，但是谁也没有能提供对同盟国战略起关键作用的情报。凯西本人在总结这些活动时说得好："我们能做的事情只是突然派人带着电台去德国，然后等待他的音讯。"

事实上，隐蔽活动在现代总体战争或平时的地缘政治学

中的作用是有限的。然而，战后发表的有关战略情报局的大量书籍与文章几乎不无例外地大谈令人毛骨悚然的敌后冒险行动，突出宣扬战略情报局引人注目的抵抗与游击活动，而忽视了它日常艰苦的秘密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

这些传说使战略情报局乃至整个情报工作在公众心目中的长期影响是破坏性的。在情报系统内部，那些估计敌方意图以及判断敌方把这些意图付诸实践能力的研究人员，同狂妄自大的准军事秘密活动人员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这种紧张关系在战后美国情报机构中长期存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也是主张政治解决世界分歧的人和主张采取大胆的隐蔽活动迅速处理问题的人之间的严重对立的开始。

采取鲁莽行动总比耐心汇集整理点滴情报对美国人更有吸引力。当中央情报局最后建立起来后，它与战略情报局一样，“莽撞的人”处于支配地位，他们常常采取准军事行动解决政治问题，而无视战略情报局的活动是在战时进行的这一事实。空投到西欧的“杰德”小组和同盟国的其他间谍得到当地抵抗组织的支持与合作，甚至在中国和东南亚也能得到这样的支持。可是战后世界缺少这种相同的客观条件，并且国内和国际气候常常对大规模的秘密活动态度冷淡。看不到这种区别，往往导致彻底失败或产生不良后果，猪湾和尼加拉瓜事件就是有力的例证。

总之，杜诺万领导的战略情报局留下的遗产内容丰富、利弊混杂。

第三部

官僚间谍

15. 冷战的勇士

克劳斯·富克斯登上了间谍舞台。1944年初的一个冬日，他行走在纽约东河沿的人行道上，寻找一位戴手套持绿色封面书的人。蓦然他发现了，那是一位外貌难以形容、脸蛋圆圆的中年人。他们交谈几句后便招呼了一辆出租车。那陌生人告诉司机去3号大街的一家餐馆。

“我叫雷蒙德，”富克斯的伙伴说。他们在餐馆的一张桌旁坐下，离其他顾客远远的，以免谈话让别人听到。

富克斯是德国出生的共产党员，曾是英国公民，近日才抵达美国。目前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家，正在参与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绝密工程。裂变铀是该工程成功的关键，富克斯向“雷蒙德”提供了有关英美联合试图制造一批裂变铀的情报，并答应继续刺探有关生产这种铀的详细情况。两人商定了下一次会面的地点后便先后离开了餐馆。

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富克斯给苏联打开了西方武库的紧锁之门。此后他在纽约与“雷蒙德”接头至少4次。即使在他被调到新墨西哥洛斯阿拉莫斯研制原子弹的实验室之后，“雷蒙德”还两次专程去那里获取重要情报。这些情报都被递送到“雷蒙德”的上司苏联秘密警察阿那托里·雅科夫列夫

的手里，他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纽约副领事，化名为“约翰”。

由于摸不清斯大林的意图，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对是否与俄国盟友共享原子弹秘密取谨慎态度。尽管如此，来自各方面的消息表明，俄国人已经注意到英美正在努力研制原子弹，而且斯大林已经命令其情报机构千方百计窃取情报不让西方在原子弹研究方面领先。原子弹本身不再是秘密，许多科学家早已掌握原子武器理论。但是研制和生产原子弹除了像美国这样的经济技术超级大国外，别的国家还只能望洋兴叹。

富克斯只是谍报机器上的一颗小螺丝钉。这部大机器的某些成员振振有词地为他们与苏联的合作寻找理由，说什么“知识无国界”，另外还有一些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间谍，他们中有的人是忠心耿耿的共产主义分子；有的人则对西方民主丧失信心，不相信它能够战胜大萧条和法西斯造成的灾难，从而倒向苏联，以求获得拯救。协调美、英、加三国共同研制原子弹的联合政策委员会的成员、英国使馆一等秘书唐纳德·麦克莱恩就是这种人。

为了研究麦克莱恩和富克斯窃取的资料，苏联取得了参加过曼哈顿工程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布鲁诺·庞蒂科夫和加拿大国立研究院成员艾伦·纳恩·梅的合作。因此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当杜鲁门总统偶尔向斯大林谈到美国已拥有一种威力无比的新式武器对付日本时，苏联领导人仅略表兴趣。实际上，斯大林几乎与杜鲁门一样对原子弹的进展了如指掌。

除依靠富克斯外，“雷蒙德”本人还受阿那托里·雅科夫列夫的指示，传递过从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陆军技术员戴维·格林格拉斯处得来的秘密情报。他使用的暗号是“我从朱利叶斯处来”。格林格拉斯向“雷蒙德”提供了有关原子弹引爆

系统的基本技术资料，后来又给他的连襟朱利叶斯·罗森堡画了几张原子弹构造的草图；朱利叶斯和他的妻子埃萨尔狂热信仰共产主义，暗中领导着一个专门搜集工业情报的间谍网。

直到1946年这个原子弹间谍网才被揭露出来。当时富克斯已回英国，在哈威尔核机构担任要职，格林格拉斯也已拒绝继续合作。至此，该间谍网已向俄国人提供了足够的资料，使他们生产出了自己的原子弹，速度之快超过了美国专家的预料。无疑，该间谍的最大贡献是关于美国原子弹试验失败的确切报告。但由于美国有雄厚的财政和科技实力，使它能够同时采用许多方法解决研制中的问题，从而节省了大量时间。由于间谍们提供的情报使俄国人节省了经费，少走了弯路，避免了美国人在试验中遇到的挫折。

恐惧和怀疑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未散时就与苏联分道扬镳了。俄国人经过西方三次严重入侵后心有余悸，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又致力于世界革命，他们很快地填补了由于欧洲以及亚洲旧殖民制度崩溃所造成的战略真空。这使美国起了戒心，觉得有必要保卫西方对付苏联的扩张野心。两个超级大国互相把对方看作吃人的老虎。双方剑拔弩张，互相抨击，摆开了冷战的战场，也为长期维持谍报活动铺平了道路。在这变化了的形势下，层出不穷的间谍案使许多美国人相信，美国充满了苏联间谍。

早在1945年，一位战略情报局官员发现，一家报道亚洲事务的左翼杂志《美洲——亚洲》在一篇有关美英在泰国竞争的文章中全文引用了战略情报局的一份秘密报告。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人员怀疑有漏洞，他们派人打进该杂志社，结果发

现不少保密的政府文件。接着联邦调查局获准于6月突然查抄了该社，缴获了约有1700份秘密文件，并以阴谋向外国提供机密为由逮捕了6人，其中包括该社编辑海军情报官菲利普·贾菲以及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贾菲和一名助手承认持有秘密文件是犯法的，受到罚款处理。然而大陪审团拒绝对其他人进行起诉。《美洲——亚洲》杂志案件引起了公众对间谍的恐慌，人们纷纷扬扬说华盛顿充满里通外国分子。

伊丽莎白·本特莉为一间谍网传递情报，她的自首加剧了公众的疑虑。1945年她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100多名为苏联秘密组织服务的人员名单。其中27人在美国政府机构工作，如财政部副部长哈里·怀特以及青云直上的国务院年轻官员阿尔杰·希斯。

此前希斯曾至少3次被当作共产党嫌疑分子。1939年，曾为苏联传递过情报的惠特克·钱伯斯就警告过助理国务卿阿道夫·伯利，指出他当时的助手希斯是共产党分子，但这种警告被当作无稽之谈。几乎同时，美国驻巴黎公使威廉·布利特也对当时希斯在国务院的上司斯坦利·霍恩贝克说过，法国情报机构把希斯和他的兄弟唐纳德列入苏联间谍名单。霍恩贝克亲自盘问了他，希斯否认后，他也就将此事置于脑后了。1954年，驻渥太华苏联使馆的密电译员埃贡·戈尔申科投靠西方，他也揭发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的一名助手是苏联间谍。通过排除法，最后又查到希斯头上，但这次告发又未引起重视。希斯仍然受到极大的信任，没有一个当权者真正怀疑他的忠诚。尽管他和本特莉提供的名单上的其他人都被监视起来，但联邦调查局未能得到他现行间谍活动的证据。1946年希斯离开国务院，担任了享有盛誉的卡内基

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

关于苏联间谍已打入曼哈顿工程的流言迭起，1946年艾伦·纳恩·梅被捕后，这些流言本来可以查个水落石出。由于埃贡·戈尔申科的揭发，梅承认自己为苏联人充当了间谍，但他不愿供出自己的同党，结果被判处10年徒刑。联邦调查局曾主动调查，但因受阻只好作罢。1949年夏，一方面由于俄国人的粗心，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人的努力，破译员破译了比尔·杜诺万暗中从芬兰人那里买来的苏联密码。破译的密码证明外国间谍确已打入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

相比之下，俄国密码比“迷”字机和“紫密”机编制的密码简单得多。俄国密码依赖于999个五位数，每个五位数代表一个字母，一个单词或一个短语。不幸的是从芬兰人那里得来的密码本已被烧坏，许多五位数难以辨认。为了加大密码破译工作的难度，与这种密码相配套的有一种特殊的笔记本，笔记本的每一页均有另一套数字，根据基本系统，加上原先数字，能产生无数组不同的五位数。

世界各地的苏联特工人员都有这种“一次性笔记本”，这种密码本的每一页只能用一次，用过后立即销毁。

众所周知，苏联驻纽约采购处是一间谍机构，联邦调查局夜间潜入该处窃取了大量文件，获得意想不到的突破。通过审查这些文件，反间谍专家们高兴地发现其中有一套这样的“一次性笔记本”。根据密码使用规定，用过的每一页都已作处理。但是在这些材料中发现了一些暗语和明语信息。从这些支离破碎的信息中，新建立的通讯安全组织武装部队安全局复制出这种密码本的999种五位数条目。近几年截获的大量这类密码信息，由于无法读懂而被束之高阁，积满尘埃，而现在密码分析家们能够读懂了。

其中有一份邱吉尔给杜鲁门的电报，显然是从英国驻美使馆的档案中被偷盗出去的。进一步调查发现的结果更令人吃惊。苏联间谍不仅能窃取英美两国首脑的秘密通讯，而且获得了源自美国使馆和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大量机密。一共有近24份情报来源于英国使馆化名为“荷马”的人，可是联邦调查局无法查明此人是谁。

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反情报特工人员罗伯特·兰菲尔钻研了这一大堆破译的密件，发现了富克斯写的一份关于曼哈顿工程进展的报告。然而兰菲尔并不认为这份报告即足以证明这位物理学家是间谍。也许这份报告是偶尔落入苏联间谍之手的。可是另一份破译的密件提到了一个英国原子弹间谍，他的妹妹在美国上大学。由此联系到富克斯的背景，他妹妹克里斯蒂曾就读于斯瓦斯莫尔学院，同时也发现他本人在逃离希特勒德国前是德国共产党员。

后来兰菲尔沮丧地回顾，他曾向金·菲尔比报告过自己的3个发现；菲尔比是英国军情6处驻华盛顿联络员，一度担任美国反苏联间谍活动的负责人。菲尔比本人长期是苏联间谍，在与兰菲尔多次会晤中他一定既兴奋又胆战心惊。一方面他作为知情人要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询问；另一方面他又害怕破译的密件随时会证明“荷马”是唐纳德·麦克林，或者证明他有背叛行为。菲尔比强作镇静，假意表示要调查富克斯的情况，暗地里却已通报俄国人，说富克斯正在受到联邦调查局的审查。考虑到这位物理学家在间谍活动中已无用处，莫斯科决定牺牲富克斯，以便保护菲尔比，使他不至于暴露。

经英国情报局审问，富克斯似乎很愿低头认罪。自他从美国回来后，他已对苏联在东欧的战后政策感到失望，试图

体面地与俄国人脱离关系。他似乎没有看到对他指控的严重程度，显然希望供认一切后得到宽恕，再回哈威尔核研究所工作。富克斯很幸运，英国的法律与美国的不同，它对为战时盟国和为敌人充当间谍明确区分了界限，因此富克斯只被判处14年监禁。

联邦调查局在调查帮助富克斯与苏联联系的接头人时获得一条线索，即他对“雷蒙德”的模糊的描述：中年，稍胖，不是物理学家，没有被雇于原子能机构，略知化学，也许是位化学家？对嫌疑分子排查后，联邦调查局发现“雷蒙德”很像那个哈里·戈尔德，这位费城的化学家早先被伊丽莎白·本特莉确认为苏联间谍。果然如此，戈尔德承认了他是富克斯的接头人，并供出了参与此案的戴维·格林格拉斯。丧魂落魄的格林格拉斯谴责埃萨尔和朱利叶斯·罗森堡劝说他为俄国人窃取原子弹秘密。不久，罗森堡夫妇被捕，同时被抓的还有朱利叶斯的朋友，他大学里的同学莫顿·索贝尔。

与别的嫌疑分子不同，罗森堡夫妇和索贝尔极力否认参与过间谍活动。此案成了美国历史上最有分歧的案件之一。为了保护绝密的情报来源，美国政府没有披露指控罗森堡夫妇最有力的证据：俄国人的密码通信。罗森堡夫妇在此密码通信中只有一个代码，但是破译文件中谈到的夫妻间谍组足以证明他们是间谍，而且证明女方的兄弟也卷入了间谍活动。即使没有这个证据，陪审团仍然相信戈尔德和格林格拉斯的供词。罗森堡夫妇被判处电椅死刑，于1953年执行，戈尔德和索贝尔各被判30年监禁，格林格拉斯被判10年徒刑。

罗森堡夫妇被处死时，此案已引起全世界的强烈抗议。法庭判决遭到了严厉的抨击，不少人认为罗森堡夫妇只是冷战狂潮和反犹太潜流的无辜牺牲品，或者认为他们和其他间谍

分子一样，至多关押起来就够了。

法官欧文·考夫曼为死刑判决辩解，认为罗森堡夫妇的罪行绝对令人痛恨，许多评论家认为考夫曼的话是夸大其词。不过全面地看，这桩原子弹间谍案无疑是美国最有影响的案件。作为直接后果，这个间谍网提供的情报使俄国人在发展和生产自己的原子弹方面缩短了至少三四年，从而也使俄国人能改变世界历史。

美国战后情报工作在滑稽可笑的气氛中开始。1946年1月24日，海军五星上将威廉·莱希和海军少将悉尼·索尔斯被领入椭圆形办公室成为在那里举行的不同寻常礼仪中的中心人物。两天前，莱希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总统私人代表，索尔斯荣任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中央情报组主任。这时，两人各自接受了一顶黑礼帽，一件黑长衫和一柄木制短剑。杜鲁门总统装模作样地宣布："凭着我作为最高首领的权力，我恳请海军五星上将威廉·莱希和海军少将悉尼·索尔斯接受象征他们岗位的长袍和短剑，任命他们分别为国家情报局的总统私人代表和中央情报组主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个月后，杜鲁门认识到他解散战略情报局是个严重错误。许多情报从国务院，海陆空三军和联邦调查局源源不断涌来，可是杜鲁门缺乏外交经验，这些互相矛盾的"情报"使他分不清真假。譬如战后不久，据说埃德加·胡佛报告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可是杜鲁门认为这是无中生有。总统希望"某个人，或某套班子从所有这些材料中理出头绪"。然而却没有谁能从事这项去伪存真的整理工作。

随着超级大国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加之人们对珍珠港事件记忆犹新，大家一致认为美国需要有一个更好的情报机构。

尽管看法一致，可是由谁领导的问题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个冲突与改组战后军事机构这场更大的争端紧密联系。海军方面提出，是应该设立一个统帅三军的总长呢，还是应该成立一个由级别相当的人组成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当反复探讨这个问题时，国务院和军方仍为由谁控制情报机构问题争论不休。问题越搞越复杂，预算委员会主任哈罗德·史密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敢说我们正在用极不理智的办法对待情报问题。"

终于在1946年1月22日，总统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建立国家情报局，由它来制订政策；下设中央情报组，由它执行政策。国家情报局由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以及五星上将莱希等组成。曾经担任海军情报部长的索尔斯将军被任命为中央情报组主任。

中央情报组的任务是协调和整理由美国25家情报机构发来的情报，并向总统和国家安全顾问们提供综合的情报成品。然而中央情报组却丝毫不像一个集中统一的情报机构，作为政府部门它没有任何权力，财政预算完全依赖于军方和国务院，业务和办事人员的编制限制为100名左右。索尔斯本人不大愿意挑这副担子，他想尽快回去当老百姓，这也进一步限制了该组在官僚机构大战中的影响。该组的主要工作仅限于为总统整理日常情报摘要。即使这样，它与椭圆形办公室的接触还受到来自国务院方面的挑战；国务院坚持要求自己向总统提供对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

1946年3月，陆、海、空三军情报机构奉命与中央情报组一起对战后苏联军事力量作第一次重要估价。这项工作很快暴露出情报界的严重隔阂。军方以保密为由，断然拒绝向

中央情报组这个非军方情报机构提供资料。此外，军方仅对该项工程中有利于他们的情报感兴趣，譬如空军强烈主张发展空中力量，"超赶"空军大国，尽管事实上根本没有超赶的对象，空军情报机构自己也秘密估计过，苏联在空中力量方面落后于美国若干年。

1946年6月，霍伊特·范德堡中将接替索尔斯继任中央情报组主任。在他领导下，该组的工作效率并没有什么提高，但编制得到了扩大。这位将军是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中有影响的共和党主席参议员阿瑟·范德堡的侄子，他富有进取精神和远大抱负，他想把中央情报组作为晋升四星上将和担任即将设立的空军参谋长的跳板。为了步步高升，范德堡极力施展自己的才华。他劝说国家情报局允许中央情报组独立搞情报，而不依赖其它情报机构的有限施舍，并且让该组承担"目前不属于它的"研究分析工作。当助手们建议他成立一个80人的研究估价机构担负这项工作时，这位将军则立即表示80人太少，下令制订了由800人执行该项任务的行动计划。

范德堡还获准收集拉丁美洲的情报，此项工作原属联邦调查局的管辖，然而最重要的是，他接管了原战略情报局转交给陆军部的反间谍机构和秘密情报机构。这些机构被重新命名为特别行动办公室，充实了中央情报组的秘密情报工作。新来的1000人中，大部分属于7个站，他们之中有战略情报局的老手，如在西德的理查德·赫尔姆斯和在罗马的詹姆斯·安格尔顿。尽管增加了这些职业老手，但该组的全面素质以及情报成果仍属一般。"该组只是拼凑起来的一盘散沙，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工作体系，"一位观察家评论说。它的大部分成员是塞给中央情报组的没有真才实学的军人。

对那些主张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情报局的人来说，中央

情报组仅是通向目标的一个过渡。比尔·杜诺万，艾伦·杜勒斯，以及其他有影响的前战略情报局官员们广泛地宣传成立这样一个组织的必要性。杜诺万认为现有机构是“三军遗孤”，并告诫人们，“情报必须是我们的第一防线。”但由于人们对苏联日益恐惧，在此问题上形成不了一致意见。1947年2月下旬，杜鲁门总统向国会呈交了一份“国家安全法”草案，建议改组武装部队；在此法条款中，决定建立中央情报局。

国会听证会主要集中于防御结构的变化，但也对和平时期建立庞大情报机构的危险表示担忧。人们认为这样做会出现成为欧洲警察国家的弊病，也有人担心会产生“一个美国盖世太保”。为了减少这些忧虑，支持者们强调该局的工作是收集、评价和转发国外情报，而不参与国内秘密政治活动。海军部长福里斯特尔对持怀疑态度的人说：“中央情报局的任务除了核对政府其它机构得来的消息外，主要限于国外。”

《国家安全法》终于在1947年7月26日通过，它是美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法律之一。除了建立中央情报局外，还建立了国防部长办公室、独立的空军和在总统直接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会主要成员是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工作。美国第一次认识到，不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情报工作对国家安全都有重要意义，并第一次将情报工作集中于一个独立部门。

该局酷似杜诺万早在1944年就向罗斯福总统提出的模式。尽管杜诺万暗示愿意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但他树敌太多，此职由海军上将罗斯科·希伦科特担任；他曾在海军情报机构工作，在数月前接替范德堡领导中央情报组。

中央情报局的任务是收集分析情报，并向国家最高决策

人提供他们对情报的最终评价。为了不致成为“盖世太保”，中央情报局“不能像警察那样实施法律、随意抓人，也不负责国内安全工作”，在收集、整理和转发情报工作中，它不能取代其它部门和机构。然而这个新机构确实有非凡的权力。它有权保护情报来源和收集方式，完成国家安全委员会可能交给的有关国家安全的“其它工作”。像宪法中的“商务条款”一样，这里的“其它工作”包含了法律上仅仅暗示到的一切活动。由于中央情报局章程写明了大量保密措施，1949年制订的《中央情报法》规定，当任何联邦法律要求该局公布“其所属人员的工作、姓名、职务、薪水和总人数”时，该局可以拒绝提供。它的经费实报实销，这一做法始于乔治·华盛顿政府。

后来，杜鲁门总统假惺惺地抱怨说，他本人根本不知道中央情报局会参与大规模的秘密活动。1963年他写道：“我为中央情报局偏离原先赋予的任务而感到不安，它成了一个既执行政策又制订政策的政府机构……在建立中央情报局时，我未曾料到它会参与和平时期的间谍活动。……总统这只无声的情报之臂竟然背离自己的本职，被人们当作邪恶的阴谋活动的象征。”也许此话不假，但毕竟是在杜鲁门领导下，中央情报局第一次参与了这样的活动。

今天已无法重现美国决策人在冷战时期所处的超现实主义局面。当时欧洲笼罩着一种绝望的气氛。西方盟友相信苏联发动进攻的日子近在眼前。希腊爆发了内战，在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在菲律宾，政府受到共产党游击队的不断袭击。在法国据说共产党正策划一次将会波及西班牙的叛乱。对此，美国的反应是多方反击，多方反

击的内容之一是旨在援助美国盟国重振战后经济的马歇尔计划，以及采取不引发公开战争而能挫败苏联的隐蔽行动。

一场间谍战的阴霾笼罩着柏林和维也纳。自1946年底华盛顿就考虑采取隐蔽行动。当时一个内阁级的委员会就以战略情报局的经验为依据讨论了行动方案，但由谁负责这些行动人们争论不休。国务卿马歇尔担心国务院与这种隐蔽活动的关系被揭露后有损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因此拒绝了由国务院来领导的建议。海军上将希伦科特认为不值得冒险去搞隐蔽行动；如果需要直接行动，军队将担负起这个责任。但不久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不允许这些争论继续下去。1948年 2 月共产党夺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共产党领导的罢工运动震撼了意大利和法国。人们担忧共产党会在意大利的 4 月大选中获胜。

福里斯特尔和其他强硬派分子对事态的发展深感震惊，他们迫使杜鲁门总统把中央情报局作为冷战的进攻性武器。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乔治·凯南警告说，如果意大利走捷克斯洛伐克的道路，“我们在地中海、乃至整个欧洲的地位将受到损害。”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求希伦科特保证亲西方的基督教民主党人继续执政。这位海军上将不愿卷入隐蔽行动，要求中央情报局总顾问劳伦斯·休斯顿拿出法律依据来证明中央情报局采取这些行动是符合法律授予它的权力的。休斯顿认为它没有这种权力，但在再三逼迫之下，他告诉这位海军上将，只要总统或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下令，中央情报局可以从事这些隐蔽行动。

中央情报局特别行动办公室得到1000万美元的秘密经费后，发起了有效的宣传运动，告诫意大利人共产党可能接管政权。詹姆斯·安格尔顿吸取了自己在意大利的经验，在此

行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成千上万的美籍意大利人被劝说做家乡亲朋好友的工作，请求他们投票支持愿与美国合作的中间派。杜鲁门总统威胁说，只要共产党参加意大利政府，他将断绝经济援助。他甚至暗示，一旦共产党选举获胜，美国将扩大隐蔽活动以支持亲西方的军事政变。最后基督教民主党在选举中大胜，把共产党排斥于政府之外。这一胜利也使中央情报局赢得了很大的声誉。

由于隐蔽行动在意大利获得成功，人们要求在其它地区也采取类似行动。当美国驻欧洲武装部队司令卢修斯·克莱将军警告与苏联交战的危险迫在眉睫时，华盛顿惊恐万状。克莱告诉陆军情报部长："我感到苏联的态度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微妙变化，战争会戏剧性地突然降临。"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苏联人确实在作进攻准备，但对战争的恐慌加剧了冷战的态势。

面对这种动荡的局势，乔治·凯南1948年5月提出建立一个永久性机构在世界范围内从事特别行动办公室在意大利从事的那种活动。中央情报局继续收集和处理日常情报，而新建立的机构——婉转地称作"政策协调办公室"——将从事对付苏联的隐蔽战。在俄国人封锁柏林6天前，国家安全委员会10/2号文件公布了政策协调办公室的章程。该机构的工作是开展宣传战、经济战、破坏活动和准军事行动，包括支援东欧的地下抵抗组织对付苏联的威胁。唯一的限制是，章程附则中的否定权，即政策协调办公室的任何行动一旦被揭露，总统有权否认这些行动。

政策协调办公室是个畸形机构，它的人员挂在中央情报局的工资名单上，中央情报局为其行动提供后勤保障和掩护，而政策指导则由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负责。但实际上，政策协

调办公室的“政治行动”计划几乎完全由凯南领导的政策规划室制订；该室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得力助手。这种关系并不奇怪，因为凯南是“遏制”俄国扩张政策的炮制者，国务院与政策协调办公室的联络官罗伯特·乔伊斯是曾经在南斯拉夫游击队工作过的前战略情报局特工。虽然中央情报局局长在理论上是协调所有情报活动的人，但他却被抛在一边。结果任何人都无权制约政策协调办公室。因此一旦该室主任主张采取有力行动，那他几乎可以为所欲为。

弗兰克·威斯纳正是这样干的。

弗兰克·威斯纳年纪不到40岁，头发开始秃顶，大腹便便，完全是大有前途的华尔街律师模样，但是在隐蔽行动中的黑道本领上他几乎是无与伦比的。被苏联人从罗马尼亚驱逐出去后，他在战略情报局驻德办事处进行了短期工作，战后重操律师旧业。他发现房地产和信托律师事务索然无味。1947年他乐意地担任了副助理国务卿职务，负责被占领国事务，实际上这是一项情报工作而不是外交工作。

威斯纳被任命为政策协调办公室主任——他的实际头衔是该室助理主任——这是副国务卿艾奇逊的建议，是他把威斯纳推荐给国务卿马歇尔的。威斯纳的社会背景、受训情况以及个人气质都表明他是领导对苏隐蔽战的理想人选，但是对他的任命激起了人们的反对，尤其是军事情报系统的反对；他们认为威斯纳是“第二个杜诺万，只会把事情办糟”。但是威斯纳有坚强的靠山，如福里斯特尔，克莱将军和艾伦·杜勒斯，他们主张把苏联从东欧赶走。

威斯纳与冷战隐蔽行动的关系，和爱德华·特勒与氢弹的关系大致相同。由于威斯纳在苏联占领的巴尔干半岛以及

战后德国呆过，他对共产主义怀有无法摆脱的憎恨，并且确信与苏联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他精力充沛，敢于冒险，多少怀有一些浪漫想法，处心积虑地要对莫斯科及其卫星国发动非常规战争，以敢作敢为的战略情报局为模式创建了政策协调办公室。在他看来，希伦科特上将领导的中央情报局是“洗衣服时在一起饶舌的老太太”。

作为反对共产主义侵占西欧的堡垒，政策协调办公室资助反共政客，如西德的威利·布兰德和意大利的阿尔萨德·加斯帕里，以及新闻记者、学生和劳工领导人等。它还竭力煽动东欧的不满分子，使他们奋起反对共产党领导人。该室还提供秘密武器经费，以便组织游击队随时准备破坏和阻止俄国对西方的任何进攻。美国决策者们不知道战略情报局的行动曾经屡遭失败，满怀信心地期待威斯纳再次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些神话般的胜利。

不久政策协调办公室总部挤满了来自名牌大学的男女青年，他们的社会条件无懈可击。加入中央情报局是迷人的甚至是时髦的事。他们之中有的曾在战略情报局工作过，如克米尔·罗斯福，汤姆·布雷登，特雷西·巴恩斯和威廉·科尔比，也有新成员如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科德·迈耶，小威廉·巴克利和霍华德·亨特。

由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更加迫切需要掌握有关俄国实力和意图方面的情报。一位中央情报局的老特工哈里·罗西兹克回忆了1948年在国防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一开始一位陆军上校就拍着桌子大声吼道：“给我派一名特工，监听从柏林到乌拉尔山脉之间每个该死的飞机场的消息。”一位空军军官要求中央情报局立即提供一架苏联TU—4型战略轰炸机供研究之用。但是苏联是个“禁区”，对西方国家封闭，

美国缺乏情报来源，无法得到有关苏联科技进步和部队行动的最新消息。据说一旦苏联在原子弹方面超过美国，斯大林会立即发动突然袭击。但美国甚至连苏联有关公路、桥梁以及工厂的位置和生产能力等基本情报都无法得到。威斯纳没有时间耐心建立情报网络以及其它附属机构，他企图利用现有条件解决情报问题。

德国的战时苏联问题专家莱因哈德·盖伦是他计划中的关键人物。作为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东方军事情报机构领导人，盖伦因能精确估计俄国形势而赢得了声誉。他甚至不顾希特勒的恼怒，如实地报告了德国侵略者所处的不利形势。盖伦曾与纳粹占领下的傀儡政府以及德国被赶出苏联前在那里留下的秘密网络进行过密切的合作。他意识到即使他声明自己不是纳粹分子，战争结束时苏联人也会搜捕并惩罚他。于是，他制订了保证自己生存的计划。

与许多德国人一样，盖伦相信俄国人与西方人解除联盟只是个时间问题。预见到这一点，他将档案资料摄制成缩微胶卷，贮藏在铁盒子里——大约有50卷——埋在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上。那是美国人向前推进的必经之路，1945年5月他和助手们向这些美国人投降了。他向审问他的弗兰克·威斯纳和当时战略情报局驻德国办事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不仅提供了自己的档案材料，而且交待了与他在苏联建立的联络网联系的办法。盖伦被带到美国作进一步审问，然后在1946年7月被送回德国。从此他作为美国资助的盖伦行动组的组长，领导着反对苏联及其卫星国的间谍活动。这样，盖伦成为战后继续起作用的唯一德国将军，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几乎是原班人马。

从他的的档案资料中，盖伦给威斯纳提供了许多东欧人的材料，这些人曾在波罗的海国家、白俄罗斯、格鲁吉亚、

乌克兰以及德国占领的其它东欧国家傀儡政府中工作过。他们中大部分人仍然躲藏在德国的流亡人员集中营里；有些人被指控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以及他们自己的同胞。威斯纳还彻底清理了战略情报局留下的政治情报档案，包括他在布加勒斯特搜集的资料，以寻找纳粹的帮凶。不久，东欧各地的反共狂热分子加入了他们的间谍网络和游击部队。他们是随时准备推翻铁幕统治的地下解放部队的中坚。

1949年9月5日在月色朦胧的夜晚，也就是俄国人成功地爆炸原子弹几天之后，一架不明国籍的C—47飞机从西德某机场起飞，越过东欧，飞至喀尔巴阡山脉某地，空投了两个人，他们加入了一支乌克兰游击队。这支部队曾经受到纳粹的支持，这时仍在为防止苏联重新占领他们的土地而斗争。这是政策协调办公室第一次对苏联国土的纵深渗透。

此后5年里，甚至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政策协调办公室不断派遣间谍渗透到铁幕背后。威斯纳还创建了一批“民族解放委员会”和“研究所”，为前纳粹傀儡政府官员打头阵。战犯法庭通缉的一些对象甚至获准进入美国，这些流亡者声称在铁幕后面有他们的人在活动，但事实上苏联早已粉碎了他们掌握的一切秘密网络。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煞费苦心地从报纸、旧书、电台广播和流言中伪造“情报”。由于这些人为纳粹效劳时非常凶暴残忍，他们在自己国内已臭名昭著，极其孤立。然而威斯纳对大量的所谓内部情报如获至宝。金·菲尔比最成功的妙计是把混进苏联间谍的几个流亡组织推给了过份热心的美国人，他以战后英国政府囊空如洗，缺少经费为由，将这些组织移交给威斯纳，以此换取政策协调办公室的财力支援。威斯纳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些草包组织，狡

猾的菲尔比定会暗自好笑。

流亡人员集中营是威斯纳招募游击人员的一块沃土。来自白俄罗斯、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的成千上万的年轻难民和反斯大林的俄罗斯人既没有工作，也没有移民希望。而“特种部队”提供优厚的工资及良好的生活条件，并且以后还有机会获准去美国。他们在新建的学校里接受美国教育和前德国纳粹秘密警察教官的训练，学会使用小型武器、无线电操作以及爆破技术。准备空投到铁幕后面的间谍都伪造了身份，携带假文件，微型收发报机，数千卢布和小袋金币以备急用。一些人将负责同那些也许还在活动的游击小组联络；另一些人将到苏联工矿去工作，并汇报他们刺探到的情报。

威斯纳认为，为了国家安全的合法需要，使用纳粹合作者并没有错。富有冷战反共精神的美国情报官员相信，只要达到合乎道德的目的，采用可能不道德的手段是天经地义的。这种做法并非他们的创造，英国人和法国人，还有俄国人也以搜捕战犯为幌子，大量吸收纳粹科学家和情报特务。他们几乎在比赛，看谁能得到最有价值的宝贝。实际上，在美国军事情报机构使用“里昂的屠夫”克劳斯·巴比搜集西欧秘密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情报之前，英国人就雇用了他。

由于威斯纳敢作敢为，他常跟其它情报机构发生冲突。1949年政策协调办公室设了5个情报站，共有302名官员，经费达470万美元。到1952年，情报站增加到47个，雇员达到近4000，经费高达8200万美元。该室大部分人员安插在大使馆、领事馆以及军事和贸易代表团里，不知内情的人真以为他们是自己的外交同事，因为他们有外交头衔，似乎有合法的工作任务，而且享受一切外交特权，包括不受逮捕的特权。威斯纳能将情报间谍伪装成外交官塞进使馆，这说明政

策协调办公室神通广大。

在很大程度上，威斯纳的情报帝国削弱了中央情报局的秘密之臂特别行动办公室。特别行动办公室的人把自己看成是正式的职业情报人员，看不起政策协调办公室的特工，认为他们是“野鸡”，闹哄哄地蛮干危及了他们的情报收集工作。政策协调办公室和特别行动办公室常为管辖范围争吵，互相争夺人员，互相破坏对方的行动。情报机构相互倾轧的事情屡见不鲜。一位情报官回忆说，政策协调办公室曾向他表示，只要他提供一份陆军特工人员名单，可以受高薪聘用，虽然他拒绝了，但有人却接受了。由于政策协调办公室的权力大，影响大，而且经费充足，其它情报机构都妒忌它、害怕它、对它产生不满。

政策协调办公室的行动常常带有艾丽斯漫游的特点。空降到铁幕后的一班乌克兰人装备了折叠式自行车，由于苏联境内没有这种自行车，他们一遇到警察就被逮捕了。一位同事问该室东欧分部的约翰·布罗斯：“战争爆发后30天内我们将在波兰部署多少游击队员？”布罗斯信口开河说，“37000人”，使他吃惊的是，这个随意讲出的数字竟被列入计划目标。

更令人吃惊的是，结果似乎真的达到这个数字。一个叫“自由独立”的组织声称自己是原波兰抗德地下力量的残部，竟与政策协调办公室挂上了钩，寻求它的援助，以便同俄国人作斗争。尽管中央情报局反间谍机构强调要谨慎行事，但由于政策协调办公室急于在东欧扩大游击力量，仍然我行我素。在以后两年里，它向该组织空投了大量资金、武器和装备。1952年12月，华沙政府大吹大擂，宣布波兰安全局粉碎了一起企图推翻政府的阴谋。进一步的调查表明“自由独立”组织从一开始就受到波兰安全局的控制。

政策协调办公室对东欧的渗透有几次是成功的，并在一段时间里获得了一些情报，但是绝大多数渗透行动是徒劳的。派出的间谍很快落网并被处决。一些人给苏联人“拉过去”，帮助他们传送假情报；另一些人在特意安排的新闻发布会上声明自己是苏联特工。甚至在盖伦领导的组织和“特种部队”学校里也充满了苏联特工。菲尔比偷偷向苏联人泄露渗透计划。威斯纳招募的500名阿尔巴尼亚人从希腊偷越国境去废黜共产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结果中了埋伏。给乌克兰游击队空降援兵的计划遭到失败后，菲尔比自知大事不妙，他说：“我不知道有关人员出了什么事，但我能作出明智的猜测。”

中央情报局分析家的工作引起了错综复杂的评论。情报分析与其说是一种科学，不如说是一种艺术，因为分析家必须不受事实束缚，运用推测方法测定外国领导人的意图。然而人们对他们的期望一直很高。“美国人民希望你们能同上帝和斯大林亲密交谈，”在朝鲜战争中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说，“他们指望你们能够准确指出战争将在下周二下午5点30分开始。”

现实情况与人们的期望相距甚远。总的说来，中央情报局早年的情报综合同笔下生花的报纸记者们炮制的新闻电讯相差无几，因为中央情报局缺乏来自铁幕后面的内部情报，而从死资料中难以得出精确的推测。1948年铁托和斯大林的争吵导致南斯拉夫被开除出共产国际，虽然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的论战早已公开化，但中央情报局似乎毫无察觉。分裂发生后，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才正确预测到分裂的结果可能会导致共产党队伍的大清洗，但他们盲目乐观地认为这次分裂将会“使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可怕的政治运动而在西欧彻底被

消灭”。中央情报局还因为未能及时预报4月西半球外交部长会议期间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发生的反政府反美骚乱而受到严厉的批评。希伦科特上将辩解说，中央情报局实际上预先警告过国务院哥伦比亚首都会发生骚乱，但是这一警告被当成耳旁风。

对东亚形势的估计也有缺陷。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获取该地区的情报成为当务之急。但是，由于驻远东美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像排斥战略情报局一样阻挠中央情报局，使获取该地区的情报十分困难。事实上，中央情报局在整个日本只有3个人，而且因为麦克阿瑟不允许他们开设办事处，他们只能在东京旅馆里工作。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央情报局和查尔斯·威洛比将军都感到震惊；麦克阿瑟将军的这位陆军情报部长控制了远东的情报工作，可总是迎合上司的口味作出情报估计。

不久，朝鲜南北方发生战争，南朝鲜人被迫逃离首都汉城。尽管得到联合国、主要是美国的支援，但是整个南朝鲜似乎即将覆灭。杜鲁门和他的助手们把它看成是考验美国有无决心阻止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扩张的机会，不作出反应将会影响中国和苏联在东亚的政策。

有关朝鲜战争背景的情报像珍珠港事件前一样少。杜鲁门总统对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不满意，解除了希伦科特上将的局长职务，任命“甲壳虫”史密斯替代他。史密斯才华横溢，刻苦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艾森豪威尔将军手下任参谋长，人们认为盟国在欧洲的胜利多亏了他。

史密斯就职前夕，人们对有关朝鲜的情报估计再度发生争论。麦克阿瑟领导的联合国部队夺回主动权，把北朝鲜人赶回了三八线。有人提出如果麦克阿瑟的军队推进到与中国

接壤的鸭绿江边，共产党中国可能会干预。但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认为中国是苏联的盟国，只有对俄国人有利，中国才会干涉。中央情报局汇报说："尽管必须看到中国共产党完全可能发动大规模干涉，但现有事实表明，除非苏联决定打全球战争，这种干涉行动在1950年不可能发生。"

但是当麦克阿瑟的军队逼近鸭绿江时，中央情报局有关中国军队集结和中国"志愿军"在战区出现的报告不断飞来，立即受到重视。最准确的情报是逃到满洲去的一名前中国国民党军官提供的，在共产党接管之前，他在那里服过役。他根据周密观察以及在人民解放军服役的昔日同事所提供的情报，弄清了中朝边境中国共产党部队的数量和战斗序列。他的报告，加上来自其它方面的情报，使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预感到中国人即将跨过鸭绿江。但是这些报告送到麦克阿瑟手里已经太晚了。11月24日，麦克阿瑟发动了全面进攻，并吹嘘说战争将于圣诞节前结束。两天后一批批中国部队发动突然袭击，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联合国部队节节败退，最后放弃了整个北朝鲜。

战斗在三八线附近结束，1951年7月开始停战谈判，这时，政策协调办公室取代联合国的"警察行动"对北朝鲜和中国大陆开展了"声东击西"的行动，以便使共产党无法站稳脚跟。在战略情报局昔日驻东亚的间谍汉斯·托夫特指挥下，这些行动包括为被击落的飞机机组人员建立脱逃网络和向北朝鲜派遣一支大约1200人的游击部队。至少有6名间谍潜入苏联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海军基地，在那里密切注视苏联可能干预战争的任何迹象。托夫特还切断了黄海海底电缆；这条电缆是驻满洲的中国部队指挥官用来与他们在北京的总部进行联络的。这条线切断后，中国人被迫使用无线电联络，

这种联络受到陆军安全局的监听。

托夫特最大胆的行动是可耻地充当了海盗角色。他在公海上抢劫了一船中国军队急需的药品和设备。这些药品，包括 3 个野战医院的设备，是印度总理尼赫鲁中立政府租用挪威货船运给中国军队拯救成千上万流行病患者的。政策协调办公室和华盛顿断然禁止这艘挂有友好国家国旗的货船在中国靠岸。托夫特企图在货船驶入香港补充给养时进行破坏，但该船没在香港停靠。于是托夫特匆忙与国民党联络，安排了不挂国旗的武装船只在台湾岛附近拦截了这艘货船。政策协调办公室的官员躲在甲板下进行策划，由台湾的中国人出头露面将货物搬走，之后仍让货船继续按原来的航线行进，货船上的人还以为他们受到中国海盗的抢劫。

朝鲜战争结束后的数年里，100 多名中国人被拉入间谍机构，受训后派往中国大陆开展游击战，其中有几支小分队空降或在海滩登陆，他们发现中国大陆根本没有像国民党声称的那么多抵抗分子在同共产党作斗争。类似的小规模行动延续到1960年前后，除了领导这些活动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被逮捕以及他们的特工被击毙外，几乎毫无成果。中央情报局还支持在缅甸境内的 1 万多中国国民党军队，这支部队1952年入侵中国被击溃后，其残部退回缅甸，专心经营鸦片生产这个有利可图的行当。在亚洲和在东欧一样，中央情报局企图颠覆共产党政权，结果却未能伤他们一根毫毛。

由于史密斯上将的有力领导，以及朝鲜战争的压力，中央情报局从1950年大约5000人迅速扩充到1955年的15000人，另有数千合同雇员以及外国间谍。朝鲜战争使冷战全球化，这时美国在36个国家设有基地。史密斯对中央情报局内部乃至

整个情报界有关职权的争论不感兴趣，而是专心致力于提高情报工作效率。许多研究机构一直批评中央情报局没有提供权威性情报评估，批评他们未能协调整个情报界的情报活动。人们谴责说，中央情报局只把自己当作与其它情报机构竞争的平行机构。

为了提高该局情报评估的质量，史密斯将军说服曾经担任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处长的威廉·兰格离开哈佛大学，组建国家情报评估处。在兰格的指导下，该处拿出了质量大大提高的综合情报。他们提出了对敌方意图的估价和许多可供选择的意见供总统考虑。为了防止有人掺入自己的主观意见，史密斯强调凡是送给杜鲁门的评估不包括其它情报机构的不同分析，对评估的反对意见在备注里陈述。国家情报评估处还主动对不作具体要求的课题提出报告。史密斯用同样的精神调整了该局情报分析处，建立了情报司，由哈佛大学法律学院教授罗伯特·艾默里领导。中央情报局破天荒地开始完成它初建时要承担的职责，即协调政府各机构情报收集计划，并向国家决策人提供信息和建议。

就职不到一周，这位将军采取了决定性步骤将政策协调办公室纳入他的控制之下。国务卿和国防部长未及提出反对意见，史密斯就宣布他完全控制了这一组织。从现在起，他们得通过他而不是弗兰克·威斯纳传递政策指导。1951年1月史密斯让连任几届中央情报局局长非官方顾问的艾伦·杜勒斯担任计划司副司长，由他负责强制合并政策协调办公室和特别行动办公室的工作。不久，杜勒斯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两室合并工作进展缓慢。1952年夏末，史密斯召集了所有有关人员开会，莱曼·柯克帕特里克把反对意见又讲了一

遍，据说史密斯大发雷霆，他突然中止讨论，宣布说，不管大家喜欢不喜欢，合并是必然的，说完扬长而去。当时史密斯作了溃疡手术后体重已下降了50磅，一位官员悄声对柯克帕特里克说："天那！瞧他那副咄咄逼人的样子，体重不减还不知怎么样呢！"合并最后实现了，新建的计划司由政策协调办公室的弗兰克·威斯纳任司长，为了平衡起见，特别行动办公室的理查德·赫尔姆斯任副司长。除了情报司和计划司外，史密斯还建立了行政司，加强预算，人事，安全和后勤工作。

然而"甲壳虫"史密斯在中央情报局的时间不长。1953年就职不久，艾森豪威尔任命他的这位老同事为副国务卿，而艾伦·杜勒斯晋升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尽管如此，在他任职的 3 年里，史密斯为中央情报局建立了延续了20年之久的基本结构和规模，这是他给该局留下的永久性纪念。近10年前杜诺万建立集中统一情报机构的设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16. 争夺世界之战

接到电话通知后大家无不惊诧。1956年4月25日黄昏，西柏林记者团应邀去苏联管辖的柏林听取情况介绍。这样的邀请是史无前例的，大厅里人们议论纷纷。苏联驻军代理司令伊凡·科丘巴上校登上讲台，宣布俄国人发现了一条由柏林西区通往东区的秘密隧道，他谴责中央情报局一直利用这条隧道窃听苏联军事通讯是"犯罪的间谍行为"。兴奋的记者们提出了许多问题，科丘巴没有回答，而是告诉大家，苏方将

带他们去目睹现场。

夜幕降临时，摩托车队在前鸣笛开路，满载记者的车队向郊区急驰而去。在紧靠西区鲁多的一个大洞旁车队停下来，那里灯光通明，一位苏联军官伸出头来，友好地招呼记者们："先生们，过来，靠近些，爬下来。"记者们从梯子上下来，到了地下室，这位俄国人带他们参观起来。

地下室拱形墙壁3条粗粗的电话电缆上挂着一串串扩音器。这位将军解释说，一条大约500码长，15英尺深的隧道已经从西柏林通向这个窃听室，连接东柏林红军司令部与莫斯科的300条电话线上安装了不少窃听器。窃听到的信息经扩音器放大后由隧道送回西柏林，然后录在磁带上。通过隧道另一端铁门上的裂缝，记者们能够看到闪烁的灯光，清楚地听到美国口音的谈话片断。

俄国人声称这条隧道是4天前被检修电缆的通信部队发现的。他们挖到6英尺深时，发现一扇铁门，上面刻有德语和俄语："司令员命令严禁入内"，战士们迷惑不解，打电话报告了司令部。接着他们奉命破门而入，在铁门另一边的美国人惊呆了，他们迅速逃离，一壶咖啡还在炉子上煮着。

柏林隧道——黄金行动——是美国、英国和西德情报机构的综合工程，旨在全面控制苏联通讯网，不留任何危险的空缺。为了防止西方国家窃听无线电通信，俄国人曾改用无法窃听的超高频率。面临这一障碍，西方情报机构只好设法窃听俄国人的电话，但是苏联人采用扰频电话机，使人无法偷听。庆幸的是，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科学奇才卡尔·纳尔逊最近发现，通电话时的真实声音在受干扰后的一瞬间，仍然留在电话线上，这个"影子"声音是可以获取的。

不久，莱因哈德·盖伦领导下的一名间谍画图说明东德

电话电缆线紧靠美国占领的柏林区域，只是这些电缆线埋在6英尺的地下，怎样安装窃听器才不会惊动俄国人和东德人呢？中央情报局柏林站负责人威廉·哈维提议向电缆线挖一条隧道，他说英国秘密情报局在1951年就使用隧道窃听驻维也纳苏联司令部与莫斯科之间的电话，不过柏林的工程肯定更为复杂，挖隧道工人不得不在受严密巡逻的边境线地底下冒着塌方的危险挖几百英尺长的隧道。

哈维曾经是联邦调查局间谍，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终于使华盛顿勉强同意了该工程。在中央情报局里，哈维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大战期间，他曾经是联邦调查局反间谍特工人员，他的任务是对付苏联在美国的间谍活动。由于他不能证明伊利莎白·本特莉对阿尔杰·希斯和其他人指控属实，哈维与埃德加·胡佛发生了冲突，1947年辞职后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由于他熟悉苏联间谍的活动，他被任命负责C处工作，这是一个反间谍的小单位，他还被认为是第一个揭发金·菲尔比的人。

更为神秘的是，哈维爱喝酒，爱玩女人。他的酒量惊人，他曾经对一个熟人讲，他从12岁开始，每天跟一个女人睡觉。他是中央情报局里唯一经常携带手枪的人，有时甚至公开把枪放在办公桌上。他声称："假若你像我那样知道那么多秘密，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要带枪。"

黄金行动采用技术手段获取情报，是中央情报局面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挑战用来保护自己地位的间接办法。有人曾提出让中央情报局成为全国主要的通讯窃听中心，但是"甲壳虫"史密斯反对这个建议，理由是该局在情报领域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情报分析，于是1952年在原来武装部队安全局的基础上建立了国家安全局。在短短几年里，设在马里兰州米

德堡的国家安全局发展成为自由世界最大的情报机关。

隧道工程由美国工兵完成，他们一次只向东柏林推进几英尺，因此地面不会听到噪音。英国人已发明了向上挖隧道的本领，他们开通了从控制室到电话电缆的垂直竖井。为了掩护该工程，美国故意放风说他们正在建造一个雷达站，观察在舍纳费尔德东柏林机场附近的交通。工程进展艰难。在一处，隧道工程人员遇到了地下水，在另一处，他们碰到奇臭无比的化粪池排放区。工程终于在1955年2月22日竣工。150部磁带录音机开始窃听秘密。

处理获得的材料是一件浩繁的工程。东德警察局的线路由专人在那里监听，以便了解隧道窃听行动是否已被发现；其它路线得来的一切材料都送往华盛顿。为了处理源源不断送来的大量信息，翻译人员昼夜在地处白宫附近、林荫大道旁的T—2大楼里工作。有关苏军战斗序列的大量情报中——苏军的准确分布以及部队运动——也夹杂着少量轶闻，比如苏军司令官的妻子在黑市做东方地毯买卖等。由于积压的材料太多，情报处理工作直到1958年9月才完成，那时隧道已被封闭两年多了。

窃听人员多次以为他们已被发现。有一次窃听室内的热量辐射直接引起了地面冰层融化，幸好老天下了一场雪，没有引起苏联人怀疑。一天清晨，窃听人员听到头顶上沉重的脚步声十分震惊，一边准备撤离岗位，一边派人出去查看，原来东德警察局已在窃听室上方建立了一个临时车辆检查站，几个卫兵正在跺脚取暖。

“哈维的这个洞”对苏联监视了11个月零21天。最后暴露时，美国人捉弄欺骗俄国人的非凡本领受到广泛赞赏。事实上，中央情报局把柏林隧道的成功看作冷战中最重大的胜

利之一。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称之为“该局所从事的最有价值、最大胆的工程之一”,哈维因此获得该局最高奖赏——情报荣誉勋章。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黄金行动简要反映了美国情报工作经验中最重要的内容，如无比的胆略，周密的计划以及高超的技术，但是该行动对国家安全的作用仍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从窃听情报的第一天起，苏联人对柏林隧道就已了如指掌，因为参加这一行动设计的英国情报官乔治 布莱克就是苏联暗探。

布莱克原名乔治·贝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在荷兰抵抗力量和英国特别行动执委会工作，成为英国公民后，从事外交工作。1950年，他正在南朝鲜汉城服务，因此被关押了3年。在监禁期间，他改变了信仰，回到英国时他已是个忠于共产主义的间谍。他被安排在英国军情6处驻西德站工作。在那里，他不仅向俄国人泄露了柏林隧道的秘密，而且还出卖了在铁幕后执行任务的数名西德间谍。

虽然布莱克并不了解卡尔·纳尔逊获取电话残留音迹的技术，他却向俄国人告密说他们的通讯安全受到威胁。是揭穿这项工程，还是暴露布莱克这个重要的情报来源，俄国人选择了前者。这样做似乎是十分恰当的，因为克格勃保持了对同盟国情报机构的渗透，而中央情报局则要耗费大量财力和人力去处理窃听来的大量无关宏旨的材料。

艾伦·杜勒斯担任局长后的8年是中央情报局的黄金时代，它不仅扩大了活动范围，而且成为美国决策过程中有影响的角色。杜勒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颇负盛名的间谍头子。加上他同哥哥约翰·杜勒斯国务卿有密切的工作关系，

于是他权运亨通。杜勒斯兄弟俩牢牢掌握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制订权，只需他们一个电话或饭桌上的一次谈话就能解决问题。

艾森豪威尔总统上任伊始，发表了激烈的反共宣言，鼓吹以“击退”共产主义的政策取代杜鲁门“被动”的遏制政策。但是决策者们认为苏联威胁的性质在朝鲜战争结束和斯大林去世后有所改变，很可能采用渗透和颠覆来达到他们称霸全球的野心。因此，中央情报局变成艾森豪威尔对付共产主义的拳头，它越来越依靠隐蔽行动和准军事行动，这些行动成为该局的明显标记。

这一特征正好同杜勒斯本人的倾向相吻合。他对同行说，假若共产党威胁要接管一个国家，他不会“等待邀请后再前去援助”。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使杜勒斯对索然无味的情报分析和形势估计工作毫无兴趣，而醉心于情报工作的具体行动。这些年在情报司工作的雷·克莱因声称，杜勒斯也许把四分之三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中央情报局的“肮脏骗术”。从1953年至1961年间，中央情报局的平均年预算为10亿美元，而隐蔽行动的费用就占了其中百分之五十四，并新增2000名雇员。杜勒斯以“白色案件总管”著称，领导着错综复杂的特别行动，每当同战略情报局的老朋友弗兰克·威斯纳密谋策划或商讨情报工作的最新技巧时，他总是乐不可支，劲头十足。他把局里的日常事务全托付给副局长前空军上将查尔斯·卡贝尔。

杜勒斯和目光凶狠、不善辞令的“甲壳虫”史密斯形成鲜明对照。他和颜悦色，常常像圣诞老人那样“哈哈”大笑。他那蓬乱的白发，浓密的胡须，不离嘴的烟斗，都显得富于魅力。他常常拜倒在石榴裙下，使他那长期受折磨的妻子克

洛弗感到绝望。有时他一边打网球，一边处理事情；有时他因痛风病发作而穿着拖鞋在办公室地毯上踱来踱去。虽然医生要他节食，但他太爱吃喝，太爱乔治敦的晚会而把医生的嘱咐当耳旁风。

与以往的局长不同的是，杜勒斯为其间谍老手的崇高声望而洋洋自得，连篇累牍地发表演说，不知疲倦地著书立说。他喜欢亲自欢迎到中央情报局来工作的新成员，绘声绘色地叙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次在瑞士未能与列宁聚会的遗憾。凡是呈交给他的建议，他总是限制只写1页纸，对那些他同意的建议，他就随手批上“可以试一试”几个字。

在紧张的冷战期间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基调在詹姆斯·杜利特尔将军建议扩大隐蔽活动的绝密报告中得到绝妙的反映：

> 显然，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死敌公开宣称要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主宰世界，在这场比赛中没有规则，到目前为止人类行动的共同准则被抛在一边。如果美国要生存下去，必须重新考虑长期存在的美国观念“公平比赛”。我们必须发展有效的间谍和反间谍工作，必须学会运用比敌人对付我们的方法更高明、更尖端、更有效的手段颠覆、破坏、消灭敌人。

紧接着这个“反共宣言”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命令，批准计划司肆无忌惮地发动反共秘密战争。威斯纳使用无限多的经费建立了比杜鲁门时代大得多的宣传系统。他凭借新

闻记者、出版社以及在政党、工会和世界学生组织中"有影响的代理人"组成的网络，随心所欲地发表文章，自由欧洲电台和解放电台对人们认为叛乱条件成熟的东欧集团国家加强了宣传工作。

强大的宣传机器是为了配合大规模的反苏叛乱。他们投入数百万美元把持不同政见的东欧人训练成大暴乱骨干，制订了代号为"红袜子——红帽子行动"的计划。50年代后期，该计划正式通过，准备由持不同政见者煽动东欧主要城市同时造反，随后在苏联内部挑起少数民族打内战，威斯纳的"解放军"则在叛乱发生几小时后攻击苏联驻军，在苏军受到沉重打击后，北约组织将派出维持和平部队，同时宣告这些部队将留下恢复秩序，直至进行了斯大林1953年在雅尔塔保证过的民主选举后才撤离。

威斯纳的这些计划想入非非，荒唐无稽，他的一些同僚也持怀疑态度，其中莱曼·柯克帕特里克和理查德·赫尔姆斯就认为，大规模的隐蔽活动是对当地间谍网安全的威胁。此外，能否成功极无把握。柯克帕特里克认为隐蔽行动和核武器一样不易控制，除非自始至终绝对保密，否则万万不能尝试。由于准备提供行动骨干人员的盖伦组织混进了共产党密探，"红袜子——红帽子行动"一开始就走漏了风声。

仅举一例。盖伦组织派驻北约司令部的联络官、前纳粹分子海因茨·费尔夫是苏联的间谍。他接触过北约所有档案，包括"红袜子——红帽子行动"计划。威斯纳甚至把费尔夫请到美国去密谋策划。由于他历史上当过纳粹，这位德国人不能获得签证，但是威斯纳给他伪造了身份。费尔夫的克格勃上司对威斯纳曲线帮助苏联间谍秘密进入美国真要感激涕零了。

由于冷战的界线在欧洲相当分明，苏美对抗转移到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押在这场世界范围斗争的赌注很大。这些国家原料丰富，几十年来都为发达的工业国家提供资源。但是这些不稳定的新兴国家莫斯科或华盛顿都不易驾驭，这些国家的许多领导人是反殖民主义的革命家，那里充满民族主义、贫穷落后和政治混乱。尽管美国有自己的革命传统，艾森豪威尔政府顽固地将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而且主观臆测第三世界的动乱在很大程度上是俄国人鼓动的。

在苏联集团之外，美国发起的第一次颠覆政府的活动发生在伊朗。1952年伊朗穆罕默德·慕沙德首相将英国拥有的英一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英国无法派遣间谍进入伊朗，便请求美国除掉慕沙德。慕沙德绝非共产主义者，但他老奸巨猾，手法多变，国有化在国内深入人心。然而，受莫斯科控制的伊朗共产党的影响在日益上升，艾森豪威尔政府害怕俄国人控制伊朗巨大的石油储备。更有积极意义的是，政府发现美国商业利益有机会渗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因此，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顾问断定搞掉慕沙德的时机成熟，任命中央情报局中东分局领导人克米特·金·罗斯福为“阿贾克斯”行动的总指挥。

金·罗斯福时年37岁，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孙子，曾在战略情报局的中东和意大利站工作过。他被阿拉伯世界所吸引，曾周游各地，写了大量关于该地区的文章，1950年回到中央情报局工作，一位观察员说：“在以后8年中，他改变了或基本左右了中央情报局在中东的政策。”

罗斯福性格温和，曾担任过历史教授，外表根本不像著

名的间谍。1957年7月他偷偷进入伊朗，策划推翻摹沙德的政变。一个半文盲的边境检查员把护照上的文字说明误认为他的名字，记录成“右额有焦痕的先生”。因为他在德黑兰很有名气，所以不能公开露面，他带领中央情报局一批骨干人员躲在郊区一间安全的地下室工作。他数次秘密会见了年轻国王穆罕默德·雷扎·巴列维，向他保证美国和英国一定提供支持，增强了他反抗的决心。同时，反摹沙德的伊朗人在军队内部活动，使用贿赂收买人心，开动宣传机器把首相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挑动群众与共产党发生冲突。

8月13日国王签署命令撤消摹沙德职务，由中央情报局推荐的法茨洛拉·扎赫迪将军出任首相。这项命令引发了一连串事件。传送命令的军官遭到逮捕，共产党成员拥向街头支持摹沙德，在罗斯福的授意下，国王离开了伊朗，使形势更为严峻。整整两天罗斯福因失去与伊朗间谍的联系而焦急不安，局势一片混乱。共产党人控制了市区，政府大楼上的国王像被撕了下来，部队早晚的祈祷里不准提到国王的名字，共产党的支持者们开始捣毁国王和他父亲巴列维的雕像。

8月16日清晨，罗斯福命令伊朗间谍指挥他们的“数千人马”立即行动。从集市上招来大力士带领人群涌上街头，高呼“国王万岁！国王万岁！”用卡车从农村运来的农民用匕首、镐、自行车链子作武器，同市区暴民一起排除障碍向德黑兰市中心进发。奉命前来驱赶闹事者的部队倒戈，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躲在幕后的扎赫迪将军也露了面，站在一辆坦克上，率领国会广场上的游行队伍，到了中午，一切都结束了，摹沙德已经逃离，他的部长们全部被逮捕。

国王胜利回到德黑兰。他对金·罗斯福说：“我的王位归功于上帝，归功于人民和军队，也归功于你。”

感恩戴德的国王结束了英—伊石油公司的垄断，让美国石油公司的国际财团分享伊朗石油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中央情报局以相当低的代价取得了政变成功，总共才耗费100万美元。然而从根本上说，中央情报局与“阿贾克斯”行动的成功关系不大，因为慕沙德本来就很软弱，国王和支持他的部队只要敢作敢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推翻他。尽管如此，从表面上看，伊朗行动仍然是个辉煌的胜利，它在美国决策者头脑里形成了中央情报局不可战胜的神话。

一回到华盛顿，罗斯福意识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没有抓住伊朗政变成功的根本原因。当他在白宫对“阿贾克斯”行动作简短介绍时，他吃惊地注意到约翰·杜勒斯的“目光炯炯，不时满意地随声附和，显然他在饶有兴味地洗耳恭听，但是直觉告诉我，他正在计划另一次行动”。公认的隐蔽行动专家罗斯福感到他有责任提醒听众，包括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内，类似的政变不会成功，除非那里的“人民和军队同我们心心相印，否则，你最好将任务交给海军陆战队。”

但是国务卿并不想听罗斯福的这番话。“他仍然兴致勃勃地靠在椅子上。”罗斯福的担心是有根据的。几星期之后，他被提名领导推翻危地马拉左翼政府的行动，很快检查了行动计划后，发现该计划不合他的要求，于是他拒绝领导这次行动。

3年前，支持社会主义的陆军上校雅各布·阿本斯·古斯曼成为危地马拉第一任民主选举的总统，依靠前任总统胡安·乔斯·阿雷瓦卢的经济和社会改革，阿本斯决心改变土地占有不均的现象。仅占人口百分之二的土地拥有者占有百分之七十二的耕地，绝大多数人民挣扎在贫困线上。另外，

文盲比例高达百分之七十五，印第安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0岁。但是阿本斯的土地改革纲领不仅疏远了保守的土地拥有者，而且得罪了美国占有的联合果品公司；这家庞大的香蕉出口公司在华盛顿有巨大靠山。阿本斯没收了该公司未开垦的234000英亩土地，根据该公司自报这些土地应该交纳的税金，阿本斯提出给该公司60万美元赔偿金，可是公司认为这笔钱太少，坚持要求赔偿1500万美元。

毫不奇怪，该公司的要求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有力支持，因为该公司在华盛顿的朋友确实有权有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它的法律顾问，艾伦·杜勒斯是股东，在国家安全局的总统代表罗伯特·卡特勒将军是董事，"甲壳虫"史密斯后来也是董事，负责美洲国家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卡伯特的弟弟是该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还得到托马斯·科伦的支持，他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助手，在华盛顿颇有影响，担任民用航空运输公司律师，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密切。

联合果品公司发动了一场高压宣传运动，在美国制造危地马拉将由共产党人接管的紧张空气，赢得了广泛的支持。门罗主义炮制出笼，人们强调苏联威胁了巴拿马运河。尽管阿本斯的内阁和军队里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危地马拉也没有与苏联及其卫星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人们谴责他受共产党控制。有人散布谣言说阿本斯吸毒成性，受苏联人的摆布。由威斯纳一手挑选的美国大使约翰·普里福伊舌如利剑，他汇报说阿本斯"思维像共产党人，谈吐像共产党人，如果他现在不是共产党人，迟早也会成为共产党人。"1953年下半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之所以决定废黜阿本斯，受联合果品公司的影响倒是次要的，主要是唯恐危地马拉受共产党控制。

像多数冷战行动一样，除掉阿本斯的决策两党意见一致，

并受到民主党重要人物的支持。威斯纳和艾伦·杜勒斯直接控制了这项代号“成功行动”的工程，在金·罗斯福拒绝后选派艾伯特·哈尼上校为战地总指挥。曾经担任军事情报官的哈尼当时是中央情报局驻南朝鲜站站长，但他在拉美经验相当丰富。威斯纳的助手雷西·巴恩斯担任与中央情报局总部联系的联络官。中央情报局选择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扮演“解放者”的角色。他是个能吃苦耐劳的职业军官，曾在一次反对阿本斯的政变失败后被捕入狱，后来在狱中挖地道逃跑。卡斯蒂略·阿马斯在危地马拉没有什么名气，除了反共，他头脑十分简单，不过叫他充当傀儡很合适，他会保护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

哈尼认为在这块土地上中央情报局不可能策划一场伊朗式的“自发的”叛乱，因为阿本斯在国内得到广泛支持。但是，他的生存依赖于军队对他的忠诚。哈尼决定通过宣传、破坏、突然袭击和由卡斯蒂略·阿马斯领导“入侵”等一系列手段达到破坏军队的忠诚、摧毁阿本斯统治的目的。“成功行动”得到450万美元经费，但有人估计这次行动最后实际耗资约2000万美元。

在邻国尼加拉瓜独裁者阿纳斯塔西奥·加西亚将军的协助下，建立了“解放军”训练基地，受训人员包括数百危地马拉流亡人员以及中央情报局征集来碰运气的美国兵。名叫塞缪尔·卡明斯的前中央情报局雇员建立了一个向他们供应武器的皮包公司。苏制武器也运到危地马拉，以进一步制造舆论，说苏联人正设法在中美洲建立据点。许多秘密电台，使用与危地马拉电台相同的频率广播耸人听闻的报道，后因水门事件而出名的霍华德·亨特负责这项宣传工作。亨特和曾经当过演员和新闻记者、最近刚到中央情报局工作的戴维·

艾特利·菲利普斯一起，准备用逐步升级的心理战促使危地马拉政局不稳。实施政变的主力是中央情报局的空军，这是一支由中央情报局用契约招募来的美国飞行员组成的杂牌军，使用的运输机和P—47战斗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剩余品。

1954年年中，套在阿本斯脖子上的绞索越来越紧，一向无所事事的美国驻危地马拉使馆一下变成前线司令部，戒备森严的四楼指挥部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猛增。普里福伊大使公开会见反对党领袖和部队军官，向官员们收买政府内部情报，并使用有影响的人物把碍事的美国新闻记者赶出该地区。像乔治·米尼这样的美国劳工联盟领袖们谴责共产党对危地马拉工会的控制。美洲国家组织以17票赞成、1票反对宣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任何一个美洲国家的控制都会对西半球构成威胁。艾森豪威尔警告国会领导人说，危地马拉正把“马克思主义的触角”伸向萨尔瓦多。

阿本斯意识到入侵迫在眉睫，装备简陋的危地马拉军队难以对付由美国策划的大规模政变，于是，他设法从美国和西欧购买武器，但到处碰壁。当走投无路时，他转向苏联集团，从捷克斯洛伐克买进了价值100万美元的步枪、机关枪和弹药。装运这些武器的瑞士货轮“阿尔芬”号1954年5月15号抵达巴里奥斯港时，华盛顿惊恐万状。

在“阿尔芬”号到达后的第二天，杜勒斯召开了情报顾问委员会会议，与会者包括陆、海、空三军、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级情报官员。他们凭空得出结论，说这艘船携带了足够的武器使阿本斯能够穿过邻国800英里区域，直接威胁巴拿马运河区。杜勒斯将这些发现呈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并获准于下个月入侵危地马拉。同时，中央情报局阴谋

破坏从巴里奥斯港到危地马拉城装运武器的火车，一组突击队在铁路沿线埋下炸药，可是一场倾盆大雨浸湿了雷管，只有一处发生爆炸，炸毁了一段铁轨。袭击者向火车开枪，打死了1名卫兵，撤离时自己损失1人。火车安全无恙地向首都隆隆进发。

中央情报局的心理战较为成功。一项反对政府的阴谋暴露，警察逮捕了十几名嫌疑犯。在普里福伊指使下，军队高级军官去见阿本斯，要求总统免去在政府中任职的共产党人。阿本斯却对他们讲，与其让共产党人在地下活动，不如让他们公开活动，军官们只得快快离去。中央情报局故意制造谣言恐吓他们，说阿本斯计划解散军队，由共产党人控制的农民民兵取而代之。已退休的空军司令乘坐小飞机逃往国外，致使阿本斯为数不多的飞机长期停飞。

入侵在6月18日开始，卡斯蒂略·阿马斯乘坐一辆小型货车，带领解放军从洪都拉斯越过边境。由于没有同时发生叛乱接应他们，中央情报局命令入侵部队在境内6英里处停下等待时机。戴维·菲利浦的“解放电台”制造了大规模入侵的假象，并向伪称在山里活动的第五纵队发送假消息。当阿本斯在电台发表演说稳定国内人心时，广播受到干扰。中央情报局的飞机在危地马拉城散发传单，并轰炸、扫射外围城镇，加强心战攻势。

但是很快出了一系列差错。中央情报局的两架飞机被击毁，另一架因燃料不足而坠毁。一个美国飞行员本来想破坏危地马拉政府的广播电台，没想到却炸毁了美国福音传教士开设的电台。一艘英国货船被误认为是苏联船只也遭到轰炸。哈尼担心这次行动会马上失败，请求华盛顿补充缺损的飞机。虽然拨调出两架P—47飞机，但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

卿亨利·霍兰认为，在全世界关注危地马拉时，把飞机交给叛乱分子将会带来严重的国际反响。

最后只有请艾森豪威尔总统拍板。6月22日，他既听了艾伦·杜勒斯要求派飞机的请求，也听了霍兰的反对意见。总统很想知道没有飞机反叛能否成功。

“毫无希望。”杜勒斯回答道。

“如果我们提供飞机，那又会怎么样呢?”

“成功的希望有百分之二十，”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回答。

艾森豪威尔终于同意了；杜勒斯的坦率得到了报偿。在杜勒斯离开时，总统对他说：“你如果说成功希望是百分之九十，我就不会同意派了。”

为了掩盖这件事，两架P—47飞机“出售”给尼加拉瓜空军，由中央情报局提供15万美元作为购买飞机款项。哈尼马上把这两架战斗机派出去狂轰滥炸了7小时，使形势转为有利于反叛者。兵营遭到轰炸或机关枪扫射，弹药库、油料库被击中，居民惊慌失措。解放电台捏造谎言，报道反叛力量在根本没有发生的战斗中取得重大胜利，还声称反叛队伍已发展到5000人，而且时刻都在增加，危地马拉军队听了这样的报道后士气低落。事实上，“解放军”人数不到400人，而且一直呆在离洪都拉斯不远的边境，以便一旦受到攻击就可以逃遁。由于阿本斯多疑，外国记者不能接近“前线”，完全听信普里福伊编造的电台报道，而他却挎着手枪在首都得意洋洋地乱窜。

阿本斯不信任他的军官们，电台以及外国报纸关于数路反叛部队已逼近危地马拉城的谣言使他感到恐慌，6月2日他宣布辞职，并躲进墨西哥大使馆避难。获胜的卡斯蒂略·阿马斯进入首都时，15万人民一片欢呼，中央情报局预先分发

的爆竹响遍全城。联合果品公司很快收回了被阿本斯没收的土地，大约4000名涉嫌参与共产党活动的人遭到逮捕，保障工人和工会权力的法律被废除了。从那以后的30年中，上校和将军们相继统治危地马拉，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条件毫无改善，甚至每况愈下。阿本斯逃离后不久，艾森豪威尔把执行这项行动的中央情报局人员召到白宫，亲自对他们表示感激，他说："你们阻止了苏联在西半球建立滩头堡的企图。"

受到伊朗和危地马拉冒险活动胜利的鼓舞，艾森豪威尔更加频繁地依靠中央情报局来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这一战术不仅使美国不必正式承认染指世界上动乱地区，而且使总统绕过了不愿卷入第三世界斗争的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伊朗和危地马拉行动巩固了隐蔽行动优于间谍活动的地位。到50年代中叶，中央情报局进行了多达50项隐蔽行动，经费占中央情报局整个预算的百分之八十。有些行动像伊朗和危地马拉行动那样顺利，也有些行动失败了。

中央情报局像幽灵一样无处不在，使人望而生畏，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央情报局是一个无法无天、不负责任的"隐形政府"，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甚至最理智的领导人都坚信中央情报局利用渗透、颠覆甚至战争来达到其目的。

空军上校爱德华·兰斯代尔是个笑面虎，曾在战略情报局负责广告工作，是这个时期隐蔽活动的典型人物，由于名声很大，两本畅销小说把他作为人物的原型。在菲律宾，兰斯代尔担任国防部长拉蒙·马格塞塞的顾问，利用两面手法击败了赫克巴拉哈普共产党游击队的骚乱。依靠美国可观的经济援助，他提出了土地改革和社会发展纲领，以达到与共产党争夺农民的目的。他还促使马格塞塞成为民主党的总统

候选人。

他采用卑鄙伎俩使游击队失去理智。根据菲律宾人恐惧吸血鬼的迷信心理，他派人将一名在伏击中丧生的赫克人身上的血放光，把尸体抛在十字路口，游击队和其他人一样害怕吸血鬼，从而逃离了该地区。兰斯代尔提供了100多万美元支持马格塞塞竞选总统，中央情报局一名特工装扮成《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为他撰写了演说，中央情报局还派人在一些竞选对手的饮料中掺进麻醉药，让他们在竞选中出尽洋相。

1954年当日内瓦协议刚刚签订，胡志明领导的长期反法战争胜利结束时，兰斯代尔在菲律宾行动成功后被派往越南。饱经战争创伤的越南在1956年大选前将由17度线暂时分成两半。美国担心共产党人胡志明获得大选胜利，于是不顾预定的选举计划谋图在南方建立反共政权。许多美国顾问接踵而来，每年还倾注了大约3亿美元的援助。美国选中了吴庭艳作为越南的马格塞塞。天主教家庭出身的吴庭艳曾在美国居住，法国人在比利时的一座寺院里发现了他，把他送回西贡当总理。

兰斯代尔帮助吴庭艳消灭了政治对手，并推行绥靖政策，在南方搞军事训练，在北方进行各种骚扰，破坏日内瓦协议。执行破坏任务的小分队在菲律宾集训，并使用美国海军船只潜入北越，最后大部分人被擒获，给河内政权谴责美国及其在南方的追随者进行颠覆活动提供了口实。兰斯代尔还帮助鼓动大批天主教难民从北方逃往南方，虽然天主教在以佛教为主的南方人数极少，他们却成了吴庭艳政权的支柱。当吴庭艳以绝对优势百分之九十八点二的选票当选总统时，人们认为兰斯代尔领导的隐蔽行动又取得了胜利。

50年代末中央情报局在印度尼西亚企图推翻苏加诺总统的行动不太成功。苏加诺结束了荷兰350年的统治，使印度尼西亚赢得了独立。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却不信任他，因为1956年他放弃了代表制政府，实行了“指导性民主”政府，使共产党扩大了权力。华盛顿担心可能失去印度尼西亚丰富的石油、橡胶和锡，同意支持苏门答腊岛上一班持不同政见的校官进行反叛。弗兰克·威斯纳声明:“我认为该是把苏加诺的脚放到火上去烤的时候了。”

在策动反叛前，中央情报局根据计划司印度尼西亚事务负责人约瑟夫·史密斯的意见，企图利用苏加诺的好色来败坏他的名誉。在印度尼西亚，男人玩弄女性并不认为是大逆不道，但是情报局散布谣言说苏加诺迷上了一个担任俄国间谍的金发女郎，并密谋制作一部描写苏加诺总统与女郎鬼混的色情影片，但是由于难以找到一个容貌与苏加诺酷似的人，最后只好由演员戴上面具拍成了这部影片。

1958年2月乘苏加诺出国之机，中央情报局支持在苏门答腊举起了反叛的旗帜。仿照在危地马拉行动中的做法，中央情报局控制的民航运输公司派出飞机空投武器和实施轰炸，支持暴动者。但是苏加诺比预料的要厉害，一举平息了暴乱。战斗结束前，一架反叛飞机误炸了一所寺院，炸死大部分做礼拜的人，飞机被印度尼西亚人击落后，美国飞行员艾伦·波普被抓获，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都声称波普是个兵痞，否认美国与反叛有任何牵连。事隔不久，艾伦·杜勒斯命令中央情报局放弃在印度尼西亚的冒险行动。4年后苏加诺应罗伯特·肯尼迪个人的请求释放了波普，这场惨剧终于落下了帷幕。波普获释几个月后，就去迈阿密为由中央情报局控制的南方航空运输公司服务了。

如果情报局局长与总统之间接触的程度是衡量他影响大小的主要尺度，那么，杜勒斯便是历届中央情报局局长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为了让总统了解他们的想法，有些局长不得不像中世纪的朝臣那样玩弄诡计，他们常常在总统快要午睡的时候前去拜访，或者研究总统的日程安排，在他办完公务回椭圆形办公室的路上挡驾，或者在某个星期六早晨，趁白宫工作人员稍不注意时突然去见他。

杜勒斯接近艾森豪威尔的机会比任何人都多，但他不像有时图画上描绘的那样，每天早晨都去椭圆形办公室交谈。两人的关系不过分亲密。艾森豪威尔每周约见杜勒斯两次，但每天都要听取中央情报局相当一级官员的简短汇报。总之，总统对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十分满意。当顾问们批评杜勒斯管理不善时，艾森豪威尔的回答是："我不会撤换艾伦……尽管艾伦有他的局限性，但我宁可让艾伦当情报主官，而绝不换其他人。"

直到1955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审批隐蔽活动的唯一方法是在有关机构之间非正式地达成理解。虽然在公众场合当问及这些行动时，总统常常吞吞吐吐，但是他一直用老兵的眼光看待这些行动。一位中央情报局前高级官员说过："要采取的一切隐蔽行动都是白宫作的决定。"在隐蔽行动不多的情况下，实施宽松的控制政策是合适的。但是隐蔽活动的数量倍增后，再采取随意态度就不合适了。为此，国家安全委员会5412/1和5412/2号文件规定审批程序，除了少数变动外，这些程序在20年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生效。

总统指派的代表、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审查和批准各项行动计划；总统通常派国家安全顾问作代表，其他人或者亲自参加或者也委派某人

作代表参加。计划由该委员会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作最后审批。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总统执政期间这个委员会称为"5412委员会"或者"特别小组"；在约翰逊执政期间则称为"303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设在行政办公大楼303房间；在尼克松执政时，称作"40委员会"，是依据规定其活动的一个文件命名的。但是不管叫什么名称，它的核心代表人物是相同的。

艾森豪威尔还建立了总统国外情报活动顾问委员会作为总统的看门狗，同时还起到了阻止国会对情报活动盘根寻底的作用。委员会由退休的高级官员以及前职业情报老手组成，比如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和戴维·布鲁斯。以布鲁斯为例，他对中央情报局到处活动感到不安，1956年他是该委员会一个下属机构的头，该机构谴责"那些聪明的年轻人过多地卷入了其它国家的内部事务。他们之所以那么起劲，是为了证明他们存在的价值而已。"但是看门狗只会叫唤，很少咬人，该委员会仅仅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顾问小组，它的意见常常无人理睬。

尽管有以上那些机构存在，中央情报局局长通常只要总统或者他委托的代表同意就能确保隐蔽行动工程得以获准。这种制度反映了无声的默契，尤其在国会内部，提倡不要对情报问题探究太深。中央情报局在成立后的头20年与军方和负责监督情报活动的拨款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之间关系融洽。杜勒斯作为职业情报老手的声望和他对国会亲密友好的态度对创造信任气氛起到极大作用。通常他总是非正式地会见国会小组，简要介绍世界形势和中央情报局的活动，询问是马马虎虎的，最敏感的讨论由杜勒斯与各委员会主席单个进行。

多年来，国会几次试图加强对中央情报局的监督并扩大参与这些活动的范围。但是这些努力失败了，因为许多立法

者不愿对秘密行动以及委员会制度的效用作过多的了解；这种制度不准中、下级官员干预。马萨诸塞州的议员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说得好：“不是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不愿讲给我们听，而是我们不愿意听。我作为国会议员和普通公民，宁愿不要这方面的知识和信息，只有那些与美国公民的命运休戚相关的事，我才有责任去了解。”

50年代初中央情报局大部分精力集中在隐蔽的准军事行动上，同时也进行了传统单线联系的间谍活动，尤其注意招募打入苏联情报机构内部的渗透间谍和内线间谍。无数叛逃者在西方寻求避难，但是西方情报机构从中吸收间谍的工作并不成功。艾伦·杜勒斯特别热衷于这类行动，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瑞士的经验使他尝到了甜头。那时候弗里茨·科尔比为他提供了德国外交部档案中搞来的大量文件。领导间谍的工作是最富有戏剧性、也是最危险的间谍活动，不仅随时可能暴露，精神上有巨大压力，而且存在着出现双面间谍的危险。

西方情报机构要在东欧集团的封闭式社会里招募特工很困难，而苏联人同甘愿背叛自己国家的欧洲人或美国人接触几乎不会遇到任何障碍。克格勃和苏军情报部在开放的西方社会为所欲为地活动，他们与莫斯科的联系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也不复杂。俄国人向西方派遣或召回间谍只需买张飞机票。在美国安插一名没有外交身份、独立进行活动的男女间谍易如反掌；而要在苏联或者它的卫星国里收集情报则极其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情报机构的最佳情报来源是那些自愿提供情报“主动上门的人”。中央情报局的威廉·胡德说：

"就是这种上门生意才使店能继续开张"。作为中央情报局维也纳情报站的副站长，胡德办了一件最成功的案子。那是1952年11月份，一位美国情报官回到停车场发现了从半开的车窗塞进去的一封信。信上说："我是一名俄国军官，在巴登一维也纳武装部队司令部苏联小组工作。假如你有兴趣购买苏联某装甲师的最新建制表，请于11月12日晚上8点半在多西街和斯托伯格街的拐角处与我接头。假如你不来，我将在11月13日晚上相同时间再恭候一次。价格是3000奥地利先令。"

中央情报局虽然想获取一份师的战斗序列表，但更急于同一名苏联军官接触。因此，情报机构派了一名会讲俄语的官员同他联系。此人拒绝提供姓名，但最后发现他是格鲁乌(苏军情报部)的一名少校，名叫皮特·塞约诺维奇·波波夫。起初怀疑波波夫是双面间谍，结果证明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成功招募为间谍的第一个苏联军官。虽然他接受了一小笔现金，但是他充当间谍根本不是为了钱。波波夫出身于农民家庭，他主动提出与美国情报机构接触是因为他对苏联现政权的不满。

波波夫每月在一安全的地点与中央情报局官员秘密会见一二次。这位少校提供了有关苏联军事实力和世界范围内间谍活动的大量情报，西方情报机构从来没有如此深入地渗透到苏联秘密活动的神经中枢。据威廉·胡德说，从1952年到1958年，波波夫"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大量来自苏联权力秘密中心的绝密情报。在这过程中，他破坏了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致使一名克格勃的头目被解职(一位四星级将军，苏联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为美国在军事研究方面节约了5亿美元。"

波波夫提供了苏联驻欧洲间谍的名单，还为中央情报局

提供了无价之宝——苏联经营间谍的方法。但是，波波夫最后还是暴露了。当他在东柏林负责审查一位经过训练并将派往美国的女间谍时，他将此事密告了中央情报局。当这位女间谍在纽约与丈夫见面后，夫妇俩立即受到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他们对自己被监视略有察觉，也许他们只是疑神疑鬼，还没有进行任何非法活动就悄悄离开了美国。他们向克格勃作了汇报并受到仔细的审问。克格勃为能调查格鲁乌中的竞争对手非常高兴，最后查到波波夫头上。苏联人也许得到了他们安插在英国情报机构中的特工乔治·布莱克的帮助，因为布莱克发现格鲁乌已被中央情报局渗透。于是莫斯科决定以研究一项正在进行的行动为借口召回波波夫，他感到事情不妙，但当中央情报局要帮助他叛逃时，他拒绝了。不久，他就被捕并被枪决了。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前，中央情报局成功地搞到了一份由斯大林的继承人尼古拉·赫鲁晓夫发表的一篇秘密讲稿，这是艾伦·杜勒斯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期间的“主要成就之一”。在这个长达6小时的报告中，赫鲁晓夫猛烈攻击斯大林，使与会代表大为震惊。有人提出警告，反对将党内的丑闻公布于众，但是赫鲁晓夫耸人听闻的报告内容不胫而走，传遍全球。虽然赫鲁晓夫擅长即席演说，但这篇报告又长又详细，不可能事先不作准备，杜勒斯从报刊上透露的有关内容推测，必定有书面稿子。

杜勒斯召见了中央情报局下属秘密行动机构负责人威斯纳、赫尔姆斯和安格尔顿，对他们说，总统和国务卿都急切希望得到一份赫鲁晓夫的讲稿，要不惜代价搞到手。一份书面通知立即分送到各个情报站，命令他们全力以赴设法搞到

该稿。

6个星期后，安格尔顿完成了任务。许多观察家认为该文件是以色列情报局穆萨德提供的，自中央情报局建立以来，安格尔顿一直负责处理来自“以色列的情报”，反过来，据说穆萨德得到了中央情报局大量的财政和技术帮助。也许因为安格尔顿和以色列人有着“特殊的关系”，以色列人想以此提高安格尔顿在中央情报局内的声誉。

杜勒斯不愿轻易接受未经证实的礼物，坚持要求请一名局外专家鉴定其真实性。赫尔姆斯建议将此项任务交给国防部情报局局长雷·克莱因。内部证据表明该文是真实的，于是克莱因建议立即将全文公布于众。使克莱因感到奇怪的是，威斯纳和安格尔顿反对将全文一次性公布，而主张把报告内容一点一点透露出去以引起苏联卫星国家的不满，作为他们“红袜子——红帽子行动”的一部分。事后克莱因回忆道：“他们想充分‘利用’这份演说，而不是简单地让每个人读一读。”

此事耽搁到6月2日，当时克莱因和杜勒斯正在研究一份涉及苏联的讲稿。克莱因事后说：“杜勒斯常常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毫不相关的话题，使人感到有点突然。他摇晃着座椅对我说：‘威斯纳说你认为我们应该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我讲述了为什么这样想的理由。杜勒斯这位老人眼睛一亮，说：‘天哪，我要作一项政策性决定！’他通过内部电话告诉威斯纳，经过慎重考虑，他希望印刷这份演说。”于是，演说全文送到了国务院，再由国务院透露给《纽约时报》。

演说的发表引起整个共产主义集团的轰动。在远东思想意识形态里的分歧已经开始出现，否定斯大林的运动加深了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分裂。在东欧，其效果是立竿见影。6月

28日，波兰波兹南地区发生了罢工。虽然秘密演说的发表并非这场动乱的唯一原因，但是它加剧了苏联所有卫星国的危机。俄国人完全低估了东欧国家要求改革的力量，赫鲁晓夫的演说使这些要求达到了高峰。

1956年10月下旬暴乱席卷了匈牙利。年轻的反叛者仅仅装备有轻型武器和土制炸弹，但是他们推翻了共产党政权，宣布匈牙利为自由国家，中立于东西方集团。虽然自由欧洲电台和解放电台表示希望美国支持，但没有证据说明中央情报局煽动了这次骚乱，事实上华盛顿和俄国人一样对这次叛乱感到惊奇。几乎与此同时，为了控制早已被埃及人收回的苏伊士运河，英、法、以入侵埃及，形势变得更为复杂。艾森豪威尔政府反对英、法、以的这次冒险行动。12月 4 日赫鲁晓夫乘西方盟国中出现混乱之机，向匈牙利出兵20万镇压反叛。

匈牙利“自由战士”一边在布达佩斯各个街区战斗，一边请求西方国家帮助对付苏联的坦克。

当时正在视察中央情报局驻欧洲各情报站的弗兰克·威斯纳在维也纳听到了这些求援的呼声。开始听到这些骚乱的报道时，他感到欣快，指望反叛蔓延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他恳求华盛顿实施“红袜子—红帽子行动”，空运武器和派遣援军到匈牙利，但未能获准。他极其愤怒，咒骂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指责他们入侵埃及为俄国人干涉匈牙利提供了机会。

结果没有对匈牙利提供援助。苏联的反攻所引起的震动使艾森豪威尔政府手足无措。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空运武器必然使用军用飞机，这就公开暴露了美国的干涉，很可能导致与苏联进行一场美国毫无准备的战争。布达佩斯巷战使

3万多匈牙利人丧生，20万人逃往国外。

匈牙利叛乱受到镇压说明所谓的“解放”和击败铁幕政治是无稽之谈。不发动全面战争，美国简直没办法在苏联势力范围内操纵或影响事件的发展。奉总统之命调查威斯纳行动的卢西恩·特拉斯科特将军发现，匈牙利人受到威斯纳特工人员的鼓动，相信一旦反叛开始，美国军队会立即干涉。特拉斯科特还发现，在布达佩斯灾难发生时，威斯纳仍加紧策划在捷克斯洛伐克支持煽动叛乱。这位将军使艾森豪威尔相信那样做的结果仍会是一场灾难。就这样威斯纳行动结束了，有关人员被解散。

威斯纳从欧洲回到华盛顿后，行动开始反常，开会发言又臭又长，酗酒更加厉害。不久，他因神经衰弱和严重的传染性肝炎住院治疗，显然他是在雅典吃了一盘变质的蛤肉后得的肝炎。此后的几年里，他曾多次犯神经错乱症，一次他发病时，同事们手足无措，不得不由医务人员将他抬出中央情报局总部。1959年他离开了计划司，改任驻伦敦情报站站长，并一直工作到他退休。6年后，他在马里兰自己的农场用20毫米口径的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朋友们认为威斯纳是冷战的牺牲品，并把他的死归因于匈牙利叛乱失败而引起的失望。

中央情报局内部有人希望理查德·赫尔姆斯接替威斯纳成为计划司司长，但杜勒斯却选择了理查德·比斯尔。这一选择异乎寻常，因为这位新司长与赫尔姆斯截然不同。对比之下，赫尔姆斯头脑冷静，精明能干，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从事情报工作；而比斯尔则是位新手，加入中央情报局还不到5年，当时杜勒斯把他当作私人助手带来，他从

未领导过情报工作，也缺乏军事和调查工作经验。尽管如此，比斯尔把中央情报局带入了使用尖端电子技术收集情报的新时期。

人们常常用“才华横溢”来赞许比斯尔，他的许多同事对他敬而远之。他曾就读于耶鲁大学，在伦敦读完经济学后回到耶鲁大学开创凯恩斯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庞大的盟国船队主要组织者之一．后来他参与了马歇尔计划的设计。观察家认为，国会之所以会接受这项计划，实际上应归功于比斯尔的清晰表述。

在中央情报局里，比斯尔对老式情报工作的局限性很快表现出不耐烦。他后来说：“间谍工作一直令人失望，一般的结论总是反对苏联集团或其它内部复杂的国家。虽然间谍工作偶尔取得辉煌的成功，但它并不是情报的主要来源。”比斯尔认为，了解对手的意图和实力主要靠先进的技术侦察，而不是靠那老式的能引起轰动的隐蔽行动。

在发展高空U—2照相侦察飞机，以及后来的卫星侦察系统中，比斯尔所起的作用进一步说明，他是中央情报局一颗上升的新星。美国情报界长期无法了解苏联原子弹试验、导弹发展以及军事演习等秘密。为了解开这个谜，美国自冷战开始就派遣军用飞机飞越苏联领空收集照相和信号情报。一位空军上将吹嘘道：“有一天，我派了47架飞机在苏联上空飞行。”但是早在50年代，苏联人就开发研制了地对空导弹，使执行这样的飞行任务非常危险，因此有必要寻求新的预警办法对付俄国人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

为了对付这一挑战，1954年下半年，以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院长詹姆斯·基利安为首的校长委员会，建议发展大大超过苏联现有导弹射程的新型飞机。艾森豪威尔批准了这项

建议，杜勒斯命令比斯尔与空军合作，因为空军一直在研究一项类似的工程。但是比斯尔自愿从中央情报局秘密经费中拿出2200万美元支付全部费用，使这项计划完全控制在中央情报局手中。这项工程不仅对国会保密，而且也不让中央情报局无关人员知道。

比斯尔将建造新型飞机的任务交给了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公司的克拉伦斯·约翰逊，因为他已经提出一种类似的空载间谍系统；高清晰度照相机的制造任务交给了照相机发明家伊登·兰德。专家们认为这项工程如果能成功，至少需要6年时间，而且经费要大大超出预算。由于比斯尔热情的工作劲头，不到两年时间第一架U—2飞机就在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公司“陈旧的厂房里”诞生，而且只花了300万美元，比预计的造价还低。比斯尔独立领导这项工程，甚至不让艾伦·杜勒斯插手。在他看来，保密不仅意味着安全，而且意味着绝对控制，控制就是力量。

在以后的4年里，美国实际上控制了苏联领空。从1950年年中到1960年年中，U—2飞机进行了50次间谍飞行。根据中央情报局的合同，由前空军人员驾驶的U—2飞机巡航在约72000英尺的高空，距苏联SA—1导弹射程有10000英尺的安全系数。用兰德照相机拍摄的照片特别清晰，据说停放在克克里姆林宫停车场上的汽车型号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导弹仓库、发射台、原子能发电站和飞机场都在不断的严密监视之下。在高峰时期，比斯尔在土耳其、日本、巴基斯坦、西德和挪威建立了U—2飞行基地，并实行全天候飞行。比斯尔吹嘘说：“我可以向地球的任何地方派出侦察飞机。”实际上，俄国人从U—2飞机第一次飞越其领空起就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但是提出抗议会暴露他们防御方面的弱点，因此他们保持了

沉默。

比斯尔的成绩难以抹杀。U—2 飞机提供了有关苏联防空现状的宝贵资料，从而使美国决策人相信，虽然赫鲁晓夫自吹自擂，但俄国人实际上还没有作战的洲际弹道导弹。遗憾的是由于这些情报高度保密，无法公诸于众，[2]也就无法纠正人们对苏联实力的过高估价。特别是1960年总统竞选期间当民主党谴责艾森豪威尔政府扩大了“导弹差距”，使莫斯科占领先地位时，艾森豪威尔只能洗耳恭听却不敢吐露真情。

尽管U—2 计划取得了成功，总统仍持保留态度。“朋友们，我相信我们国家需要这种情报，我会赞成这项计划的，”艾森豪威尔郑重地说，“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总有一天我们的飞机会被人逮住，那我们就闯祸了。”一旦发生这样的事，那么艾森豪威尔改善美苏关系的努力就会徒劳。为了减少这种可能性，艾森豪威尔坚持亲自批准每次越界飞行。最使中央情报局和空军烦恼的是，他取消或推迟了好几次飞行任务。1959年秋在戴维营与赫鲁晓夫会晤后，冷战的紧张局面有可能缓和，总统命令暂时停止对苏联进行越界飞行。

1960年 4 月中央情报局要求恢复越界飞行，艾森豪威尔迫不得已批准了 5 月 1 日劳动节的飞行任务。也许总统把苏联对越界飞行的沉默误认为默许，实际上，赫鲁晓夫十分恼怒。在巴黎四国首脑会议的前夕进行越界飞行是十分危险的，尽管有人保证，即使U—2飞机被击落，不管是飞行员还是飞机都不会落入苏联人手中，因为所有的U—2 飞机驾驶员都学会拉响暂时不爆炸的炸弹，在他们跳伞以后炸弹马上炸毁飞机，[3]此外，他们还携带有毒针，假若面临被捕和折磨的危险，可以当即自杀。

在指定的那一天，由中央情报局合同雇员弗朗西斯·加

里·鲍尔斯驾驶的U—2飞机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起飞，总航程为38000英里，他将飞越苏联的丘拉坦导弹试验场以及位于乌拉尔山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原子研究中心，最后在挪威的博德着陆。飞机按计划越过了预定目标，没有发生意外。突然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鲍尔斯听见一声沉闷的轰击声，天空中出现桔黄色的闪光，使他一时看不清任何东西。这是苏联的一枚新型SA—2导弹，击毁了飞机的双翼。飞机在空中猛烈旋转，直向地面栽去。

几天后，赫鲁晓夫隐晦地宣布，一架美国间谍飞机在苏联领空被击落。美国国务院以为飞行员和飞机都不会幸存，仓促编造谎言说，失踪的飞机是搞气象研究的，该机民航驾驶员报告供氧困难后误入苏联领空。赫鲁晓夫得意洋洋，突然宣布说，U—2飞机的飞行员已被生擒，在飞机残骸里也发现了胶卷和仪器装备等罪证。

虽然发生了挑衅性事件，但是赫鲁晓夫暗示说，假如艾森豪威尔保证自己与越界飞行无关，并谴责这种行为，他愿意去参加首脑会议。赫鲁晓夫也许认为，美国人会因这次间谍活动而处境难堪，以致在首脑会议上作出让步，使他这个机敏的外交谈判家在会议上捞到资本。在华盛顿，杜勒斯秘密提交了辞呈，为了让艾森豪威尔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与此事件无关，并向全世界宣布他已经解除了越权行事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务。总统拒绝了杜勒斯的辞呈。尽管U—2事件破坏了他为缓和所作的努力，使他感到愤怒，但他不仅承担了直接责任，而且为美国对苏联进行间谍活动作辩解。据他分析，如果不这么做，人们会以为在华盛顿是一班无名小卒在作重要决策。赫鲁晓夫受到来自克里姆林宫内部和有关共产党国家的批评，说他对帝国主义表现懦弱，于是他抓

住艾森豪威尔拒不道歉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仍然非常紧张。

值得指出的是，制造这场闹剧的飞机竟是一种即将过时的武器。几个月之后，美国和苏联相继使用了侦察卫星来拍摄对方的地形和军事部署的照片。早在鲍尔斯被击落前，比斯尔就预见到苏联技术会赶上U—2飞机，苏联已经开始试制卫星，飞行高度超过任何苏联导弹射程，其拍摄照片的清晰度与U—2飞机相同。这些“太空间谍”反倒没有引起外来入侵的担忧，这并不奇怪，因为它们为超级大国提供了证明对方不在计划突然袭击的手段。

但是 U—2 事件另有反响。许多美国老百姓因政府对他们说谎而大为吃惊。在艾森豪威尔承担越界飞行责任之前，U—2 飞机铸成的大错引起了公众对政府的秘密机构感到不安。美国人第一次意识到，美国实际上像它的敌人一样也在开动同样的冷战机器。在华盛顿政府之外，“情报”这个字眼开始产生了新的邪恶的意义。

17. 忍受一切重荷

约翰·肯尼迪宣誓就职3周后，杜勒斯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私人宴会。出席宴会的除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外，他还特邀了新总统十几名高级助手。宴会上酒过三巡，两班人马之间增加了了解。情报局的人员天花乱坠地吹嘘他们最秘密的功绩，总统方面的人听得如痴如醉，在大家抽烟、喝酒时，杜勒斯巧妙地让情报局各司负责人介绍了他们的工作。

这场表演结束时，理查德·比斯尔对杜勒斯说："我是你领导下的吃人鲨鱼。"

同埃德加·胡佛一样，杜勒斯属于肯尼迪第一批任命的官员，为此，他感到非常荣幸。但作为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旧部，杜勒斯认为有必要尽快与白宫的新班子建立联系，这种友好关系使中央情报局在同国务院和国防部的竞争中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总统助手们与中央情报局高层的亲密关系使他们可以直接打电话索取所需的情报资料，不必通过惯常的烦琐渠道。的确，中央情报局很快适应了新总统的那种讲究实际、注重高效的工作作风。肯尼迪告诉一位助手说："只要我急需情报资料或参谋意见，中央情报局就会立即提供。可是国务院对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四五天还拿不出明确答复。"

作为自罗斯福以来最年轻的总统，肯尼迪坚信他的上台不仅标志着民主党接替了共和党，而且象征着新的一代擎起了老一代的火炬。肯尼迪树立了一个坚韧不拔、锋芒毕露的形象，他欢迎对峙，并把外交工作变成意志的斗争。作为一个坚定的冷战勇士，肯尼迪无法容忍艾森豪威尔的领导，迫不及待地要在世界舞台上大显身手。在他看来，艾森豪威尔不够咄咄逼人，容忍了过多的权力限制。他要反其道而行之，凡是艾森豪威尔消极被动的地方，他要积极主动；凡是艾森豪威尔小心谨慎的地方，他要大胆敢为。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发誓："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承受一切重荷，迎接一切艰难，支持一切朋友，反对一切敌人，以确保自由千秋万代。"

军事扩张是肯尼迪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和赫鲁晓夫关于苏联会用洲际导弹摧毁美国的警告使美国人民十分惊恐。肯尼迪竞选时就许诺一

定要缩小“导弹差距”。然而上台后，他从情报中了解到赫鲁晓夫只是在恐吓。为了在共产主义面前不示弱，这位新总统自己创造了“导弹差距”——大约二百比一，美国领先。

肯尼迪知道，核时代的现实有碍于用传统手法战胜共产主义。甚至当赫鲁晓夫决心用“民族解放战争”打破帝国主义的控制时，肯尼迪没有采取遏制政策，而是大谈特谈向共产党控制的第三世界传播“自由之病”。像共产党人一样，他笃信自己的社会制度必胜；同样，他也希望加速这个变化的进程，如通过类似拉丁美洲进步联盟提出的“民族建设”计划，或者通过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

肯尼迪在古巴作了第一次尝试。经过3年的游击战，年轻的古巴民族主义者菲德尔·卡斯特罗终于在1953年1月推翻了美国支持的残暴的富尔吉西奥·巴蒂斯塔政权。起初，美国对这场革命很热心，但是不久卡斯特罗开始清除反对派，同时又将自1898年以来一直主宰古巴经济的美国经营的矿山、蔗糖和公用事业公司等收归国有，美国的热情像被浇了一瓢冷水。卡斯特罗摆脱了美国的控制后，向苏联寻求援助，并于1960年春同苏联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美国当局有人认为卡斯特罗一开始就想在古巴建立共产党政权；总之，他言必称马克思主义，公开宣布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他站在苏联一边。一位恼怒的美国商人评论道：“这场革命像西瓜，越剖越红。”

距美国仅90英里处，出现了古巴这样一个亲苏国家，华盛顿勃然大怒。早在1959年12月，中央情报局就想“除掉”卡斯特罗，5412委员会的一个下属机构，即“特别小组”，讨论了推翻他的计划。1960年3月，艾森豪威尔鉴于伊朗和危地马拉行动的成功，毅然批准中央情报局的计划，开始训练

一批连级规模的游击队，向古巴渗透。这些游击队抵达古巴岛后将联络抵抗组织一起摧毁卡斯特罗政权。杜勒斯十分重视此项工程，安排他的接班人、中央情报局的宠儿比斯尔负责。然而，古巴并非伊朗，卡斯特罗也不是雅各布·阿本斯。如意算盘打错了。

在阴谋推翻卡斯特罗的同时，还制订了暗杀他的计划。当权者中无人公开谈论暗杀计划——高级官员不可能糊涂到如此地步——但有迹象表明，虽然没有经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批准，但他对这些阴谋是一清二楚的。1960年3月10日在他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至少暗示了这些计划的内容，即如何“在古巴建立一个新政府”。官方记录表明“海军作战部长阿莱·贝克上将建议，除掉古巴领导人的设想必须是一揽子计划，因为卡斯特罗周围的许多领导人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4天之后，特别小组还议论了“如果菲德尔和他的兄弟劳尔·卡斯特罗以及他的高级助手切·格瓦拉同时消失对古巴会产生什么影响。”

难道这不是向中央情报局暗示杀害卡斯特罗吗？事后，幸存的参加者们对由参议员弗赖克·丘奇领导的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说，暗杀行动并未在这些会议上提出或讨论过。但是熟悉这些会议用语的雷·克莱因说，讨论中使用的语言表明，暗杀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的计划“至少从理论上提出过”。丘奇委员会最后说：“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使我们得出结论说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或约翰逊，以及他们的心腹顾问们，或者特别小组批准暗杀卡斯特罗，”但是一旦卡斯特罗被杀，他们中绝不会有人掉泪。比斯尔作为其中之一员心里就很清楚，他是如何接受杜勒斯微妙的指示而安排暗杀行动的。

中央情报局卷入暗杀行动决不是一小撮违反规定的情报流氓一时心态失常。中央情报局所追逐的目标，不管存在什么问题，毕竟是美国政府的目标。政治暗杀至少一度被认为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自我标榜为自由世界保卫者的美国越来越感到自己面临着一个难题：除掉某些人物是否对自己或盟国有利？就菲德尔·卡斯特罗、刚果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伊拉克阿卜杜勒·卡塞姆上校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独裁者拉斐尔·特鲁希略而言，答案是绝对肯定的。

"杀人是错误的，但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如果谁能清除伊迪·阿明，那将使许多人摆脱苦难，"后来，比斯尔这么说是为了替这些阴谋活动涂脂抹粉。除掉绊脚石的任务落到中央情报局的身上，因为该局从事准军事行动、煽动政变和叛乱，精通暴力和暗杀的门道。在浓烈的冷战气氛中，暗杀外国领导人被视为这些隐蔽行动的必然发展。虽然丘奇委员会没有发现中央情报局直接杀害过外国领导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情报局没有尝试过。

1960年下半年美国决策人认为，卢蒙巴总理在刚果摆脱比利时统治后的骚乱时期无法控制局势，可能出现苏联接管，因而采取了行动，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暗杀卢蒙巴事件。丘奇委员会宣称："文件和证词揭露出来的许多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一个合理的推断，暗杀卢蒙巴的阴谋是由艾森豪威尔批准的。"特别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卢蒙巴命运的官方记录中有"除掉"和"干掉"等字眼。中央情报局毒药专家，技术服务处处长斯坦利·戈特利布博士制造了送往中央情报局刚果站用于杀害卢蒙巴的毒药。然而当地的事态发展使这一阴谋未能实施，因为在这些毒药被用于杀害卢蒙巴之前，他已被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反对派废黜，并处以极刑。

戈特利布博士制造的毒药本来也要用来害死卡塞姆上校。1960年初他夺取了伊拉克政权。他不仅杀害了他的前任和许多外国人，而且进一步与艾森豪威尔政府为敌，同苏联重归于好，并使当地的共产党合法化。比斯尔的副手理查德·赫尔姆斯认为除掉卡塞姆“十分必要”,把一块浸有毒药的手帕邮寄给他。然而在他接到手帕之前，他就被推翻并枪决了。

30年前由美国扶上台的特鲁希略是个本性残忍的独裁者。他执政时间过长，不再受到欢迎，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届政府都唆使多米尼加反对派赶他下台。尽管丘奇委员会没有发现中央情报局是否参与了1961年5月特鲁希略谋杀案，然而该局向反对派提供了也许用于谋杀的武器。

可是中央情报局企图暗杀的最主要目标是菲德尔·卡斯特罗。谋杀他和古巴其他领导人的阴谋五花八门。第一次公开企图发生在1960年7月。华盛顿命令中央情报局哈瓦那站站长策划一起除掉劳尔·卡斯特罗的事故。古巴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接受了1万美元的贿赂，准备执行这项计划。但是在企图动手前，该计划取消了。

中央情报局急于除掉卡斯特罗，甚至同贩毒犯罪组织相勾结。由于卡斯特罗禁止这个辛迪加在古巴从事赌博、娼妓和贩毒等赚钱犯罪活动，该辛迪加老板对他恨之入骨。比斯尔认为该犯罪组织有搞阴谋的丰富经验，利用它干这种事，一旦败露，也绝不会追到美国政府身上。曾经制作色情电影毁坏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名誉、并在联邦调查局工作过的罗伯特·马休被中央情报局看中，让他同该贩毒犯罪组织联系。两名黑社会分子约翰·罗塞利和山姆·吉安卡娜为能向政府报仇而大喜过望，他们本想采用黑社会的谋杀方式，但

因太危险而被否定；接着，他们决定收买一个人，叫他把唾手可得的毒药投进卡斯特罗的食物或饮料中。据说 1961 年初曾尝试过两次，第一次放的毒药没有溶解，第二次行动没有下文。与此同时，由艾森豪威尔批准而组织的反卡斯特罗的游击战迅猛发展，最后竟成为对古巴的全面入侵。

1961年 4 月 17 日午夜刚过，5艘破旧的商船排成一路，乘风破浪驶进古巴南端猪湾乌黑的水域。在拂晓的微光中，由约 1200 名古巴流亡人员组成的一个旅，接受中央情报局的招募和训练之后，在他们的家乡登陆建立一个滩头阵地。这就是等待已久的入侵古巴的扎巴塔行动。

但是卡斯特罗对此袭击早有准备。天一亮，这些入侵者就遭到古巴空军的猛烈轰炸。尽管流亡者的飞机已把卡斯特罗的飞机炸得所剩无几，但由于肯尼迪总统临时改变原先的承诺，不再对古巴残存的飞机发起攻击，使卡斯特罗仍能控制滩头领空。

流亡者的两艘船很快被击沉了，一艘装着他们的大部分军火，另一艘载有通讯设备。入侵者被钳制在大海和滩头后面的红树沼泽地之间，没有任何逃离的希望。在卡斯特罗的飞机和大炮的攻击下，入侵者伤亡剧增，弹药也快用完，该旅旅长皮帕·桑·罗曼通过电台不断恳求救援，可是毫无反应。华盛顿组织这次入侵的人们听到呼救后束手无策，只好责怪肯尼迪取消了原先的空袭计划。登陆 72 小时之后，电台传来桑·罗曼最后的呼叫："我已弹药告罄，只好走向沼泽地。"

猪湾行动是巨大的悲剧，生命无辜地被断送，美国名誉受到损害，新政府蒙受了耻辱。肯尼迪对这一灾难承担了责

任。他说："胜利有一千个父亲，而失败只是一个孤儿。"比斯尔和杜勒斯则因中央情报局历史上这起最大的闹剧而遭到强烈谴责。这一灾难比匈牙利的失败更有损于中央情报局的声誉，这主要因为众所周知美国是这场悲剧的后台，在众目睽睽之下美国遭到了惨败。总统对比斯尔说："在议会制政府里，我得辞职。然而在我们这个政府里，我不能、也没有辞职。所以你和艾伦还要鼓足勇气干下去。"

这次行动错在哪里呢？

事后分析，找到了扎巴塔行动惨败的许多原因：肯尼迪拒绝批准第二次空中袭击；缺乏安全措施；用1200人入侵古巴，去对付卡斯特罗素质不断提高的20万军队和民兵，这是以卵击石的蠢事；对古巴形势的情报和预测的差错；中央情报局在伊朗、危地马拉和其它地方得手后盲目骄傲自大。有的评论家甚至认为中央情报局一开始就没有必要参与这项行动；如果肯尼迪认为卡斯特罗对美国安全是一个严重威胁，那他就应该派遣海军陆战队，而不应该冒险采取凶吉难卜的准军事行动。

这次行动的计划来源于理查德·比斯尔的丰富想象。1960年的整个秋天，他急不可耐地看到一股股渗透古巴的游击队被卡斯特罗部队所消灭。古巴移民们认为出动大部队会鼓舞古巴人民揭竿而起反对卡斯特罗，受此影响，比斯尔开始准备大规模入侵。在中央情报局飞机的掩护下，流亡者们将在古巴南海岸的特立尼达镇附近登陆，建立滩头堡之后，由中央情报局在佛罗里达把各派流亡者组织拼凑起来的流亡政府送到该岛；如果形势不妙，入侵者可以退至附近的埃斯坎布拉依山中开展反对卡斯特罗的游击战。无论哪种情况，推翻卡斯特罗的起义将按期举行，美国会旋即承认新政府。

比斯尔违反了情报工作的原则，主观地领导了古巴行动。年迈的杜勒斯只是稍加过问，主要精力放在他认为更重要的工程上：耗资4600万美元的中央情报局兰利总部大楼，这幢大楼建在华盛顿以南的弗吉尼亚州农村。中央情报局的其他人对古巴行动一无所知，对可能遇到的风险估计不足。情报司副司长罗伯特·艾默里，国家情报评估委员会成员舍曼·肯特，对流亡者关于古巴人民起义的时机已成熟的报告提出了质疑，他们感到莫名其妙，因为据他们了解，卡斯特罗深受爱戴，持不同政见者们要么坐牢，要么流亡在外，根本没有同时举行反叛的可能性。中央情报局从英国情报机关获得的材料表明绝大部分古巴人是支持卡斯特罗的。

理查德·赫尔姆斯意识到正在酝酿着一场灾难，谨慎地与这次行动保持一段距离。像在危地马拉事件中一样，担任这次行动宣传工作的戴维·菲利普斯也注意到赫尔姆斯在所有会议上沉默不语，菲利普斯认为他不像惯常那样提出尖锐的问题有点不可思议。不久赫尔姆斯连会议也不参加了。比斯尔和他的副手工作上有心照不宣的分工：比斯尔全力关注古巴行动，而赫尔姆斯负责其它一切秘密活动。表面上，他们俩的关系虽有点冷漠，但还属正常；暗地里，比斯尔催促杜勒斯把赫尔姆斯调到伦敦去，而赫尔姆斯则骂比斯尔是“杂种”。

肯尼迪在与尼克松竞选总统时，曾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古巴和卡斯特罗问题上软弱无能，他上台后立即批准了入侵古巴的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白宫只看到中央情报局以前颠覆外国政府连连得手，不了解该局上层官员在这次行动上意见分歧，于是批准了比斯尔的计划，没有对此项行动的不足之处提出必要质疑。但是当入侵日期临近时，各种报刊发表了有关美国支持的古巴人在危地马拉受训的消息，肯尼

迪重新考虑了这次行动的影响，他担心美国公开卷入，对原计划作了重要的调整，准备给流亡分子足够支持保证入侵成功，但这种支持不能暴露美国的参与。结果他的这两个如意算盘都打错了。

登陆地点向东移至偏僻的猪湾。肯尼迪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他，这个登陆点离埃斯坎布拉依山区70英里，即使背水一战，打游击也不可能。在入侵前夕，总统减少了流亡者空军的飞行次数，而后又取消了至关重要的旨在打击卡斯特罗空中力量的大规模空袭计划。比斯尔和杜勒斯也许应该抗议肯尼迪削减支援，威胁放弃或者停止这次行动，但是他们自己既是提议人又是计划制订人，只好硬着头皮干。他们相信只要问题严重，形势发展会迫使总统下令美国公开干涉。

如果肯尼迪按计划实施空袭，那么猪湾入侵会取得成功吗？卡斯特罗认为是可能成功的，他的胜利是由于入侵者缺乏空中支援而赢得的。但肯尼迪把这次失败归于其它原因，恼怒的总统事后说："凭我一生的经历，根本不必依靠这些专家，我怎么竟会愚蠢地放手让他们干呢？"一般认为，是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将这位缺乏经验的新总统引上了歧路。他依赖于他们的意见，他们则让他难堪。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当然比斯尔和杜勒斯计划不周罪责难逃，而且他们仅仅告诉肯尼迪他听得进的东西。这次失败的主要根源是，总统和其他决策人没有重视克米特·罗斯福的预言，即除非"人民和军队同我们想的一样"，这种行动是不可能成功的。

无疑在古巴的惨败最重要的后果是影响苏联人对肯尼迪的看法，两个月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晤。事后，茫然的肯尼迪说："他奚落了我一番，我想他这样做完全是因为

猪湾事件。他认为这样年轻而又无经验的人陷入那种困境是可以理解的。……不根除这些思想，我们就无法和他相处，因此我们必须行动。”

对于猪湾入侵的错误，肯尼迪火冒三丈，据说他发誓“要将中央情报局撕成碎片扔掉”。有人建议要缩小该局规模和权力，把情报和分析工作从该局隐蔽行动中分离出来。总统的怒气最终渐渐消退，但他下令全面改组中央情报局，让当时该局的监察长莱曼·柯克帕特里克负责进行内部调查。柯克帕特里克的调查报告——至今仍锁在该局秘密档案库里——对杜勒斯和比斯尔进行了无情攻击。读过该报告的一些官员认为，10年前因脊髓灰质炎致残而坐轮椅的柯克帕特里克将自己未能升官归咎于杜勒斯，这份报告不仅为了报复，而且想通过把这场灾难的责任归罪于中央情报局的领导而不责备白宫来博得肯尼迪家族的青睐。由于杜勒斯一直视柯克帕特里克为自己的门徒，所以他对报告的攻击性调子特别反感。

为了加强总统对中央情报局的控制，肯尼迪想任命他的弟弟司法部长鲍比接替杜勒斯。可是鲍比认为这样的变动是肮脏的政治交易。最后他当了总统监督该局的私人代表，然而他也像许多局外人一样，很快迷上了秘密活动。对中央情报局的调查使它威信扫地，该局预算削减，驻各国的情报站站长均改由大使领导。准军事行动移交给了五角大楼，对其它秘密活动作了种种规定和限制。作为平衡措施，成立了国防部情报局，接管了三军情报机构的许多工作。

约翰·麦科恩被任命为杜勒斯的继承人，这标志着中央情报局新纪元的开始。麦科恩是一位保守的共和党人，他曾是杜鲁门的空军部副部长，艾森豪威尔的原子能委员会

主席。他发现中央情报局混乱不堪。局内人员萎靡不振，白宫对它的信任一落千丈。因此，新局长的使命是重建该局的威望，使它重新积极参与决策活动。但是他这个局长与前任截然不同。艾森豪威尔喜欢听杜勒斯为他分析情报，而肯尼迪宁愿自己分析情报，所以麦科恩不是个情报军师，而是个情报经理。

肯尼迪的做法正合麦科恩的心意。麦科恩办事有条理，要求严格。他认为中央情报局不能锋芒毕露以免新闻界称之为“间谍机关”。杜勒斯喜欢和助手们闲聊，而麦科恩却是位一本正经的领导人。兰利总部新大楼第七层豪华的办公室原来是杜勒斯为自己设计的。麦科恩搬进去后，立即取消了原来高级助手们可以直接与局长接触的做法。有一次麦科恩叫来一名助手，并交给他一张单子，上面列着所需要的大量情报。

这位惊愕的助手看过单子后说：“我想你明天要这些材料吧？”

“不是明天，是今天，”麦科恩答道。“如果我明天要，那么我明天再找你。”

麦科恩接任后，立即改组了情报局的领导层，以尽快消除失败后的沮丧。理查德·赫尔姆斯接替比斯尔任计划司司长，雷·克莱因担任了情报司司长，莱曼·柯克帕特里克担任了新建立的审计委员会执行主任。麦科恩与其前任相反，对秘密活动不大感兴趣，而更关心采取技术手段搜集情报，特别是日趋迅速发展的卫星照相系统。在他任职期间，比中央情报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强调情报分析和评估。

古巴仍然是一个摆脱不了的棘手问题。猪湾事件进一步使肯尼迪兄弟坚信，古巴岛是指向美国心脏的一把匕首。他

们忘记不了失败的痛苦，对那个曾打败过他们的大胡子古巴人心怀刻骨仇恨。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回忆说："我们对卡斯特罗恨透了。肯尼迪兄弟俩迫不及待要除掉卡斯特罗。"1961年11月30日，总统批准了一项大规模秘密行动计划，叫做"猫鼬行动"，千方百计——包括采用暗杀手段——坚决除掉卡斯特罗。

名扬菲律宾和越南的反暴动专家爱德华·兰斯代尔将军负责"猫鼬行动"。鲍比·肯尼迪亲自督战，他声称，除掉卡斯特罗是"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其它一切均属次要。……要不惜时间、财力、物力和人力。"但是"猫鼬行动"建立在同样错误的假设上，即古巴人民反对卡斯特罗，一有机会就会举行反叛。这种假设曾使扎巴塔行动流产，所以"猫鼬行动"也是注定要失败的。中央情报局的国家情报评估委员会认为"广大人民绝不可能奋起"反对卡斯特罗，尽管如此，肯尼迪兄弟并没有从早先失败中吸取教训。他们报复心切，坚持认为卡斯特罗是强加在古巴人民头上的怪物。这一观点不仅说明他们对古巴革命真谛一无所知，而且表明他们没有掌握该岛的足够情报。

兰斯代尔凭着丰富的想象力，一下提出了33种除掉卡斯特罗的具体方案，包括反卡斯特罗的宣传活动、准军事袭击以至破坏糖类作物等等。这些行动的"压轴好戏"是在1962年10月举行公开起义，推翻现政权。兰斯代尔的一些锦囊妙计过分看重了美国的警察作用。无疑他最富有想象力的计划是说服古巴的天主教徒们，要他们相信基督将再次降临古巴，但是只要反基督的卡斯特罗在台上一天，基督就会绕过古巴而不降临。一旦这些传说在民众中扎了根，美国潜艇将埋伏在古巴的近海，用曳光弹照亮夜空，造成基督即将降临的假

象，促进古巴人起来废黜卡斯特罗。特别小组认为以基督降生的光环来消灭卡斯特罗未免有点滑稽可笑，好在此计划并未执行。

曾在柏林隧道行动中出过名的威廉·哈维负责除掉卡斯特罗的具体任务。兰斯代尔在肯尼迪总统面前吹捧哈维是"美国的詹姆斯·邦德"。一贯爱读伊安·弗莱明小说的肯尼迪看到身体肥胖、眼睛鼓起、喉咙粗厉的哈维，不禁露出疑惑的神情。哈维领导了一个代号为"W特遣队"的秘密机构，每年经费达500万美元，由他在柏林结识的门徒西奥多·谢克利经营的中央情报局迈阿密情报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情报站。古巴流亡者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偷袭。潜入古巴的特务建立了一个情报网，使中央情报局再也不缺少该岛情报了。这些行动促使古巴当局进一步加强控制，相当一部分行动被受过苏联训练的古巴情报机构渗透。

哈维坚持积累情报，对此，鲍比·肯尼迪很快变得不耐烦了，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肯尼迪的催促下，哈维制订了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在这紧张的气氛中出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方案。戈特利伯为卡斯特罗制造了许多致命的礼物，其中包括有毒的雪茄烟和钢笔，一套浸透有毒物质的游泳服，一只连接爆炸装置的奇异贝壳将放置在卡斯特罗最喜欢赤身潜泳的水域。似乎这一切不足以达到目的，哈维还向英国寻求技术援助。英国军情5处一位官员彼得·赖特引用哈维的话说："我们的'游击队'正在发展一种新的手段对付这类问题，正在寻找必要的专门技术。"哈维与贩毒犯罪组织头子约翰尼·罗塞利恢复了联系，向他提供5000美元的枪支炸药以及毒药。然而，即使真的实施了暗杀卡斯特罗的任何一个计划，那也不会成功。

1975年卡斯特罗估计，中央情报局曾20多次企图杀害他本人或古巴其他领导人，丘奇委员会发现有案可稽的阴谋至少有8次。有些阴谋只是停留在酝酿阶段，那些实施的计划都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除了暗杀计划外，中央情报局还考虑破坏卡斯特罗的领袖形象，如使用一种化学药品喷洒在他常去演讲的电视台，使他演讲时行动反常；又如使用另一种化学药品洒在他鞋子上，使他的大胡子统统脱落。不用说，这些阴谋诡计到头来无一奏效。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总统与这些反卡斯特罗的阴谋有直接联系，然而肯尼迪兄弟间的密切关系表明司法部长很可能将这些行动的进展情况全部通报总统本人。正当策划这些阴谋的时候，古巴却突然变成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导弹危机的中心，这次危机不仅阻碍了阴谋推翻卡斯特罗的无用企图，而且几乎使世界陷入一场核战争。

1962年整个夏天，美国情报机构获得的大量情报表明，苏联在古巴的军事力量增加。米格战斗机在古巴机场出现，驻古巴苏联军队的人数增至5000，空中侦察表明，在古巴北端的小港马里尔，大量电子设备正在卸船。中央情报局认为，这些货物是为伊尔—28中型轰炸机的到达作准备的；这种轰炸机可以攻击美国的目标，但是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没有建造这些飞机所需跑道的迹象。如果古巴人即将得到的不是轰炸机，那又是什么呢？

中央情报局为缺乏可靠的古巴情报而不安。空中侦察可以跟踪苏联的军备运输，但无法确切了解那些集装箱里究竟装了些什么。唯一能提供古巴岛直接情况的是进入迈阿密的古巴难民，可是分析家们不相信他们的报告，当一些难民谈到

他们在该岛看见用平板车运输苏联大型火箭时，他们的话竟被看作像神话一样荒谬。为了阻止这些谣言的流传，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评估委员会在9月12日发出了一份秘密报告，其中谈到苏联人不会在古巴部署进攻性导弹，他们从未在自己的疆土之外安装过这种武器，不可能在古巴铤而走险，引发同美国的对峙。

白宫赞成这种估计。国会中期选举临近，肯尼迪正遭到来自共和党方面的攻击，他们谴责说苏联正在古巴部署远程导弹，而肯尼迪政府却无动于衷。与以上评估意见不一的人也有，如约翰·麦科恩。自从在航空照片中看到苏联正在古巴西部建造地对空萨姆导弹基地起，他就认为这些基地是为了保护苏联核导弹的，因为常识使他知道俄国人不可能用萨姆导弹来保护普通基地。虽然他正在法国南部度蜜月，但他还是向兰利总部接二连三发去电报，即众所周知的“蜜月电报”，敦促当局关注古巴有核导弹的可能性。

9月20日，一个古巴难民不仅告诉迈阿密的审问者他亲眼看到装有一枚导弹的车辆通过他的家乡，而且对导弹大小的估计与苏联中程导弹一模一样。紧接着，在古巴的一名特工也报告说，在哈瓦那西南50英里处的桑·克里斯托波尔地区，所有的老百姓已经撤离。麦科恩拍来的蜜月电报，以及从其它方面来的大量证据，促使情报局竭力弄清是否苏联人真的在古巴部署导弹。U-2飞机不断地飞越古巴西部上空，对涉嫌的基地反复拍照。

中央情报局国家照片判读中心的分析家们终于在10月14日拍的一系列照片中发现了他们要寻找的目标。仔细观察了桑·克里斯托波尔附近一块林中空地的多张照片后，他们认出了一排排的中程导弹。

这些照片送到椭圆形办公室后，肯尼迪总统问照片判读中心主任阿瑟·伦达尔："你对此有把握吗?"

"总统先生，我有绝对把握。"伦达尔回答。

肯尼迪既气愤又惊讶。射程为 2200 英里的这种导弹可以攻击美国一大片地区的目标。迄今为止，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部署这种战略导弹的原因仍无一致看法。据苏联官员事后说，赫鲁晓夫也许为了保护卡斯特罗政权，使之不受侵略的威胁；也许为了用冷战的胜利堵住克里姆林宫批评家的嘴；也许为了取得核均势，显示在导弹方面能与美国抗衡。但是假如他期望肯尼迪会要求举行撤除导弹的谈判的话，他的打算绝对错了。猪湾事件之后，肯尼迪根本无意让步。

在此后 13 天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执委会上，肯尼迪的高级助手们分析形势，为总统出谋划策。麦科恩参加了会议，这清楚地说明，中央情报局成功地发现了导弹，并在整个危机中不断搜集到确切的情报资料，已经使它恢复了地位。鉴于 U-2 飞机拍摄的照片表明导弹基地工程正在加速进行，执委会审议了多种方案：在导弹基地投入使用以前立即发起空袭，全面入侵古巴，或者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大部分与会者，包括麦科恩在内，主张偷偷轰炸基地，可是遭到鲍比·肯尼迪的反对。"我现在理解东条英机计划偷袭珍珠港时的想法了"，他在给一位助手的条子中写道。他不希望他的哥哥作为另一个东条英机载入史册。

10 月 22 日，肯尼迪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告，苏联已经在古巴部署了火箭，危及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他宣布实行海上封锁，禁止将武器运进古巴，同时又发表了最后通谍，要求赫鲁晓夫立即撤走导弹。为了让俄国人有时间考虑后果，海上封锁实际上是在 10 月 24 日上午开始

执行的。赫鲁晓夫把美国的谴责说成是谎言，并警告说，如果美国人采取任何海盗行径，苏联将作出相应反应。

约有12艘苏联运输船继续驶往封锁线，使形势越趋紧张。一架U-2飞机在古巴上空被击落，装有核弹的B-52重型轰炸机随时待命起飞。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报告说，苏联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员们正在烧毁文件，通常这是两国关系即将破裂的征兆。一位总统助手事后回忆道："人人都清楚，在几小时内，我们可能会击沉苏联船只中的一艘。"突然消息传来，大约有半数的苏联船只停止了前进，或掉头向后撤离。国务卿腊斯克评论道："我们互相瞪眼，各不相让，但我想还是对方先眨眼了。"

赫鲁晓夫未能坚持他那偷偷改变力量均势的勇敢尝试，终于退让了。苏联在得到美国保证尊重古巴领土完整之后，从古巴撤走了导弹。这次可耻的失败也是导致赫鲁晓夫两年后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导弹危机帮助中央情报局恢复了外交政策第一梯队的职能。虽然"猫鼬行动"是场悲剧，并在10月危机解除后草草收场，虽然中央情报局开始并不能肯定古巴有苏联导弹，但是白宫对这次危机中通过各类人员或技术手段获取的情报十分满意。甚至持怀疑态度的人现在也相信，美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情报机构。鲍比·肯尼迪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对中央情报局分析专家雷·克莱因说，U-2飞机有关导弹基地的第一批照片证明了中央情报局有史以来的努力没有白费。

危机期间，中央情报局最有价值的情报之一是美国收买并安插在苏联高级指挥部的格鲁乌军官奥列格·佩考夫斯基

上校。克莱因解释道："通过照相、窃听以及许多其它方法获得的情报，都从佩考夫斯基偷来的文件中得到了验证。"在很大程度上，佩考夫斯基的情报使肯尼迪总统认识到，苏联导弹力量落后于美国，赫鲁晓夫的核战争恫吓只是讹诈而已。分析家从佩考夫斯基的情报资料中精确估计出在古巴部署导弹所需要的时间，这一点对美国安排作出反应的时间极为重要。佩考夫斯基还密报了赫鲁晓夫并不想在危机过程中对柏林施加压力的消息。没有佩考夫斯基提供的情报，美国在整个导弹危机中的处境也许会更微妙。

佩考夫斯基与农民出身的苏联间谍弗拉基米尔·波波夫不一样，他是沙皇军官的儿子。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过伤，多次立功受奖，30岁就晋升为上校。但是他对苏联的社会制度失望了，特别是对赫鲁晓夫的领导更是绝望，担心这位苏联总理会挑起一场核战争。从1960年起，他千方百计同西方情报机构挂钩，甚至在莫斯科街头冒昧接触旅游者，请求他们给西方使馆转送情报。然而这些行动反而使人怀疑他是苏联有意打入的间谍。

最后，佩考夫斯基与英国情报机构有联系的商人格里维尔·温挂上了钩，当时温正在莫斯科安排一苏联贸易代表团访英。佩考夫斯基是代表团团长，他设法让温相信他的真诚。1961年初，英美情报机构开始联合领导这位苏联人的间谍工作，尽管有人，如詹姆斯·安格尔顿，依然认为佩考夫斯基只是在提供假情报。在此后的18个月里，佩考夫斯基表面上仍是格鲁乌的忠实军官，但暗地里却向西方提供了数千份绝密文件，其中有苏联将军们的个人经历和军事计划、间谍活动、军事装备、火箭、宇宙卫星等方面的情报。

作为间谍，佩考夫斯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希望得到

赏识。有一次，他坚持要谒见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由于女王陛下不愿公开卷入情报活动，因此在温莎堡接见了他，并让表兄弟蒙特巴顿伯爵陪了他一天，为此他感到非常满足。经温提议，中央情报局作为弥补，安排他在椭圆形办公室秘密会见了肯尼迪总统。总统拉着他的手一同走到窗前，并对他说："奥列格·佩考夫斯基，根据我所了解的苏联形势，我已清楚地看到你为全世界和平事业——不仅为西方，也为你自己的人民——作出了你的一切贡献。"

然而，克格勃已经监视了他，在取得巨大胜利的时刻，佩考夫斯基和温被捕了，在导弹危机越演越烈之时他们锒铛入狱。1963年5月他们受到审判，被定为间谍罪。据苏方报道，佩考夫斯基被立即枪决了。温被关进监狱，后来英国抓住了苏联间谍隆斯代尔，温与戈特·隆斯代尔交换，回到了西方。

肯尼迪在导弹危机中成功后壮了胆，开始发动一个强有力的攻势，以挫败苏联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印度支那的活动。1955年美国违背日内瓦协议，支持在越南南方建立了吴庭艳伪政权，从那以后，两个越南一直闹摩擦。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美国支持的吴庭艳集团企图镇压越盟的残部，这时称作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或简称越共。镇压遭到了反击，并在1960年3月铸成了大规模的起义。

这场缺乏预计、不受欢迎、没有宣布的东南亚战争是美国遏制政策的必然结果。肯尼迪总统及其专家治国论者认为这场冷战后的新冲突是美、苏、中三强对峙的反映，而不是越南人之间的争斗。肯尼迪把南越比成"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基石"，林登·约翰逊副总统则称吴庭艳是"亚洲的温斯顿·

邱吉尔”，并说，“他是我们在那里的独生子。”

情报资料表明，有百分之八九十的越共是军人，他们的大部分给养是在南方而不是从北方获得的。然而鹰派人物如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总统顾问麦克乔治·邦迪和瓦尔特·罗斯托，坚持认为那里的危机是河内侵略的结果。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做法像在朝鲜一样，正在保护分裂后的越南非共产党政权一方，以免遭另一方的攻击。通过保卫西贡政权，他们想向共产党证明民族解放战争不灵了。实际上，美国所保护的这个威信扫地的集团，几乎全是殖民统治的遗老遗少，他们既腐败又无能，只会滥用手中一点点权力。西贡政权与越共截然相反，没有团结、牺牲精神，也没有凝聚一体的准则，更没有人民拥戴的政治领袖。

美国在越南的政策是无知与狂妄的产物。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三届政府无视越南的思想意识以及政治文化方面的复杂性，企图将传统的美国军事战略准则和政策分析概念运用于根本不合适的形势。越南一开始就当作广为赞扬的反暴动理论的试验场，于是美国投入了比以往更多的人力、财力和武器装备，坚信优越的军事力量和技术力量必定胜利。1961年肯尼迪上台时，越南南方大约只有800名美国人。该年年底，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瓦尔特·罗斯托访问了西贡，随即成立了越南军援指挥部，美国开始承担起更大的义务。到肯尼迪遇刺时，那里已有23000名美国人，但是这并没有阻止越共的游击战，地下组织的活动仍然非常活跃。

美国情报界在越南的活动很不景气。越共反情报机构有效地防止了敌人的渗透，使美国人只能依靠南越情报机关和警察系统获取情报。这是一个重大障碍，因为这些机构早就被越共渗透，成为极不可靠、有时甚至是非常危险的情报

源。中央情报局少数有外交身份的情报人员对越南情况略有所知，但是他们只在越南逗留1年，时间太短，不可能掌握越南人的思想脉搏，也不可能对形势有一个直观的理解。

自1953年起，越南就一直是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评估委员会的目标之一，但是决策者们作出重要决策前，并没有充分研究现有情报资料，也没有同情报官员们充分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略情报是制订军事和政治战略的决定性因素。而现在不同了，战略情报在决定对越政策时影响极小，除非这些情报适合军方和非军方决策人对现实的解释时才被重视。关于一个非共产党的南越是否能长期生存下去的问题，中央情报局的现时情报办公室和国家情报评估委员会持怀疑态度，它们的情报估计无人理睬，而为五角大楼服务的国防部情报局的乐观预测受到了欢迎。此外，中央情报局不相信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多米诺理论"，认为即使南越垮台，东南亚的民族对抗也将成为共产主义扩张的绊脚石。

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对扩大美国的干涉是否明智提出了质疑，认为北越会加强对南越的渗透，因为美国空军阻止不了北越军队的进攻。朝鲜战争和胡志明领导的反法革命战争都表明空中封锁在不发达地区用途非常有限。然而这一有预见性的看法被搁置一边，军事集结迅速增加。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央情报局在散布恶讯，该局被排斥于决策工作之外。

美国控制越南战争时，遇到了"民族建设"的难题。南越是一个天主教统治的佛教国家，1963年夏秋之间，不满的佛教徒发动了反对吴庭艳政权的游行示威。虽然抗议只是民族情绪的反映，吴庭艳却命令荷枪实弹的南越军队攻击赤手空拳的佛教徒，并把他们看作共产党分子。实际上，越共对

佛教徒的起义同吴庭艳一样深感震惊。华盛顿对吴庭艳已有新的打算，迫使他采取措施巩固政权，但吴庭艳不听使唤，对佛教徒的血腥镇压只是一根救命稻草。南越几位将军意识到吴庭艳已不再受宠于华盛顿，便问美国官员，如果他们发动政变，美国将作何反应。曾在1960年共和党副总统竞选中失败的新任驻越大使亨利·洛奇说，吴庭艳和他的家族已成为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障碍，这实际上是为把吴庭艳赶下台开了绿灯。

中央情报局在政变阴谋中是沾边的，它派卢西恩·科奈恩同反叛的越南将军联络。关于政变是否可行，华盛顿意见分歧，特别是那些将军们暗示要杀害吴庭艳和他的一些亲属后，除了其他人外，约翰逊、麦克纳马拉、麦科恩都反对推翻吴庭艳。中央情报局局长带有讽刺意味地说："我们无权鼓动、批准或支持暗杀。"根据中央情报局分析，当时还没有接替吴庭艳的合适人选。为此麦科恩对肯尼迪说："总统先生，如果我是一个棒球队领队，并且手下只有一名投球手，不管好赖，我将保留他。"麦科恩的不同意见未被采纳。1963年11月1日部队包围了吴庭艳的官邸，在作出谨慎行事的许诺后杀死了吴庭艳。

吴庭艳的死讯传到华盛顿时，肯尼迪正在与助手们商谈。事后泰勒将军回忆说，当时肯尼迪跳了起来，"冲出房间，脸上露出震惊和不安"。在西贡，得意洋洋的洛奇邀请反叛将军们到他的办公室，向他们祝贺胜利。他宣称，"这下有可能缩短战争了。"

但是一起暗杀正在酝酿之中。3星期后，即1963年11月22日，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饮弹身亡。

18. 都是“可敬的人”

林登·约翰逊与肯尼迪迥然不同，他对情报细节不感兴趣。肯尼迪总统对情报检索单上的某个问题感兴趣时，总要打电话向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了解，然而约翰逊是否看过该检索单，麦科恩表示怀疑。威廉·科尔比回忆说，在一次白宫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局长曾叫他给约翰逊看一张新发现的越南军事设施的照片，“可是总统并不像肯尼迪那样仔细地察看，他唯一的反应是要我注意不要把他的咖啡洒到他膝盖上。”

在肯尼迪被暗杀后的一段混乱时期里，麦科恩几乎每天去椭圆形办公室。新总统相信，卡斯特罗出于对企图杀害他的各种阴谋的愤怒，采取了报复，他是暗杀肯尼迪的幕后操纵者。麦科恩告诉约翰逊，尽管可以怀疑凶手利·哈维·奥斯瓦尔德与古巴，甚至与他曾居住过2年半的苏联有关系，但是没有共谋的迹象。由于总统和麦科恩属于两种不同的频道，他们间的蜜月非常短暂。雷·克莱因回忆说，约翰逊寻求一致意见时不愿耐心地听取中央情报局的简报和建议，而喜欢与少数关系密切的顾问商讨问题。肯尼迪乐于听取不受欢迎的情报，而约翰逊却不喜欢听那些不愉快的消息。

约翰逊这位来自得克萨斯州丘陵地区的政客对微妙的外交事务感到不安，留用了肯尼迪时期的迪安·腊斯克、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麦克乔治·邦迪，以便保持美国国际政策的连续性。约翰逊与大多数美国人一样相信冷战设想。他反

复谈到慕尼黑、希腊、中国和朝鲜的“教训”，发誓不让共产党入侵东南亚。约翰逊一直担忧，如果南越落到共产党手里，他会遭到右派的攻击；共产党在中国胜利后，杜鲁门总统曾遭到这样的谴责。

约翰逊任总统期间，恰巧美国的国际威望滑坡。西方盟国要求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第三世界也在寻找更大的自治权。如何对待面临的时代，约翰逊心中无数，只好抓住过去的经验不放，坚信山姆大叔可以靠使用武力和援助两手来左右形势。上届政府留用的人员对越南政治的复杂性以及对美国实力的局限性均缺乏了解。但是他们不断敦促约翰逊，使他逐步加强了对西贡承担义务的责任感。虽然他有意建立一个繁荣、公正的伟大社会，但是越南却浪费他的精力，挫伤他的抱负，甚至毁坏他的声誉。

卷入越南战争后，约翰逊希望在东南亚获得胜利，赌注越押越大。1964年8月发生了北部湾事件。一艘美国驱逐舰报告说，它遭到了北越鱼雷快艇的无故袭击。接着，美国扮演了参战国的角色，对北越狂轰滥炸，而且将战火蔓延到了老挝和柬埔寨。美国军队从1965年的8万人猛增到1968年的50多万。正如中央情报局预测的那样，北越也作了相应的升级，他们展开了一场“人民战争”，把他们的事业紧紧地同深入人心的村自为战的爱国主义连结在一起，这是他们两千年来反抗外国统治的经验。

20年前，胡志明曾对法国人说：“即使你杀我10个人，我只杀你1个人，即使在这样的差额下，你们仍然失败，我们必然胜利。”胡志明预言的真谛没有变，只是他的敌人变了。麦科恩担心美国在亚洲的地面战会陷入泥潭，提醒总统说：“在一场我们不能取胜的军事行动中”，美国面临着势不两立

的顽敌——南方越共和北越。麦科恩关于吴庭艳倒台后南越会更加不稳定的预言证明是正确的。那些接任的将军们试图稳定局势，但无法控制这难以驾驭的国家。

中央情报局一开始就被当作情报中心和为总统提供决策情报的机构。可是猪湾事件已证明，历届总统和中央情报局有时也会分道扬镳，因为该局同政府其它机构一样人员不断更替。情报机构的官僚主义化意味着在权力斗争中和制订政策中情报本身也是一个因素，尽管该局影响的大小取决于当选的官员。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约翰逊和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人们即使没有把它看作一个十足的敌手，但也视其为不听使唤的奴仆。

为此，在越南问题上，似乎信赖中央情报局的决策者们实际上不愿听取它对战争前景的看法。中央情报局面临着一大批咄咄逼人的挑战者，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到国务院，各自吹嘘自己的观点。结果，总统只得选择那些支持自己立场的主张。当中央情报局再次送去一份调子悲观的材料时，约翰逊不耐烦地对一位助手说："还是那番屁话。"对越政策常在"周二工作午餐"上决定。可是，麦科恩参加的机会越来越少，后来甚至根本不邀请他了。由于从权力中心被孤立出来，麦科恩于1965年初辞职，并竭力建议由理查德·赫尔姆斯、雷·克莱因或莱曼·柯克帕特里克等情报老手接任。但是，总统出其不意地选择了得克萨斯老乡威廉·雷伯恩海军中将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雷伯恩是一位坦率老练的水手，他曾提出的北极星导弹计划非常及时而且列入预算计划，他也因此而一举成名。但是他缺乏情报或外交工作经验。这一任命标志着总统希望在中央情报局贴上他自己的标签，同时也说明总统对该局的情

报分析不感兴趣。该局一位官员气愤地说："约翰逊唯一关心的是谁在对谁做什么的材料。"按照不成文的规定，该局的两项主要任务将分给政府的军方和非军方情报机构。赫尔姆斯被任命为雷伯恩的副手，并有希望接替他。

这位海军中将一进入兰利总部就遇上不愉快的气氛，并一直没有得到改变。在雷伯恩宣誓就职的当天下午，总统命令美军进入多米尼加共和国。起初约翰逊为入侵辩解说，当华盛顿支持的多米尼加政府面临被推翻危险、许多美国人受到威胁时，有必要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后来他又声称叛乱是共产党煽动的。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文件内容互相矛盾，为此，情报局局长受到谴责。

由于雷伯恩仅忠于任命他的总统而不忠于中央情报局，因此职业情报家们对他很不满意。这位新局长认为他的任务就是把中央情报局变成为总统意志服务的驯服工具，人力和物力都集中用于越南，各种行动也越来越军事化。所谓在老挝的秘密部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央情报局早就开始征集米奥部落的人组成小分队，骚扰越南的渗透并收集情报。但是军方接管了这支装备简陋的队伍，将其扩充到近 5 万人后用于作战。雷·克莱因评论道："这就是60年代中期的隐蔽行动史。中央情报局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压在它肩上的隐蔽工作重担，犹如越南正在破坏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一样，破坏了该局的全面工作。"

中央情报局内部对雷伯恩粗暴的工作方式和他对国际事务的孤陋寡闻十分不满。该局官员反问道："如果我们中有人被任命为海军作战部部长，海军会有什么想法？"有关雷伯恩出洋相的各种笑话首先在乔治敦各种集会上传开，后来竟然登上报纸。据说有一次在中央情报局人员会议上，雷伯恩无

可奈何地问道："利比利亚哪个部族是寡头政治的执行者？"有人挖苦地劝他把副局长带到白宫去参加会议。甚至约翰逊总统也终于认识到雷伯恩的尴尬处境。1966年6月，理查德·赫尔姆斯接替了他，这是从中央情报局内部人员中直接提拔起来的第一位局长。

接任前不久，赫尔姆斯应总统之邀，去得克萨斯约翰逊的私人牧场住了一夜。晚餐时，明尼苏达民主党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富有幽默感地问赫尔姆斯是否能识别桌子上摆着的黄色鲜花，赫尔姆斯区别不了。接着，这位参议员又让他说出端来的各种酒是如何酿制的，赫尔姆斯又考了个不及格。

"詹姆斯·邦德会知道这些答案，"麦卡锡冷冰冰地说。

赫尔姆斯没有被逗乐。像大多数情报行家一样，他蔑视流行小说中虚张声势的间谍。他身材魁梧，具有江湖赌徒那种沉着而又锐利的目光。他负责中央情报局的人事工作，是领导间谍网和有外交身份的情报人员的行家。一位同行说："在迪克·赫尔姆斯领导下，再也不会出现猪湾事件，同时也不会有U—2事件。"

当上约翰逊的情报局局长后，赫尔姆斯面临着艰难的任务。一方面中央情报局对越南问题提出的建议和警告总是无人理睬，人人萎靡不振；另一方面，总统对客观的情报分析不感兴趣，认为中央情报局应该帮助他赢得这场战争。由于战争毫无胜利希望，赫尔姆斯无法给总统提供赢得胜利的魔术。但是他总算与总统保持了接触，同时使该局继续从事并突出情报分析工作。

中央情报局也提出并参与了许多反暴动的计划，其中凤凰计划最为有名。该计划由中央情报局以前的一位分析家罗

伯特·科默提出，此时他负责民事行动革命发展处的工作。该计划旨在清除南越的越共秘密基层组织，其基本原则是打击越共的游击队。凤凰计划宣称仅在1969年它就“除掉”了19534名越共嫌疑分子，其中6187人被杀。但是因为它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一切有同情越共嫌疑的村民发动攻击，凤凰行动不久步入了歧途。村民们被驱赶到一起，用严刑拷打逼他们提供情报，那些有共产党干部嫌疑的人立即遭到枪决。中央情报局有人说：“他们错杀了许多无辜老百姓。”凤凰行动很快臭名远扬。反战狂热分子说，凤凰行动证明该计划炮制者们得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妄想症，妄想建立一个遍布各地的“隐形政府”。

与中央情报局脱离了工作关系、当上科默的副手和凤凰行动负责人的威廉·科尔比，事后尽力为中央情报局开脱罪责。他解释道，实际上是越南人在执行该行动计划，为数不多的美国人主要指导训练并充当顾问。尽管如此，中央情报局必须对该计划承担主要责任。它陷入越南的反恐怖行动由来已久，为凤凰行动提供了武器装备和活动经费。科尔比一定知道其中的某些错误，因为他发布的指示中谈到可能有越轨行为。他说：“如果美国人碰到那些由越南人指挥但不符合陆地作战规范的行动时，那他们当然不会继续参与这些行动。如果有谁讨厌凤凰计划中那些警察式行动，那应该毫无偏见地给他另行分配任务。”科尔比从越南回国时，首先看到的是他的大幅漫画，上面写着：“通缉杀人犯科尔比。”

中央情报局在情报搜集和分析方面有进展。根据驻越美军副司令布鲁斯·帕尔默将军的看法，该局的所有情报判断“一般来说是正确的，它的情报评估大部分也是恰当的”。在评价美国空袭的效果时，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正确的，即美

国空袭不能动摇胡志明的意志，也无法削弱他承受战争的能力。该局一直认为北越坚信自己比美国人及其南越盟友们具有更强的生存力，一定会坚持打到底。

但是准确的情报不总是受人欢迎。在关于南越究竟有多少共产党武装力量的问题上，中央情报局与军方打了场笔墨战。在军事情报判断中，最困难的是确定敌方部队的力量，主要部队的编成，或者战斗序列。这项任务在游击战中更为困难，因为正规部队在战场上不时得到非正规部队的支持。

一场关于战斗序列的激烈争论出现了。中央情报局一位年轻的分析人员塞缪尔·亚当斯仔细查阅了陆军的统计资料，“感到其中有些滑稽可笑的事，这些统计资料没有任何意义。”亚当斯确信，共产党部队总数为60万，是援越美军司令部所估计的30万的两倍。原来陆军的估计中排除了游击队和辅助部队，而这两支力量作为敌方现有战斗部队的一部分活跃在南越。实际上亚当斯在谴责驻越美军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因为他企图用30万人的最高限额使约翰逊总统相信这场消耗战正在取得胜利。

亚当斯的分析有戏剧性的影响。如果他是正确的，那么威斯特摩兰司令部报送给总统的有关战争进程良好的报告则显然是谎言。1967年公众对越战的支持开始降温。如果在翌年总统选举前没有新的突破，那么约翰逊再次当选就很困难。当这个棘手问题交给赫尔姆斯后，他立即下令对亚当斯的报告进行严格的内部审核。如果中央情报局告诉总统胜利并不在眼前，总统会要求中央情报局不只是依靠一名无名小卒的报告，而要依靠更多的情报分析。

对亚当斯报告的审核没有任何结论，因为共产党部队不会在某个入口处鱼贯而入，一数就清。但是专家们一致认为

亚当斯对游击队和辅助部队作了有权威的研究。援越美军司令部对中央情报局的这一看法不能接受，于是1967年9月在西贡举行会议，进一步论证。3天中，与会者们抛出了许多数据，并互相谩骂。一位陆军军官吼道："亚当斯，你全是放屁！"最后，会议拿出一个低于情报局高于援越美军司令部估计的数字，赫尔姆斯接受了这个妥协，亚当斯却非常恼恨。

1968年1月底，新年攻势在南越全面爆发。这个攻势基本证明中央情报局对共产党力量的估计是正确的。美国人和他们的南越盟友发现自己的敌人比官方承认的要强大得多，组织得更好。帕尔默将军评论说，那个妥协性估计"也许进一步使人错误地认为敌人无能力在全国同时发起大规模进攻"。此外，新年攻势使人们想起珍珠港事件中的情报失误。与日本的偷袭一样，这次攻势也是有预兆的，缴获的文件，截取的通讯，照片的分析均表明一场进攻正在酝酿之中。早在1967年12月20日，威斯特摩兰就警告华盛顿注意敌人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但是如同在1941年一样，无人确切地知道敌人将何时何地发动进攻。

许多观察家认为进攻将在神圣的阴历年庆祝活动前开始。一般认为共产党不会在新年节日期间发动进攻；如果他们违背自己的休战声明，那他们会失去民众的支持。所以新年前夕看到敌人没有进攻，美军也就放松了警惕。大多数美国人不熟悉越南历史，不知道越南人曾经在1789年新年发动突然袭击，大败外国占领军。

美国人对突袭毫无准备，惊慌失措。共产党暂时取得了辉煌胜利，打进了美国驻西贡大使馆并占领了顺化。但是越共在军事上损失很大，约有4万人阵亡，游击队的战术指挥系统几乎全被破坏。战场的枪声未停，约翰逊总统和威斯特

摩兰将军就发起了强大的舆论攻势，把新年攻势说成是敌人的垂死挣扎，并宣称这是美军的一次巨大胜利。

然而美国人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战斗却是另一种场面：越共冲进美国使馆，街上到处是死伤人员，建筑物被炸成废墟，茅屋熊熊燃烧，难民四处逃命，妇女哭天喊地，这一派混乱的景象没有丝毫胜利的意味。大使馆暂时被占领，虽无军事意义，但却在美国人心灵上留下创伤。尽管总统一再发誓，在越南“隧道的尽头有希望的曙光”，然而大多数美国人为那些血腥镜头所震惊。新年攻势使约翰逊失去公众的信任。反战气氛越来越浓，群众示威要求停止轰炸，开始谈判，甚至要求立即撤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越对美国人的反应也感到吃惊。陈度将军承认：“坦率地说，我们也没有达到主要目的，未能促成南方的全面起义。至于在美国国内造成的影响，虽不是我们的本意，却是一个可喜的额外收获。”

由于威斯特摩兰坚决要求增派20万军队——这意味着动员后备役，扩大征兵，同时，由于在越南绥靖计划破产，约翰逊无可奈何地请新任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召开特别小组会议研究越南形势。这是赫尔姆斯一直期待的好机会。在随即召开的3天会议上，他向该小组提供了中央情报局的研究报告，指出，即使向越南增派部队，“最好的结果是今后10个月内的形势将仍然处于不分胜负的僵局。”克利福德和特别小组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于是总统的越南问题高级顾问组，即所谓的智囊团，提出了脱离战斗和撤军的建议。

一贯强硬的鹰派智囊团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一个主要因素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所作的敌方力量评估，经过分析发现，共产党伤亡人数已超过五角大楼在敌方战斗序列中所确定的总人数。一度是战略情报局官员的驻联合国大使阿瑟·

戈德伯格问道："将军，如果在一个32万人的战斗序列中已有24万受伤，8万死亡，那么我们究竟在那里跟谁作战呢？"与此同时，约翰逊面临着一场强烈的政治风暴。作为民主党候选人与约翰逊竞争总统的麦卡锡参议员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另外，在威斯康星州的民意测验中，约翰逊的失败也几乎是确定无疑的。

3月31日，约翰逊总统在电视上宣布，他将下令停止轰炸北越，并希望同河内谈判。接着，他说他将不谋求连任总统，这使电视观众包括他的一些顾问们非常吃惊。看来这场战争的最新损失是使约翰逊总统下台。

20年前声嘶力竭地叫嚷要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现在这个政策已走到死胡同的尽头。北越接受了约翰逊谈判的建议，但是他们只是将战场移到巴黎的谈判桌上而已。这场谈判谈谈停停，直到理查德·尼克松接替约翰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在继续进行。

在新任总统中，很少有人像尼克松那样胸有成竹。在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期间，他任副总统达8年之久，因此他深刻理解世界事务的复杂性。此外，他思维敏捷，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佩服。尼克松内心对那些蔑视过他的人不满，他认为阴谋活动无处不有：在新闻界，在共和党控制的富裕的东部集团中，在华盛顿官僚机构的高层，特别是在中央情报局中。

为了照顾两党关系，虽然新总统仍然任命赫尔姆斯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同时埃德加·胡佛也继续留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但他怀疑赫尔姆斯属于名牌大学自由派。其实尼克松不仅讨厌他，而且也不相信中央情报局。他把1960年竞选

失败归咎于中央情报局。该局许多高级官员都是亲肯尼迪家族的乔治敦派。尼克松认为，为了确保肯尼迪上台，他们抛出了关于"导弹差距"的报告，成为民主党候选人攻击他的炮弹。

尼克松入主白宫正值美国历史上的危急关头。他继承了一场不是由他发动的战争，国际形势日趋恶化，国内分歧越演越烈。他还接下了混乱不堪的国家安全机构。新总统象肯尼迪一样努力把权力集中于白宫，特别是集中于亨利·基辛格博士手中。曾经是哈佛大学教授的基辛格，起初担任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来又成了国务卿。为了在1972年大选前把美国从越南的泥潭里拔出来，尼克松和基辛格采取了迂回策略。他们把战争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并告诉美国人民战争升级是为了向和平进军。他们声称，狂轰滥炸河内是为了逼使北越结束战争，而和平的真正障碍是西贡政权，它坚持要美国在撤出越南战争后保证其生存。

中央情报局提供给尼克松的劣质情报，加深了他对该局的反感。他认为分析家们反映出学术界的偏见，他们的报告平淡无奇，堆砌了不少形容词。他批评中央情报局不会直截了当回答问题。他还抱怨道："兰利的小丑们究竟在那里搞什么鬼？他们4万人难道就在那里读读报纸吗?!"

尼克松认为，更糟糕的是不断发生情报差错。由于在东欧缺少情报来源，1968年夏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前，中央情报局提供了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该局还低估了从柬埔寨西哈努克村转运给北越部队外援物资的总量。事实上，军方对于苏联力量的评估有点危言耸听，但它却比中央情报局的估计更准确。

基辛格很快控制了整个情报来源。他既有铁的手腕又富

有魅力。他直言不讳地说他比他的许多对手要高明，他看上去像一个布鲁克斯的屠夫，玩世不恭地运筹着一切。他把国家安全委员会从一个顾问机构改变成一个外交事务机构，并着手彻底改造国务院和情报系统。当问及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时，各情报机构所给的答案基辛格认为都不能及格。据说有些情报只是报社记者所发稿件的翻版。一位助手清楚地记得，一次基辛格怒气冲冲地挥舞着国家情报评估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尖叫道："这不是我要的东西！"与此同时，管理与预算处副处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对情报系统的管理体制作了分析，发现既重叠又混乱。

基辛格靠损害正规机构和部门获得权力。为了压垮中央情报局，他要赫尔姆斯提供猪湾事件和吴庭艳集团大屠杀的有关档案，并含蓄地威胁说，必要时要将这些材料透露给报界，使中央情报局难堪。赫尔姆斯连见尼克松都非常困难，只好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时给他留下条子。虽然赫尔姆斯竭力使中央情报局适应日益困难的形势，但是由于无法接近总统，又不了解他的意图，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收集工作遇到障碍并形成恶性循环。有一次赫尔姆斯向一位同事透露："有些事我还得从头学起。我得学会了解总统意图。"

在尼克松时代，中央情报局在制订政策中，特别是在总统力图恢复同共产党中国的正常关系中，影响甚微。在尼克松1972年 2 月访问中国之前，基辛格绕过国务院和情报机构，包揽同中国的一切谈判。

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为中央情报局主要是执行白宫秘密计划的工具，而不是情报分析机构。因此当1970年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博士有可能被选为智利总统时，中央情报局被找去执行任务了。在那年 9 月选举中，阿

连德比另外两位候选人得票多，但未超过法定多数。根据智利宪法规定，国会将在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中选择总统。按照传统的做法，大选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即阿连德，进入定于10月24日进行的决选投票。虽然阿连德保证只在智利宪法允许范围内把智利改变为马克思主义国家，但是美国的多国公司，特别是阿那康达铜公司和国际电讯公司害怕国有化。基辛格低沉地说："我不明白当一个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让他们的国家共产主义化时，为何我们要袖手旁观。"

9月15日，尼克松在白宫召见赫尔姆斯，命令中央情报局阻止另一个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南美洲掌权。根据赫尔姆斯面晤总统时的谈话记录记载，总统说："也许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但一定要拯救智利！"中央情报局在智利行动中能得到1000万美元的经费，如果需要，还可以增加。最能干的人将被派往智利。在行动中不要去找美国驻圣地亚哥使馆。尼克松命令说："要对它施加经济压力。"

赫尔姆斯后来告诉丘奇委员会："总统斩钉截铁地下了决心。可以说那天我是带着总统赋予我便宜行事的权力走出白宫的。"

美国干涉智利大选由来已久。早在1964年，中央情报局就说服阿连德的反对派团结在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埃杜瓦多·弗雷周围，并向该国投入了近300万美元以确保弗雷的当选。第二年又投入了更多的钱，以促成选举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进入国会。1970年6月，国际电讯公司董事长约翰·麦科恩向赫尔姆斯建议，国际电讯公司与中央情报局联合起来，该公司将提供至少100万美元，共同阻止阿连德获胜。国际电讯公司为了反对阿连德已经化掉一大笔钱，但是这次反对派拒绝拥护一个候选人。赫尔姆斯对中央情报局能否在短期

内影响选举结果没有把握，因此拒绝了国际电讯公司的建议，但答应帮助该公司将资金转交给反对派。

白宫批准了一项双管齐下的计划，阻挠阿连德在选举中获胜。第一方案是40委员会批准的通过贿赂智利国会议员达到不选阿连德的目的。绝密的第二方案是白宫瞒着40委员会批准的，授权中央情报局在必要时策动军事政变阻止阿连德上台。有趣的是，在赫尔姆斯领导下，中央情报局已不再像该局成立后的头25年那样强调隐蔽活动和准军事行动，兰利总部对破坏智利民主的阴谋普遍感到忧虑。其实，两年前，国家情报评估委员会在一份文件中指出，拉丁美洲社会改革的力量非常强大，外来势力根本无法控制。

曾参加危地马拉和猪湾行动的戴维·菲利普斯，这次又勉强参加了智利行动，负责执行第二方案的行动小组。菲利普斯责问道："难道中央情报局应该执行总统的命令，在一个具有民主传统、政权巩固的拉丁美洲国家煽动军事政变吗？"但是计划司司长兼中央情报局与白宫的联络员托马斯·卡拉梅辛斯执行任务不动摇。他说："我们不能走进总统办公室，用拳头敲着他的桌子说我们不干。"

虽然化了至少25万美元行贿，并不断警告说，如果阿连德获胜，对智利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将被切断，然而第一方案还是失败了，对此谁也不感到奇怪。策动军事政变的第二方案同样毫无成果。几名智利军官图谋反对阿连德，可是陆军总司令勒内·施奈德坚持要按宪法办事。阴谋分子未能逼迫施奈德退休或辞职，决定在10月24日国会选举前用绑架的办法除掉他。

中央情报局给阴谋分子提供了冲锋枪和弹药，但两次行动都失败了。在决选投票前两天，施奈德在与一伙企图绑架

他的歹徒枪战中，身负重伤。据说这伙歹徒用的是手枪，而不是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冲锋枪，而且他们的行动与中央情报局支持的组织无关。假设事实是这样，那么在策动政变之后，这位将军的死已经震动了智利人，使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宪政的旗帜下，阿连德平安地当选为智利总统。

尼克松和基辛格事后宣称，在绑架企图失败后，他们就命令停止实施第二方案，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则说，第二方案仍按既定方针执行，对此白宫是一清二楚的。卡拉梅辛斯对丘奇委员会说："至少就我所知，实际上从未有人下令停止执行第二方案。"丘奇委员会对这种各执一词的说法无能为力。

阿连德当选后，颠覆智利的活动进一步加剧。在后来3年中，中央情报局就向智利反对派提供了近800万美元的援助，并对智利施加经济压力，中止美智贸易，拒绝提供国际贷款。由于政府管理不善，本来很不景气的智利政府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运输行业工人罢工后，国家的混乱达到了顶峰。据传，这次罢工是由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尽管该局否定了这些谣言，但靠工会自己的财力是不可能使罢工延续如此之久的。这种混乱局面为军事政变铺平了道路。

1973年9月11日，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终于发起了一场血腥的军事叛乱，地处圣地亚哥闹市区的总统府浓烟滚滚，烧成一堆废墟，阿连德可能被人暗杀，也可能自杀身亡。尽管中央情报局否认自己与政变有直接牵连，但是它一直关注这场政变，而且给阴谋分子打气。新政权很快就得到了美国的承认，被看作是反共堡垒。不久新政权又得到大批曾拒绝给阿连德的援助。皮诺切特一上台就实施戒严，发起一场残酷的镇压运动，并持续了15年之久。阿连德倒台的时候，

赫尔姆斯也因卷入水门事件而被赶出了华盛顿。

面对水门丑闻即将卷起的风暴，赫尔姆斯的第一个反应是捂盖子。1972年6月17日凌晨，中央情报局已退休的安全工作人员詹姆斯·麦科德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水门办公楼的办公室安装窃听器时，与4名古巴流亡者一起被逮捕了。到赫尔姆斯同高级助手们分析形势时，该局卷入白宫定性为“劣等窃贼”事件的人数已增至3人。除麦科德外，还有两年前退休的霍华德·亨特和在职的一名古巴人尤金尼奥·马丁内斯。赫尔姆斯对助手们说：“保持镇静，什么也不要说，以防把我们卷进去，请对这件倒霉的事保持沉默。”

水门闹剧起源于尼克松和基辛格对政府的秘密决策不断泄露给新闻界而产生的忧虑。他们早就下令在许多人的电话上安装窃听器，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白宫的助手，以及借保护国家安全为幌子的记者们。1971年《纽约时报》公开了五角大楼一份关于卷入越南战争的秘密历史文件，随后总统助理约翰·埃利希曼组织了一个特别调查组去寻找漏洞。退休后一直从事日常公共关系工作的亨特和曾在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工作过的戈登·利迪被雇来充当堵塞漏洞的“管子工”，尽管他们都以夸夸其谈和制造麻烦而闻名。后来，他们被调到尼克松的竞选班子，即连任总统竞选委员会。

中央情报局避开水门事件的漩涡是不无理由的。1971年夏，它曾屈服于白宫的压力，给亨特提供了伪装用品、照相机、录音设备等间谍工具，用于窃听正在为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治病的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埃尔斯伯格是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被指控向新闻界透露了五角大楼的那份文件。在亨特的请求下，中央情报局还准备了一份埃尔斯伯

稻的精神病史。赫尔姆斯深知亨特其人，觉得他那无事生非的做法挺有趣，亲自答应了他的要求，也许是为了改善同白宫的关系。但是当亨特接二连三的要求引起许多麻烦时，赫尔姆斯经反复考虑后断绝了和他的来往。

尼克松总统不想让中央情报局从水门丑闻中溜走。一方面，他认为水门窃听的暴露不是偶然的，是他在中央情报局的老对手——即1960年为肯尼迪竞选效劳的那些人——故意安排的闹剧，目的是使他在连任竞选运动中难堪。另一方面，他想把抓住中央情报局作为一种手段，以便阻止联邦调查局追查连任竞选委员会通过曲线方法从墨西哥转给"管子工"们的秘密经费。

6月 23 日，即水门事件发生 1 周后，赫尔姆斯同新任命的副局长弗农·沃尔特斯将军一起被召进白宫。沃尔特斯的军事生涯基于他的语言能力，他掌握11种语言，并能十分流利地用这些语言交谈。1959年他与副总统一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遇到一群乱扔石子反对美国佬的暴民袭击，他表现得十分勇敢，从那以后，深得尼克松的赏识。总统办公室主任霍尔德曼告诉他们说，总统要中央情报局出面让联邦调查局放弃对墨西哥问题的调查，因为那会暴露中央情报局在国外的合法行动。赫尔姆斯则回答说他根本不知道有这类行动。

然而，霍尔德曼坚持要沃尔特斯与帕特里克·格雷讨论此事；格雷这位平凡的新英格兰律师在上个月埃德加·胡佛死后，被意想不到地任命为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在后来几天里，沃尔特斯和格雷为墨西哥问题争吵不休。格雷几乎在哀求沃尔特斯，为了国家利益一定要他限制对此案的调查。7 月 6 日，沃尔特斯毫不含糊地告诉格雷，此项调查对中央情报

局在墨西哥的行动不构成任何威胁。中央情报局还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白宫的建议，不同意为水门窃贼们提供保释，也不同意为他们支付薪水和家庭开支。

由于采取了这些行动，虽然迟了些，但中央情报局没有参与水门丑闻事发后的掩盖活动，也没有被尼克松和他的助手们利用去为他们开脱罪责。但是正如威廉·科尔比所说，赫尔姆斯使中央情报局与水门事件保持距离的策略是一柄双刃剑。由于拒绝提供证据，由于回答问题准确，不添枝加叶，中央情报局反而引起怀疑和不信任。从中央情报局追查或走漏出来的每一件事，使人们更加相信，仍有更多不可告人的材料被隐瞒着，看来中央情报局与水门事件确实有牵连。另一方面，一些严肃的批评家和报纸如《华盛顿邮报》指出，对尼克松政府，中央情报局"是唯一敢说'不'字的机构"。

由于这个"不"字，赫尔姆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972年12月，在尼克松连任总统不久，赫尔姆斯被解除中央情报局局长职务，去伊朗当了大使。当他最后离开兰利总部经过门厅注视着大理石墙壁上代表着中央情报局以身殉职人员的30颗星星时，在场所有人员顿时流露出对他的尊敬和爱戴。6年多来，赫尔姆斯为维护中央情报局的独立和完整作了最大的努力。

赫尔姆斯曾经说过："国家要坚信，我们也是忠诚地为她服务的可敬的人。"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人民，国会以及新闻界确实相信，美国的情报界是由"可敬的人"所领导的。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民主党参议员约翰·斯滕尼斯恰当地表达了流行的看法："间谍活动是间谍活动。你们一定要下决心建立一个情报机构，并要把它当作情报机

构来保护，闭上你们的眼睛，任凭别人说三道四。”但是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使这种信任一扫而光。妄想狂合法化了，国家安全和秘密机构不再是保卫共和国的工具，而被当作随意掩盖罪恶和渎职的场所。

这种敌意和怀疑使中央情报局内部的士气一落千丈。赫尔姆斯离开后的4年中，该局换了5任局长。接替赫尔姆斯的詹姆斯·施莱辛格从1973年2月到6月只干了4个月。但是没有人像他那样对中央情报局大加砍伐，或者说，没有人比他更令人讨厌。一些观察家开玩笑地说，实际上，任用这位破坏性极大的施莱辛格是尼克松总统对中央情报局的报复。虽然施莱辛格没有情报工作经历，但他早先曾研究过情报系统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所以他不算一个新手，作为该局局长，他有自己的改革日程表。他认为该局人员太多，经费太多，真正要做的工作太少。他还认为当今高技术世界再也不需要使用斗篷和匕首的间谍了。

施莱辛格把削减情报预算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根据国会来的消息，情报预算在1973年已增至60亿美元，其中百分之八十由五角大楼控制。中央情报局估计得到7.5亿美元，其中约4.4亿元是隐蔽行动的经费，而科学技术司和情报司只有前者的一半。据其它方面估计，情报系统的全部预算每年为110亿美元。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情报费用远远超过国会所讲的数字。不论实际数目是多少，施莱辛格认为太多了，而且这些经费使用的重点都是错误的。

施莱辛格计划更多地依靠计算机和“空中间谍”卫星等技术手段来搜集情报，并且将资料收集和分析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于是他在计划司开始裁减工作。他认为战略情报局和冷战时期留下的“莽汉”太多，命令新任计划司司长威廉·科尔比

对秘密活动人员和准军事行动专家们进行一次大清洗。几周之内，约有百分之十的人员，近1000人退休的退休，辞职的辞职，有的干脆被解雇了。由于越南战争降级，这次裁减步子很大，简直是伤筋动骨，不过许多知情者认为早就该这样做了。配合隐蔽活动的收缩，中央情报局变卖了曾在印度支那和其它地区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美国航空公司和南方空运公司这两笔财产。为了进一步降低隐蔽活动的神秘性，科尔比将他领导的计划司改为意义更明确的行动司，同时通向中央情报局总部公路上的路标也由“公路局”改为“中央情报局”。

对施莱辛格的清洗工作反应非常强烈，以致他增加了私人保镖，以防工作人员中有人对他暗算。有一位来访者要求参观技术服务部，那里有制造皮下注射器和带毒雪茄烟的魔鬼工厂。施莱辛格对这位来访者说：“我不能带你去那里，去了我们都不能活着出来。”这玩笑暗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令科尔比吃惊的是，詹姆廉·施莱辛格解雇了安格尔顿，因为此人虽然很能干，但他的行动搅乱了中央情报局，而且他的一些意见也是值得怀疑的。比如，安格尔顿坚持认为斯大林和铁托间的裂痕只是一个假象，中苏分裂只是麻痹西方、使它放松防卫的诡计。这两人长期争执。50年代末，科尔比在罗马工作，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民主派与社会主义者发生了冲突，社会主义者已经摒弃了与共产党的历史联系，因此科尔比支持与左派接触的主张。曾在意大利住过的安格尔顿感到共产党的影响无处不有，他怀疑社会主义者仍在暗中与共产党联系，于是他讥讽科尔比的想法太天真。结果科尔比赢了这场争论，安格尔顿则一直耿耿于怀。

安格尔顿在中央情报局内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拿出培养种兰花和用假蝇钓鱼这些业余爱好的劲头使自己赢得神秘

人物的声誉。他瘦得像一具干瘪的尸体，身穿黑色的丧服。他喜欢对提问题的人反问。一次，一位官员应召去他的办公室，发现他蜷缩在一间密室里，窗户上蒙着漆黑的窗帘，没有一丝光亮。“……安格尔顿本人正在刺眼的灯光下阅读文件……我仿佛觉得我去了一个不能对任何人讲的地方……这种感觉整整一天后才消除。”

安格尔顿从事反情报工作30年，经常觉得苏联间谍已打入中央情报局。金·茹尔比和汉斯·菲尔菲分别在英国和西德情报机构担任了重要的职务，法国秘密情报机构也受到严重渗透。由此他推理，也许兰利总部也隐藏着苏联特工。由于这一想法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他相信，中央情报局在铁幕后活动的特工人员都受克格勃控制，他还认为大多数投靠西方的人都是俄国人派来散布假情报的。由于安格尔顿的反对，奥列格·潘科夫斯基第一次表示叛投时，遭到了中央情报局的拒绝。只是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劝说下才接受他提供的资料。更有甚者，安格尔顿竟认为中央情报局自己的官员中，有一些也是嫌疑分子。

因妄想症而引起的害怕克格勃的担忧使科尔比感到：“在这种思想的干扰下，我们花了许多时间防止克格勃渗透，而没有花足够的精力去开辟新的情报来源去搜集我们必须了解的苏联秘密情报。”然而，总是有人认为安格尔顿的想法有可能是正确的。从杜勒斯到施莱辛格，中央情报局局长们对他的看法十分感兴趣，并认为安格尔顿黑魆魆的迷宫理论可能真有道理。所以挖掘潜伏敌特的工作从未停止，制造了许多混乱并破坏了日常工作。有的官员甚至开玩笑说，兰利的确潜伏着一名苏联特工，那就是詹姆斯·安格尔顿。

安格尔顿最担忧的事为1961年12月在赫尔辛基叛逃的克

格勃少校阿纳托利·戈利岑所证实。他声称苏联人已打进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内的所有西方情报机构。戈利岑还告诉安格尔顿，克格勃和格鲁乌将向西方派遣假投诚者散布假情报。不久，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两名官员主动要求为联邦调查局服务。接着在1964年，一个叫尤里·诺斯科的克格勃官员在日内瓦叛逃。他谈到一个令人吃惊的情况：当肯尼迪总统的谋杀者利·哈维·奥斯瓦尔德居住在苏联时，诺斯科监视过他的行动，但没有卷入他的行动。诺斯科的说法有一部分得到化名为费多拉的联邦调查局密探的证实。(此人后来被怀疑是双面间谍。)

诺斯科说奥斯瓦尔德是单独行动的，这使联邦调查局十分满意。但是在不长的时间里，3个人叛逃，如果包括潘科夫斯基就是4个，中央情报局苏联处对这样的巧合实在难以相信，特别是根据戈利岑的警告发现了诺斯科伪造了自己在克格勃的级别和职务，这就更加令人怀疑了。中央情报局其他官员，包括理查德·赫尔姆斯在内，也发现诺斯科说他对奥斯瓦尔德不感兴趣不可信。奥斯瓦尔德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时曾驾驶过U—2飞机，克格勃不会对他不感兴趣。此后3年诺斯科被软禁起来，不仅受到无情的审问，而且在肉体和心灵上受到了各种折磨。虽然他的供词破绽百出，诺斯科仍坚持自己最初的基本说法。

诺斯科泄露了这么多机密，也有少数人相信他的话。他指出驻莫斯科的英国海军武官助理约翰·瓦萨尔是苏联间谍；揭发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受到窃听。他还为调查人员提供了跟踪罗伯特·理·约翰逊中士的线索；约翰逊在巴黎北约司令部服役期间给俄国人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战略性文件。总而言之，诺斯科提供的情报的价值至少比得上戈利岑

提供的情报。最后，他得到"平反"，有了新的工作，被安排在中央情报局负责训练专门研究苏联问题的新手。

中央情报局在施莱辛格大清洗后惊魂未定又增添了新烦恼，他们没有预测到1973年10月会爆发埃以战争。正当该局急需提高声誉时，这次失误却使它降低了威信。在此以前，中央情报局在中东一直保持了成功的记录。1968年赫尔姆斯向总统汇报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交战7至10天就会获胜，因此赢得了总统约翰逊的信任；事实上，以色列仅用6天就胜利了。然而，当1973年下半年人们纷纷议论说埃及会发动突然进攻时，以色列和美国双方的情报机构都持怀疑态度，认为埃及人没有进攻能力。分析家们说，即使埃及军队成功地越过苏伊士运河，它也不能坚守"甚至是一小块土地……长达一个星期"。这一情报失误之后，又出现了没有预测到石油输出国组织会强行实施石油禁运的失误。更严重的挑战还在等着他们。

施莱辛格刚到兰利上任，就收到一份他认为是关于中央情报局卷入水门事件的详细报告。报告谈到，在审讯泄露五角大楼文件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过程中，发现豪伍德·亨特从中央情报局得到作案器材后对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生办公室进行窃听。施莱辛格阅后大发雷霆，一气之下，他对科尔比说他要"捣毁这个地方，必要时解雇所有的人"，看一看中央情报局还隐藏着别的什么丑事。紧接着他发布了一项指示，命令所有新老雇员，如果他们怀疑中央情报局从事了非法或可疑的活动，必须向监察长报告。可是，处理这一问题的工作落在科尔比身上，因为指示发布不久，尼克松便任命施莱辛格为国防部长，并选择威廉·科尔比继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19. 风云莫测的时代

威廉·科尔比戴着眼镜，看上去温文尔雅，貌不惊人，但实际上他是个性格极其复杂的人物。他智勇双全，在战略情报局时曾被空投到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和挪威执行任务，多次立功授勋。他还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具有严格的道德观念，因此，一些同事称他为“军人牧师”。施莱辛格命令监察长写的长达693页的报告，详细地记载着中央情报局的可疑行动，这份被人称作“家珍”的报告使科尔比心烦意乱。

“混沌行动”计划破坏性极大。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根据约翰逊总统的命令联合举行的这一行动目的是调查越南反战运动是否受到国外操纵和支持。数千美国公民受到立案审查明显违背了中央情报局关于禁止对内从事间谍活动的章程。调查结果没有发现外国人插手，但是“混沌行动”一直延续到尼克松执政时期。报告中谈到的其它内容也同样令人不安。

为了查明泄露情报的原因，新闻记者受到监视；安格尔顿领导的查漏防漏人员实施了一项偷检邮件的长期计划；中央情报局批准了一项对无辜涉嫌人员试用麻醉剂的试验计划。在试验过程中，该局的一位官员自杀身亡。在另一份更敏感的报告中，监察长归纳了对卡斯特罗、卢蒙巴和特罗吉洛实施暗杀计划的情况。

“家珍”报告违反了科尔比前任局长们所作的一项重要规定，即不对任何可能引起麻烦的事情写书面材料。例如，1972

年赫尔姆斯觉察到水门事件中有危及中央情报局的事情后，立即命令将有关麻醉药试验的原始文件全部销毁。但是科尔比强调说，保护中央情报局并使之生存的最好办法是承认过去的错误，今后做得更好。他向参众两院监察委员会的主席通报了监察长报告的详细内容，随后向中央情报局发出指示，提出了今后行动的规范。这些指示包括明确规定今后不准中央情报局再卷入暗杀事件，也不准类似“混沌行动”、偷检邮件、对无辜人员试用麻醉剂等违反中央情报局章程的事情重演。

在尼克松声名狼藉即将下台之前——他于1974年8月9日辞职，由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接任——科尔比使中央情报局与过去错误告别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同年12月下旬，《纽约时报》记者、普利策新闻奖荣获者摩西·赫什告诉科尔比，他知道中央情报局曾对反战分子进行过非法刺探。科尔比对此没有否认，但辩解说，这些活动是孤立的活动，有人把事情编得太离奇了。他还强调说这些活动已经停止，并且1年前他就颁发指示，这样的事不可能重演。

赫什不同意这一说法。圣诞节前3天，《纽约时报》开始发表一系列文章谴责中央情报局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间谍活动以及其它非法活动，如对内监视，强行搜查，偷检邮件和窃听电话等等。显然，这些材料是科尔比向国会有关委员会通报“家珍”报告后有人捅出去了，另外，中央情报局内部那些宗派分子急于向其它机构中的竞争对手发信号，也泄露了一些情况。这样中央情报局很快陷入猛烈的政治风暴之中。与此同时，安格尔顿被解雇了，这一不适时宜但又非常巧合的决定给人造成了一个错觉，即安格尔顿是上述非法活动的罪魁祸首。

对于揭露出来的中央情报局的错误行为，福特总统比谁都吃惊。他曾经是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委员，人们认为该委员会应该监督中央情报局，但是在科尔比向他介绍“家珍”报告前，他对那些暗杀计划闻所未闻。福特抢在人们要求国会进行带有敌意的广泛调查之前先走一步，指示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领导一个由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等商界和政界人物组成了特别委员会，其任务是限制国会对中央情报局在国内滥用职权进行的各种活动进行质询。但是国会在废黜了一个总统之后，情绪激昂，坚决要求弄清中央情报局的一切活动，要想把它放在一边是不行的。参议院成立了一个情报活动特别调查委员会，由雄心勃勃的爱达荷州民主党参议员弗兰克·丘奇任主席。众议院经过一段周折后也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由纽约州众议员奥蒂斯·派克任组长。第二年，整个国家出现了美国特有的现象，即让情报机构在众目睽睽下接受审查。

这次对情报机构的打击实际上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打击。由于人们对情报机构了解太少，可能把它们作为发泄各种不满的替罪羊。控制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斗争甚至在这场调查之前就开始了。国会用1974年援外法的休斯一瑞安修正案来对照中央情报局在智利的活动报告。这是国会控制中央情报局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它要求总统向国会的监察委员会提供书面材料证明隐蔽活动的必要性，努力让国会及时全面了解所有这类活动。

在“情报年”揭露的有关中央情报局活动的无数材料中，福特总统本人泄露出去的情况最令人吃惊。总统在与《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的一次秘密谈话中透露，调查人员可能会发现比赫什所揭露的事情更加敏感的问题。

“比如哪些行动?”据说有人这样问道。

“比如暗杀,”据说总统这样回答。

这样诱人的珍闻一下传开了。不久大批证人向各调查小组提供情况，企图揭开暗杀行动的秘密。一天，参议员丘奇竟情不自禁地大声问道，中央情报局是否已经变成了一只“凶猛而又离群的大象”。这个引人注目的词语活龙活现勾划出一个胡作非为、乱砍乱杀、威胁国家基本自由的组织的形象。但是实际上丘奇的这句话为曾经批准或默许中央情报局滥用权力的总统和其他官员们开脱了一切责任。

科尔比担心中央情报局会一蹶不振，冒险孤注一掷。他没有像以往那样说该局秘密活动不能公开，而是与调查人员密切配合，兼顾国家安全和国会想知道内幕的需要。这样,诸如贩毒犯罪组织、有毒雪茄、外来武器等情况全部展示于公众面前。

总统、亨利·基辛格、理查德、赫尔姆斯以及情报界许多官员都认为科尔比在揭露中央情报局过去的错误时走得太远了。事实上，副总统洛克菲勒在一次听证会后把科尔比拉到一边对他说:“比尔，难道你真的有必要把这些材料告诉我们吗?”一次基辛格提到科尔比的天主教信仰时开玩笑地说:“比尔，当你走进国会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你去忏悔。”赫尔姆斯的反应是发自内心的，他说:“谁能想到执行美国总统的命令竟会被认为是犯罪呢?”

不久，丘奇和派克两个委员会发现“家珍”仅仅是冰山的山尖。滥用权力不仅限于中央情报局，据揭露,从1942年到1968年，联邦调查局针对“国内监视目标”搞了23次秘密活动,它通过窃听和讹诈等反情报手段破坏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声誉达20年之久。据国家安全局透露，通过“酢浆

革行动”，国际电讯公司30年来为政府提供了美国公民发出和收到的电报复印件。

在调查过程中，偶尔有人说这是为了改善工作，但那只是说说而已，调查人员真正的兴趣在于揭露滥用权力的犯罪事实和限制隐蔽行动。中央情报局的隐蔽行动司“是损人利己的机构”，丘奇吼道，“是一个多余的机构，机构内的人总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干涉别国的阴谋，这样他们就能得到晋升，并为扩充人员找到理由。……对外干涉完全是它自己的创造，否则谁也不会想到，更不用说批准了。”

这些调查给中央情报局精神上造成极大创伤，严重影响了它的工作效能。科尔比后来回忆说：“每一条新爆出的耸人听闻的标题，每一次新的败坏名声的揭露，使大家神经紧张、情绪震荡。”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感到很压抑，不能坦率地发表意见，其它情报机构也对参与秘密行动深感不安。一些情报官员对那些勇敢而又忠诚地为中央情报局服务的人现在可能会受到罪恶的迫害而义愤填膺，对科尔比不采取措施阻止调查而深感不满。

就在国会调查人员仔细审阅档案时，中央情报局正处于它历史上又一次最活跃的时期，当然这种活跃也许是注定要倒霉的。在越南南方最后落入越南北方手中后，隐蔽行动转入伊拉克和安哥拉。当时伊拉克对伊朗构成了威胁。为了破坏伊拉克的稳定，美国和伊朗联合支持正在企图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的库尔德部落，中央情报局给库尔德人提供了许多缴获来的苏联武器，价值约1600万美元，伊朗给他们的援助更多。1975年伊朗和伊拉克达成了谅解，伊朗国王不仅停止了对库尔德人的援助，而且当伊拉克对库尔德人的据点

发动全面进攻时，封锁了中央情报局为他们提供武器的自由通道。极度痛苦的库尔德人要求美国干预的恳求遭到冷遇。有一位国会议员对放弃支持库尔德人大为不满，据说基辛格在与他谈话时这样回答："隐蔽行动不该与慈善工作混为一谈。"

1973年尼克松与基辛格一面从越南南方撤走最后一批美国部队，一面又答应保证西贡伪政权的生存。答应与不答应都一样，中央情报局已经预料到越南北方将在1976年接管整个南方。事实并没有等那么久。美军完全撤离18个月后，越南北方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越南南方很快就崩溃了。

在大举进攻面前，中央情报局驻越南许多地方的官员吓破了胆，他们抛弃了越南特工和秘密档案。在西贡，美国公使格雷厄姆·马丁和情报站站长托马斯·波尔加拒绝迅速撤退人员，理由是这样做会引起大溃退。在对形势不明的情况下，他们处心积虑地酝酿最后一次政变，指望建立一个河内能够接受的维希式政权。在最后仓皇撤退时，直升飞机从美国大使馆的屋顶上起飞，许多与中央情报局共同工作过的越南人以及危及他们安全的重要文件全都没有带走。中央情报局1人被捕，在受审时向敌方提供了重要情报。在越南工作的中央情报局分析家弗兰克·斯纳普在溃退时愤怒地辞了职，并且公开谴责中央情报局抛弃了3万多老朋友。

1975年下半年开始的安哥拉冒险"特写行动"同样是灾难性的。那时葡萄牙突然允许非洲殖民地安哥拉独立，但是由于部落与种族之间的政治分歧，安哥拉爆发了内战。如果它不成为冷战的战场，那么它的独立也许不会引起外界的注意。但是基辛格害怕由苏联和古巴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掌握政权，便命令中央情报局发动了支援反对派的隐蔽行动。于是反对派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

盟得到大量经费和武器。40委员会担心会出现另一个越南，竭力阻止中央情报局向安哥拉派遣美国顾问。但是安哥拉特工组组长约翰·斯托克韦尔坦率地说："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派了。"

在审查休斯一瑞安修正案的过程中，国会批评家们对"特写行动"略有所闻。他们对中央情报局在安哥拉行动中勾结南非种族分裂主义政府非常气愤，认为这样做不仅破坏了美国在非洲的政策，而且会导致产生一个新的越南。最后当中央情报局参与安哥拉内战的消息见诸报端时，衣阿华州民主党参议员迪克·克拉克企图用立法手段切断美国对安哥拉派系的秘密支援。虽然福特总统谴责国会"胆小怕事"，可是1976年初国会第一次投票制止了中央情报局的一项隐蔽行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15000名古巴军队的帮助下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中央情报局在"詹尼弗工程"中表现出色。这是一次海上行动，要从太平洋 16000 码深处打捞起一艘沉没的苏联潜艇。海军希望得到该潜艇上的导弹、密码本和作战设备，根据海军的要求，中央情报局与它的老搭档、已隐退的亿万工业巨头豪伍德·休斯合作建造了一艘打捞船，取名"格洛玛探险家"号。

1974年夏，"探险家"号伪装成一艘深海采矿船找到了那只潜艇，并开始打捞。然而船体断裂，一半掉回海底。翌年，"探险家"号重返原处将另一半也打捞起来。结果没有发现海军所要的导弹和密码本，但是获得大量其它情报。这次行动带有高技术科学幻想的味道，使中央情报局暗淡的形象重放了光彩。可是有些观察家认为这次行动类似柏林隧道行动，对是否值得花 3.5 亿美元的巨资表示怀疑。

"情报年"临近尾声时，对隐蔽行动的无情揭露产生了强烈反响。两党议员不再热衷于制约中央情报局，而是回到互相争吵的老路上去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油价给西方国家经济的打击和国际恐怖主义日益严重的威胁使人们担心，在急需情报的时候，如果继续揭露情报机构的活动，势必给国家带来危害。中央情报局雅典站站长理查德·韦尔奇被害事件最能改变公众对这次调查的看法。韦尔奇的真实身份是由反中央情报局的地下杂志《反间谍》泄露的。中央情报局利用韦尔奇被害一事打击对该局挑剔的人。科尔比将韦尔奇的死归咎于"对中央情报局所进行的骇人听闻、歇斯底里的调查"，他的谴责使丘奇委员会陷入混乱，并从此一蹶不振。

各种调查获得的数千页材料归结起来只有两个字，即"监督"。如果有一只凶猛的无羁绊的大象，那不仅仅是中央情报局，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方法也是如此。政府执行机构不总是按法办事；总统过多使用隐蔽行动；谁也不尊重宪法，谁也不注意政府处理问题时的保密规定。产生这一切的部分原因是国会对情报机构也许包括总统和整个行政机关缺乏必要的监督。

丘奇委员会甚至想"彻底禁止一切形式的隐蔽行动"，但是这些良好的愿望却忽视了世界充满危险这一事实。该委员会的结论是，秘密干涉其它国家事务的能力应该保持，但只能"对国家安全至关紧要"的情况下才能使用。为了加强国会对情报界的控制，并使监督不致造成泄密，调查人员请求取消休斯一瑞安修正案中提出的设立队伍庞大的各种监督机构，提出只在国会两院各设一个永久性委员会。

福特总统改革的速度比国会快。1976年2月18日，他颁布了11905号行政令，基本内容是洛克菲勒委员会的建议和

威廉·科尔比的修改意见合并而成，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提高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在情报界以及在白宫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局长兼任国外情报3人委员会主席①，该委员会直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工作，由于总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也就是向总统本人报告工作。原来负责监督隐蔽行动的40委员会被由部长级官员组成的5人委员会顾问组代替。为了加强对情报活动的外部监督，福特建立了一个情报监督委员会，由3位著名的非官方人士组成，他们都是国外情报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自冷战以来一直充当总统的顾问。然而批评家认为这些改革只不过是装饰门面而已，五角大楼仍然控制着至少一半情报预算。归根到底，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真正权力在于可以直接接触任命他的总统。

对于这一点，谁都不及科尔比体会更深。尽管他带领中央情报局度过了它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在大规模调查彻底结束后，福特免去了他的职务。总统为了清除中央情报局在政治上的恶劣影响，亲自选择了驻中国大使乔治·布什作为科尔比的接班人。对布什的任命标志着总统高级情报顾问应该脱离政治这一传统观念的改变。布什作为前得克萨斯州议员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丝毫不隐瞒自己有当总统的抱负。

选择布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可以信赖，不会出意外，他忠于中央情报局及其担负的使命，局里的老手们都喜欢他。布什改善同国会的关系，想方设法提高兰利总部人员的信心和士气，避免重提不愉快的往事。后来他热情地说："这是华

①该委员会另两名成员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和新任命的主管情报工作的国防部副部长。

盛顿最好的差使。"然而他任职仅仅10个月，因为吉米·卡特在1976年大选中险胜了福特。尽管布什表示愿意继续留在兰利，但新总统很不信任政府知情人，特别是中央情报局。政府换届，中央情报局的班子也随之更换，这还是第一次。

卡特把政治上缺乏经验打扮成优点，竭力宣传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道德观，因此在竞选中挫败了福特，也打击了华盛顿政府。卡特曾经是海军军官、成功的商业家和佐治亚州州长。他比战后历届总统都缺乏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但他极力主张国际道德标准。在竞选中，他抨击了他称作的3大国耻——"水门事件、越南事件和中央情报局事件"——并且质问了秘密干涉其它国家事务的政策。卡特代表了美国在印度支那惨败后流行一时的新孤立主义，与其前任不同的是，他不相信苏联的基本意图是敌对的，他甚至说："人权是我们外交政策的灵魂。"

新总统对中央情报局的不信任得到曾是丘奇委员会成员的副总统、前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的支持。卡特提名由西奥多·索伦森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这在职业情报人员中引起了更大的不安。索伦森是约翰·肯尼迪最喜爱的演说撰稿人，国会保守派认为他太无约束，并通过中央情报局帮忙后得知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拒服兵役。索伦森不愿他的任职引起一场激战，主动要求撤销对他的提名。紧接着卡特选择了一位海军学院的老同学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海军上将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非常勉强地接受了。特纳曾是领取牛津大学罗兹奖学金的学者，是出类拔萃的海军军官，他希望成为海军作战部部长或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因此他认为担任局长不是一条死路也是一条弯路。

像总统一样，特纳很不信任情报人员和他们的行动，据说卡特要求他“搞清楚这些人究竟在搞什么名堂”。所以情报局内一些人感到特纳一上任就非常厉害。虽然他没有情报工作经验，但他认为情报工作只不过是评估资料，用他的话说是“数豆子”。他在海军工作时曾受过困难的磨练，他相信自己同样能把中央情报局领导好。

特纳刚刚上任进入第七层楼的办公室就遇到了麻烦。当他向资历较深的官员了解情况时，他发现他们的工作“杂乱无章，毫无重点”，呈送给他的报告“冗长琐碎，毫无用处”。特纳对中央情报局各部门间互不通气甚感吃惊，认为这种保密办法不仅不合理，而且会掩盖大量不可告人的活动。

中央情报局前合同雇员埃德温·威尔逊的丑闻证实了特纳的怀疑。威尔逊向利比亚圣人卡扎菲上校提供了进行恐怖活动的武器，并阴谋杀害两名美国检察官和数名证人，为此他被判监禁52年。中央情报局数名高级官员也因受牵连而被解雇或被迫辞职。特纳随即修订了限制中央情报局退休人员活动的准则，然而这一事件肯定了许多美国人的看法——情报工作是一种卑鄙的职业。

与此同时，不少人指责中央情报局对苏联实力和意图的估计过于乐观。强硬派声称，由于情报分析家们遵循尼克松、基辛格、福特的缓和政策，没有充分看到俄国人在谋求获得第一次打击的能力，而且并不想与美国人保持核均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乔治·布什曾命令成立A、B两组分析队伍，要求他们各自拿出对俄国实力与意图的评估。A组由中央情报局苏联问题专家组成；B组由保守的对外防务分析家组成。不出所料，B组的结论是中央情报局确实低估了俄国人的实力。A组估计到B组会持这种立场，修改了它原来的调

查内容，作出较为"悲观"的结论。但是中央情报局分析家们对此持不同看法，他们攻击布什不加质疑就贸然接受了B组的评估。

作为外来人，特纳上将的主要问题是控制中央情报局。"当第一个年度预算要我批准时，一切都已定好了，"他后来写道。"三大部门（隐蔽行动、情报分析和后勤保障）都期望我批准他们想要的东西。"他指出这些部门都像独立王国小心保卫着自己的地盘，防止外人进入。副局长弗兰克·卡卢奇把中央情报局局长办公室比作发电厂的控制室，所有电闸都切断了。

特纳认为中央情报局有其积极的一面，即通过卫星和电子技术收集了许多精确详细的技术情报。由于他在海军工作过，他也认为电子和信号情报优于人力情报。似乎只有技术才能改变中央情报局的形象，也只有重视技术情报才能适应卡特超脱的外交政策，从而使美国安全有保障。

然而，当总统要求看第三世界发生的一场小型战争的高空照片时，有关部门竟然拖了几个星期。特纳一气之下委派秘密行动司雇用一架飞机飞越该战场拍摄照片，不料飞机坠毁在一片甘薯地里，还为此赔偿了200万美元。特纳抱怨道，虽然他名义上是世界上最好的情报局局长，他却不能及时得到一张"米老鼠式战争"的照片。

特纳与其它情报机构也产生了不愉快的事。名义上他是整个情报系统的领导，但他却卷入同国防部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内部争斗之中。国家安全局拒绝接受中央情报局有关苏联海军的情报，认为那些只是"战术"情报而不是"国家"情报。国防部情报局的官员在五角大楼催促下提出支持增加国防开支的报告。这场激烈的竞争也扩大到白宫，白宫官员

要求中央情报局提供在政治上帮助总统的评估材料。

批评家们谴责特纳为了抬高用技术手段搜集情报的价值，在越战以后裁减情报人员，贬低人在情报工作中的作用。1977年10月裁减工作开始，重点是秘密行动司，在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上称为“万圣节大屠杀”。特纳声称真正裁减的只是极少数人，在缺编的820个空位中，主要是由提前退休和两年来正常消耗造成。但是裁减人员的方式既无情又缺乏理智，许多被解职的人只收到一张用计算机打印的只有一句话的纸条。据说有一名工作多年的雇员竟在住院治疗期间被解雇了。

特纳与他领导的情报机构心照不宣的紧张关系这时变成公开的对立。老情报人员说，这位上将解雇了820人，而有的报纸却说3000人。据说中央情报局的隐蔽行动能力随着大批经验丰富的官员被解雇或退休而大大削弱。而特纳争辩说大裁减的真正原因是他决定向行动司传统的独立性挑战。他说：“假若我能尽快压缩这个间谍机构的规模，我就可以监督它所干的一切。这里存在着权力和地盘之争。”

特纳说他希望保留中央情报局进行隐蔽活动的能力，但要把这种能力用于确实重要的行动。然而在后来3年里，情报工作的重点作了根本的调整。欧洲的主要情报机构和以色列的穆萨德规定约百分之八十五的预算用于间谍情报，百分之十五用于技术情报，而美国的比例却倒过来了。批评家认为这种分配是不合理的。间谍卫星或者遥控装置也许比任何间谍网络能提供更多有关俄国军队部署的情报，但是它们无法知道苏联的导弹实验室里正在干什么。“技术情报往往得不到你真正想了解的情报，”前中央情报局官员乔治·卡弗说。“而间谍能给你搞到战争计划、文件、新式武器系统设计图等，还可探测政治形势的变化趋向。”

此外，专家们认为，靠技术手段收集的情报常常是对手们允许公开透露的信息，并且对这些信息保密化钱太多，也不值得这样做。人们还指出，美国情报工作过分依赖为数不多的卫星，一旦战争爆发，这些易受攻击的卫星将成为苏联导弹首先攻击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日益突出的恐怖主义和国际贩毒活动迫使情报机构注意那些只有依靠特工人员才能解决的问题。

正当卡特总统贬低在第三世界进行隐蔽行动的时候，苏联人却在向那个地区增强军事和政治渗透。古巴军队被苏联用来扩大它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南也门的影响。越南成了苏联的正式盟国，俄国人不仅能使用美国在金兰湾建立的海军基地，而且也获得反对中国的一个盟友。苏联军队进驻阿富汗，扶植摇摇欲坠的亲共政权。伊朗陷入了一片混乱。国家安全局错误地认为古巴驻有苏联的一个战斗旅，直接阻碍了参议院批准签订第二次战略武器会谈的军备控制协定。随着这些动乱的增加，深感震惊的总统给特纳写了一封信，复制两份分别送给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和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他说："我对政治情报的质量很不满意。"这句含蓄的话意味深长。

1977年除夕，卡特入主白宫快1年时，作为贵宾出席了巴列维国王在德黑兰举行的盛大宴会。总统举杯祝酒时慷慨激昂地说："由于国王的英明领导，伊朗在世界多事地区仍是个安全岛。"然而就在那天上午，在这个安全岛上爆发了大规模反国王示威游行，谁也没有向总统提及此事。同样，情报界也缺乏预见。不到1年后，罢工和示威实际上使伊朗陷入了瘫痪状态，而中央情报局在对伊朗形势作了彻底分析后公布的

一份国家情报评估中指出，伊朗“不会爆发革命，甚至也不处于革命的前夕。”同时，国防部情报局预言伊朗国王至少可以继续执政10年。

自从1953年中央情报局把国王重新扶上孔雀宝座(王位)以来，伊朗成为美国在盛产石油的波斯湾地区的桥头堡。尼克松和基辛格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在那里的影响，国王可以源源不断得到美国武器装备，以便让国王遏制俄国人，并充当调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喉舌，尽管事实上他却促使石油价格猛涨。反国王和反美情绪日益加剧，无数伊朗人反对国王使社会现代化的计划，因为伊斯兰毛拉们认为这些计划违背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规和传统。其他人则对普遍的腐败现象和残酷的专制深恶痛绝。中央情报局没有预料到不满情绪如此根深蒂固，一位观察家说它的情报是“廉价货色”。

后来国会调查人员指出，情报工作失败的基本原因是中央情报局在伊朗扮演了双重角色，既要支持伊朗政府，又要客观估计形势，结果两个目的都受到损害。一方面“中央情报局一贯认为自己是国王的支持者”;而另一方面,“它又想对伊朗的政治形势提出可靠的情报分析”。1973年该局伊朗问题主要分析家写了一份报告，警告说，国王的政策正在“到处播下不满的种子”。但是这一结论性看法在最后定稿时被删掉了,因为他的上司说这样的结论不能反映美国对伊朗的政策。美国外交官和特工人员由于没有接触宗教反对派而不能领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煽动力。他们的大部分情报来自国王、他所控制的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以及对动乱视而不见的石油公司。但是一个好的情报机构的标志就在于它有克服这些困难的办法。

无疑，伊朗危机中最大的情报失误是中央情报局没有发

现国王得了无法医治的癌症，而且正在服用法国医生提供的大量药品。国王优柔寡断，拒绝命令军队和秘密警察采取强硬措施镇压叛乱分子，担心大屠杀会使他的儿子不能继承王位。包括卡特总统在内的大多数美国人盲目以为国王是至高无上的君主，拒不相信国王会被忠于流亡在巴黎的宗教狂霍梅尼的民众所推翻。

在伊朗局势危急之时，美国外交政策机构面临着繁杂的任务。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处于最后阶段，美中关系正常化加快了进程，戴维营会谈使解决埃以冲突取得令人注目的突破，所有这一切都比解决伊朗危机更为重要。直到1978年10月华盛顿决策者的注意力才完全转到伊朗问题上来。这时伊朗局势已经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国家安全委员会伊朗问题专家加里·西克说："目前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缺少有关伊朗形势发展的过硬情报，这是情报工作的最大灾难。我们的情报一直很少，我们的情报不能提供确切的报告。"

特纳承认存在这个问题，但辩解说，他不能满足对情报的需求是因为美国在伊朗的情报能力已经削弱。卡特总统致函外交政策顾问抱怨政治情报质量差，在此11天后，中央情报局发了一份文件试图说明国王没有采取重大行动的原因。文件认为国王犹豫不决说明他"正在继续妥善处理他的政权所面临的危机"。西克认为这"纯粹是冒充正确判断的官样文章"。决策者们开始寻找其它情报来源——这些来源往往不准确，各有各的打算——而且不愿让别人共同使用，这样，给政府内部增加了不信任的气氛。

伊朗危机反映了卡特外交政策顾问之间的冲突。万斯主张调和政策，而出生于波兰的布热津斯基则赞成强硬的对抗路线。一部分人希望废黜国王，建立一个安定、自由的伊朗；

另一部分人主张建立一个能镇压革命的军政府。面临两派各执一词，卡特政府无所适从。

与25年前不同的是，现在没有像克米特·罗斯福这样的人去德黑兰拯救国王的王位。由于军队士气低落，又失去其它支持，国王只得于1979年1月16日逃离伊朗，一去不复返。在去机场途中，他若有所思地回忆起1953年出国时，人民涌向街头要求他一定再回来。而这一次，人们为他的离开而欢呼："国王滚蛋了！现在该轮到美国人滚蛋了！"

政治领袖们总认为凡事都可以预测和推理，但在对付伊朗危机中，卡特没有考虑到西方行动模式在此并不适合。他同前辈们一样，通过冷战这面棱镜来看待国际事务，并在既谴责美国又谴责苏联的原教旨主义宗教革命面前失去了控制力。特别是他未能认识到，极左派、政治稳健派和伊斯兰毛拉们这些互不相容的力量之所以能凝聚在一起是因为他们既仇恨国王，又反对美国。由于基辛格和洛克菲勒集团施加压力，美国决定让病入膏肓的前伊朗统治者于1979年10月到美国接受治疗，使反对国王和反对美国的两种情绪拧成了一股绳。

1979年2月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占领了1天，此事本应是一个警告，但是事件发生后，美国没有及时适当减少外交人员，相反，卡特却认为伊朗已恢复"正常"，并且增加了外交人员。有人像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那样，极力把霍梅尼描绘成"一个圣人"。这一切对伊朗的狂热者们很有利，随着动乱的加剧和思想狂热的冷却，狂热者们寻找废黜温和的临时政府、加快革命进程的方法。由于华盛顿不听劝告，允许国王到美国临时避难，为爆炸点燃了导火索。1979年11月4日，勇敢的"学生"占领了大使馆，扣留了近100名人质。妇女和黑人很快就被释放了，落在伊朗人手中的53人，其中3

名是中央情报局官员。

在人质被扣留的444天中，中央情报局几乎没有人在德黑兰“留守”。自从国王被驱逐出境后，他的特工网络也遭到了严重破坏。由于没有情报来源，美国连人质被藏在哪里都搞不清。激进运动的斗士们在他们称作“间谍窝”的档案中发现了大批秘密文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使馆被占领1天的事件结束后，馆内的机密文件既没有销毁也没有转移，无数文件仍存放原处。威廉·科尔比指出：“基本规定之一是在碰到麻烦以前烧毁该死的材料。”有关人士说，自西贡狼狈撤离以来，秘密材料的散失是最大的损失。中央情报局伊朗站站长托马斯·埃亨销毁了他的大部分档案。但是武官处的大量档案文件被缴获，其中有易被识破的国防部情报局安插在伊朗的情报源名单，以及美国情报搜集的主要目标。为了煽动反美情绪，激进运动的斗士们发表了将近60份据称在使馆里发现的文件，包括原文影印件以及破损后复原的秘密文件。

美国收留国王只是伊朗扣留人质的借口，国王的死并没有使他们获释，激进分子还有傲慢的美国人意想之外的更庞大的计划。只要人质在他们手中，清洗的烈火即所谓“革命中的革命”将继续燃烧。美国人已没有力量控制事态发展，如果聪明一些，应尽快脱身。然而卡特总统并不因为伊朗危机已使他筋疲力尽而罢休，反而为人质问题陷得很深，这也许因为他为遗弃人质而感到问心有愧。由于新闻界煽动性报道，人质问题成了美国人人关注的中心问题。

在处理伊朗问题中，美国被一些评论家看作是连环画《花生》中的人物查理·布朗。查理不断让淘气鬼露西为他控制足球，尽管每当查理要踢时露西总是把球抢走而使他摔了一个大筋斗。不幸的是，美国人质就是这种足球，卡特试图通

过谈判来达到释放人质的目的，但是最后伊朗人还是把这只足球抢走了。

直到1980年4月，总统才倾向采取布热津斯基的强硬政策。1979年底，苏联因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权而入侵阿富汗，这是卡特任职期间受打击最沉重的一次事件。他认为苏联是插向波斯湾的一把匕首，放弃了寻求与苏联和解的努力，摆出了加强军事准备和政治对抗的姿态。情报机构首先得到加强，过去10年里它的预算经费缩减了百分之四十，人员削减了百分之五十，虽然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这种下降趋势已得到根本的改变。中央情报局还奉命暗中支援阿富汗游击队，通过巴基斯坦向他们输送资金和武器。

在此期间，报纸和电视台每天报道人质遭受磨难的消息，伊朗危机日趋恶化。卡特担心人质危机对他1980年再次竞选总统产生不利影响，他批准了一项军事营救行动。中央情报局在这著名的“鹰爪行动”中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来自老挝的前美国航空公司专家负责后勤保障。情报局的一架飞机将以取土壤样品为由，在计划着陆地点“一号沙漠”作短暂停留。隐蔽行动司的准军事人员为海军陆战队的直升飞机安装远距离飞行设备；这些飞机将运送陆军特种部队的营救队。在营救工作开始前几个月，至少有7名特工潜入伊朗，摸清人质被关押的确切地点，并负责准备把突击队员运到使馆的卡车。

但是“鹰爪行动”结果成为一场恶梦，战斗分队尚未来得及运到能攻击德黑兰的地点，3架直升飞机因机械故障失去空运能力，因而该行动也就流产了。

这次临时凑合的行动极不光彩地收场。一架直升飞机在慌忙撤退中与一架运输机相撞，8名机组人员在大火中丧命，卡特最后的一点信誉也在坠落到一号沙漠熊熊燃烧的飞机残

骸中彻底消失。

20. 重蹈覆辙

像华盛顿许多大事一样，这次奠基仪式得到热烈祝贺。1984年5月底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罗纳德·里根总统渡过波多马克河去参加中央情报局兰利总部另一幢新大楼的奠基礼。望着集中在一起的全体情报人员，能说会道的里根称颂了他们不怕牺牲和默默奉献的精神。他说："没有你们，我们国家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就会受到威胁。你们的日常工作对人类自由地生存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里根继卡特入主白宫后亲临中央情报局总部，像总投资为两亿美元的新大楼工程一样，象征着中央情报局出现了转机。曾在战略情报局工作过的威廉·凯西大胆泼辣，敢于冒险，被里根提拔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从此该局开始了令人注目的复兴。越战以后对中央情报局大规模的调查和限制已经结束。该局的经费迅速增长，人员大量增加，并能经常向总统汇报工作，在贯彻美国外交政策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切顺利，越来越顺利，"威廉·科尔比作为旁观者作出这样的评论。

但是这些变化是用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凯西没有向总统提供有关世界问题的冷静而又内行的情报评估，而且将中央情报局推向无限制的隐蔽战争，重温战略情报局的光荣岁月，这使人们再次担心中央情报局会成为"凶猛而离群的大象"。这些活动终将损害里根总统的形象。

然而凯西有一定的洞察力。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1982

年11月去世前几个月，凯西就对苏联未来的接班人作了正确的预测。他对里根总统说："契尔年科晋升不久，基里连科身体欠佳，格里申是实力难测的竞争者，不过如要我打赌，我认为安德罗波夫将会取胜，而戈尔巴乔夫会后来居上。"凯西准确预见到克格勃的头子安德罗波夫会上台成为中央情报局的传奇故事。但是执政1年多的安德罗波夫逝世时，华盛顿《邮报》记者达斯科·多德尔抢在中央情报局之前发表了这条消息。

情报工作中的一条规律是对挫折和错误大加宣扬，对成功和胜利严加保密。美国情报机构在凯西领导期间经历了许多不容争辩的失败。

• 据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早在1983年就得知一个与伊朗有联系、并受叙利亚保护的什叶派穆斯林组织——自称是上帝特遣队——计划攻击里根派往贝鲁特执行维持和平任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但是它没有提出该组织爆炸车辆的确切情报，致使241名陆战队员丧生。

• 中央情报局甚至无力保护自己不受恐怖分子的袭击。1983年初美国使馆遭到轰炸，几乎摧毁了整个驻贝鲁特情报站。而中央情报局未能打进劫持美国人质的伊斯兰组织；人质中还包括在中东的情报人员。

• 中央情报局组织了反恐怖部队，对可疑的恐怖主义分子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可是却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恶果。一个反恐怖小组在贝鲁特上帝特遣队领导人住处外面的汽车里放了一颗炸弹，致使80多

人死亡，200人受伤，而该领导人却安然无恙。

· 中央情报局拙劣地处理苏联反叛者，特别是克格勃的高级官员维塔利·尤琴科。当此人重返莫斯科时，他对处理他的外行方法大大奚落了一番。

· 在尼加拉瓜所谓的秘密战争中，中央情报局到处留下罪证。

· 尽管间谍卫星在苏联上空飞行，在切尔诺贝里核爆炸事故发生的头3天，中央情报局竟丝毫没有觉察。

· 中央情报局没能发现沙特阿拉伯已经购买了能够携带核弹头的远程导弹这一中东不稳定的因素。

· 由于贪婪、背叛和欺骗，大量机密流向外国，其中一些出自中央情报局内部人员。

由于凯西与总统关系密切，尽管出现了上述失误，他仍然保住了乌纱帽。里根进入白宫前曾是和蔼可亲的电影明星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对外交事务了解甚少。但对于苏联问题，他无需别人指点。里根把苏联看成是“现代世界的罪恶中心”。他以“挺起腰杆”，加强实力，提高威望的诺言击败卡特后，他对俄国人态度强硬，绝不答应同恐怖主义分子谈判，促进军备竞赛升级，采取了坚定的反共立场，尤其在第三世界。

像20年前的肯尼迪一样，里根总统把第三世界看作是可以击败共产主义的战场。在里根主义的指导下，华盛顿对各地“自由战士”都给以热情支持；这些“自由战士”唯一的共同点是反对苏联支持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在尼加拉瓜、安哥拉、阿富汗和世界上其它热点地区把理论付诸实践的任务落到了比尔·凯西和恢复元气的中央情报局身上。短

短几年中，至少开展了50次“特别行动”。隐蔽行动不再是外交政策的陪衬，而是外交政策的主体。

一位观察家在凯西任职的鼎盛时期指出：“你们必须知道凯西是在73岁高龄时才享有黄金时代的。”里根的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皱纹满面、躬腰驼背、步履蹒跚，看上去像个回家途中疲惫不堪的商人而不像间谍老手。他的外表完全像“莽汉”比尔·杜诺万。但他却缺乏名牌大学毕业生的绅士气质，不像曾为战略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确定基本目标的杜诺万。他早年丧父，小时流落街头，靠勤工俭学读完了福德姆和圣约翰大学法学院课程。珍珠港事件后，他加入了美国海军，后来调到战略情报局。他得到杜诺万的青睐，在战争结束时曾领导过空降到德国去的“杰德”小组。他最珍贵的一件物品是杜诺万将军给他的一封信，上面写道：“在形势十分艰难的时候，你像大家一样挑起了一副最沉重的担子，而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凯西不到40岁时就赚了100万美元，但他屡次陷入困境，他赚钱的手段是否正当也遭到了怀疑。多年来他一直是个情报迷，而且被福特任命为总统的外交情报顾问委员会委员。在衣阿华州提名总统候选人的秘密会议上，里根输给了乔治·布什。就在关键时刻凯西接管了里根竞选总统的班子，虽然晚了点，但是他制订的战略赢得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胜利，为里根荣登总统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尽管他想成为国务卿，但是里根却任命他担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职业情报人员对凯西任职出乎意料之外；他们认为国家安全局德高望重的博比·英曼海军上将应该担任局长，可是他却被任命为凯西的副手。评论家们指出这位新局长的知识专长已过时40年，他也许只能成为政府政策的吹鼓手。凯西

提名里根竞选班子的马克斯·休格尔担任敏感的行动司司长而遭到猛烈抨击，两名工作人员对休格尔过去的生意买卖提出了质疑之后扬长而去、弃职不干了。这一事件也许是中央情报局内部人员故意安排的。但是凯西得到原战略情报局老朋友们的支持，并且有里根总统撑腰，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只好勉强说他“不是不适合担任此职”。

在凯西领导下，整个情报系统的预算每年以百分之二十五的比例上升，甚至超过了五角大楼的预算增长速度。在1987财政年度估计达到了240亿美元，其中中央情报局的经费可能达到30亿美元。在兰利由里根亲自破土建造的七层大楼比原来的中央情报局总部大楼扩大了一倍，可容纳人数迅速增加到约16000名雇员。如果接近总统机会的多少是衡量情报局长工作成效的主要标准的话，那么凯西甚至超过了艾伦·杜勒斯，因为他是第一位能同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一起经常出席内阁会议的中央情报局局长。里根非常乐意听凯西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在战略情报局工作时的功绩，而且一听就是好几小时。雷·克莱因评论道：“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知道自己的材料呈送到了最高领导人那里，他们的士气更高涨了。”

甚至批评家也认为凯西在改进情报评估工作中很有魄力。他任命自己最喜欢的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盖茨为情报司副司长，放手让盖茨改革情报收集工作。技术情报和人力情报的比例作了调整，国家情报评估和其它分析材料的数量和质量得到提高。国家情报评估材料从1980年的12份增加到1985年的60多份。根据以往分成A、B两个小组进行情报分析的经验，这时更加强调在情报工作中开展竞争，并在日常评估材料中写进不同意见。凯西还首次对苏联科学发展作出预测，并把工作范围扩大到研究诸如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

等领域。考虑到总统的时间有限，凯西送去的情报都很简洁明了，扼要介绍各种珍闻要事。

然而局内人员仍抱怨凯西强迫分析家们对情报成果任意剪裁加工，以适合具体政策或政治立场的需要。一位情报官员说："凯西从白宫回到这里来寻找能支持他的立场的材料，他不要求我们对某件事情或情况作出评论，而是想得到他能用来为有分歧的政策作辩护或能扩大情报局职能的材料。"负责拉丁美洲方面的情报官约翰·霍顿，在凯西拒绝接受他对墨西哥形势的分析材料后，于1984年愤怒辞职。霍顿声称："凯西希望对墨西哥稳定形势作出惊人分析以便使美国在中美洲的行动合理化。"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后来说，甚至在伊朗门事件之前，他已经"对中央情报局提供给他的一些材料是否客观和可靠产生了很大怀疑"。

令人费解的是，凯西的最大弱点表现在政治方面。立法机关的监督增加了局长的责任，使他成为总统决策是否能获得国会支持的关键人物。立法机关的监督本来并不复杂，但性情暴躁的凯西坚决反对对他领导的秘密工作实行监督，经常与国会发生冲突，使人们常常谴责他隐瞒情报。他对同事们说："不要汇报，要少透露情况。"当受到询问时，他要么干脆说不了解情况，要么含糊其词搪塞一番。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诺曼·米纳塔评论说："即使你衣服着了火，如果你不直接问他，他决不会告诉你。"

正当凯西重整中央情报局的时候，苏联采取有力措施获取美国的技术成果。在冷战时期，克格勃主要搜集常规军事秘密。这时它的目标是工业、科技，尤其是卫星、计算机和密码破译等领域的情报。1983年调查人员断定，西方技术已被

苏联应用于至少 150 种主要武器系统，这一事实可以作为克格勃行动成功的佐证。实际上，利用窃得的技术，苏联已经能够仿制西方国家的导弹和飞机。苏制潜艇发射 SS—N21 导弹与美制托马霍克巡航导弹非常相似。另外，西方穿甲技术也被用来对付北约自己的坦克部队。

苏联工业间谍活动的目标是由其军事工业委员会确定的，该委员会制订所有需要搜集的西方技术计划。到 80 年代中期，每年列入计划内的总数已超过 3500 项，苏联情报机构获取的项目超过计划的三分之一。据美国两位前情报官员说，苏联开展了多层次的技术间谍活动。美国出版的所有科技资料，包括博士和博士后论文，均在收集之列，其它能够得到的技术情报，通过购买或者征得许可来获取。通过合法手段无法达到目的时，苏联及其华约盟友则通过走私或者利用假公司来窃取。此外，他们还利用金钱和美色来获取国家安全方面的秘密情报。

近年来，苏联集团在西方的间谍人数增加了一倍多。仅在美国，这类间谍在 50 年代只有几十人，而今天已增到千人以上，苏联集团驻西方的使馆以及新闻机构中，可能每三四人中即有一名克格勃或类似克格勃的特务。据信，苏联及东欧集团在驻美使馆、联合国使团和联合国雇员中，安插了多达 1300 名这样的特务。除了这些合法间谍外，还有许多数目不详、隐蔽很深的“非法”间谍在活动。

苏联对新技术渴求已使旧金山南面的硅谷成为与维也纳同样臭名昭著的间谍活动中心。据说聪明年轻的克格勃间谍混入移居美国的苏联移民，在大学获取学位后打入与国防有关的部门。苏联间谍还企图买下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银行，以便了解哪些高科技人员经济困难，有出卖高技术的端倪。

除了苏联和东欧集团的间谍外，日本、法国、以色列、南朝鲜的特工也出没于硅谷和类似地区搜集秘密资料。由于五角大楼所雇人员缺乏保密观念，他们很易达到目的。当了解到洛克希德公司无法解释有关斯坦尔斯轰炸机的1千多份绝密资料的下落时，该公司董事长尴尬地说："我们内部放松警惕是不可原谅的。"

与罗森堡夫妇，克劳斯·富克斯，金·费尔比等冷战时期的间谍不同的是，在80年代，背叛者完全出于经济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追随苏联的意识形态。水门事件和越战失败之后，旧时的道德和忠诚观念被抛弃，加上秘密资料和接触这些资料的人数日益增多，这一切是造成间谍爆炸的主要原因。卡特政府决定对间谍依法起诉，而不再悄悄利用未决犯作为双面间谍，也是造成公布间谍案的一个因素。当今的间谍与约翰·卡莱小说中杜撰的叛逆者大相径庭，他们大部分来自中下层，基本不受监视，对自己的工作极不满意，薪金微薄，经济拮据。对他们来说，充当间谍是发财的捷径。中央情报局也难免不出现背叛者，但是最令人吃惊的重要秘密泄漏却来自其它部门。

"间谍年"始于1985年5月，当时联邦调查局反情报人员正监视着一辆挂着弗吉尼亚州牌照在华盛顿郊外僻静的道路上行驶的运货车。它在路边停了好几次。驾车者不断查看地图，似乎在寻找一个路标。最后，他在一段杳无人迹的路上停下来，走到一根挂着"不准狩猎"牌子的电话线杆后面，在那里放了一只纸袋，还在上面堆了几只空瓶和其它废物后，便驾车离开了。纸袋中装有129份美国海军的秘密文件。特工人员埋伏在近处，等候来取文件的人。他们发现苏联使馆的副领事阿列克塞·塔克琴科开着车在那里乱转，也许他发现

情况不正常，所以没有接近“目标”。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没有当场逮捕这位苏联官员，而是取走纸袋并于当晚在附近的一家旅馆拘留了开货车的人。

这位货车驾驶者名叫小约翰·沃克，是擅长通讯联络的美国海军退役准尉。他的被捕爆出了美国海军历史上最大的间谍丑闻。经进一步调查发现，沃克领导着一个范围不小的间谍网，其中包括他的兄弟阿瑟·沃克，一位退役中校，反潜艇战专家；他的儿子迈克尔，尼米兹航空母舰上的一名水手，以及他的一个朋友杰里·惠特沃思，一位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退役无线电高级技师。沃克还曾劝说担任海军通讯官的女儿向他提供秘密情报，但是被她拒绝了。沃克被捕的第四天，塔克琴科及其家属旋即匆忙回国了。

沃克家庭间谍网对国家安全带来的危害有多大，也许永远难以作出确切的估计。在18年中，沃克向莫斯科提供了大量有关美国海军通讯以及其它方面的确凿资料。虽然他得到75万美元报酬，但他生活奢侈，生意萧条，这笔钱很快就被挥霍一空。在海军服役时，沃克曾有机会接触绝密资料，而且几次担任过敏感性工作。在惠特沃思配合下，他能够向苏联提供跟踪美国潜艇和对付反潜行动所需要的一切资料。在审讯中，当问到他的活动范围时，沃克说：“凡我能搞到的机密，全部提供。”由于三叉戟式、北极星式导弹潜艇被视为美国最可靠的核威慑武器，沃克的背叛引起了极大的不安，因为这些战略武器不同于过时的B—52轰炸机和陆基核导弹，人们认为它们是苏联无法攻破的武器。

与此同时，沃克在国际系统工作的兄弟阿瑟向他提供了关于美国舰艇设备损坏频率的报告，他的儿子迈克尔主要提供了关于美国海军跟踪苏联潜艇能力的情报。国家安全事务

专家詹姆斯·班福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些转送给俄国人的情报资料的价值："对于苏联来说，沃克间谍网犹如一个更清澈的海洋，可以看清美国水下力量，同时又犹如一个更加混浊的海洋，可以隐蔽它们自己的力量。"

此案最令人吃惊的是，假若不发生家庭纠纷，沃克间谍网必将继续活动下去。沃克的妻子巴巴拉自1968年起就知道他参与了间谍活动，可她到1984年底才向联邦调查局告发，4个月后此事才引起重视，整个家庭间谍网被破获。据当时海军作战部部长詹姆斯·沃特金斯将军估计，该间谍网约造成1亿美元的损失。然而，令人最焦虑的问题是利用间谍活动渔利的还有哪些人。

不久答案就找到了。从1984到1986年间，共有27名美国公民被控参与间谍活动，其中之一是前国家安全局中级雇员罗纳德·佩尔顿。在破获沃克案之后几个月，他就被控向苏联出卖过秘密情报而锒铛入狱。他以35000美元的廉价向苏联出卖了美国海军最重要的通讯和监视系统的核心资料，造成近年来美国情报系统的最大损失。佩尔顿于1979年因公司破产而辞去年薪为24500美元的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很快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他抛弃妻子，与一位年长的前赛美王后同居，开始酗酒，并换了好几个工作。6个月后，即1930年1月，他与苏联驻美使馆挂钩出卖情报。

佩尔顿凭记忆向克格勃提供了他曾帮助整理由几个情报机构用于跟踪情报搜集活动的60页报告。另外，从对他审讯时获取的证词中可以看出，他了解情报机构正在进行的一切活动。政府破例地披露，佩尔顿出卖了国家安全局用于对付苏联57种主要通讯系统的多种高级窃听手段，其中包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军基地附近的鄂霍次克海域进行的潜艇情报

搜集绝密计划。国家安全局一位官员证明，被佩尔顿出卖的这些隐蔽行动"曾使我们清楚地掌握了苏联军事力量的规模以及他们的行动和训练计划。"

佩尔顿是被维塔里·尤琴科出卖的，尤琴科是一位克格勃上校，8月份在罗马投靠西方。审问时，尤琴科供出有两人打入美国情报系统。一个是他在华盛顿工作时认识的佩尔顿，苏联人叫他"朗先生"；另一个叫"罗伯特"。尤琴科从未见过他，无法讲出他的外貌特征，但提供了确认罗伯特的线索。他说，罗伯特1984年在奥地利向克格勃出卖了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当时他正在受训，将派他去驻莫斯科情报站任职。

中央情报局大吃一惊，如果尤琴科所供属实，说明在非常敏感的苏联处隐蔽着间谍。事实上已有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莫斯科出了问题，至少有一项重要行动遭到破坏，美国获取苏联技术资料的重要来源国防研究员阿道夫·托尔卡契夫被逮捕了。

根据尤琴科提供的情况调查，中央情报局最后认定问题出在爱德华·霍华德身上。他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1983年被解雇。在中央情报局两年期间，他同妻子玛丽曾一起接受专门训练，准备去莫斯科处理中央情报局窃取的部分情报。但是经过常规检测后，发现他有酗酒和吸毒的前科，因此被解雇了。尽管中央情报局帮他在家乡新墨西哥找了一份工作，并支付了他治疗精神病的费用，他还是对中央情报局怀恨在心。有一次他在苏联驻华盛顿使馆外徘徊，拿不定主意是否走进去。事后他向中央情报局官员谈及此事，遗憾的是该局未将此事通报联邦调查局，因此霍华德的外交护照未被吊销。

1984年9月霍华德夫妇赴奥地利，他终于以投靠苏联实

现了他的报复愿望。虽然他只是个受训者，但他知道莫斯科情报站的不少情况，足以破坏该站的活动。在托尔卡契夫被枪决后，据报道又有几名向美国人提供情报的苏联人被捕和处死。此外，至少有5名美国外交官被指控参与间谍活动而被驱逐出境。一位知情官员说："霍华德掌握的情报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查明霍华德是叛徒后，联邦调查局开始监视他在圣菲的家。然而当密探宣布要将他逮捕时，他却利用在中央情报局时学到的技能，通过妻子帮助，偷偷溜走了。不满1年后，即在1986年8月，霍华德在苏联露面，并得到保护。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谴责中央情报局在处理霍华德案件中犯了一个大错误。中央情报局为了迅速扩充人员竟招募了一名根本不适合做秘密工作的吸毒者，而且过早地让他接触非常敏感的材料，在他被解雇后未能继续监视他的行动，得知他有投靠苏联的企图后又没有及时通报联邦调查局。然而也有人认为霍华德并不了解托尔卡契夫的活动，因此提出也许美国情报机构中仍有一个苏联间谍在活动。

美国驻莫斯科使馆本身以漏洞多而出名。早在1940年联邦调查局就警告说，那里的男性外交官常常玩妓女，还同与苏联情报机构有联系的同性恋者鬼混，而使馆所雇用的苏联人则出入自由，无人过问。但是这些警告没有引起国务院重视，直到一名海军陆战队卫兵供认，他被克格勃的一位漂亮的女接待员引诱落水，以致允许苏联特工人员随便进出使馆最敏感的办公室，偷阅秘密文件，到处安装窃听器。此事成为美国情报史上最严重的以性换取情报的丑闻后，使馆的其他卫兵也全被拘捕。然而海军调查人员对调查工作敷衍了事，只审理了其中一个案子。

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认为他们的通讯设备遭到破坏，

只得用一般方式书写敏感材料，为此苏联人十分高兴。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与苏联官员在克里姆林宫谈判期间也只得专门进口一辆通讯车作为联络工具。正在莫斯科兴建的耗资2亿美元的美国新使馆的安全问题引起了担忧。由于预制件不在工地制作，美国监督人员没法看到，因此有可能在其中安上高级窃听器，于是在1985年停止了施工。里根总统为此建议将该建筑推倒或者另择新址重建。

苏联人也针锋相对地指责美国情报机构在苏联驻华盛顿新使馆中安装了窃听器。美国使馆的新馆址在地势较低的莫斯科河畔，而苏联使馆馆址在华盛顿的最高点艾里山上，那是苏联人安装窃听装置的理想位置。虽然情报界反对让苏联人占用那地点，但是海军上将鲍比·英曼说，直到美国解决了自己使馆的问题之后，苏联人才获准搬进新使馆。

在这些间谍对间谍的活动后面，可能还有更深层的阴谋。作为对付不利宣传的策略，在有人暗中幸灾乐祸的时候，中央情报局官员向新闻界披露了维塔里·尤琴科投靠西方的消息。尤琴科是被逮住的一条大鱼，他同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一起在兰利总部共进午餐。但是3个月后，他在乔治敦饭店吃饭时乘保镖不注意偷偷溜走，躲进了附近的苏联使馆，使中央情报局大吃一惊。在去莫斯科之前，尤琴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曾在罗马被美国特工人员跟踪并绑架。观察家注意到，尤琴科没有丝毫悔悟的样子，而是在记者招待会上非常活跃，不时打断使馆人员抢着说话，普通背叛者一般不会这样做。

难道尤琴科是一个真正的背叛者，只是后来对在美国生活的前景感到悲观失望吗？难道他决心回国，只是因为中央情报局亏待了他，或者因为他的女友——一位苏联驻加拿大

外交官的夫人——拒绝同他一起流亡吗？他是否是克格勃蓄意打进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还是被用来警告可能的背叛者，美国不会给他们提供安全的避难所？有人指出，不久前克格勃驻伦敦人员奥列格·戈迪叶夫斯基在英国寻求避难。尤琴科为了表示真诚，供出了佩尔顿和霍华德，可是1985年年中这两人就已成了无价值的废物。

苏联对美国情报机构的渗透占据了中心舞台，同时发现，另一个国家以色列也正在窃取美国的秘密资料。1985年冬，海军反恐怖主义分析家乔纳桑·波拉德和他的妻子安尼因被指控为以色列搞情报而遭拘捕。波拉德能接触为整个情报机构服务的计算机系统，他向以色列提供了关于美国向阿拉伯运送武器装备的秘密消息，伊拉克和叙利亚化学战潜力的数据，以及使以色列能在1985年10月轰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突尼斯总部的有关情报。作为交换，波拉德从以色列得到5万美元现金，并在以后10年中将得到30万美元，这对夫妻生活水平大大超过正常收入，但是海军方面没有查明原因。直到他经常索要与自己工作无关的绝密文件时才引起人们的怀疑。

联邦调查局把他们监视起来后，波拉德夫妇突然逃往以色列使馆，但被拒之门外，就在门外，他们被捕了，当时他们还带了满满一箱绝密文件。事发不久，同波拉德联系的3位以色列外交官为了逃避罪责，偷偷飞回以色列。以色列官方声称，将波拉德与他们联系在一起是无赖行为，然而波拉德对审讯者交待，他们传递的秘密情报得到“以色列政府最高层”的赏识。

波拉德案件触发了美以之间的外交争端，这是因为美国的反情报机构不仅要对付美国的敌人，而且要对其忠实盟友之一的以色列进行隐蔽战。有人认为，如果真是这样，那以色

列牺牲波拉德夫妇只是为了丢卒保车。

弥补间谍瘟疫造成的损失需要多年的艰苦努力和数十亿美元代价。初步研究表明，美国情报机构驻外特工网络和在世界主要地区的电子窃听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在公众要求制止情报非法外流的呼声下，国会被迫通过了包括对间谍恢复死刑，对接触保密资料的400万政府雇员进行测谎器试验等一系列法规。

反情报专家指出，死刑不可能遏制间谍活动，当间谍认为一旦被捕可能坐牢，更不用说被处死时，他们就不会去执行秘密任务了；他们一般认为是不会被捕的。测谎器也不是查明隐蔽间谍的可靠工具，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完全可以使测谎器无效。要防止再度出现间谍年，仅仅采取简单强硬的措施是不够的。

詹姆斯·安格尔顿被撤职后，中央情报局反情报人员从300名缩减为80名。安格尔顿建造的中心资料库按地理位置被分成了若干部分，据说获取入库许可证易如反掌。间谍案接二连三发生后，专家们建议扩大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反情报职能，改善协调工作，以弥补国会抨击情报机构对内从事间谍活动后带来的经费压缩、人员裁减问题。但训练一支合格的反间谍队伍至少要化4年时间。专家们认为迅速加强保密的最好办法是减少密级文件数量和接触密级文件的人数，同时严格政府安全检查制度和增加检查次数。但是据1988年底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分析，在安全方面仍有不少薄弱环节，比如，五角大楼每5年需要接受一次安全检查的人员多达10万。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认为，目前“秘密材料太多，能接触秘密的人太多，间谍太多，……而消除间谍威胁

的努力则太少了。”

那些揭露出的间谍案有很大破坏性，然而围绕里根——凯西中央情报局的最大争论是该局在全球所采取的隐蔽性准军事行动。关于“自由战士”抗击苏联支持的优势兵力的传说——在阿富汗的丛山峻岭中，在非洲的灌木草丛中，在中美洲的热带森林中，“自由战士”们以寡敌众，顽强地进行战斗——勾起了总统的联想。里根在1986年的国情咨文中对这些“自由战士”说，“美国将……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你们为自由而奋斗、牺牲和为赢得自由而战的权利。”

在里根总统任职期间，隐蔽行动成为“第三选择”。政府扩大隐蔽行动，并在80年代中期每年拨款6亿美元用于准军事行动。

从1979年开始的阿富汗行动时间最长。与其它一些行动不同的是，这次公众一致赞成支持游击队，希望让苏联为其付出更大代价。此外，与在中美洲的威胁不同的是，苏联在阿富汗的威胁是赤裸裸的。为了对付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国会拨款10亿美元，其中沙特阿拉伯出资约2.5亿美元——据报道，这2.5亿美元在到达那些部落手里之前，约有三分之一被扣除掉了。这些钱存在中央情报局一家瑞士银行的户头上，专门用于购买苏联以及其它渠道来的武器装备。但叛军发言人抱怨说，这些武器装备他们连一半都未得到，而且大多是不能使用的。

批评家认为，帮助反共叛乱分子的政策使用范围太广，它会使美国卷入与美国利益无关紧要的地区。他们指出，除了阿富汗叛军外，接受美国援助的任何其它组织都没有推翻亲苏政权的前景。批评家还认为把叛乱分子称为“自由战士”简直滑稽可笑。比如，在尼加拉瓜领导反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

线的索摩查国民警卫队并不比“桑阵”更加民主，也没有广泛的公众支持。阿富汗穆斯林起义者誓与苏联人不共戴天，但是他们只是些宗教狂，并不喜欢民主。如果安哥拉支离破碎的局面不是悲剧，那也称得上是一场闹剧。接受中央情报局慷慨援助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的领导人乔纳斯·萨文比也只不过是伊夫林·沃美洲讽刺小说中的人物，他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结盟，经常袭击由古巴军队守卫的美国切浮龙——海湾石油公司的设施。

中美洲是里根的主要烦恼。他认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和他们在萨尔瓦多的盟友计划把该地区变成另一个古巴，这样，苏联既可把它用作在南北美洲腹地的基地、又可用作从事颠覆活动的舞台。同时里根担心中美洲的骚乱或共产党的胜利会使难民潮水般地涌向美国。里根任职几个月后就签发了企图制止从古巴和尼加拉瓜向萨尔瓦多出售武器的报告，这样为越战以来规模最大的隐蔽行动奠定了基础。

凯西勇敢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不久，该行动成为著名的“凯西战争”。起初拨款1950万美元，由阿根廷和洪都拉斯军方为美国培训一支500人的队伍。采取这一策略的目的是为了堵住国会中反对派的嘴，因为越战以来他们心有余悸，害怕美国在中美洲地区再次被拖进泥潭，但是这件事越来越清楚地露出马脚。当华盛顿在福克兰战争中表示支持英国后，阿根廷气愤地退出该计划，于是，中央情报局只好直接指挥这项行动。

越战后关闭的部门恢复了工作，在加勒比和东南亚地区曾经从事过隐蔽活动的“莽汉们”重新被招募去参加这场秘密战争，其中有些人与流氓侦探埃德温·威尔逊有密切关系。凯西重新起用退役空军少将理查德·西科德，尽管此人伦理

败坏”中央情报局对他疑虑重重。西科德否认与威尔逊有过合作，但承认威尔逊是他和伊朗人艾伯特·哈金搞商业合作的牵线人。中央情报局前官员托马斯·克莱因也是威尔逊的助手，他雇了飞行人员执行秘密运输任务。尽管中央情报局否认，但另有报道说，该局还雇用了贩毒分子参与空运。

在凯西的策划下，由装备极差的乌合之众组成的前索摩查国民警卫队变成一支 2 万人的反革命突击队，配备有自动步枪、迫击炮、重机枪和轻型飞机等武器。但是随着人数的增加，这支杂牌军也越来越难控制。经常有报道反映他们的残暴、内讧、践踏人权、腐败、贩毒和缺乏战斗力。甚至在中央情报局支持他们数年后，他们仍无成功的迹象。

中央情报局内部对凯西热衷于隐蔽行动有强烈的保留看法。副局长约翰·麦克马洪一再反对扩大这种行动，几次努力失败后于 1986 年 12 月辞职，他的位置由唯命是从的罗伯特·盖茨接替。麦克马洪之所以反对卷入大规模的准军事行动，是因为这些行动遭到公众的批评，引起国会的攻击，受到新闻界的揭露。但是凯西支持反政府武装的热情没有减弱，他不能容忍国会和其它官僚机构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内的压力，将隐蔽行动牢牢控制在自己和经他遴选的少数助手手中，其中秘密行动司拉丁美洲处处长杜安·克拉里奇尤为得宠。

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随心所欲的“中央情报局内的中央情报局”可以追溯到 40 年前战略情报局的光荣时代。凯西在一次战略情报局老战士团圆会上说：“我相信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可以告诉我们今天应该怎样挑起全球的重担。虽然能干的人员相对少了，而且也只能得到军费预算中的一小部分，但是我们仍能向第三世界输送新的力量，遏制第三世界践踏民主自由和人权、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马列主义

政权。”

在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萨尔瓦多的美国大使和情报站长们，通过告诉飞行人员空投地点和如何避开“桑阵”的攻击，直接支持了这项运输任务。中央情报局的暗探们指挥袭击了太平洋沿岸港口科林托的储油罐，为那些主张政治暗杀的人介绍开展游击战的知识。他们公然违背国际法，在尼加拉瓜几个港口布设水雷。在布雷后的一天夜里2点，前反对派领袖埃德加·钱莫洛被中央情报局一名官员叫醒要他对这次布雷承担责任。盟国如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被劝说给反政府武装提供资金和武器，南非也给予了帮助。里根总统本人参与了筹款活动，在沙特国王和总统会谈之后，沙特同意每月捐款从100万增至200万，筹款总数最后超过了3000万美元。

国会对不太秘密的“秘密战争”和凯西的管理能力越来越不安。总统提交国会的报告中只表达了有限的目的，而中央情报局的隐蔽行动却是无限制的，这一差距使国会更加愤慨。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作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和里根意图的支持者也对凯西的正直和诚实提出了质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丹尼尔·莫伊尼汉谴责道，凯西不但没有依据法律预先通报重要活动的计划，而且在对尼加拉瓜港口布雷5周后才将此情况作了汇报。

国会终于在1984年10月通过了称作“博兰修正案”的一系列法律中的第一项，专门制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以及“美国涉及情报活动的一切机构和实体”动用资金支持反政府武装。虽然1986年夏国会同意向反政府武装提供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是此前反政府武装只得到了合法的“人道主义援助”，而且中央情报局或五角大楼都没有插手。

谁要是认为这些限制会使里根总统削弱或停止在中美洲的秘密战争，那么他必定没有考虑到里根对尼加拉瓜叛军所承诺的责任。罗伯特·麦克法兰告诉国会调查人员："在公开场合或私下交谈中，总统不止一次地表明，他不愿背弃反政府力量。为了恢复军事援助，里根游说国会和美国人民，并暗示说，谁要是反对援助反政府武装，谁就是对共产主义软弱，由此凯西为中央情报局找到了保护伞。法律要求中央情报局向国会报告自己的一切活动，而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在白宫办公，不受任何外界权威的监督。因此，反对"桑阵"的实际指挥权移交给了国家安全委员会。

海军陆战队中校奥列弗·诺思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是凯西的代理人。凯西制订政策，诺思执行。诺思英俊、机敏、富有爱国心，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他曾协助为入侵格林纳达，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轰炸利比亚和捉拿劫持"艾基利·芬罗"号客轮的恐怖分子等行动制订计划。他同里根总统一样，为反政府武装操劳不息。在国会颁布"博兰修正案"前，他一直给他们以帮助，作他们的军事顾问。他与凯西合作指挥着活动在中美洲丛林和瑞士银行的一批集资者和前情报军事人员，后来由得克萨斯州前参议员约翰·托尔为首的总统检查委员会指责凯西没有履行提醒总统美国外交政策有"秘密化"危险的职责，并说他"应该要求把这一职责转交给中央情报局"。其实这正是凯西想回避的事。实际上，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防止国会限制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并把活动的绝对控制权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里。如果没有奥列弗·诺思，凯西也会设法创造一个出来。

1986年11月，关于反政府武装得到外来经济援助的传说

破产了，这件错综复杂的事首先在黎巴嫩被揭开。贝鲁特一家与伊朗激进分子有联系的杂志披露说，85年底离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麦克法兰于次年5月秘密访问了伊朗，为了释放被什叶派恐怖分子扣押在黎巴嫩的几名美国人质，美国答应向伊朗提供武器。据说，曾经再三宣布绝不同恐怖分子谈判，并谴责伊朗为国际"谋杀公司"成员的里根总统批准了这项任务，以及与伊朗的其它交易。

里根断然声称这些报道毫无根据，并说报界公开发表这些无稽之谈危害了美国营救人质的努力。但是在感恩节前两天，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透露，武器确实运抵伊朗，目的在于联络伊朗"温和派"以取得人质的释放。他进一步指出，这笔武器交易获得的约3000万美元不知去向，据说可能转送给了尼加拉瓜叛军。为了替总统开脱责任，米斯声称，只有麦克法兰的继承人、海军中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上校与秘密转交资金给反对派有关，总统对此一无所知。披露这件事情后，诺思被国家安全委员会解雇，波因德克斯特辞职。

伊朗门事件很快成了继水门事件之后华盛顿最大的丑闻，严重地损坏了里根总统的威望，特别是在他表示无法回忆起重要细节，并坚持说自己没有用武器交换人质之后，人们对他的真诚和能力提出了严肃的质问。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关键问题既不是向伊朗出售武器，也不是向反政府武装转移资金以致违反了"博兰修正案"，而是政府欺骗人民，说了假话。用武器秘密交换人质对里根极力宣扬的绝不与恐怖分子打交道的政策是一个极妙的讽刺。华盛顿努力反对世界恐怖主义成了空话，里根总统则成了笑柄。

里根支持者们争辩说，丑闻出自两名过份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自以为自己要做的就是总统想做的。其实总统只是

上了当的旁观者——这是托尔委员会能接受的一种解释——并且这一插曲仅仅反映了白宫与国会争夺外交控制权斗争的一个侧面。但是众参两院调查委员会收到的证词证明，总统已深陷伊朗门事件。当里根理屈词穷时，只得强调“博兰修正案”不适用于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他坚持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是一个情报机构，而仅仅是我的顾问。”

国会两个委员会和一名特别检察官开始深入调查伊朗门事件。此后8个月中，全国上下密切注视着报纸、电视上报道的耸人听闻的事件，如隐蔽行动、瑞士银行的秘密帐户以及国际武器秘密交易等等。奥列弗·诺思和威廉·凯西成为轰动事件的中心人物。他们两人年龄相差30岁，但是他们共同支持反政府武装，共同承担因国会对他们行动范围限制而带来的痛苦。凯西给诺思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有钱，有势，功成名就。他后来对国会调查人员说，这位长者是他的良师益友。在凯西的指导下诺思组织一帮人支援反政府武装，当伊朗门事件行将败露时，凯西指示他销毁了所有的证据以掩盖事实真相。

凯西自己和中央情报局在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说法很含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这件事，我们只是配合行动。”在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作证时，他对许多问题的回答都是“无可奉告”，以致每次回答都引起调查人员的哄笑。但是大量事实同他声称对行动不甚了解的说法相矛盾。这次露面不久，凯西似乎有些筋疲力尽，终因恶性脑瘤住进了医院。1987年2月，副局长罗伯特·盖茨接替了他的职位。3个月后凯西去世了，他在伊朗门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谜被他一起带进了坟墓。

盖茨是继威廉·科尔比之后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第一个职业情报人员，并且是从情报分析人员而不是从隐蔽活动人员中提拔起来的情报局长。但是他任职仅29天，由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对他在向伊朗出售武器的交易中的问题查不清，他自己要求取消任命。于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的新局长，盖茨仍然当副局长。

凯西的去世自然使他成为替罪羊，但是对于这一行动他思想上是共鸣的。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席丹尼尔·上井评论说："辨认沙滩你不必看清每一粒沙子。"除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和他的同伴外，这一越轨行动牵涉到一大帮人。

在黎巴嫩的一名人质威廉·巴克利的困境引起了中央情报局的特别关注。1984年 3 月巴克利被捕时，他被视为驻贝鲁特美国大使馆的政治官员，而实际上他是驻贝鲁特情报站的站长。他掌握中央情报局在中东地区整个地下网络的情况。为了寻找他的下落，中央情报局白白浪费了近50万美元。

事实上，赎回人质的问题首先是由一度担任过秘密行动司副司长的情报老手西奥多·沙克利等人提出来的。1984年11月沙克利报告说，一名自称与伊朗革命派领袖有来往的伊朗人马纳彻·戈巴尼法曾提出用武器交换人质。可是美国官员认为他是个骗子，根本没有理睬他的建议。沙克利受了一段时间的酷刑后死去。据说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得知他受到痛苦折磨的详情时还落下了眼泪。

根据国会调查人员对伊朗事件的回顾，1985年春，以色列建议用武器交换人质。以色列官员后来承认，沙特军火商艾德南·卡肖吉安排了戈巴尼法同两名以色列军火商阿道夫·施维默和雅科夫·尼罗迪见面，戈巴尼法告诉他们，伊朗"温和派"想买武器，并为西方解决人质问题打开方便之门。

这一安排对各方都有好处，伊朗同伊拉克血战 4 年之久，急需武器和补充国王原先购买的美国装备的部件；在华盛顿宣布禁运之前一直暗中向伊朗提供装备的以色列想乘机帮伊朗一把；美国想使人质获释；军火商则可大发横财。

1985年 7 月 3 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前情报部副部长戴维·金奇告诉麦克法兰，以色列与伊朗已成功地进行了对话，伊朗官员迫于日益严重的苏联压力，对与美国谈判开始发生兴趣，并答应施加影响释放人质，以换取一批美制“陶”式反坦克导弹。美国官员，尤其是总统本人，听信了以色列的话。

在凯西指导下，中央情报局官员作出了新的分析，认为霍梅尼政权摇摇欲坠，伊拉克将赢得战争胜利——尽管其它部门不同意这个分析。国务卿舒尔茨和国防部长温伯格都反对这种评估，温伯格在一份文件上用铅笔批道：“荒谬绝伦，不值一看。”舒尔茨告诫说，以色列关于伊朗的日程安排“与我们的安排不一样”，并且谴责这个提议是“反常的”，是“与我们自己的利益背道而驰的”。

中央情报局缺乏伊朗情况的来源，无法查证戈巴尼法的话是否属实，只得相信以色列，而以色列后来承认，他们自己的情报也几乎全部来自中央情报局一直认为不可靠的戈巴尼法。然而里根总统以为出售一批武器可以表示“诚意”，并能使人质获释，因此给以色列开了绿灯。由戈巴尼法和以色列作中间人，一批“陶”式反坦克导弹于八九月份抵达伊朗。但是结果使白宫非常失望，5 个人质中仅有 1 个获释。

1985年11月，在中央情报局的配合下，至少又装运了一批反坦克导弹和部件。副局长约翰·麦克马洪得知这些武器作为石油勘探设备由南方航空运输公司送往伊朗时，他对同事们说，这次行动没有总统的书面批文，是非法的。为了对

村不同意见，凯西请求总统补发了批文，使这次行动合法化。可是因为这批武器全是过时货而且贴有以色列标签，伊朗没有接受，所以没有再释放任何人质。

1985年12月，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失望中决定取消向伊朗出售武器，这不仅因为只有1名人质获释，而且因为戈巴尼法没有通过测谎器试验，他们再也不相信他了。此外，舒尔茨和温伯格对这次行动持反对态度，1987年1月，总统召集助手们重新讨论伊朗计划。舒尔茨说，总统显然倾向于恢复武器出售。总统问："出售武器有什么错的呢？"凯西避而不谈戈巴尼法在该局测谎器面前的失败，热情支持出售武器计划。

10天后，里根正式签发了一次裁决，命令恢复向伊朗出售武器，这次从美国的武器仓库中直接提取，防止假冒。中央情报局的律师对总统说："通过恰当的裁决，你可以授权中央情报局向不受法律条款和出口军火规定限制的国家出售武器。"但由于此事"十分敏感"，凯西奉命对国家监察委员会隐瞒了此项裁决。尽管舒尔茨和温伯格对发生的一切非常清楚，但他们不过问，也不介入。

人质问题使里根百般苦恼，这也许是他改变政策的原因。圣诞节期间，被扣人质的家庭万分悲痛，这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身上。有迹象表明里根希望在作1986年国情咨文时看到所有人质获释。根据国家安全顾问波因德克斯特将军的备忘录记载，以色列曾暗示，他们担心伊朗在与伊拉克的战争中会节节败退。

在武器交易中私人军火商没有插手，中央情报局扮演了主角。它从五角大楼以大大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购买了价值1200万美元的武器，并负责由美国经以色列转运到伊朗。由

于中央情报局的这笔经费必须经过国会批准，凯西只得秘密地让西科德开办一个假公司为该局作掩护，这样西科德的“公司”可作为以色列的代理人将武器卖给伊朗。但是伊朗拒绝预支买款，中间人艾德南·卡肖吉只得依靠合伙者提供了3000万美元。

五角大楼收回了1200万美元，其余1800万美元由西科德、艾伯特·哈金和诺思上校控制，存放在一家瑞士银行里。起初诺思建议将这笔钱由戈巴尼法转交给伊朗反政府力量，接着他又建议让伊朗人把钱交给尼加拉瓜叛乱分子。据诺思说，凯西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实际上反政府力量仅得到350万美元，直到这次行动失败时，仍有800万美元留在瑞士银行里。诺思很快就结清了余额，他在证词中说，这笔钱使凯西产生了一个大胆想法，即用于世界范围的隐蔽行动，不必入帐，也不受国会限制。

但是伊朗人毕竟是狡猾的老手，他们对这批武器标价为原价的4倍感到非常气愤，不断以拖延释放人质来要挟美国人，由于戈巴尼法一直不守信用，拒绝安排释放人质，诺思、西科德和艾伯特·哈金建议接触另一个中间人，伊朗二号人物拉夫桑贾尼的侄子。他们当场拍板，保证一旦伊朗遭到俄国人的入侵，美国将同苏联宣战，同时他们还声称美国将寻求有利于伊朗的办法来结束两伊战争。作为交换500枚“陶”式反坦克导弹的条件，伊朗答应释放所有人质，但结果仍只有1人获释。

戈巴尼法对将他排斥于谈判和分红行列之外非常气愤，威胁说要公开此事。与卡肖吉一起为这项行动投资的人声言要为他们未得到的钱打官司，以此敲美国政府的竹杠。1986年11月2日，《贝鲁特》杂志刊登了有关麦克法兰的德黑兰失败

之行的文章，于是整个武器交换人质事件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总共有3名美国人被释放。但是另外3名又被绑架了，被极端分子劫持的人质仍然是5人。美国官员对伊朗人奸商般的狡猾缺乏心理准备，彻底上当受骗。舒尔茨评论道："我们的人输得两袋空空。"每次吃了亏不但不接受教训，而且更信任伊朗人，给他们送去更多导弹和部件。这是贪婪、欺诈和无能的写照，也是美国政策失控的反映。

1987年7月初一个雾茫茫的早晨，众参两院对伊朗门事件的调查公布于世。上井参议员拖长了声音说："诺思，请你站起来举起右手。"参议院秘密会议室一片寂静，奥列弗·诺思身穿海军陆战队军服，僵直地站到令人注目的位置，这是自尼克松13年前被迫辞职以来最大的政治丑闻。这个听证大厅是美国历史上几宗最令人难忘事件的见证，1921年内政部长受贿案，陆军—麦卡锡案，水门事件等听证会都在这里举行，但诺思勇气十足的样子是以往任何一次不能比拟的。

诺思声称："我来到这里讲真话，不管是好的、坏的还是丑的。"全国很快被他的叙述惊呆了，在以后的6天里，他时而滔滔不绝，时而咄咄逼人，时而粗暴无礼，他谈到那些异乎寻常的秘密活动，瑞士银行帐户，秘密武器交易，"似乎可能的否决"以及不露蛛丝马迹的合作等等。

"一项隐蔽行动实质上是一种谎言，"诺思镇静地对隐蔽行动作出自己的结论。他认为，有人已把撒谎作为一种政策，对国会撒谎，对内阁成员撒谎，对美国人民撒谎，为了保证行动安全，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备忘录送至总统而没有回音，那是因为可能否决的事不能公开。实质上，诺思

证词使人相信政府有充分理由及动机进行这些行动。面临如此敏感的行动，置碍手碍脚的法律于不顾是允许的。与犹豫不决的国会相比，总统是更坚定、更顽强、更名副其实的民主斗士。

诺思证词中最令人吃惊的部分之一是关于威廉·凯西的意图，建立一个不受国会和情报机构控制的“隐蔽、自给、独立的实体”，以便进行情报机构不愿或不能承担的活动。调查委员会对重蹈历史覆辙，建立类似战略情报局的计划深感吃惊，但是事实上，它已经以“企业”的形式而存在，这是凯西为了援助反政府武装和进行其它隐蔽行动而组织起来的“企业”。这个“企业”建立后的两年里，有权支配飞机、机场、船只、武器库、秘密银行户头以及遍布全球的商业网络。

最后，调查没有发现里根总统与违反“博兰修正案”把资金转移给反政府武装有关的“确凿证据”。诺思的证词似乎想把总统拖下水，他对委员会说：“我从未进行过一次未经上级批准的行动”。但是一贯记忆力较差的波因德克斯特在这件事上给总统解了围，他说资金转移是他亲自批准的，因为他以为这是里根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告诉总统。虽然里根声称这已证明他清白无辜，但许多美国人不相信这种解释。

特别调查委员会为了避免与总统发生冲突，宣布它自己规定的审案时间已到，于是把自相矛盾的证词和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留给特别检察官去解决。1988年3月16日，诺思、波因德克斯特、西科德、哈金以及中央情报局哥斯达黎加站站长约瑟夫·费尔南德斯因对国会撒谎，违反“博兰修正案”和挪用政府资金而被起诉。

不管结果如何，有几点是清楚的。总统宽恕了为执行秘密外交政策而在政府之外建立秘密网络的行为。许多计划是由

那些本身有问题的人干的，而他们又作了与政府政策相悖的保证；高级官员对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了反政府武装方面一再向国会撒谎，向美国人民撒谎；与可耻的中间人作武器换人质的交易，把美国政府降低到了乞求施舍武器的盟友位置上。

在很大程度上，伊朗门事件是猪湾事件的重演，都有同样的秘密活动分子，同样的反共武装部队，同样的铤而走险的愚蠢企图，同样错误地相信美国的行动不会曝光，以及同样彻底失败的恶果。里根的支持者们为这些计划辩解说，虽然方法有严重缺陷，但人质的释放和尼加拉瓜反抗力量的生存证明这一计划是正确的。他们认为，总统唯一的错误是为了秘密实施一项微妙得使美国人民难以理解的政策而屈服于措辞不当的法律。

然而，那是把领导人的缺点归咎于民主。归根到底，伊朗门事件是蔑视民主政府繁琐的办事程序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这种蔑视孕育于数十年来采用的简便快速的隐蔽行动。隐蔽行动的魔力难以抗拒。然而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秘密政策只有遵循像公开政策一样的程序才能得到成功，这是一个明确无误的公理。众议院调查委员会主席李·汉密尔顿说得好："我们的政府不可能在暗中发挥作用。除非官员们说真话，否则政府不能发挥作用。只有当政府的各个部门相互信任共同协作时，宪法才能产生效力。"

结束语

每天上午，威廉·韦伯斯特乘坐黑色轿车由司机送往中央情报局绿树环抱的兰利总部。下车后，这位中情局局长从车库直接乘坐电梯去位于第7层楼的办公室，这样，他就可以避开总部入口处大理石走廊中“莽汉”比尔·杜诺万肖像上深沉的目光。这倒也好，因为韦伯斯特的主要任务是消除杜诺万领导的战略情报局的“能干”精神，这种精神像令人昏昏欲睡的咒符一样缠绕着美国情报工作近半个世纪。

韦伯斯特就任全国谍报工作领导人时含蓄地表示，要与无法控制的鲁莽行动告别，要开辟与国会合作的新纪元，要结束威廉·凯西为了迎合某种政策、不惜歪曲情报评估和分析的做法。他在宣誓就职仪式上宣称：“我们将在世界各地努力执行任何困难任务，并要忠于宪法和法律。”为了表明他从事的是搜集和分析外国情报的传统工作，官方宣布，与凯西不同的是，他将不成为内阁成员。

韦伯斯特指挥的这个机构深陷困境。伊朗门事件风波刚刚停息，整个华盛顿磨刀霍霍，准备向中情局算帐。除了这一丑闻引起的激烈争吵，情报界还面临着经费危机。为了削减里根执政期间积累的巨额赤字，等待情报界的是人员裁减和不景气。令中情局聊以自慰的是，凯西擅自采取背离中情局规定的越轨行动，应由本人负责。然而，韦伯斯特要恢复人们对中情局整体的信任，恢复情报产品的可靠性，任务十分艰巨，这同他在联邦调查局工作时所面临的任务相似；甚至

批评家也承认，他在联邦调查局加强了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创造了打击敲榨勒索和制造国内恐怖等犯罪活动的有效方法。

沉默寡言、举止矜持的韦伯斯特到兰利就职时也有某些有利条件。国会、美国人民和情报界的有识之士都希望改革。他对中情局任何部门、对任何外交政策都无偏见，可以放手改革。他虽缺乏对外工作经验，但在情报工作方面他也绝非新手。40多年来，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一直明争暗斗，特别是在反情报领域，深知内情的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这种争斗给外国间谍肆虐美国提供了可乘之机，而韦伯斯特是彻底结束这种争斗的理想人物。

韦伯斯特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隐蔽行动的未来。一些批评家呼吁禁止使用秘密手段达到政治目标，指出这样做麻烦甚多、得不偿失，还玷污了美国的国际声誉。韦伯斯特声明，他“不反对”隐蔽行动，但与凯西不同的是，他对隐蔽行动表示了相当大的怀疑态度。为了加强对这些活动的控制，他建立了一个由中情局资深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审查有关隐蔽行动的一切建议，并经常审议正在实施的行动计划。值得注意的是，该委员会由秘密行动司以外的一名官员领导。

虽然韦伯斯特的改革赢得了国会和舆论界的支持，但是一些老手对秘密行动越来越从属于机关日常事务而不满。在这些批评家看来，凯西下台后的改革削弱了中情局的秘密行动。他们认为，按照商业部或邮电部等行政机构相同的工作方针，情报机构就不能发挥作用，过多的监督和清规戒律抑制了情报人员的工作热情、主动精神和聪明才智的发挥。他们认为韦伯斯特的工作重点旨在避免麻烦，而不是积极承担中情局工作范围内那些艰巨有时甚至危险的任务，结果，该局的秘密行动能力遭到破坏，韦伯斯特主管的只是一个失去锋

芒、四平八稳的中情局。

伊朗门事件之后，中情局外部的人提出旨在加强该局效率和责任的大量建议。一些观察家认为该局太庞大、太臃肿、太官僚主义化，以致不能发挥有效作用。为了恢复秘密工作职能，有人建议中情局精减机构，把“闹哄哄”的准军事行动转给五角大楼，把宣传工作转给美国信息局等单位。还有人建议禁止国家安全委员会参与行动计划，要求参议院确认国家安全顾问这样的重要岗位人员，并加强同国会的协商，进一步确定中情局的职责范围。

人们特别重视中情局局长的作用，建议局长的任期应该固定——普遍提出任期为6年——并且局长本人不主动参加行动计划。鉴于局长将继续充当总统情报顾问并统管整个情报界工作，中情局的日常工作应交给与联邦调查局局长同一级别的另一官员负责。人们指出，如果这些工作集身一人，那会使总统绕开国务院，不同国会协商便秘密实施外交政策。

然而，从情报界走过的道路来看，这些试图改组机构和调整组织的努力将是徒劳的。不管制订什么计划，不管在法律上作出什么限制，总统将继续因人们对外交政策争论不休而无所适从，很可能会独立采取迅速行动。再说如果白宫决心采纳某种意见，总能很快找到合适的执行者。

鉴于上述情况，根本问题不是盲目服从命令，而是具备必要的常识和良好的判断力。决策者们在酝酿秘密行动计划时，应该考虑诸多基本问题。假如政府中有人千方百计打听秘密，新闻媒介不遗余力套取秘密，那首先就得考虑某一行动计划公开后会产生什么后果，该计划会获得美国人民的支持吗？它与美国的公开政策相悖吗？那些即将获得美国秘密支持的是些什么人？对于用武器换人质的鲁莽决策，如果当权

者中有人思考了以上问题，那伊朗门丑闻就几乎不会发生。

然而必须记住，秘密行动至多只是情报机构存在的一小部分理由，情报机构的主要目标仍然是，通过情报收集和分析，向决策者提供他们对重大事件作出预见和反应所必须的信息。美国200年的历史表明，秘密情报收集是有效决策的前提，是政府必做的工作之一。起初，美国情报工作是军事行动的辅助手段，但在当今动荡不安的时代，它有更重要的作用，当代的总统有如同战时华盛顿和林肯一样“必须了解”的东西。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主要大国集团之间取得大体均势，情报同核导弹一样有威慑作用。因此，超级大国使用卫星拍摄军事设施照片、侦听导弹试验数据，并且也使用间谍、内奸、破译密码等常规手段收集情报。为了有效遏制对方，敌对双方必须了解对方的破坏能力。不管这一现实如何令人厌恶，间谍和间谍活动在国际生活中比比皆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吸取历史经验。美国情报机构走过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当开拓技术手段收集情报时，它在情报分析方面却落后了。它一贯善于获取事实，但在分析事实、估计形势、指明方向并对突发事件提出预报方面却大为逊色。然而有些时候，比如在越南事件中，当中央情报局正确地认为美国不能获胜时，决策者们却不愿听真话。总之，不仅要获取情报，而且要恰当使用情报。

提高情报质量不靠灵丹妙药，不靠新的法律，也不靠技术上的突破，而靠平凡的措施：招募有发展前途的人员，系统训练，不断改进情报收集和分析方法，提高高级职员的素质和独立工作能力。当总统受国内政治的左右，作出不合时宜的决策时，情报人员必须大胆进言。

作为决策者，当他们获得令人吃惊的情报时，必须学会保持镇静。此类情报常常引起惊慌，使人判断错误，因而采取盲目行动。对情报评估、现行政策、敌我分析和国家利益的认识常常有不同看法，决策者们只有倾听各种意见，才能很好使用情报。同时，他们不仅要看到情报的作用，还要看到情报的局限性。情报能提供各种选择，但不能作出选择，也不能为错误政策作出补偿。情报的作用在于最终合理使用。

此外，在不损害秘密工作的情况下如何对其有所约束？秘密机构与民主社会之间存在着自然的矛盾。情报机构是以不同于其它机构的宗旨和准则而组成的保密团体。情报人员是国家安全的保护者，比不断更替、经选举产生的官员更熟悉国家安全工作，在此意义上，他们无异于其它机构的行家里手，他们的观点与政府其它部门当权者的观点一样，同样需要给予重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视同仁的观念被抛弃了，在隐蔽战线工作的情报人员往往受到妄想狂的攻击，对秘密情报的需求反而引起人们对制衡的更大呼声，而制衡反过来危害了秘密情报工作。这一进退两难的问题解决起来谈何容易，既不可立法，又不能自动消失。

说到底，秘密机构要在一个民主社会受到欢迎，就必须反映那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但是我们的政府不仅由法律、而且由人组成，不管我们在法律和制度方面采取什么措施，情报人才以及监督他们的人员总是不能减少的。